

小说

离家的前夜

堂厅里黑漆漆地。右边屋子的耳门虚掩着，由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她旁边：两个人都屏息着向屋子里倾听。

“乖，宝宝，吃奶奶，吃奶奶。”那个新来的奶娘温爱地说着。

“呵呵呵……”小鸠又凄惶地哭起来了。

“哦，不吃，不吃。乖乖，莫哭，莫哭。”奶娘说。

小鸠不哭了。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蹑手蹑脚走到耳门旁，贴着一只眼睛向屋里瞧：坐在桌旁的是母亲，她皱着眉头，脸色带着一点怒和怨，一手抱着小鸠。小鸠凝着她灵活的小眼，注视着火。泪珠挂在小颊上，时时摇动着头，发出哭后的啾啾。奶娘靠在旁边，在桌上转着铜子。一共三个铜子在转，奶娘的手很灵捷，倒了这个，又转起那个。

“鸠，好玩呀，噯！”奶娘一边忙着转着铜子，一边笑着逗小鸠。

“嗯，嗯。”小鸠把小手指着在转的铜子，很高兴地啾啾着。

“嗯，嗯，鸠也转，鸠也转。”奶娘由母亲手里抱过小鸠来，把铜子给了她，说：“奶娘真疼你呢，小宝宝，你自己转。”

小鸠把奶娘那张陌生的脸注视了一会儿，忽然又有所感触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样？”蝶低声地问我。

“不成功，她不要她呢。”

蝶正打算说什么，忽然屋里传出母亲的话声：

“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现在的世界不同啦，要读书，——结了婚还要读书，生了孩子还要读书！真是新花样，女人读书有什么用！”

“少奶奶毕了业，会当女教习先生，赚钱来孝敬你老人家呢！”

“我也有这福气！女人毕业有什么用！这种狠心的，自己的血肉呀，你看，忍心把她磨得这样可怜！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

“妈，妈，妈，妈……”小鸠凄楚的稚音。

“宝宝，这是你的妈呀！”母亲的声音又变慈和了：“那个狠心的妈不要你了，你还想她做什么？——宝宝，乖乖。真是可怜呢，今天下午自你来了以后，一口奶也没吃。真是可怜的孩子！犯了什么法，叫人受饿罪！”

“鸠，噯，多好玩呀！”奶娘说。铜子又在桌上转起来了。

“娶什么女学生！我早就说女学生要不得。女学生是一朵花呀，摆在那里给人赏赏赞赞的呀！还抱孩子，抱孩子不是做了苦工？”

“赫赫赫！……”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

“你还笑！”蝶的声音分明含着泪。

“妈，妈，妈，呵呵……”小鸠又凄切地哭喊了。

“饿了啦！”母亲喊着说。

“小宝宝，吃奶奶，真好吃呀！”奶娘又在逗小鸠。

“呵呵……”小鸠哭得更厉害了。

蝶站起来，很快地推开耳门，走进屋子里去了。我也茫然地跟了她进去。

小鸠张开小口，眼泪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母亲说：“妈来了，妈来了！”小鸠看见蝶，张开手，使劲地向她怀里扑过来。口里亲热地喊着：“妈，妈，妈，”泪还不住地向下滚。

“真是活冤家！”蝶红晕着眼眶说，“乖，不哭了！”

小鸠果真不哭了，小手在蝶的胸前乱抓着，亲热地撒着娇。蝶把钮扣解开，露出乳来。可怜的孩子！她饿急急地含住了一只，又用手摩弄着另一只。但是凄凄切切地，又接二连三摇动小头，发出咿嚤的余声。

“你看可怜不可怜？”母亲感动地叹息着。

“真是痴东西！”蝶用手帕替小鸠拭了泪，抚摩着她柔细的头发，半似自语，半似教训地说道：“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还要择东捡西的！假使你妈死了呢，你不活了？”

“说得真好听！”母亲又怒又笑地说。

此时大家都无声了。那个奶娘无事可做，在旁边腼腆地搓着两手。

小鸠含着奶，已在蝶的怀里睡着了。

“可怜的孩子，”母亲轻松地挺了挺腰说，“饿了，又哭得疲倦了，现在一吃饱，不就睡熟了？真是可怜的！”

蝶抱着小鸠到我们自己的新房里去。母亲也打算去睡了，招呼奶娘，今晚权且在她屋里睡一宵，到明天再作道理。

我走回卧室里，蝶躺在藤椅上，一只脚踏着小鸠的摇篮，侧身向里面，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平日的催眠歌。

“又哭了，有什么值得哭的呢？快到一岁的孩子，那里这么容易换奶？——慢慢地，说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就肯吃她的奶了”。

“她不吃，她自己受！”蝶哽咽着嗓子发气地说，“我是一定要出去的，我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

一个正在绚烂青春的姑娘，生命在熊熊地燃烧，希望在她的目前美丽地闪烁。蝶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女子。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跃的，前进的，充实的生活。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村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她怎能过得下去？蝶说：“在校里读书，多么新鲜活泼！现在可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一切干枯的，死寂的氛围来逼紧我的心胸。我是个活的人，我不能死死地掩埋在这古墓里！”

我爱她，我完全同情她。

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房里静悄悄地。蝶不知几时已经起身，小鸠也不在摇篮里了。我懒懒地穿好衣服，找到后面厨房里，才看见蝶捧着碗在吃什么。昨晚的那一层愁云，早从她的脸上消散了。

“你起来了？”她含笑地跑近我。

“你吃的什么？”

“肝，醋炒猪肝，怪难吃的。”她皱着眉，摇着头说。

“吃这个做什么？”

“止奶呢！”她高兴地说：“小鸠吃奶娘的奶了。今天一早起，奶娘来抱她，她就要她抱。我叫奶娘抱她到没人的地方去。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厅上，和她玩了一会，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吃了奶，又玩了好久，一次也没有哭。现在我叫奶娘抱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知道熟了就会吃她奶的，昨天你偏要那么着急！”

“这样子，我俩明天就动身。”她一时真高兴。

“好，只要你愿意。”

奶娘声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因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她要在家料理；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里去养育。好在都同在一个村里，自然可以时常来来去去。我们也都答应了。

“不知道她家里干净不干净？邻居怎么样？屋舍怎么样？”我说。

“下午我要去的。我要送小鸠的衣服，东西去。”蝶一边回答我，一边又和女佣人说：“张妈，你先去看看她在那里登得惯登不惯？哭不哭？现在在那里作什么？奶娘待她怎么样？”

“你自己去一去也好。”我说。

“可是现在我不敢去；去了，她会不要奶娘了。——到晚上，我不见她面，偷偷地去看看情形。”蝶说着，眼就红了。

蝶中饭也不吃，忙着把小鸠的衣服，玩具和零星东西打点了一箱又一包；又忙着把我们自己的行李书籍理好。她脸色苍白得可怜，眼也变得滞钝了，泛着凄清的弱光。

然而刚才她并不是这样子的。

“蝶，你不舒服？歇歇吧。”我说。

“不要紧……”她哽咽着嗓子，向藤椅上一躺，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泪。

蝶虽然年青，但也是具有强烈的母爱的。青春的火焰鼓动她振起，前进；但等她丢开了孩子，预备振起，前进时，她顿时发觉已经失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心已经空虚，怅惘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正吃晚饭，蝶叫张妈提了箱子包袱，到奶娘家里去。

“你吃了饭再去。”母亲慈祥地和蝶说，“我和你一块去看看。”

“我吃不下。——晚上，路难走，你老人家莫去。”她说。

“少吃一点，你两天没有好好地吃饭了，饿出病来怎么办？”我也怂恿她。

“没有的事。我饿了，我自己会吃。不要紧。”她说着就和张妈去了。

我到外面去辞了行回家，屋子里坐着满满的人。蝶很兴奋，同时又很疲乏地坐在椅上。小鸠在她怀里又跳又唱。满屋里喧哗着，有的赞叹，有的怜惜小鸠。

“怎么她又回来了？”我看见小鸠在她怀里，不免惊奇地问。

“这孩子真了不得！”蝶含着柔弱的目光，兴奋地说：“我到了奶娘家，我不敢进去，只在房外坐着。小鸠在房内，正和许多左右邻家的孩子玩，玩得真高兴。以后，我和奶娘轻轻他说了一句话，她在房内就听出来了。她也不玩了，摆着头，嗯，嗯，嗯地四处望；望不见，她就妈，妈，妈地喊着，扁着小嘴要哭了……”

“噯，你慢慢说。”

“我忍不住了，走进去。我说：‘咦，你还认得我呵！’她喜得打起格格来，望我怀里扑，又跳又唱。唉，那样子我真说不出！抱到我手里，唉，那种快乐的样子！她就不放我了。这个抱，她不要；那个抱，她也不要。她把手指着外面，推我，打我，要我抱她回来。”

“今天就让她在家里睡吧。”我拉拉她的小手，又把自己的两手拍着。她摆着头，紧紧地抱着蝶的肩，表示不要我抱。

母亲不作声，只是叹息着。

小鸠在奶娘怀里吃饱了奶，——蝶的奶上涂着黑墨，小鸠曾失望地哭了

很久的。——就由蝶抱到我们卧室里来了。

我，蝶，小鸠，我们三个人都睡到床上了。小鸠高兴地爬着，滚着，嘴里又唧呀地唱着。蝶说：“你喊爸呀。”小鸠就滚到我身边，昂着头，窝着小嘴喊：“爸——”蝶说：“你喊妈呀。”小鸠就又滚到蝶的怀里喊：“妈——”她玩了一会儿，就安静地睡着了。

“你也静心睡吧。今天你太疲乏了。你看你又这样疲弱了，说不定你明天不能勉强动身的，饭又不吃……”我说。“日子迫了呀，我必定要赶上考期的。”

夜阑了。只有蚊虫的鸣声和时钟的摆动应和着。我也睡不着，翻身看蝶，蝶一手护着酣睡的小鸠，不时地耸动着肩，吐着长“你还没有睡着？”

“唔……”显然又在抽咽了。

“不要哭，好姑娘。”

“我的奶涨得痛。”

“过一两天就会好的。你静心睡，不要胡思乱想。”“我睡不着。——你靠近我一点。”

我把身肢靠近她，她空着的右手就抱住了我，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出去了，我不读书了。”她紧紧地把我一抱，就伤心地低泣起来了。

“你把胸襟放远一点。”我抚着她的发，不禁也黯然了。蝶索性大声痛哭起来了。

小鸠也醒了，在蝶怀里钻动着。

蝶一边哭，一边拍着她。

一九三 一、九

(原载 1931 年 7 月《妇女杂志》第 17 卷 7 号)

两只小麻雀

我的好友张兆佳夫妇和他们的可爱的小槐子都回他们的故乡歇暑去了。他们的故乡是一个有趣的去处。我要求他们到家后把那有趣的生活详细告诉我。兆佳就寄来这一束东西，说是从他太太的日记里节录出来的。

洗了澡，走到院子里来。佳捧着一只玻璃杯，在石榴树旁捉火萤；捉了一只火萤，闹着要拉我的头发下来“弹棉花”。所谓弹棉花，最是残酷的游戏：扯住一根头发，把萤的腹部在上面搓弹，发亮的东西天花乱坠地落下来，一只快活美丽的火萤就好端端地送死了。

“别作孽呀，它活它的，你活你的，各自享有其生命。”我像说道般地说。

“真是慈悲的姑娘！”他笑我。

我逼他放去了手里的火萤，拉他在竹床上坐下来。我们先谈着北方的好天气，渐渐谈到我们这阔别一年的故乡来了。佳吐了一口气说：

“如今，我们村里有三多。”

“那三多？”

说着，母亲也挈着小槐子出来了。母亲说：“三多？是多福多寿多男子！”我和佳都笑起来。我问佳是不是这三多？

“我说的却不是这三多。是断墙破壁多，抽鸦片的小伙子多，还有猪屎多！——少一件也算不得中国的现代乡村，少一件也算不得破落了的封建乡村！”

“养畜生，我最讨厌猪。”母亲坐到藤椅上，抚着槐子的头说：“又脏，又难看。——槐子，你喜欢不喜欢猪，黑猩猩？”

“黑猩猩，我不喜欢。”槐子莫明其妙地答。

我说我如果在家里不出去，一定要多养些小动物：小羊子，小白兔，鸡儿，鸭儿，……都养在院子里。佳说他幼年的时候，最喜欢小麻雀，从红颖颖的小雏儿，养成羽毛丰满的大麻雀。有一次，他养了一只最有趣的小麻雀。整天在自己的身畔飞；放它飞出去了，一回儿又飞回来。肩上臂上由它栖息。有时伸出小啄儿来在脸上轻轻地啄，不痒不痛的真好玩。我不相信这离奇可爱的故事。

“你这些话呀，也并不是自己编的，倒是从外国童话上直抄下来的。”

“你问母亲是不是真的！”

“句句是真的！”母亲安详地说：“早上上学去，麻雀也携了去；晚上回家来，麻雀栖在肩上同回来。后来被大伯娘家的黑猫儿咬死了，他哭了三四天。大伯娘答允买小白鼠赔偿他，他才罢休。那是——让我想想看，——那是他八九岁的事，比槐子大三四岁啦！”

槐子听得出神了，半晌才靠到我的怀里来，小手指摆在口沿上，仰着头急切地说：

“娘，我要小麻雀！”

“这可谈出事来了！现在你们给他小麻雀。——槐子，叫你爸爸给你，是他先谈的。”

“你也要麻雀？”母亲欢喜地说：“你倒说说看，小麻雀是个什么样儿？”

“小麻雀，——”他咿唔了许久，始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到后才挣着说：“笼里。芸芸家里。——有毛。叫！”用手比着笼子和毛。

我们都笑起来。小玉站在廊下，笑着解释，说是今天早上带他到大伯娘家里玩，芸芸有三只小麻雀。他当时就想要。芸芸一只也不肯给他。她哄他说回来找娘要。

大家正笑着，一个黑影子进了侧院门。天已经快夜晚了，除了几点流萤，四围只余着一团模糊的淡墨图了。我们正要问来的是谁，小玉却高喊着说：

“槐子，槐子，你的妈来了！”

槐子的奶妈已走近我们身边了。提着一只蔑篮，一个衣包，喘息着喊了我们。说听到我们托老三哥搭了口信去叫她来，她当天就想来；只是家里许多事，直到今天才弄完。奶妈还是一年前的旧样子，没有多少话说，放下篮子，捞起衣角来抹汗，许久才蹲到槐子身边，拉着槐子说：“小宝宝，还认得妈不？”槐子却生疏了，向母亲身边让。

我们都到堂厅里来，看见灯光都皱起眼皮来。奶妈坐立不安地，重又蹲到槐子身边去，说：“槐子，槐子，你不认得妈了？”槐子瞪着两只大眼睛，只是不作声。奶妈站起来叹了一口气，放着轻弱缓慢的声音说：“难怪呀！已经整整地一年了。”说着，眼睛里放着凄清的光，默默地望着槐子；说他长大了，胖了，又说他像个小洋人。母亲教他喊妈，他才迟疑地喊了。并且走近她。她牵了他的手，他才不畏惧了。

奶妈的篮子里装着两尾大龙头鱼，还有一些大瓜蜜桃和红椒。母亲问她阿宝怎么没来。她说动身时天黑了，他的爸明天送他来。又说，上次落大雨，他们河口村又发了蛟，屋子里上了二三尺水，七八盘四眠的老蚕，抢不及，全给水冲了。阿宝的爸大前天进城去修耘耙，路上遇着了一伙土匪，人家托买锡箔的五块钱都被抢去，还挨抢拐子打坏了右手，田里的活计一点也做不得，每天都是请伙计下田。……她一个字一个字迟缓到像被用力挤出来般的谈着。我在北平住了一年，这些另一个世界的事都已记不得了，如今又以那旧有的情调，从奶妈口里听到。

奶妈吃了饭，洗好浴，拉着槐子低声地问东问西。枯黄色早衰的脸上，堆满着慈爱的笑。一种幸福和欢慰的容光，盖住了原有的苦郁底云翳。槐子大约已从她身上找到了为他所熟稔亲热的旧有的东西，现在是很自在地和她有笑有说了。

“妈，你给我。——小麻雀，我要。”

我们都大声地笑起来。我告诉奶妈是怎么一回事。奶妈见槐子这样亲贴贴地和她索东西，高兴得泪也要流下来。说这是很容易办的，她记得去年在这里时，后面柴屋里的西墙上有一个麻雀窝。说着马上把槐子搀到母亲身边去。自己和小玉提着灯笼就走。我高兴地也跟了去。柴屋里霉气薰人，茅草，松针，棍柴杂乱地堆在稻仓旁。那墙上果真有一个碗口大的窟洞。奶妈七手八脚地搬来木靠梯，小玉提着灯。那墙上长满了苔藓，近灯光的地方正爬着一只大蜈蚣，旁边又有三四只蜻蜓，映着灯发出银灰的怪光来。我远远地站着，再也不敢走近去。奶妈以一种素未有过的，活泼矫健的身段爬上梯子。小玉嚷着说：“小心呀，麻雀窝里老住着蛇相公的呢！”奶妈不理她，刚把手探到洞里，就哎呀了一声。只听见扑拉拉飞出一只漆黑的东西来，满屋子里吱吱地飞鸣着。我们都吓怔了。详细看时，却只是一只大蝙蝠。这屋子在这种夜深的时候，满蕴着鬼故事里的一种神秘可怕的空气。我的毛孔一根根苏竖起来了。奶妈毫不惧怕的再伸手进去，摸出来的却是些茅草松针和细布条之类的东西，麻雀的影子也不看见。奶妈非常失望地抹着汗下了梯子。

我回到前面来，佳正在书房里坐着，在一张写坏了的信纸上乱涂着。一颗颗的汗，凝着水珠在他的额上鼻上。我心里也闷热得说不出，一边走一边嚷着和他说：

“佳，你想想看，好比是在公园里，我们坐在石凳上吃冰淇淋，……好比现在有一架电扇在我们身边呼呼地响。”

佳笑着不做声。我靠到桌旁看他到底写些什么，只见他在纸上写着——

“槐子好运气。槐子运气好。他有一个娘，还有一个妈：娘的短发乌又光，妈的头发黄又枯；娘穿的薄纱衫儿长统袜，妈穿的粽子鞋儿蓝土布；娘身上发出花露精儿巴黎香，妈身上飘着腥臭汗儿豆腐乳；娘想着电气风扇冰淇淋，妈想着八盘老蚕和丈夫。娘——”我念着，笑得在他身上乱捶，夺了他的笔，不许他再写。

早上刚醒来，堂厅里小麻雀的叫声和槐子喜乐的嚷声打成一片。佳在刷牙，告诉我说，奶妈天没有亮就到菜圃里的屋檐下找到一个麻雀窝，捉着两只小麻雀。说着，槐子已经提着竹笼子高兴地嚷着进来了。

“娘，看，小麻雀，妈给的。”一只小口笑张着，像裂开了的石榴一样。

这是两只羽毛丰满的小麻雀。除了镶着黄边的大嘴外，已认不出是雏儿了。它们哥儿俩在笼里惊乱地飞扑着，眼睛射着愤惶的光。奶妈也走了来，含着满脸胜利的微笑，瞟着槐子狂乐的神情，像一位大艺术家在欣赏他最得意的杰作一样。

槐子提着麻雀，从这里跳到那里，夹着舌头唱“小麻雀呀，小麻雀呀。”这样玩了一整个上午。

中饭时，阿宝的爸爸送了阿宝来。阿宝比槐子大两岁，却比槐子低半个头。一脸病色的肉，衬着两只滞钝的小眼睛。母亲可怜他，说要不是槐子抢了他的乳吃了，他也不致于这样病弱。我牵了他的手，叫小玉撮几片饼干给他吃。他却忸忸怯怯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阿宝的爸高抬着用布捆了的右手，极不驯熟地用左手在吃索面；一边和母亲谈着话。他谈那天进城遇着土匪的事，又说今天一早起，保卫团又到他家去写户头捐。每人要出二角钱。在河里打了半天鱼，才打发三个团勇走了。

“老太太，”他用捆着右手的布抹着额上的汗说：“我们这种人家，做一天，过一天。一家人都是两只肩膀夹着一个南瓜头。我们天高皇帝远，什么东西也不怕。土匪来就怎么？出这些冤枉钱，心里不自在！——这种世界，也不知道要到那年才太平。”

“他们嘞，”母亲指着我和佳说：“偏要说大清不好，我们过惯了大清日子的人，这种民国世界可真过不来。”

“妈老是冤人。我们几时说民国好，大清不好来？”我无可奈何地笑着答。

“可不是，你们不是说革命好？依我说，这些革命党在大清的时候都该杀头的。”

我和佳都想不出话来答辩，只有相视会意地作苦闷的笑。

“二先生，你们在外面见过世界的人，一定知道。我倒要问问看。”阿宝的爸正容地说：“听说江西大天师告诉人，民国只有四十年的天下。如今又是洋历，又是本历，一年要过两次年，说是四十年的江山，二十年便会完。今年不是民国二十年了吗？”

我不等他说完就忍不住扑嗤地大笑起来。阿宝的爸马上红了脸，不好意思

思地说：“这些话我也不大相信。不过他们都是这么说，所以我要问问看。”

佳却忍住了没笑，正经地回答说：“你们不要相信张天师，那是骗人的。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们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是社会上的中坚分子。”

佳想了一想，却再也说不下去了，只苦闷地望着我。大约觉得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的苦。我看他说了半天，并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好叫阿宝的爸了解，也替他很苦。但我也更没法儿说。

“他的手，田也种不得了，还有什么自己的力量！”母亲说：“你们可不是满口民国，蛇会的？刚才她还说我冤你！”

阿宝的爸没有得到可信的答案，就要回家了；说请了两个伙计在田里耘草。

“老太太，”他一边走，一边和母亲说：“现在的世界，——伙计是三角钱一个工，一吃一拿。不监着他们做，就会偷到大树荫下去打盹。——明年我也不种这劳什子了，决意把田还东家，专来打一年鱼过过看。”

这样地说着，走出了大门。

槐子对于奶妈费尽了心血捉着的，引得自己也那样狂热地喜欢了几天的两只小麻雀，兴趣已渐渐地淡薄下去了。整天只和小玉阿宝在堂厅里玩，请“孔夫子”，牵羊子……阿宝教他唱“公打我，婆骂我”之类的歌。要他认方字片子，但也不肯干了。

关麻雀的笼子挂在母亲那边的天井里。两只可怜的小麻雀，以前那种英蛮不驯的豪气都没有了，敛着翼蹲在一起，只是啾啾地凄凉的叫着。不知几时老麻雀也寻找来了。起初是从屋脊上飞到笼子上，从笼子上飞到屋脊上，“喳喳”急愤地噪着。以后就一点钟内来回数百次地衔虫子来喂她的孩子。

我几次想开开笼子把这两个孩子放还这可怜的母亲。奶妈却不肯，说是现在槐子虽不玩它，可是等他要起来没有时，就麻烦了。小玉对麻雀嚷着说：“如果放了你，可不要飞走，在我们家里玩玩。米饭，虫子由你吃。”

我和佳说，抢了“别人”的孩子关在笼里，给自己的孩子玩，那算是什麼心肝？佳笑我是浅薄虚伪的慈悲主义，说我的思想一点也不通：

“你不但抢了别人的孩子给自己的孩子玩，还抢了别人的母亲侍候你的孩子啦！你还是该先替人类和人类谋平等，还是该先替麻雀和人类争自由？”

奶妈笑起来，说：“我不是抢来的，我是自己情愿来的。”

我笑着说：“看你开口闭口都是自由平等地，我可没你那样的革命精神。你那满口的革命精神，我看也不值一文钱！”

下午和佳到大姊家里去玩。大姊屋里坐满了小姐太太，在听三姑娘说《粉妆楼》。我们进了屋子，把一屋子的人都赶走了。三姑娘一见了佳，满脸红得像关公，腆腆腆地转身打后门走了。大姊说我们来得真杀风景，骂我们说：“你们在学堂里的人，认了一肚子字，也该说点小说书给我们听听；你们不，倒也罢了，却反过来捣我们的乱！”又说：“这三姑娘出了嫁，和她“布袋”（即女婿）要好非凡。虽然不像你们俩个面皮厚，可背了人，也一步不离。前天他“布袋”到店里去了，今天才敢接她来。书是没有念几年，小说可真说得不差。”我说三姑娘走了，没人说时，我准来说一天，赔偿今天的损失。可是及不得三姑娘说得好。大姊非常喜欢。

在大姊家里吃了点心，就和佳回家。走到母亲那边，却看见那原有的麻雀笼子已换了一只较小的笼子。小笼子里只剩下一只软弱无力的小麻雀了。

“那只大笼子呢？”我问小玉。

“老麻雀啄破了。”

“还有一只小麻雀呢？”

“跟老麻雀飞走了。”

这真出乎意外地把我们怔住了。

奶妈说：“太太到大太太家碰和去了。小玉领着两个孩子在堂厅里玩。我洗了衣服，到这边来喝茶，看见那老麻雀已把笼子上的蔑杆啄断了两三根，嘴上头上全是血淋淋地。我要来赶时，已带了一只小麻雀飞出笼子了。”

我叹了一口气，走过去看那只小笼子。小笼子里摆着两只小瓷槽：一只装着水，一只装着稻，都是满满地，想是奶妈换笼子时刚装上的。那只小麻雀栖息在横着的短枝上，蓬松着两翼，在歪歪倒倒地合着眼打瞌睡，偶而也睁开眼来微弱的叫两声，但不等到叫完，眼皮又沉下来了。母亲这边沉寂极了，老麻雀也不再来。小麻雀只是微弱地，打瞌睡。

我要把这只麻雀放走。佳又讥笑我满脑子里虚无的慈悲主义，浅薄的温情主义，说：“你同情麻雀，你去替麻雀争自由平等来！”我很生气，我不知道什么主义不主义，只知道我有怎么样的感觉，我就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说，怎么样表示。别的我不知道！我也不要知道！

小麻雀终于没有放，放也没有用了。

早上在阶沿上刷牙，看见小玉倒提着那只直挺挺的小麻雀从母亲那边出来。槐子见了，从奶妈身边赶过去，问提的是什么东西。

“小玉姑娘，就不要让他看见罢！”我高声地说。

小玉要藏时已来不及。槐子看见死麻雀，瞪着眼睛呆了半晌，三步跑到笼子边去望了一望，回头抓住小玉，提起小拳头在她身上乱打。说是小玉把他的小麻雀弄坏了，弄得不叫了。说着把小嘴唇一扁，就哭起来了。

“槐子，槐子，这个不要了。妈再捉给你，妈再捉给你！”奶妈这样地哄了许久，槐子才住了哭。

奶妈和小玉舞着梯子，屋前屋后，左右邻居找了大半天，一只麻雀也未捉着。槐子看见她们空着手回来，就又扁着嘴要哭。

我又哄又劝地教他说，麻雀可怜，它要飞，不要关在笼子里；它也有妈，它要和它妈在一起。——这孩子一点也不听话，兀自扁着嘴要麻雀。我真气极了，拉着要把他关到仓房里去。奶妈抢着把他抱走了。

吃晚饭时，奶妈不见了，只有小玉搀着槐子和阿宝由后院里进来。

“奶妈回家去了，明天就来。”小玉笑着说。

“什么事？”

小玉瞟了槐子一眼说：“奶妈说她家门口的河边，有许多水鸟儿，比麻雀好看一万倍。晚上点一枝芒杆，要捉几只，就捉几只。捉了，明天就送来。”

“妈，去，捉，好看。”槐子用手比着说。

“好看！——偏要麻烦人，一点也不听话！”我又怒又笑地骂他。

晚上，热得不能忍受。这种热，一点也不干脆。空气里满滚着沸了的水蒸气，一呼一吸都使人感觉困难；身上冒出来的不是汗，乃是又腻又粘的油。东流山上不时的闪着电光，显然又是要下雨

滂沱大雨，翻江倒海地下了四五天。奶妈一直没有来。阿宝天天哭着。槐子倒把麻雀的事忘去了，却只是念着妈。我哄着他两个吃东西，唱歌；叫小玉和他俩躲猫儿，立“孔夫子”。这样才哄住了。

几天来，雨下得太闷人了。抬头看不见一线青天，只一块块又重又厚的云，压在屋头上。我们一步也不能出去，别人也不能到我家来。一天到晚只闷在屋里，佳有时看小说，有时翻译他的书。我除了哄两个小孩子，或和母亲闲谈外，只拿着一本《浮生六记》消磨时间。

吃早饭时，槐子高兴地拉我去看他们敬的“孔夫子”。那“孔夫子”是用一只大香烟匣子做的，里面贴了些红纸，粘了一张香烟画片在中间，直着靠在矮脚桌上。“孔夫子”前面摆着三件新的陈设：两边是施德之济众水的空玻璃瓶，里面插着新开的海棠花；中间摆着一丛翠绿葱茏的稻秧。稻秧是由下面小瓷槽里抽长出来的。这只小瓷槽我认得，上面绘着南斗星北斗星下棋的故事，是那只关小麻雀的笼子上的。

“下了几天雨，就抽出这样大的秧来了？”我真惊讶，但我想到那不知去向了的小麻雀，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凄酸。

“可不是，”小玉得意她的心巧：“太太刚才叫我取那只放在天井里的笼子，我看见里面绿荫荫的，我说是什么呀，——原来是稻抽出秧来了。”

中上雨渐止。不一回，却就又射出炙人的太阳来。大姊穿着高钉鞋蹒跚地走了来。说外面大路上积水深过脚踝，西村里倒了四五处墙。大姊不放下我前次说的话，说三姑娘眼睛病了，要我去接三姑娘的手，说《全本二度梅》。我真不愿意去，可又没法儿推辞。

火般的太阳，炙着满路的积水，蒸发出缕缕的水汽，满鼻里扑着猪屎之类的混合瘴疔之气。我一路走，一路笑大姊真好兴致；这种天气，竟要一来一去地拉人说小说书。

大姊屋里正等着满屋人。稍坐一回，就催我说；我一边捧着书说，一边只觉得胸膈里恶闷。说了一个多钟头，真支持不住了。大姊说我脸上苍白得难看，也不敢勉强我再说下去。刚好门口来了一担西瓜，心想吃点西瓜，或许肚里会凉快一点。大姊果真就买了一大只。我吃了两瓣，胸里虽爽快了一点，但头又昏眩起来。我想睡一回，急便打着伞回家来。

到了家里，佳埋头在书房里用功，母亲睡午觉还未醒，阿宝哭着要妈，小玉在哄他说：“天晴了，你妈明天就会回来的。”他们敬的“孔夫子”已经拆毁了：烟匣子倒翻在地上，济众水的空瓶，已打碎了一只。小槐子手里拿着那只小瓷槽，把稻秧一把一把地拔问天井里去。

我在藤椅上刚刚躺下来，贩鱼的老三哥来了。

“老三哥，你今天到河口村去担鱼没有？我们槐子的奶妈“唉——”老三哥拿下头上的麦杆帽，不等我的话说完，就瞟着正在扁着嘴哭的阿宝，浑浊着破嗓子说：“——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惨事，河口村发大蛟，破了百家圩。——村人三股淹死了两股半。——他的妈，——”

“你说什么，怎么的？”我眼里冒出了满天乱星！

母亲和佳也都出来了。

“我今天到河口村去挑鱼。一路上水齐膝。我就知道河口村有了大劫数。——走到河口村，那里看不见一家人家，屋顶也看不见！那些人，有的在船上，有的在高树上，叫得满天打霹雳！”

“这怎么说！这怎么说！”母亲瞪着惺松的眼睛说。

“你知道奶妈的消息没有？”

“我挑着空担子绕大路回来，在八室岗上遇着一大批河口村的难民，正想找一个熟人，却看见阿宝的爸和他的老奶奶坐在石碑上。老奶奶在乱碰乱

颠的哭；他的爸直着眼，也无泪，也不动。我问他，他才说，昨天晚上河水翻江竖壁的滚来，先扶老奶奶上了船，回头再救他嫂子，就看不见家了！”

我的头像塞满了旧棉花。只听见阿宝在耳朵边打大锣般的哭起来。老三哥几时走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呕吐了一阵，就回房里睡。迷迷糊糊地看见一群强盗打进屋里来，定神看时，又不是强盗。却是些绿面红牙鬼。我要跑，只觉得脚上穿着高钉鞋，一点也跑不动。忽然一个鬼赶来捏住了我的咽喉。我大喊一声，睁开眼睛，看见是奶妈坐在我床边，一手按着我的头。我嘶着喉头喊：“你不是淹死了吗？”

“怎么了？怎么了？是我，是我！”说话的却是佳。

我望一望四周，满床上飞着蝙蝠，麻雀。身上潮腻腻地，像是满处爬着蜈蚣和蜈蚣。我用尽气力要挣起来跑。

“倒点济众水给她吃。”似乎是母亲的声音。

我神志又似乎清明起来，只觉得身上油煎也似的热。佳给我喝了济众水，又呕吐了一阵。

再也睡不着。看看房里，槐子已经在小藤床上睡了。阿宝靠在母亲怀里，瞪着眼对我望着。小玉也站在房门口。满房里冷悄悄的。天已快近黄昏了。

“玉姑娘，”半晌，听得母亲低声地说：“要你站在这里做什么？你也去把那些稻秧扫一扫；把瓷槽拾起来放还笼子里去；那只大笼子明天也该拿到竹匠铺子里去修理一下。这样大的人，还要人家吩咐一件，你才做一件！”

“阿宝，——”我一阵心酸，滚着满腮眼泪，哽咽着说：“是我们的小槐子逼死了你的妈。是——”

听得阿宝喊了两声妈，哭声又塞满在房里。

一九三一、十一、二十

（原载 1931 年 12 月《文学月刊》第 2 卷 1 期）

小花的生日

寒鸦在屋脊上断断续续地叫了几声，美容睁开眼，已隐约地可以看见窗格子了。她揉了揉一夜不曾好睡的倦眼，想要起来，却发现小花的爸底一只脚正摆在自己的胳膊上，压得麻木难忍；她轻轻地侧过身，把它移开，里边的小花又醒了，唧嚶着把小手儿乱摸。她重又睡下，一手拍着他，一手捏着乳塞到他口里去。等到小花渐渐睡着，乳头由他口里落下，美容再隔着帐子外望时，窗格上已映满着鱼白的曙色了。

起了床，呆呆地坐在矮脚凳上，心里很麻乱：她计划这一天的事该如何安排。这是异特的一天，是小花的周年生日；但这一天并非因为是小花的生日而有意义，她所热烈期望着的事，却寄蕴在三太太的身上。

前几天她抱着小花到三太太家里去讨米汤濡衣服，三太太看见了小花，喜欢得不得了，接在手里调逗着玩，小花越是窝着小嘴笑，三太太越是乐得喊宝贝。“这小宝贝呀，是去年几时生的？——呐，看他笑得多惹人疼！”

“十一月初九，”美容满脸堆着笑说：“再过几天就是周岁了呢！”

“这小东西生得真可爱，鼻子，眼睛，那一点不方配！比他哥哥的相貌就要好得多！——美容，你别愁，现在吃点苦，将来你总会有福享的。”

“三太太疼惜的话！我这苦命的人那里谈得上什么福！只想他不要像他爸爸，我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谈起小花的爸来。小花的爸自六月间歇了生意回家，于今已快五个月了。他本是个忠实勤快的人，只是性情暴躁些。在店里，也颇得店主的信任，自做学徒起，直到今年，十一年中并不曾换过一次店。不想店中一连几次经乱兵的强索，和土匪的抢劫，又加上主顾们，小康人家一天天贫窘起来，大富家又都搬到大地地方去住，生意就逐渐清淡下来。到今年，已经维持不住；六月中，店主突然死了，三十年来轰轰烈烈的一家老店，就此关起大门，贴上“召顶”的白字条。回到家里，两手空空，以前那样一团甜美和谐的空气，如今是一缕青烟似的飘散了。每天枯坐在屋里，看妻的愁眉怨眼，听小孩子的大哭小叫，和体味着亲戚本家们底讥笑与蔑视底辛味。他原是一个生性刚强高傲的人，在这种生活底紧压之下，一腔悲愤，就只有向美容和大花身上找岔儿发泄。美容含着满眼的泪，怨怼地说述他如今是如何的横蛮无理，如何的打骂寻凶：前几天为了大花打碎了一只碗，把大花凿得满头起瘰疬；替小花烘尿布，偶一不慎，烘焙了一块，他又大骂，她回辩了几句，就被他劈脸两个大耳光；……他又怕人耻笑，要不然，上山砍点柴，或是种点菜蔬，多少总也可以赚点钱。如今一家四口子，都靠她十个指头替人家洗点衣服，做点女红来维持，每天又要照应小花，又要烧粥洗衣，四五天也做不成一双鞋。她本来想，把大花交给他爸，自己带小花去替人家帮佣，餬了自己的嘴，还可以得三两块钱一个月，又好避免他横蛮的虐待；可是人家都不愿意雇用带有孩子的女人。她顺口就求三太太，托三老爷设法在外面替他谋个生意。三太太真是个慈悲的人，满口答允替她写信去说项；可是这年头，找生意也不是容易事。叫他等着，别着急，并且慈和地劝教她说：

“你自己的脾气也要改改，忍得的事，还得忍一下，平时总该和颜悦色地侍候他。你们小花的爸，也不是个坏男人，如今歇了生意，是他的气运不好，不久脱了运，他自会飞黄腾达。——这两年歇生意的人那只你小花的爸一个？三婶婶的富少爷，八奶奶家炳焕炳耀弟兄三个，南村里权叔叔的儿子，

侄儿，……我所知道的就不下十余个，如今不都是在家里飘飘荡荡地吃死的用呆的？他们可不比你小花的爸爸安分啦！纸烟，鸦片，还要偷娘的，老婆的金器出去赌博，贴那些妖精似的狐媚子！……”

“——”美容连声地喏应着，随后笑了一笑说：“三太太把他比得太高了，他们都是公子，少爷，胡行胡为点也不要紧；我们是什么人家，一天三顿粥也吃不上嘴，他凭什么出去胡行胡为？——自己又只有那样一付好本事！”

“美容，你们做媳妇的可说不得这些话！从前你公公婆婆在日的时候，不也是一家呼呼喝喝的人家！你们小花的爸，不也是少爷公子，穿好的，吃好的？——丈夫的气运不好，做媳妇的更要贴心劝慰，侍候。那些话可不是派你说的！”

美容心里有点不平，但是口里还勉强应喏着。三太太非常高兴，说她虽然年轻不晓事，可是肯听劝告，总算是好媳妇。

美容又把小花身上的薄棉袄，拂开给三太太看，说这还是她婆婆的一条旧棉裤改制的，棉花都已结成铁板了。三太太由衣袖里牵出小花的小手，两只小手冻得红紫紫地。三太太连连喊可怜；美容说，大花更要可怜，这种冷天，身上只穿着他爸的一件棉背心，手上的冻疮都已开了裂，一天到晚就蜷在灶门前打磕盹：“那死不死活不活的样子，没的叫人看了生气！”

三太太深深地叹了几口同情的气。

“初九是小花的生日，”半晌，三太太才说：“我替你邀几位太太，到你家打一场牌，好给大花小花制件新棉衣。”

“三太太真是积福的人！”美容心里马上开了一朵大红玫瑰花，不等三太太说完，就堆了一脸欢笑，扭拉着小花向三太太作揖磕头，说：“小花，小花，三太太这样疼爱你，你将来可要报答这个恩！”

几天来美容只热烈地期望着这一天，如今这一天是到了。

独坐在矮脚凳上，四周都冷清清地，只有小花的爸的鼻声震动着冷凝的空气。美容麻乱地想了许久，才站起来走到床背后，把蜷睡在长凳上的大花拉醒，——大花今年是八岁的人了，挤着一脸干瘪肉，两只涩眼时时刻刻沉着，像在打磕盹。——叫他到人家去收衣服。大花出去了，她自己才到厨房里去烧开水。

等到她把开水烧好。大花已由各家把衣服收来，满满地一竹篮，斜歪着小身肢驮着进来，美容把家里的事粗粗安排了一下，吩咐大花看照小花睡觉，别又让他在被褥里赖尿；爸爸起来了时，汤罐里有开水；……她吩咐完了，就提着篮子和木锤下河去。今天又刮大风，扑在面上像刀刺一样地生痛；满天盖着乌沉沉的云，似乎要下雪。河岸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几只白颈子老鸦在田亩里飞，叫得怪刺耳地。美容跪到临河的大石上，两膝像是浸在冷水里一样匆匆地把一篮衣服洗完，回到家里，小花的爸已不在床上了。小花一个人坐在轿凳里，握着一个九华山的木摇铃放在嘴里吮吸着。一只大母鸡跳在桌上，在啄食小花木碗里剩余的粥渣。美容赶去那只鸡，“大花！大花！”地叫了许久，才看见大花揉着眼浑着喉咙从厨房里应声出来。

“睡不够的小鬼！又躲到灶门前去打盹啦！……你那宝贝老子呢？”

“我不知道，”忽又改过口气，沉着眼毫无表情地说：“爸爸一早就出去了，悦是到大舅老爹家里去。”

美容猜测他一定是去托他大舅谋生意。心想他大舅那样势利的人，肯替

你谋生意！一定又是碰一鼻子灰回来。三太太答允写信托三老爷的话，她是不曾告诉他，她不愿意早先就告诉他。

三个人吃了点早粥，美容就到三太太家来：三太太刚起身，春梅正在替她梳头。

“三太太，你早。”

“我吃了早饭就去，你现在去请一请五福堂三少奶奶，南村里大太太和权婶婶，昨天在五福堂打牌，我已和她们说好，她们都答允了。催她们早一点去，我们多打几圈——我这里你不用再来了，我吃了早饭自己去。”

南村里大太太和权婶婶正在吃早饭，一见美容来了，不等她开口就都说吃完了马上自己去，用不着再来催了。只有五福堂三少奶奶不能去，因为三少爷昨夜又发癫痫，病在床上须得自己照应。美容心头压上一块重石，绷着要三少奶奶去成全她一下，说三少爷在家里有丫头侍候，不要紧。三少奶奶是个年轻的傲慢姑娘，沉下脸，不作声。

“看三太太的面子成全我一下。我们小花的爸也不在家。三太太说昨天和少奶奶邀好了的。……”美容堆着满脸谄媚的苦笑。

“你这个婆娘才叫不讲理！人家家里有病人，正忧得揉断肚肠，你偏要缠着人去给你打牌！”三少奶奶气忿地说着进了房，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走出了五福堂，美容忍着满眼的火和泪，重又到三太太家来。春梅说：“我们太太已经到你家去了。”三步跨进自己家里，大太太，权婶婶也都来了。三太太正逗着小花玩。小花手里握着一个红纸包，不用说是三太太给的周岁礼。美容先抢着谢了，和大太太权婶婶陪了“失迎”的不是，又骂大花这小鬼怎么茶也不会倒！而后才苦着脸向三太太告诉三少奶奶不能来的事。

三太太皱着眉想了半晌，再也想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权婶婶说，要是六房里三婶婶没有出去赶场，此时去请一请，一定十拿九稳来。美容听到要去请三婶婶，心里跳了下，她想起三婶婶的富少爷来。富少爷见了她，总是嬉皮涎脸地笑，有一搭没一搭地找她说话；她见了他，脸上就喷满了热气，老是不自在，心里有点讨厌他，也有点喜欢他。

权婶婶教她说，就说是三太太请她来打牌。

到三婶婶家，三婶婶可巧已经出去了。富少爷一个人躺在软椅上，衔着烟卷在拉胡琴，自哼着“泗洲调”。见了美容，立刻放下胡琴，站起来；满生着红颗粒的苍白脸上放下一脸笑，把眼睛挤成一条细缝，说：

“呵呀，美容嫂，难得到我家来！——你怎么忙得头也不梳一梳！——昨天你们大花来检衣服，我的紧身褂里有块花手帕忘记取出来，你看见了没有？”

美容红着脸，心肝只在腔子里乱窜。她说不曾看见花手帕，待回去再找一找看。又告诉他说他是来请你三婶婶去打牌的，三太太，大太太，权婶婶都等着，三缺一，牌是没法打得成了。

“这还不是容易事，我给你去凑一下。——你要是早告诉我，么半分洋要打几场就打几场，那怕找不着人！”

“只伯……”美容心里真感激，没说出去的半段话忙吞了回去，改了口气说：“只怕她们不曾和你打过。”“那里的话！她们不是常在我家打？那一次我不在场？……她们都是老人家呀，美容嫂说话真有趣！”

富少爷是拔上鞋子跟美容来了。天上已下起细雨来，北风更刮得怕人。

三太太非常高兴，和富少爷说：“虽然你是个男子汉，我们都把你当子

侄看待；小花的爸和你是同辈，也不外，大家都不用避讳。”大花到三太太家去取来马雀牌，三位太太一位少爷就动起手来。美容到房里去梳洗了一下，罩上一件半新的竹布褂；叫大花到恒泰号赊来一斤挂面，半斤猪肉，独自在厨房里忙。里面热闹的牌声，和厨房里玄油的爆炸声打成一片。这种活跃兴隆的空气是美容家从未有过的。美容微微地笑，整个的心被欢乐所占领。打完八圈牌，雨下得大了，叫大花赤着脚到各家去取雨鞋和伞。美容敬出小花的周岁面来，又抱着小花向太太和少爷磕头。吃完面，大家又重复入席继续打。美容偷眼看看牌合内，约摸已有三四元彩头了。三家都有亏输，只权婶一家赢了。

“今天这一场牌，我包管有七八元彩头。”富少爷噙着烟卷笑眯眯着眼对美容说：“只是两位太太输多了，我输点倒是不要紧的。”

“小花，”美容抱着小花说：“你拜拜天老爷，保佑两位太太快捞回本！”

“美容，你这婆娘太偏心，难道他们都该捞回本，就派我一个人输？”三婶说着，大家都笑起来了。

“我也想权婶不输啦！我几时说该你一个人输来？”

“越发地说不上路了！我也不输，他们也不输，难道是你输？”权婶说了，忙着吹纸捻，吸水烟，也不笑，也不怒，扮得像有那么一回事。

大家又笑了。

“这我可不知该怎么说啦！……小花，你代娘说一句。”

“小花，你说该我输，该富伯伯输！”富少爷笑着说。

说笑了一回，美容重又把小花放回轿凳里，自己走到厨房里去收拾。大花不知几时早已把三付雨具取来，独自躲在灶前，把一双乌紫紫的赤脚摆在灶门上取暖，捧着一大碗面，在饕餮地，一口不等一口地吃，两条清鼻涕拖在嘴唇上。

“看你这馋痨鬼的样子！一天到晚只会睡，只会吃；事末，一点也不做！——快点吃完了，到里面去照应茶烟，我还要折衣服。”

美容骂着把三太太吃剩的面三口吞完，走出厨房侧门，到院子里走廊上来。走廊上晾着昨天洗的衣服，她一竿一竿收下来，坐在搭板旁折叠。通大路的耳门开着，一个缺腿的老婆婆正跪在门阶上向她叩头。

“你摸错了门路呀，我的老太婆！”美容瞟了她一眼说：“我们也是快讨饭的人家，那有得给你！”

老婆婆兀自不肯走，雨下得正大，她秃着头跪在门阶上，淋得满身如落水鸡。美容到底熬她不过，由袋里摸出一个铜子掷了过去。那老婆婆是个半瞎子，听到铜子的响声，在泥泞地上摸来摸去，老是摸不着。以后还是喊大花冒着雨过去拾起交给她，她才像一只蜗牛似的慢慢地爬走了。

富少爷噙着纸烟走出来，问厕所在哪里；她红着脸指告他是在走廊的东头。

“我已输了十多块了。”富少爷一边走一边说：“在你这里，我输两块倒也高兴。”

美容不知怎么回话才好，只有低着头依旧折衣服。富少爷不一会又系着裤子走回来，走到她跟前，站住了，盯着眼看住她，美容低着头，心里又碰起一只小乒乓球来。

“美容嫂，不是我故意说夸奖的话。”半晌，富少爷说：“你真不像生过两个孩子，每天操劳着的人，看你刚才梳洗打扮了一下，马上就轻了十岁

年纪，叫人不多看上几眼，心里就舍不得！”

“富少爷，你……”一时，美容觉得血管也要涨裂开来一样，她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听你大花说，你小花的爸爸常无事无件的骂你打你，真也太岂有此理！要是我那母夜叉抵得上你的百分之一，我真要死心塌地的把她当神供，金子珠宝由她戴，绫罗绸缎由她穿，……”

“真的，我倒忘记了，我那块手帕你找着了没有？”

“你的衣服内哪有花手帕来！你这人，真会冤人！”美容说着，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怎么的，觉得嘴唇和手肢都拘挛起来。

“找不着也就算了，——你猜我那块手帕是从哪里来的？”

“我怎样会知道呀！”

“我告诉你，我买了打算送你的，——其实我这里还有一块，呐，”他走近两步涎着笑脸说：“你赏我光，收了我的。”

“我不要，——你还要缠，可给里面知道了！”

“赏我一次光。”说着靠近她，要把手帕塞到她怀里去。美容抖颤着手推拒他。这样缠了一回，富少爷忽然急剧地离开她，飞跑到里面去。美容正莫名其妙，抬头却看见小花的爸拖着一身泥水，铁青着脸，站在刚才那缺腿的老婆婆跪着的耳门上，向她望着。

“好呀，青天白日的！——”

小花的爸气急败坏地两步撞近美容，一把扭住了她的头发按向那搭板上，一阵乱轧，美容杀猪似的大哭大叫起来。小花的爸随即丢了手里扯下的一把头发，在地上拾起那块花手帕，打厨房门赶到里面去。富少爷却已灰白着脸由另一个门逃出来走了。

三位太太都已惊惶地离开桌子，看见小花的爸啮着牙，像一只饿狼寻找食料似的东望西张，越发地摸不着头脑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是三太太问。

“还要问什么事！”小花的爸喘着粗气，颤着手把那块花手帕一扬说：

“刚才溜进来的那杂种你们把他放走了？——好哇！你们也是名门家的太太，我不在家，你们就设了局来诱人家的女人！”

美容披散着一肩乱发！带着一鼻一脸子鲜血，尖着嗓子大哭大喊地骂进来：

“你这鬼摸头的千刀斩！你南瓜切不动切葫芦！你自己到大舅老爷家里去碰了钉子，回来却向我寻凶！你打人骂人也要分个青红皂白！——你不看看席上是什么人！你……”

“好哇！老子就单不怕这些有钱有势的人！……”狼一般的嗥叫着，撞过去就花拉拉把麻将桌子推翻在地上。

三位太太早都气得瞪着眼发抖，还是三太太镇静了说：“小花的爸，你快三十岁的人，也该知道点天高地厚！这样血口喷人作威作福，我可不依你！我是可怜你们小花没棉衣穿，才邀了几位太太给你们打牌；你媳妇有这些不清不白的事我们可不知道！”说着，拉了大太太权婶婶说：“这人家算完了，没处去和他们说理！——大太太，权婶婶，我们走。”说着，三位太太雨鞋也等不及穿，就打着伞走了！

“你这不要脸的千刀杀万刀刷！亏你有脸子朝朝暮暮向人家摆老公架子！你死起两块铁脸在家里闲住五六个月，躺倒睡，伸手吃，你几曾给我个

半文钱！我来辛苦地一天做到晚，挣几个钱来养你们一家饿瘪鬼！——冤枉你顶了个男人头！——好容易三太太看了我面子，趁着小花的生日来替我打场牌，你就来借故寻凶！你是个挣气要脸的男子汉，你试挣得个三元五元，我给你这臭手打死了也甘心！”

小花的爸被三太太一阵吆喝，原已不做声了；现在听美容这样放刁撒泼地大骂，恰又触上他心头一股无名烟火，撞过去又是像狼一般的扭住美容的头发，一掌打翻在地上，举起泥泞脚没头没脑的就是一阵乱踩！

美容又是杀猪似的尖叫直冲上青天！两个瞪着眼看着的孩子都被吓得打铜锣似的哭喊起来。

美容“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地直着声音喊了一阵，挣扎着起来，抱了小花向外跑：

“我要出去评评这个理！我水世也不再跨上你这破落户的门！”

出了门，迎面打来一阵风雨，天已黄昏了，她抱着嘶哭着的小花在泥泞路上蹒跚着，走一步，滑一次，自己也不知要走向哪里去。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六日脱稿

（原载 1932 年 1 月《中国社会》第 1 卷 1 期）

栀子花

正月十八祥发要动身了。二堂叔本要在十五日走，因为要赶开课前到北京。祥发不肯，说自己是初次出远门，总得拣个黄道吉日。十五日是大正月半，决不可用；十六日历书上注着“不宜远行”；十七则又“七不出，八不归。”只二十日是“诸事皆宜”。可是二堂叔却说，要是二十动身，那二十三才得到下关。看了《申报》，二十三浦口没有通车开行，还得在下关白等几天。商量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让步，决定用十八的日子。

动身的事是早就安排好了；钱则在二堂叔家借了三十元，加上妻的首饰所换得的钱共有四十余元，够得到北京的盘川了；父亲的皮箱网篮，也由楼上搬下，掸去了灰，修补了。该带的东西都已装置妥贴。

十七日祥发和妻在房里待了整半天。妻自去年小产后，便有了咳嗽喘气的病，信水也快半年没来了。请郎中开了许多次药方，吃了并不见效。明知咳嗽是小病，但看她一天天瘦损起来，心里总觉得放心不下。自己走后，家里只留下妻一人，更可怜了。妻向他流着无言的泪。他望着她枯黄浮肿的脸和红涩的眼睛，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只在自己的盘费里取了五元给她，叫她不要太刻苦，不要太操劳。妻希望他到北京后积点钱，将来好接她出去同住。

下午妻在侧院里收衣服。祥发帮着她收折了一会，走近西边那座挺着大肚子，如一个孕妇似的院墙下，对着那丛栀子花树出了半天神。这丛栀子花树是他最心爱的东西。世界上除了钱和妻，他恐怕是最爱这东西了。早前几天，为着能到北京去就事了，肚里只藏着一团喜跃和高兴；如今在这快动身的时候，对于家里一切的东西都有点恋恋之情了。

他提了桶水，给栀子花树浇溉了；在地上拾起一根柴枝，仔细地在那枝叶上拨除着蛛网；告诉妻，自己走了后，要常常替他浇水，别让鸡鸭猪羊进来捣乱。妻当然愿意照办。

晚上照例到本家眷戚家里去辞行。大家都含着笑，祝他高升，发财。最后到二堂叔家，和二堂叔谈了许多关于旅行和北京的话。他愁自己到了外面，衣服不合式，给人笑他乡下傻子。二堂叔说北京的社会朴实得很，用不着在衣饰上用心思。二堂叔虽比他年小七八岁，但事情比他知道得多。他不替他愁这些衣饰之类的事，他替他愁着另外一些较为严重的事。

“祥发，你现在高兴，一到北京，你就会把你心上开着的花扯得粉碎！”孩子气的二堂叔装着老成的样子说。

祥发莫名其妙地笑了，说：“栀子花，我走了叫我媳妇经营，等四五月里花开了——”

二堂叔大笑起来：

“到了北京，有花房，有公园。一年到头都有好花看。你不要老记着你的栀子花。——我是说你到了北京，定要觉得苦，住不惯。”

祥发脸红了，嗫嚅了许久，才说：“北京总比家乡好。”

“自然比家乡好，可是你去住住看。”

祥发不愿意听这不吉利的不着边际的话，心里打了个疙瘩，坐了一会便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妻已睡了，说又在发烧。祥发这一夜当然不曾合眼。妻的呻吟和咳嗽声连续地震动着凄冷的空气。他心里麻乱极了，想着二堂叔的话，

想着北京，想着自己愁苦的家庭和不幸的身世。他一会儿凄伤，一会儿恐惧，一会儿欣喜，许多种的情绪纽着结，像一个小姑娘马上要被花花轿抬到生疏的婆家去作媳妇一样。也难怪，这次的离家是祥发开始他新的生命的关键。

过了年，祥发是三十二岁的人了。以前虽也出过门，但和这次完全不同。以前不过是到离本村百余里的镇上去讨帐或是批发货品，肩上背一个衣包，骑着“两脚马”，一两天功夫便到，一两天功夫便回来。这次可不同了。这次是到北京，迢迢七八千里路，最少也得花六七天；路上将经过许多大地方，将看见许多为他久已神往的新奇的东西；到了北京，认识的人只大堂叔和二堂叔，别人不但不认识，连话也不会懂。一个生疏新奇的热闹地方眼看得马上就要跳进去，一段光明的新生活眼看得马上就要在前面展开了。

祥发想出远门，原不是一天的事。他在二堂叔家里看过《申报》，听过大堂叔，二堂叔许多关于另一个社会的谈话。这些美丽有趣的地方在他脑子里打上深刻不灭的印象，他开始厌弃他自己所住的地方。自己所住的地方那真乏味极了：古旧的破屋子，倒塌的墙和狭隘崎岖的石路，鸦片馆，小赌摊，褴褛的男人和女人，大家都戴着一个沉郁愁苦的脸，谈着关于粮食涨跌，土匪兵灾之类的事。……他懊悔从前不曾进学堂念书，他羡慕大堂叔和二堂叔。

前年，祥发做了十多年的店铺倒闭了。这不算希奇的事。村里，镇上，以及邻近许多地方，近来每年都有许多店关上门，贴上“召顶”的字条。祥发失业后，只靠着妻做女红所赚的钱来敷衍日子，想尽了路头谋生意，都毫无结果。恰好大堂叔大学毕业了业，在北京有了很好的差事。他喜欢极了，写了许多次信去求他设法。起初，大堂叔回信说“自己脚力小，外面也没有你能做的事”，叫他还是在家乡一带另外找条出路。以后大堂叔暑假回了家，他又苦苦去请求，说家乡一带，实在再也找不到饭碗，店铺是放排似地倒闭着，就是勉强能支持的，也都拼命减裁店员，那有自己插足的份儿；说自己三十多岁了，总不能老是厚着脸坐在家里挨饿，自己是只隔一层肚皮的亲侄儿，总得看祖上的分提携一下，说从前叔祖爹在，也屡次带自己的父亲到外面办过差事的。

“祥发，”大堂叔是想着事实上的难处，叹了一口气说，“你年岁虽比我大，但外面的事总不及我知道得清楚。你听我说，你是个做生意的人。你的长处是算盘打得好，秤称得狡猾。可是你这些本事，我所能找得的事都用不上。”

“我在店里也管帐的，还可以写写字。”失望了许久，祥发才想到这一条路。

大堂叔说，外面如今大学毕业生也半文钱不值，能写两笔字有什么用处！说外面有的是学校，每年制造出一批批的毕业生，社会上也并不给他们相当的饭碗。现在的都市地方，就如一个清水粪坑，蛆太多了，粪则有限，那里有法子摆布这些蠕蠕蠢动的蛆虫？而且内地里又百业凋敝，日就没落，大家都觉得都市里好，都向都市里跑。“你以为外面容易找饭吃，可知外面是清水粪坑呢！”

这些话祥发自然都不十分懂得。但他听大堂叔不肯替他设法，心里涌上一团绝望的云翳，坐在一旁，无言地流泪了。

大堂叔虽然是个新人物，但看侄儿这走投无路的可怜的神态也就软了心了。想了半天，只有半作安慰地用慢慢想法的话允许他。叫他等着，作兴可以替他谋个录事的职务。

这次寒假，祥发日夜期望着的消息终于出乎意外地由二堂叔带来了。差事是下级录事。每月十五元的薪资。二堂叔说，俭省用，可以管他吃用，要想寄钱给媳妇可不容易。祥发喜欢极了。他想，在店里一天忙到晚，也不过七八元一月的工薪；现在是加倍了，而且还可以到大地方去见见世界。祥发大乐之下，每时每刻都在心跳着，吃饭睡觉也不能安心，直到动身的时候。

十八日天没亮就和二堂叔动身。妻流着满脸的泪送他到门口，祥发安慰了她几句，自己也黯然了。

到北京是在动身后第六天的早晨。在路上，事事都由二堂叔一手照理，祥发只有瞪着眼睛东张西望的份儿。二堂叔幼年时他是抱过的，便是现在，还依旧不脱孩子气；但如今到了外面可不同了，如今样发自己倒成了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全仗二堂叔来照应了。外面一切未见过的东西都引起他的惊奇，使他觉得不可思议。他相信二堂叔对于这些东西都十分熟悉的。他问了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二堂叔有时故意欺骗他，有时嘲笑他，有时对他作不耐烦的表示。他开始觉得羞愧和无味。

在前门下了火车，就随二堂叔带着行李乘洋车到大堂叔办事的地方来。休息了一会，大堂叔约他们一块出来吃午饭，说是替他们洗尘。两位堂叔穿着西服，风度举止都英俊漂亮，一点儿也不像家乡的人了。祥发注意到自己，自己的身段是一副典型的内地店伙的身段：平顶的头，苍白乾枯的脸，微曲的肩背，和不合时的衣服。他和堂叔们走在一起，觉得一举一动都不自在了。他意味到自己的丑陋，自己的狼狈。他可怜他自己。

饭馆是挺美丽的。祥发拘束地在堂叔指点的座位上坐下来。茶役偶而向他注视一眼，也要使他感到腴腆和不安。

“现在你居然到了北京了！”吃着饭，大堂叔开玩笑地对祥发说，“觉得北京比家乡如何？”

“从前皇帝建都的地方呀。”祥发忸怩地答。

“我说他到北京来了，会住不惯。他不相信。”二堂叔又说那话了。

祥发觉得二堂叔是故意窘他，心里很难过。但他勉强堆了笑，说：“叔叔都住得惯，我那就住不惯？”

“好，你住着试试看。——你说话，人家都不懂；这里的人情世故你也不知道；你是内地里做惯了生意的，如今却由半天里跳进一个生疏的环境里来吃饭，什么事对于你都不熟悉。——我打个比方给你听，好比水在这樽子里已结成一块圆形的冰了，你要把这块冰再放进一个多角形的盒子里去，放得进去放不进去？你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是一块化不开的冰了。”二堂叔装着老成的样子，滔滔地说着，偏过头问大堂叔说：“对不对？”

“反正是他自己愿意来的，弄不好，我也没办法了。”

“多少人在家乡找不着事做，跑到外面来？”祥发梗起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缓缓地说：“村里就不下二十多个。我店里七个朝奉，现在三个在江西当兵，两个在党部里。他们不也都混得很好？——在家里没饭吃，不出来也不行。”

“中国的社会，不彻底革一次命，也真没有出路了！”大堂叔叹了一口气，对二堂叔发起感慨来：“经济，完全踹在帝国主义者脚下；政治是如此的紊乱；内地的农村社会加速地崩溃，失业的人，都市里也没法收容。大家走头无路，不是去当土匪，就是在家里吃老米饭。像祥发他们总算是最幸运的了。”

“古话说，世运六十年一转。我想不久总要出一个真命帝主的，像这样乱糟糟的还得了！”祥发半懂不懂地插着说。

二堂叔哈哈地笑了。

“你别笑他，”大堂叔滑稽地说，“他这议论倒像是辩证法的社会观呢！”

祥发不懂大堂叔说的是什么，但他知道是打趣自己。他脸红了，搓动着两手，看着。

吃完饭，二堂叔匆匆地取了行李上学校去了。大堂叔陪着祥发在祥发办事地方的左近找好了一家公寓，看定一个小房间，说妥了是连伙食茶水每月十二元。祥发知道外面房租伙食贵，自然也不必自己去参加意见了。回头把行李东西搬来安排好了，大堂叔教了他一些公寓的规例，叫他只管放大胆子过日子，别手慌脚乱的像乡下人，叫茶役看了笑话。叮嘱了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起，大堂叔就来带他到办事所里去开始工作。他们工作的地方是一间半中半西光线黑暗的大房间。里面放着两条长条台，坐着十来个人，埋头忙碌地在抄写文件。主任替他找了一个坐位，交了一束纸张给他，叫他照着原底用正楷誊写，不要掉字，不要涂改。祥发恭恭敬敬地应诺着。坐下来后，偷眼看了一下同伴们。同伴们都浑身带着异乡人的气息，有穿学生装的，有穿长袍的，但看来都比自己神气。他们不时地在伸纸蘸墨之余向他扫射几次眼，他觉得自己不自在极了。

提起笔写上三四个字，就觉得自己的字一点也不整齐；换了一张纸，写不到两三行又发现掉落了一个字。他心里很慌乱，心想像这样不顺手，岂不糟糕！镇定了一下，才写得较为满意了。

主任站到他身边，把他写好的拿起来看了一会，毫无表情地交还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又走到旁人的身边去。

祥发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后，虽不曾完全应了二堂叔说的“住不惯，要苦熬”的话，但他渐渐觉到这生活的空虚和落寞了。每天早上九点钟去工作，吃了午饭又重去，到下午四点钟就回公寓来。工作的时候，大家低头写字；工作完了，同伴们都有说有笑地走出来，谁也不曾理睬过他。回到住处，只有那满室凄冷僵硬的空气在等候他呼吸。这样，他觉得自己是住在一个无人的沙漠上，他觉得自己已成了另一种动物，和其他人不同的一种动物。好比，一天到晚，就难得有一两次和其他人接谈说话的机会。

最难挨度的是下午工作完后和晚间。到了星期假日，那更无聊赖了。大堂叔那里也曾去过几次，但一次也没在家；二堂叔的学校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然无从去找。祥发唯一的消遣，便是站在门口，瞪着两只孤凄的眼睛看马路。汽车洋车卷着浓厚的灰土像走马灯似的飞奔着过去。那些过路的人，看来都非常活跃。这使他觉到自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自己所有的只是一个干瘪枯死的灵魂。

除了车子之外，在下午的时候还常常有二三两两的女学生走过。这最能引起他的注目。她们披着短发，穿着紧窄的衣服，谈笑自若，一点也不怕人，和家乡的女人一比，完全两样。他当然不敢正面看她们，但当她们走过门口，他就有充分的机会盯看那扭簸着显露了清晰轮廓的臀部的后影。他幻想到一些使自己心跳的猥亵的事，就又自然而然地想念起妻来了。

在室内的时候，是无事可做的，只有躺在床上瞪着眼睛向每一件东西注视：粗劣的桌椅直挺挺地立着，窗扉门扇都破旧到像一个残废的乞丐，屋落里结满着蛛网，墙壁上有斑剥的石灰。这些东西是和自己一样的干枯冷落，

和自己一样的毫无生气。于是他又想着妻，在幻想里描摹着，她正在家里做什么？咳嗽，呻吟？低着枯黄浮肿的脸在做针线？提着小斗在浇灌栀子花树？……

一天下午，二堂叔来了，这真使他狂喜得直跳起来。

“过得怎么样？”二堂叔坐下来，含笑地问。

“还好。”

“不见得吧，住得惯？”

“事情也很清闲，吃食也不坏。什么事都比家里好。就是太寂寞了一点。”祥发含着由衷的欢笑，说着，就站到门口高声地喊：“杀王！杀王！来开水。”

二堂叔顽皮地笑了，说：“我不渴。——这是你的京话？”

听差竟答应着提着水壶来了。

“到外边逛过没有？”二堂叔笑了一会说。

“没有逛过，怕出去了，找不回来。”

“我陪你到市场上去玩玩。”

祥发当然欣喜地允诺了。

市场上电灯辉煌，织梭般地走满着阔气的男男女女，商店像鸽笼似的挤列着。祥发看见了许多为自己不曾见过的美丽可爱的商品。他目不暇给地向每一件东西盯着看，可是二堂叔走得太快了，又怕自己走脱了伴。他心里又急乱，又怅惘。

“他娘的腰，”祥发赶上二堂叔，欣羡地笑着，用一句家乡土话骂着说，“外面好东西真多，就是买不起。”

“是哇！我知道你看见这些东西要眼热的。——你还不曾到过上海啦，你到了上海，更够你眼热的呢！”

“不是眼热，我说着玩的。”

“祥发，你作劲赚钱呀，赚了钱，什么东西都好买。”

祥发梗着两根青筋笑了，说：“赚钱，到那里去赚钱？除非做强盗！”

二堂叔买了几本书和一些日用品便出了市场，替祥发叫了洋车，自回学校里去。

祥发回到公寓里，和往常一样，一团落寞悲哀的空气直袭到他的心尖；但比往常更难受了。市场上那些美好可爱的东西模糊而又清晰地在他脑子里闪耀着，向自己投着骄傲的眼。他感到压迫，连呼吸也像被什么搪塞住一样。他叹了一口气，想，那些美丽的东西都是属于另一种人类的，和自己毫不相干；不，整个的外面的世界都与自己毫不相干。他想到二堂叔说的“住不惯，要苦熬”的话，他开始觉得这话在另一意义上是完全对了。

日子是照例落寞干枯地过着。每月十五元的薪资，起初，也曾半文不少的领过两次，可是第三个月便开始积欠了。主任说是“上头”没发款子来，一切开支都无着落，大家没有办法，权且只有等一等。这给祥发一个霹雳！但同事们都领不着钱，他要埋怨谁？现在，他除了挨度着那一切的精神的苦痛而外，又开始为伙食房租焦虑着了。

这近一个多月的生活，都是由大堂叔供给的，大堂叔说：

“你没命地要出来，现在可好了？”

话虽不是责骂，但听来越发地使祥发难过：自己是为什么出来的呢，不过想找一口饭给自己吃罢了，但是事实上连这一点也不能办到了。未出来时，是在病损的妻身上寄生着；现在出来了，却又开始寄生在大堂叔身上了。自

已是三十多岁的男子呀！……太阳渐渐由温和转到炙热，已是阴历四月末的天气了。问了几次主任，薪水依然是没有着落。祥发怀着一个沉重伤痛的心，只有去找大堂叔。

“不知道薪水到几时才发？——像这样总不是事。”

“政局又要有变动，你们的机关作兴要关门大吉了呢，还谈得上薪水！——你不曾看过报？”大堂叔沉着严正的脸说。这决不是大堂叔开玩笑！祥发心上压起一块重石，眼前缭绕着黑云，他想哭了。

“唉……我的运气！”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运气，大家都是如此呀！便是我，近来不也是靠典当过日子。”

“我在家里动身时，就知道这次出来不会有好结果的。——二叔叔偏要拣十八的日子动身。”

“十八的日子怎样？”大堂叔惊奇地问。

“十八是破日。”

大堂叔无可奈何地笑了：“我的好先生，你还有闲心思想这些事！现在大家都已到这地步了，你在这里等着，暂时是等不着什么的；另找事，我实在没这本领了。我看你在这里住着也非常苦，我说你还是回去的好。——再过几天，恐怕想回去也不成了。”

祥发没有回答，像槲木头似的楞在椅子上。

“你真不愿意回去，也可以，就和我一起住。我有一个馍馍吃，我总肯分一半给你。”

回去？祥发想到妻子。对于妻，他是每天都想念着的。三四个月中，妻不曾来过信，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一个破落，凄凉，但是很可爱的家乡在祥发脑里显现出来了。他想到来北京后的生活：干枯，落寞，孤凄，愁苦，压迫，恐慌——是他这三四月来新生活的全部。还在这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地方待着做什么呢？自己再挨着一切不能忍受的苦痛？给大堂叔多一个累赘？……

“没法子，也只有回去。不过是盘川……”哭丧着脸，祥发伸了口长气慢吞吞地说。

“盘川，我给你一件皮大氅去当一下，总够你到家了。”

“一来一去百来元的盘费，赚着的不过三十元……”祥发惨笑着说。

“总算你游了一次北京。”大堂叔说着，也滑稽地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大堂叔和二堂叔都来送行了。洋车拉到前门，车站上扰扰攘攘，和正月里来的时候一样。大堂叔帮着把行李东西搬上车厢，祥发的脑子如一张黑色的厚纸，什么思想也没有了。

“路上你要寸步小心，不要闹出岔子来。——你也用不着难过，到家后再慢慢想法找个事做。生为现代的人，都只有过一天，算一天，急也没用。——这一次总算是你上了我的当。”

祥发对于大堂叔始终是感谢的，现在听了这些温暖的话，使他更觉得由衷的惭愧了。

“是我累了叔叔。”瞠着那两只枯涩的眼答。

“祥发，到了家，你的栀子花准已开了。”年轻不知苦痛的二堂叔快乐地笑着说。

“二叔叔老喜欢说笑话。”祥发太阳穴上又梗起两根青筋，凄惨地勉强

笑着回答。但他对于年轻的二堂叔感到不快和恼恨了。他想这次的失意，完全该由二堂叔负责，他偏要十八日动身，未动身前就一再说自己到了北京“要苦熬，住不惯”，这都是不吉的朕兆！

汽笛响后，两位堂叔都告辞走了。火车在黄昏的大漠上向南飞驶。祥发由心尖上涌起一缕绝望的冷气，他扑在窗栏上，像一个女人似的凄凄啜泣起来了。

在一个梅雨淅沥的天气；祥发拖着他绝望的灵魂，创伤的心，和一个打得粉碎的美梦进了家乡。他心跳着，想着妻见了自己如何的惊骇，他要如何的抱着妻痛哭一场……情绪是如四个月前离家时一般的紧张而且兴奋。

到了家门口，推开那扇塌坏的门，屋里冷清清的，妻的房门虚掩着。进了房，房里阒寂无人。桌上凳上积着寸厚的灰尘，满房里放散着熏人的霉气。眼睛移到床上，床上翻乱着垫草，帐子被褥都不在了。祥发怔了一怔，全身像被浇上一桶冷水了。

他下意识地高声喊了几声妻，楼板上急乱地一阵老鼠的奔窜声，并不听见妻答应；丧魂落魄地找到侧院里，院子是浸在阴森森的梅雨里，关着一团死寂的空气，也没有妻的影踪。——只有院心中堆着一堆床草和纸锭的残烬。那以前挺着大肚子的古旧的西墙，想是经不住风雨的摧迫，不知几时已倒塌了。零乱的砖土，正压盖在他那丛栀子花树上；在砖瓦的隙里犹露探着一两朵枯悴的白花。

祥发再也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阵黑，躺倒在泥泞的地上。

一九三一、一二、二

（原载 1932 年 1 月《文学月刊》第 2 卷 2 期）

金小姐与雪姑娘

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拖着孤零零的灵魂，拿了羊皮纸的毕业证书跨出大学门阶，带着一张窘苦凄怆的脸，东跑西走了半年后，很幸运地能像鸡场里的一只鸡，挨进拥满在食槽边的馋饕伙伴们的队里，把自己的嘴喙挤着抢着摆到食槽里去。这便是说，由一个好朋友的提携，介绍到市立中学当了名教员，把自己从讲台上所听得的一些经纬，用那照例的方式又谈给别人听，每月卖人家一百元：我算是已经有了职业了。

也是如一只鸡一样，它除挤着抢着把嘴喙放进食槽以外，还需要跟和自己生理不同的鸡周旋周旋。我是个孤零零的二十五岁的人，又是在春天，我想女人。

我曾经和一位美丽的姑娘恋爱过，那是数年前的事了。那姑娘叫作雪姑娘，瞒着我，十八岁就和男人做过许多丑事。我在大学读书，一些使自己听了要喷血的故事由好事的关心人的信里谈话里告诉给我。大家都说这姑娘要不得，淫荡而且下贱。我懂得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很自然地，哭了一场，就把雪姑娘赠我的像片丢进火炉去，把雪姑娘给我的信用作了手纸；只留下雪姑娘那影子不时在眼里隐现，没法对付。

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些事，我知道这个吃人的社会怎么摆布一个无瑕的女子。我不恨她，更不忍鄙视她，耻笑她，像一般绅士们那么做；反倒远远地想法打探她的消息。但我是个卑怯苟安的心很和我的身份相称的人。我蜷缩在自己的矛盾中，冲不出来，却想另找个女人造个故事来给自己掩盖这创伤。

我的好朋友觉察到这一点，给了我一个机会。

“子彦，”我的朋友说，“我替你介绍个女朋友，把你的生活来调剂一下。我觉得你如果有个女朋友，生活一定会充实，心一定会有着落。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患了像你这样的忧郁病，只有女人是唯一的好药剂。”

我被他搔着痒处，就笑了。

“你笑了？我一粒砂子恰恰丢到你针眼里。”好朋友高兴了。“不是说笑话，你听我说。我的未婚妻有个表姐，姓金叫金家凤。人聪明，脾气好，面貌也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年岁大了点，看去像有二十五六了。——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听她表妹说，所以也很苦闷。她的家庭是个新旧参半的家庭，准许她自由恋爱。但事到如今，看女儿的脸上已隐约有了些皱纹，身边依旧没个男孩子伴着看电影，逛公园，心里是比女儿自己还要急了。最近，来了个严重的训令，说是到放暑假的时候为止，如果还找不着女婿，那就怪不得做娘老子的将就着代找一个了。这僵局，她表妹想到你。我则怕你不愿意。但我想你们见见面，做个朋友总不碍事。由你俩和我俩的友谊关系说起来，也应该天生是朋友。我明天给你们介绍见见面。你不妨试试看。”

好朋友是个热心的人。我感谢他的关心，打起精神等候着一块甜的糖跳进我这苦涩的咖啡生活里来。

事情如料想那么顺适，金小姐是由好朋友和好朋友的未婚妻给介绍见面了。听了好朋友关于金小姐的说述，我原早就捧出我伤痛的心等候抚摩了；见了金小姐的面，——身段是修短合度，除了没有一般时髦小姐的那骄矜和威风，上等的高跟鞋，上等长旗袍，一切都是时髦女人的气派；五官端正，脸上敷着一层薄薄的粉，可是并不曾盖住那贫血的苍白松弛的皮肤；微肿的

眼皮里嵌着两只枯涩的瞳子，像雨夜的街灯，闪着凄清冷落的光；一种腴腆窘促，十分不活泼的神情，使我第一眼就生了同情和怜惜。从这些外貌上，我领会她是个安分的好小姐，从前应该也有过叫人思慕的青春，而现在，年龄和生理的催迫，又给过她怎样的苦恼和折磨了。——我心里下了个决心，准定要和她造点故事。

金小姐屡屡偷眼看我；我望了她，她就红着脸巡视房里的陈设。这种关心的看法，不是偶然，不是无心；她像是已经把我当作了她的对象，考察她这对象好是不好，就像从前的姑娘偷看她已经被动地订好终身的人一样。她除偷眼关心地看我而外，只忙着以凄清的含笑来承受别人的谈话；不特意提出话来问她，她是不轻易开口的。

这一天，我们用的也是其他年青人进行事情的方法：一路去上馆子，一路去看电影，一路去逛公园。在饭馆里，我是被好朋友两口子安排着和金小姐对面。大家都似乎觉得，这和好朋友两口子相对面有同样的意义；在电影院的坐法，在公园，路上的走法，也都是被这空气安排着。这意义，这空气，金小姐是以腴腆的含笑默认了。

到了夜晚，和好朋友送两位小姐回大学。两位小姐推开门进去了；好朋友的未婚妻重又探出头来，含着大家都理会得的一种神秘的笑，说：

“凌先生，家凤姐叫我和您说劳您驾了；还有，说害你花了许多钱，说谢谢您了。”

这样，见了几次面，玩了几次后，我们便居然成为一对了。好朋友服侍未婚妻穿脱外衣，金小姐的外衣便居然由我服侍着穿脱；我的肩上染了头垢或尘灰，金小姐便居然由腋下钮扣上取花手帕给掸拭。

一天，由市立中学下课，回到寓所，素来零乱不堪的书桌忽然整齐起来。书籍纸张，层层叠叠理好在右角；文具小件也都各得其所地安置在靠墙的一边。桌子的正中摆着一只精美的蜡纸封裹的长方盒。我正惊讶，听差提着水壶进来，说：

“两位小姐来坐了许久，等您没来，就走了。”

我对着桌子和方盒出了半天神，便戴上帽子到女子大学来。填好会客条，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金小姐一个人羞红着脸出来。

“表妹没回来。……”

“金小姐，谢谢你替我理了桌子，谢谢你精美的糖。”

金小姐把脸涨红到耳朵边，两只枯涩的瞳子向我一闪，即便低头弄手指。半晌，才噗嗤笑了一声，慢吞吞地说：

“桌子……糖是我忘记了，丢在你那里的。”

事情便这样可喜地进行。好朋友两口子都是聪明人，从此觉得这局面无须他们来周旋了，我和金小姐就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一对年轻人，面对面在一起，谈话就比较得没有拘束。自己的事，对于恋爱的见解，都渐渐由金小姐口里听到些个了。

她的谈话虽然很简略，但那意思我完全领会。

她觉得在现代社会盛行着的这种恋爱，并不见得比父母代庖的婚姻好。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在一适当的偶然机会中相遇，便恋爱。这机会在社会上稀少得很，因之如一捆干柴碰着烈火，便马上燃起来了。这期间不容选择，也不容考虑，有机会便要燃烧。从前的男女是由父母媒人给撮合，现在的男女是由那稀有的机会给撮合。这恋爱只能给青年以麻烦，以苦厄，反

不如父母代庖来得干脆。所以她家里要代她找女婿，她并不十分反对。不过因为进了大学，算个新女子；新女子应当恋爱，所以她也愿意恋爱。

从前看过些新杂志，新书报，受了一些理论的骗。在那欺骗中，替自己建筑起一个美丽高超的理想，把自己的婚事看得非常认真。到了现在，就吃了这认真的亏。一方面怀着那美丽高超的理想，一方面又幽闭在家庭里，禁锢在学校里。家庭是个内地的上层家庭，学校是内地的女子小学，女子中学。一些历史上传下来的观念，习尚和空气把她包裹着。她是个安分拘谨的人，只敢在那种历史和社会特为女子安排下的圈氛中过活，不敢造次，不敢疏忽。她懂得这个社会只准许女人怎样做人。

她渐渐知道从前所怀的那理想，不是目前这个社会一个女人应该有的理想。花一般美的憧憬已和那时的青春一起埋葬，昔年的傲气与锋芒已被迎头闯来的现实碰成碎末了。她现在对于恋爱的怀抱很简单：只要有一个男人，这男人不十分岂有此理，愿意接受她的爱，能忠心专一地待她，她的恋爱的事便算万分美满地解决了。至于这男人不了解她，不关心她，甚至给她气受，瞧她不起，她都愿意忍受。她有的是软和温贴的心，可以忍受。一般时髦小姐，她们骄矜，她们威风；但那骄矜，那威风，终究是要在被男人获得时消灭的。因为这世界，这社会，是男人的世界和社会。她是个软弱安分的女人，没本领反抗，干脆就死心踏地的屈服。

她想所谓独身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事。她是已经被教养成这样的女人，如一般女人一样，有细腻丰富的感情，有女人的爱好；爱好一个温暖安乐的家庭，爱好一个温存忠心的丈夫。要抱独身，则必得在人生的其他方面找乐趣，找成就；而现在的女子一方面自己没这能耐，一方面社会也没给这机会。她说，那些时髦姑娘，喜欢交际的花朵，在年轻的时候自然是愿意怎么就怎么，快乐而且逍遥，可是年岁大了，独自一个人，怎么挨度日子？

这就是金小姐所以成为现在的金小姐的缘由。这就是金小姐恋爱观念的梗概。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见几次面，或者我去看她，或者她来看我，都没一定。我比较忙，实在说，还是她来看我的次数多。以前她那种腼腆忸怩的神态，如今是以幸福的笑颜代替了。

金小姐的确懂得怎样来爱一个男人：一个星期中至少要送三五次可口的食品给我吃；我那些不漂亮的领带，已由皱折变成贴平，由四五条变成十七八条了；两只睡了四五年的旧枕，在和她认识两个星期后便已送给听差，如今床头摆着的是两只她亲手绣了猫头鹰在白杨枝上唱歌，一弯新月在天边的图案的绸套，配了三友实业社芦花胆的美丽而且舒服的枕头了；我的毛巾，我的牙刷，这一类盥具和日用小件都早已由她换置一新；素来污秽的手帕，每天都由她第一天要去，第二天变成洁白送回放入我的衣袋中；像一个猪窝的房间，被她整理装扮得有照相登画报的资格了。

如果不是刮大风一类的例外日子，每天早晨七点钟左右，我正朦朦胧胧地拥在被里，就照例有缓慢安详的皮鞋声由远而近，门推开了，进来了一个笑的脸；有时自己睡糊涂了，听不见那轻碎的皮鞋声，醒来时也照例有一个笑着的脸在我的床畔，或书桌边。

“夜里睡得可好？”伴着这关切的声音的是羞涩的笑。

我的失眠症早已自愈，回答自然是好。于是我躺在床上，望着她那幸福的笑脸，零零碎碎地谈点话。

“凤，我拿什么报答你？”有时我想起自己对于她的心，觉到由衷的惶愧和不安，就这样和她说。

“你不要这么说呀！”像一个慈母，替我整掖着肩上的被头，或者抚摩着我的乱发。

起了床，在俨然一对夫妇的空气中，对坐在桌边吃着她买了带来的蛋糕或加厘饺；八点到了，两个人同出来，我到中学去上课，她自回学校去。临别，约定再在那里会面，谁找谁。

关满了一肚子一脉管的热情，十多年没机会漏一点一滴，烧毁了我们的青春，如今是如澎湃汹涌的江水，找着个闸口奔流泛滥了。当着这闸口的很自愧的是我，一个给另一女子牵拉着心没法摆脱的人。这个空虚创伤的灵魂，如今虽像一只橡皮袋，被热水灌注得充实而且暖和，但我不能没有内疚。因为我对她只有怜惜和感谢，我是在一种无可如何的形境中，怀了一个可耻的心念骗取了她的爱情的。

这滑稽的悲剧，到四个月头上便凭空起了波澜。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阴历四月末的风吹拂着身上的轻暑，我和金小姐在公园散了一会步，她忽然想起××电影院新到了有声名片。电影看到“休息十分钟”时，金小姐离开座到右边盥洗室里去了。就在这空当，一个卖糖果的小孩递给我一张纸条。

“您是凌先生？”他指向出口处说：“刚才一位小姐给了我一毛钱，叫我送这张纸条给您。”

我没有功夫来诧异，展看那张包口香糖的小红纸，上面东倒西歪的写了几个钢笔字：

凌家三哥：

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我前天到此地，住白象胡同三十二号。你可愿意来看看我？

王雪姿

我心里一大跳！

“喂，卖糖的，”我下意识地喊回那小孩，“那小姐呢？”

“她交给我这字条，刚才走了。”回头指着我们座位后的第三排说：“原先就坐在那里。”

我知道这件意外的事有怎样严重的意义，用功夫镇静了我自己，把字条裹入手帕放到衣袋中。

不一会，金小姐就回座，电灯重灭。四年前的旧事代替了那后半场电影，再在我脑中开映。

这荒唐姑娘只有一个贫病的寡母，无兄无弟，无姊无妹，是我婶母的侄女，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比我年小三岁。我们有三年相爱的历史，我曾用金小姐爱我的这热情爱过她，我们曾互相给饮过一杯没世难忘的初恋的芳醇。她进初中时只是个十五岁的天真女孩。照着我婶母的嘱咐，我只把这整天露着嫣然笑靥的小姑娘当我的同胞妹来关爱，来照护。但那时我是个十八九岁的人，青春的烈火在我的血液里燃烧，我的年龄我的生理不许我长久这样看待她。不久，在有意无意间便自自然然地将我们的关系超出了兄妹的单纯的爱。这姑娘太聪明，太懂事，不像其他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知道把耳后边，脖子上，调弄得没一丝垢积；知道怎样洒香水，擦巴黎粉；知道怎么穿戴合时的衣饰，买时髦漂亮的东西；爱看《红楼梦》，《茶花女》，爱看

新时行的张资平，郁达夫的小说。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懂得了二十五六岁女人所能够懂的事。她的早熟，她的胆大放肆，常常叫她这老实的“三哥”惊骇。

一个星期日，我带她到我们那中学所在的城里一座圣公会礼堂改造的电影院看电影。是着了那电影的魔，我克制不住自己，在那黑暗中，抱了她作第一次的接吻。这十六岁的小姑娘竟会紧紧把我抱住，我像被绳索捆着似的，使我伸不出气。这对于我是一个惊奇的袭击。从此我们便半日也不能离。一有机会她就依偎着我，像一只小小的百灵鸟，唱着那些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一星期中至少有两首幼稚可爱的白话诗给贴上我的日记簿。我被这少女的热情所沉醉，整天像喝了葡萄酒，迷迷糊糊不知该怎么消受她。高中没毕业她便因学费无着停学。我家的店年年折本，卖去祖上遗田勉强供我上大学，当然也无法给她援助。我进了大学后因为要省钱，便不曾回过南。第一年，聚精会神地读她诉说相思的信，呆呆地躺在床上回味过去的梦，埋首在桌上给她写十张八张蝇头小字的信是我唯一的功课。不久她便由一位亲戚介绍到医院中作看护。从这时起，推说医院里事忙，她便不常给我信。而且那些好事的关心人给告诉的，和医生发生了关系，被姓张的小伙子骗到上海去进什么美术学校，被姓张的弃了，和姓虞的姘上了；其后是当电影演员，做舞女等等一些使自己听了要吐血的荒唐故事便源源而来。

这荒唐姑娘，在起初我愤恨过她，但渐渐我便没勇气。我知道她是被这个社会怎么对付着的。一个贫寒的少女，她有感官，她有现代人的物质欲愿，置身在一个一切都商品化了的都市中，那些丑恶的人物包围着她，那些美好的东西诱惑着她，她无法抵御自己不成为商品。稍一做错了，这个社会便不饶恕她。于是掉在泥污中，越挣扎便越更深地陷落。她的堕落，她的荒唐，她自己没有罪。……

四年不见的雪姑娘，到现在只留下一个伤痛的印记在我的灵魂里。

电影散场，外面已缀起淡黄色的街灯。吃了饭，送金小姐回到学校，我便照着那张包口香糖的红纸所开的住址找到雪姑娘的住处。瞒住了金小姐，自己偷偷地做这事，我避免不了良心的谴责。但我无法不这样做，便做了。

叩了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上海娘姨。

“有个姓王的小姐住在这里吗？我姓凌。”

“哦，凌先生。小姐正勒呐里厢等徐。”

走进那四合头的小院中，东边房门前站着一个苗条的女人。

“是三哥呀？”还是四年前的口气。引我走进了房门：“你还肯来看我？我派你一定不睬我了呢！——还认得我吗？”

那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使我生了嫌恶。

我控制着翻涌麻乱的情绪，勉强扮了个笑脸仔细向她望了一眼：一个圆如满月的天真的笑脸，如今是瘦长而且憔悴；像一朵纯朴的玫瑰花的少女风韵已整个毁坏。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道地上海派女人。在这女人身上，除了两只乌乌的大眼球还依稀像当年，是再也找不出一丝儿我的雪姑娘的影子了。

“要是在外面遇见，就真不认得了。”

“女人十八变，话不错。哈哈！”上海女人地笑着，“——你还是旧样子，虽然穿了这样漂亮的洋装，在电影院里我一看见后影就认得了。你看我的眼睛阿是蛮厉害？”

房里乱七八糟地摆着些东西：里墙边靠着一张矮铁床，衣服，袜子，毛巾毯，胡乱卷堆在上面；三两只箱子东横西竖在地上，一只开着，里面是些红的花的衣服，盒子和画报；旧木桌上挤满开着的闭着的香水瓶，胰子盒，香粉盒，皮钱夹，香烟罐子，《啼笑姻缘》，《北平指南》。我喝着茶，抽着烟，想不出话来说，只把眼睛巡视着这周遭，心里时时苦痛得想哭。

“我是请你来谈谈的。你别不作声呀！——我问你，同你看电影的那位是你太太，是你爱人？”

“也不是太太，也不是爱人，”我窘促地假笑了笑，说：“是新认识的女朋友。”

“女朋友还不就是爱人！哈哈。”

“你要说是爱人，自然也可以。”

“我做人识相。我不敢当着面招呼你，想了半天，才想出那送字条的主意来。你告诉了她没有？”

“用不着告诉她。”我嗫嚅着说。

不一会，上海娘姨进来了，说：“小姐，喊个菜来哉。”“你还没有吃饭？”

“你吃过了？——吃过了也要再吃一点。今天我真高兴，特意去买了两瓶白兰地。我要你陪我喝。肯不肯赏面子？”

我被强迫着带到西边屋里。桌上摆着五六样馆子菜，两瓶酒。

这荒唐姑娘一樽一樽饮着酒，像喝白开水。我心里滚沸着一种说不明白的难受的热潮，有点待不住了。我站起来说：

“好吧，改日再来看你。”

“什么，你要走？就是你那相好正等着你，既来了，今晚也得和我谈谈。”

她抖颤着那醉脸上一只涂满口红的嘴唇说着，按住了我，回头又键上了门，说：

“好呀，三哥。你样子没变，人可变了。我做错的事，我自己知道。我至少也算是你的表妹，也算和你同过三年学呀！”

“雪，你醉了！”我无可奈何地望着她那双六七分醉意的眼睛说。

“你别胡说八道！”咕嘟又灌了一大樽，“——你猜，我到北平来是干什么的？我不怕你笑我，老实说给你听……我要改邪归正了。我的大伯要把我嫁一个海关老头子做填房太太。……在上海过惯了那种风风雨雨的日子，我也真愿意嫁个人安静地休息休息了。要不然，再过几年，老了，不去讨饭，做什么？”

“哦，这人在北平？”这问法是我用了极大的努力才做扮出来的。

“这人在我们南边，那里是在北平！我到北平来是——反正我是不怕丑，我说，我到北平来是打胎！”

“打胎？”

“是打胎。怎么，你要笑我？那东西三四个月不来，在上海验了，医生说——我本也知道是出鬼！我不对付，下半年怎么嫁过去？在上海，马上就风吹出去。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敲了那小鬼头一记竹杠，弄到五百块钱，就带那娘姨到北平来动手——北平我也早就想玩玩的。”她闪着醉眼，端着樽子，喝一口，说一句。

像《复活》中聂赫留道甫对于那堕落可怜的玛司洛娃，我是没法控制我自己了。我的天真无瑕的雪姑娘再在我意识中跳出来。一种旧有的热情迫着

我，使我想抱起她大哭。用伤痛盖住的残焰，我禁不住它的重新燃烧了。我自己笑我没有男子气，半晌无言，那一颗颗女人的眼泪，如今是在一个男子的眼眶中打着转了。

“雪，你把你自己毁坏成这样，你三哥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受不住。你不要窘苦我。我恨过你，但我不曾鄙视过你，污骂过你，更没有耻笑过你！”

“哈哈，你这些话真好听！那么，三哥，你原谅我的过去？那么，我怕死，不打胎了，现在嫁你，你要我不要我？”

“我原谅你，我愿意娶你。”我的喉头滚着这句话，但立刻金小姐在我的脑里一晃！我啞紧口唇，觉得七八只爪子在抓着我的心。

“你要我不要我？哈哈！你这个……哈哈！”喝了半口酒，流满在印度绸的衣上。

她狂笑着，摇摇倒倒地站起来。我刚伸手来扶她，她身向前一栽，跪跌在地；把头在我怀里一阵乱揉，就放声大哭起来。

我抖着手，侧身下了门上的键，高声把上海娘姨喊来。

“你小姐喝醉了，抬她到床上去。”

抬到了东房里，歪在床上大笑大哭到十点，呕吐了两三次。看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才抽身出来。

回到寓所，我像个女人似地抱住被头独自大哭了一场。整夜沉浸在内心的搏斗中。

一朵鲜明无瑕的，自己爱过捧过的花，如今已被这杀人的社会制度逼成这样。我是第一个挑逗她少女的爱情的人。她给我饮过一杯永不能忘的爱的芳醇。到现在，对于这给人践踏成污泥的花朵，不只怜惜和伤心，我是依旧爱着的。她自己没有罪，她的灵魂依旧纯圣，依旧洁白。我应该抬起她，给以爱护和抚摩。……

但是，我怎么安排金小姐？她被固锁在历史遗留给女子的传统中，毁了她的青春。到现在是无可措手地把爱情来任意抛掷。我骗取了她那无微不至的体贴与情爱。她要我填塞她那颗凄零冷落的心。……

金小姐是被这社会用封建传统的毒害给沦落了的。雪姑娘是被这社会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我是个被遇养支配在一个懦弱可耻的人格中的人，对于这杀人的社会，毫不能拿出力量予以摧毁；只拘守着自己的运命，静候历史车轮的推进。……对于这两个女人，我应该援助那一个？……

好像一只小虫子闯进了蛛网，我无法解脱自己！

在这苦厄的交斗中，我啞紧牙根过了一天。

翌日早晨，我尚未起身，金小姐照例踏着轻碎缓慢的皮鞋声来到我寓所。她除带来一件亲手制了赠我生辰的绣着只大凤鸟在胸口的睡衣而外这有一封她父亲的信。那信上说她的婚事已在进行，大约不久便可定夺，叫她要于放假时回家去。

“这信我要你替我回复。”

这话的意思是很明显。苦斗在我的内心进入一个更深的严重情境中了。

“你自己的意思怎么回复？”我尴尬地扮个苦笑说。

“我不知道。你替我做主呀！”

她说着，羞红了脸，无心地在桌上检着我的用脏的手帕，回头又忸怩地去在架上的上衣中寻检。……“这王雪姿是谁？”

我由昏乱的思绪中惊觉，那张包口香糖的红纸条已在她的手中了。

这严重的局面眼见得已无可挽回。再把欺瞒继续延长，我是没这能耐了。叹了口气，愧惶的泪流满在腮上，我把我想说的话都从头对她说了。

“凤，我对你的内疚，是无可饶恕！我听你裁处，你吩咐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金小姐挺着两只枯涩的眼，呆呆望住我。

第二天，好朋友和好朋友的未婚妻拿了金小姐的信来：

子彦：

我决于今晨搭早车回家去了。

雪姑娘的遭遇，雪姑娘的命运，我是同情她，怜惜她，如同情怜惜我自己。她是你真正的爱人。她能给你的东西，我不能给你。我没理由来搅乱你们！

我和你四个多月的畸形关系，是一出滑稽剧，愿我们把它如一场梦似的忘去吧！我是个被幸福遗弃的人，生在人世，反正是行尸走肉。你对我毫无内疚，你不必难过。

一夜的哭泣与转侧，我自喜我能这样做了。

祝福你俩！

金家凤匆匆中

这一封潦草简短的信给我一个绝大的惊讶！一种愧恧和悲怆搅拌在一起，我只有无声地流泪了！我把故事简单地告诉了好朋友两口子，就一气跑到白象胡同来。

一进胡同口，瞥见雪姑娘的那位上海娘姨押着一车子箱笼迎头来。

“你上那里去？你小姐呢？”

那娘姨惊惶失措地望了我一眼，一边催车子往前快走，一边回头慌慌张张地说：

“小姐……小姐……在屋里厢。”

看了她那种尴尬的神情，我摸不着头脑。快跑到三十二号，门是洞开着。推开东屋的门，一群苍蝇嗡嗡地飞闹起来，腥味扑满在我的鼻官。那床前狼藉地散乱着一堆堆血污的表心纸，棉花块。我的雪姑娘卷盖在血迹斑斑的毛巾毯里，露着白牙齿，泛着个狰狞可怖的青灰怪脸，僵卧在床上。……

等我再有知觉时，是在医院中，好朋友两口子在我的身畔瞪着眼。

一九三二年二月

（原载 1932 年 2 月《清华周刊》第 37 卷 1 期）

官官的补品

自己是个乡下人。感谢阎王把我投胎在一家体面人家，一落地便有人喊官官。每天袖着手都会有好菜好饭吃。一切为生存而忙劳的事，既有别人为我忙劳，自己就乐得跑出那个野蛮无味的地方，到文明人的队里来过活。到现在，我是很可以了：白的面孔，白的手，文明人的打扮，文明人的言谈，出出进进在跳舞厅，电影院，哪一点儿我含糊？

我是很小年纪便离开家乡的，算起来，已经十年出脚¹了。因为许多田地山业在家乡，搬不动；又有母亲在，母亲是个老太太，说是不能把骨头送到外乡去，将来在阴间作孤魂野鬼，所以她老人家宁愿留在乡下，守着二百年前的祖遗旧宅不出来，要我委屈点，每年回去给她看一次。我理会得母亲这苦衷，年年都回去住一晌。今年，家乡一带虽闹土匪，但也冒着险，由我大叔派了四个团丁保护着，平平安安到了家。

我自幼便不失官官的身份，有个瘦弱常生病的身肢。到后大了，便又染了一身头晕出冷汗的文明病。去年暑天在上海，和陆柔姬姑娘兜风玩，汽车出个大乱子，损血太多；虽补了血，可是身肢终究吃了亏。现在是更瘦损了。母亲不缺少爱儿子的本能，唠叨着说：“官官这身肢要吃点补品呵！”其实我自己并不傻。当然懂得补品的好处。在外面，要吃补品是太方便。派克牛奶以及卡伯勒乳白鱼肝油之类，既美味，又受用。回到家乡可真糟！家乡的人都是不知除了吃粥吃饭而外还要吃其他什么的，鱼肝油哪会有？至于牛奶，家乡的牛，是和家乡的人一样，只会驮着沉重的犁头在田里倏颈屈头跑；哪会像外面的牛，安安逸逸的如这些文明人，蹲在温度空气都合适的屋里酿奶子？

母亲说：“官官，替你雇个奶婆，吃点人奶吧？”

我笑了：一个站起来五尺高的人，偎到女人怀里吮奶子。这固然不一定是做不得的事，但家乡的女人不比外面的女人呀！这些女人有的只是一脸枯黄干瘪肉，浑身放散着汗酸臭；她们是不会把皮肤调弄得白嫩嫩，擦上香水巴黎粉安排给人搂着吻着的呀！

我向母亲皱眉摇摇头。

“为什么你摇头？”

“那多难为情！”

“有什么难为情？”母亲笑了，给我解释这误会：“傻孩子，又不是叫你像个小官官自己亲去吮奶子，是叫她挤在碗里给你喝呀！”

我竟没想到有这个好办法，惊奇地问：“是像牛奶一样，挤出来喝吗？”

“自然是罗！这个可比牛奶好十倍啦！”

“那就试试看吧。”

母亲真高兴，马上把话放出去。第二天就由一个外号叫铁芭蕉嫂子的女佣领来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奶婆来。铁芭蕉嫂子在前面走，抱着个肥头大脑的小毛毛；奶婆跟在后面。这奶婆有一身典型的家乡妇人的调子：身体上粗下细，蓬着一头橘色头发像麻雀窠；小小的脚，隆起高脚背，歪放在“剪刀口”的鞋里；滞钝的眼睛，小鼻子，一只暗红色的口唇镶着些干裂灰白脏东西在两角；枯黄的脸子，汗酸的气味，自然也不缺少。她穿件庞大的破旧蓝布褂，

¹ 出脚：出头。——作者注

两只大奶子在胸口隐约晃动，和她蹒跚的步子合着节拍。

母亲叫她坐，她忸忸地坐下了。丫头倒了茶来，她赶忙站起，双手接着碗，张开嘴唇，笑着低声说：

“折福呀，姑娘。”

“莫客气了。”母亲说，“我家大官官，——想必铁嫂子也早和你说过了，——长得太快，小时又缺了奶，现在身肢太单薄，想找个人来挤点奶子吃。我看你人也结实，也知礼。我喜欢。就是不知你的奶子可好？”

铁芭蕉嫂子两手撑着那小毛毛的胳膊向上一荡扬，走过来，放着拉拉的男子声音说：

“太太，你莫看这婆娘丑样子，奶子可真肥毛毛。呐，只看看这点小龟子，几个月的人，可就活是个李逵哥！”

小龟子捏着肉包似的小拳头，向那笑窝着，露出没牙齿的红龈肉的嘴里塞。母亲在他脸上调了调，肥而厚的棕色肉一阵抖。下巴，手膊也都有肥而厚的肉结成累累的箍箍儿。

母亲问：“是几个月的毛毛？”

奶婆原望住她的小龟子笑；听母亲问，把嘴唇包了一包，而后低声慢气地说：

“七个月，要到九月里才满周岁。”

“看毛毛，奶子不见得坏。”

“你解开钮子给太太看看。”铁芭蕉嫂子献着殷勤。

我是躺在椅上抽烟卷，奶婆羞涩地用滞钝的眼睛向我瞪一瞪，大约是对着我不好意思解纽扣。

“造你娘的孽！”铁芭蕉嫂子说：“我家大官官没见过你这对葫芦×奶子！快三十岁的人，小龟子也崩出两个了，还害你娘的什么臊！”

奶婆红了脸，羞涩地再望一望母亲，但母亲已走到她身边；没奈何，只有忸忸地解开纽扣来。

那对奶子挺翘着奶头，真大得像爪棚上吊着的大葫芦。四周团团围着褐色的斑点，青的筋络，犹如地图上的河流，交错通布到胸口。母亲以一个买客鉴别货品的神势把奶子凝神仔细看，伸过手去揉了一揉，豆浆似的白奶就望外直冒。铁嫂子沾了点到嘴里尝一尝，咂着舌头说：

“又甜又香，怪不得把这小龟子养得像猪一样！太太，你尝尝看。”

“看了颜色就知好，用不着尝。铁嫂子，你现在和她谈谈数目。”

“你要作得主，你就老实自己说吧！”铁嫂子吩咐着奶婆说。

“我自己也做不得主。我婆婆说，请太太看着给。太太是不会给我们亏吃的。”

“两句话倒说得上路子。”母亲安详地坐下来，“照平常说么，雇个奶婆到家里领小官官，是三块钱一个月。现在，我只要你每天来挤两次，你的毛毛是照常吃。——你们寒苦人，我也知道你们的难处，就让你一月拿一块半钱。”

“一天来两趟，就一个月拿一块半大龙头？这笔交易可真做得。要是我那短命老公不下棺材，我也不帮工了，酿点奶子卖卖钱，一生一世有得过。”

铁嫂子嚷着，母亲也笑了。奶婆羞涩地用舌头在口唇干裂的两角舐了舐，

大龙头：此处指一种有龙头图案的银元。——作者注

含笑说：

“太太真是慈悲人，天保佑大官人将来做个一品官，我们再好好来啃点元宝边。——太太，你老人家不知道，这年头，过日子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家里家口重；公公是个残废人，也老了；我们毛毛的爸又——”

“快点挤奶子是正经。挤了奶子，再哭你那些丧！”铁嫂子拿来一只有益茶樽，像一只青蛙似地叫着说。

奶婆红着脸赶忙接了樽子，重新把刚才上好的纽扣解开，右手扳出左奶来，按着奶头揉了揉，向樽子里一挤捏，嗤嗤地发出清脆的响声，白的奶子就一丝一丝激出来。

我远远地望着，觉得很有趣。这婆娘真蠢得如一只牛，但到底比牛聪明了：牛酿了奶子，要人替挤捏出来卖钱，自己只会探头在草盆里，嚼着现成的食。这奶婆，这只牛，却会自己用手挤，卖了钱，养活自己，还好养家口。我想，人到底比牛聪明呀！

“我倒忘记问，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母亲怜惜地问。

“说起来，想太太总记得。”铁嫂子抢着答：“他公公就是那个老不死的瘫痪老陈，他老公便是去年大官人在上海闹了大乱子在医院给助血的那个小秃子。”

“哦，就是从前种我西村杨树墩二十亩田，前年才退佃的那家佃户吗？”

“可不就是那家破落户！”

说起瘫痪老陈和小秃子，我也记得这两个人。瘫痪老陈是我家佃户中最调皮的一家。别家都照规约交白壳稻，只他大箩小箩全上麻壳粳。三十石租谷每年都要欠几十斤不到堂。向他催索，或说要换佃，老陈便拖着腿，像个蜗牛似地爬了来，哭丧着那张晦气脸，向母亲大叔说好话讨饶。学会了一只天花乱坠的嘴，说雨水怎么不匀调，蝗虫怎么多；杨树墩离河太远，又是高砧田，水是怎么个难车法；说世界不好，田亩捐，户头捐，团防捐，是怎么繁重驮不起；说自己瘫了腿，一个儿子，双手握不来四拳头，请伙计的工钱怎么大；求母亲可怜见，赏他一家五六口子喝点糙米粥，说也是绝大的大阴鹭。母亲是个慈悲人，老被他一说便说软了心。直到前年，因为遭了“夹收旱”，他竟欠起半租来。大叔发了火，说他抗租不法，要送他上县衙坐牢子。大叔的话都句句在理路上：大叔说，大家头上同顶一块天，大家全是在同样的年头上过日子。为什么别家佃户田里都有匀调雨，满田水，偏偏你种的田里就没有？为什么别家田里没蝗虫，惟独你种的田里就有了？别家佃户也一样有团防捐，户头捐，田亩捐，也一样请伙计下田，为什么他们就驮得起，单单就只见你每年来叫苦怨天？说租券上写好的有“无论虫伤水旱，每年硬交白壳稻若干石。设有抗租拖欠等情，自愿送署究办……”的话。也有你自己的指印在。你要知法，就莫犯法，安点本分。那瘫子听了大叔这斩钉截铁的话，不怕他多么调皮，也只有瞪着眼流泪，无话答；只好到母亲跟前求母亲给宽说，莫上县衙里投呈子。母亲真是个好老太太，见了他那样子，又想到为子孙造点福，叫大叔别追究了。说我们家也不在乎这几石稻。过去的都让他了。从此换家佃户，免得以后再牵牛花，南瓜藤，拉拉扯扯一辈子也缠不清楚。

高砧田：隆起的高地上的田。——作者注

夹收旱：在稻子快要成熟时遇到干旱，使稻子不能最后生长得饱满，称“夹收旱”。

瘫痪老陈的儿子小秃子，去年流落在上海，是我救他回来的。刚才铁嫂子提到的，便是这件事：

去年暑天在上海，我新爱上了陆柔姬。这姑娘是蟾宫跳舞厅的舞女，有一身象牙似的肉。乌亮亮的眼睛里装满了情和爱。会唱英文歌，会写白话信。那袅娜多姿的身段，世界上找不到东西来比拟。

那天晚上蟾宫舞厅举行茶舞会。因为一时高了兴，我和陆柔姬连着跳了十多个“皮斯”，直到散了场，犹不尽兴。没有音乐了，就开起话匣子，叫陆柔姬教我跳探戈舞，闹到快天亮。那几天正是火热天，空气中无一缕风，工厂烟囱吐出的浓烟，毫不飘动，一朵朵凝成黑雾，弥漫了全市，越使人觉得胸口如填满了棉花；连电扇也失了效用。陆柔姬耐不住热，要坐汽车去兜风。坐上汽车，我催车夫加足速率，风呼呼地在浑身吹扑。陆柔姬把脸偎在我的胸口，头发带着浓香在我腮上飘拂。我一时如醉如痴，学着时髦文学家的句子和她道：“我愿意和你一同死。好比今天这汽车像近两日报纸上所常见到的一样，闯到电杆上去，或是翻到河里去，我就和你这样搂着，含着微笑于不知不觉中突然死去。那多有意义呵！”不想这玩话竟成了讖语，那汽车夫不知是喝了酒，还是疲乏了，在江湾一个转拐处，汽车整个儿倒翻在路旁小沟里。

这岔子是出得太悲惨了：可爱的陆柔姬跌坏了内脏，口里鼻里流血，不等到医院就死去。我被碎玻璃块轧伤后脑，昏厥三十多分钟，打了强心针，才复苏醒。只有那个幸运的汽车夫伤势最轻，仅只跌伤右手。这岔子，连同医药费及陆柔姬家族的抚恤费共近一万元，使我挨了大叔和母亲许多埋怨和训责。

我损血太多，悲伤过度，身体精神受绝大打击，在医院住了半月，毫不恢复。大叔由家乡送款子来，见我病损成那样，急得和医生商量，要求用最快妥的法子为我治疗。那个外国医生说应该行补血注射。我不知道这补血注射是怎么一回事，不愿意照办。那个外国医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打着满口洋泾浜的上海话：

“补血注射是交关好，交关好。一点子也不痛。顶多也只不过像蚊子咬一口。”

“到底给我注射什么药水呢？”

“是用别人的血给你补呀。”大叔到底比我懂得多。

“用谁的血呢？难道也买得着么？”

“你这位少爷真是一位纯洁的好少爷呀！”那外国医生拍拍我的肩膀说，“中国有的是贫贱人。他们没本领赚铜钱，但是肚子不饶他，一样要饭吃；不卖血，就得饿肚子。明白不明白？你好了时，到门口去看看，两边条凳上天天坐着些破破烂烂的阿瘪三，都是卖血的。”

我高兴得笑起来：这世界真是有趣的好世界，有了钱，原来什么东西都好买的。

“可是上海这地方，”外国医生皱着高鼻上的皮，摇头继续说：“撒烂污。十个阿瘪三的血，有九个不清洁。毒来些，龌龊来些。要不得，要不得。”

大叔是个精明干练的人，说这件事不是随便做得的：上海这地方，大街小巷，满贴着花柳病广告，满站着下流雏妓。卖血的人都是娶不起媳妇的，下流事那一件不做？那种毒血一朝注入自己血管里，可就没法取出来了。大叔说着，忽然想起来，说昨天下火车时，在北站遇见一个家乡人。这人的血

一定比较可靠。我问是谁，大叔说的便是这瘫腿老陈的儿子小秃子。

“这小子怎么也跑到上海来见世界？”

“可不就是这句话么！他一见我就向我借五块钱。——这小子，也活该。说去年我家辞了他家佃，在家乡找不着饭吃，听了一个布客的话，说上海有的是工厂，工钱大，又不十分苦。他就花了心，糊里糊涂，跟那布客溜到上海来。那布客倒真介绍他到浦东一家纱厂里去当粗役，每天拿三毛钱工资。这王八蛋也真不走运，做了五个月，这家纱厂就关了门。——他说是什么和日本纱厂竞争，亏本太多才倒的，信他的胡说八道。——歇了工，再也找不到那布客；上海又没有一个人，想回家也不行。这小子倒调皮，就天天守在北站等寻来往的家乡熟人。”

“你给他钱没有？要给了他，现在该离开上海了。”

“你这孩子真叫不懂世故！是别人叫他到上海来的，为什么我平白送他五块钱？——我知道他的话是真话，还是谎话！”

我不放心，催大叔快去找。大叔告诉医生，说自己能找到可靠的熟识人来抽血，问可以不可以？

“交关好，交关好，我们医院里这两天正没收到好血。你把这个人带来，让我验一下，看能用不能用？”

大叔出去一会的工夫，果真就带了陈小秃子来。这小秃子，我看见了就认得。三十多岁的人，头上披着几根黄草似的稀毛发。两只眼睛向上吊。穿了一身肮脏的白布褂裤，袒着胸口。赤脚穿着张了前口的陈嘉庚橡皮鞋。虽比以前憔悴了些，但累累的筋肉，依旧如一只壮水牛。他进来了，喊了我，溜着两只吊眼睛，只向房间里的陈设巡扫着。

医生不许他在我的病房里登，马上叫他出去验血。医生回来高兴地连叫“耶稣基督”，夸奖大叔的眼力真好，说这人的血顶刮刮，而且也正好合我的用，这是上帝保佑我。又说我的身体太弱，注射多了怕受不住，只须三个夸特就够了。

医院里收买血，照平常价钱是每磅十元。但有时让卖者觉察到病人非用他的血不可时，他便居为奇货，要挟着抬高价钱，也是常有的事。这小秃子是狡猾得如他父亲一样，见大叔特地到北站去找他；验了血，医生又说顶刮刮，他便抓住这机会，要敲我竹杠：

三夸特血要大叔给他二十元。

“你这小子才叫不识抬举！”大叔骂他说，“我家大官官可怜你，怕你在外乡流落，才特意荐你这笔交易的。你如今却要敲竹杠。好吧，你敲吧！——你莫想错了路头，你不看看门口等着的那些穷光蛋是干什么的！怕我买不着血！”

小秃子仰天叹了口气，觉得已无所施其狡黠了；求我说句好话，酌量多给点钱。我只想我的身肢快复元，免得老在这医院里闷待着，急坏人。请大叔就看他家乡人分上给他十五元。

医生抽了血（盛在一只放有药水的瓶子里保护着，使不走热度，不凝固），当天晚上就给我施行注射。这注射真不甚痛。只是十多分钟后，却发起寒热来，像是患了疟疾病，震抖得钢丝床都叮叮作响。我害怕起来。

“我上了当了！”我颤着声音嚷，“医生没有仔细验，小秃子的血里一定是有毒的呀！”

医生和看护都轻言静语的替我解释，说这是注射后必然的现象，过一会

儿便会好的。我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寒热是退了；只是浑身难过，精神也十分萎靡。

我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等精神身体全恢复，才被大叔迫着回家住了几个月。

母亲怜惜地问：“你丈夫现在是在哪里？”

“他去年打上海回了家，”奶婆换了右边奶子，继续捏挤着，答道。“——太太，我们这种人家，那里驮得起一个人，闲着手，只吃饭？公公婆婆天天和他吵。在家里闲住了半个月，就和几个邻舍约着同走了。说是到省里去当兵。可是他又没盘川。出去七八个月了，没音信，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

“这种下种老公，死了也干净！冤枉他顶了个龟子头！”铁色蕉嫂子嚷着，在那毛毛脸上劈劈叭叭亲了几个嘴，和毛毛说：“你莫学你那宝贝老子呀！你将来要像条水牛一样，又做得，又驮得，赚钱来养你的妈。”

奶婆挤好一樽子奶，怕回去迟了要挨婆婆骂，即便抱起她孩子走。母亲叮嘱她要多喝汤水。吃了汤水，奶子自会酿得好。并说我家也不多她一张嘴，每天就到我家来吃饭也可以。奶婆笑着，说了许多添福添寿的话。

铁嫂子把奶隔水煨热了，便拿给我喝。这人奶用不着放白糖，也是甜盈盈的，也并无腥气。在外面，每磅牛奶是四块钱一月，大般又都掺混豆汁，比起这人奶来，是逊色多了。

我每天吃两樽子奶。奶婆从不失时地在我家吃中饭晚饭时来两次。吃了饭，便挤奶；挤完奶，便又忙着回家去。这奶子果真是件好东西，一个多月后，我的饭量大进，脸色也丰腴红润了。我在这野蛮无味的地方是住不惯的，早就想出去；可是县境内四处都闹土匪，各大村镇虽都办有自卫团，但是并不能真的把些土匪斩草除根。为这事，母亲不放心让我冒险走，说趁这机会在家多吃几月奶，好好养息一晌。到了外面，要吃奶子可不是容易事。

谈到土匪，最近一个月来风声是更吃紧了。七星岭的土匪在上月和另一支土匪拚了伙，啸聚五百多人，枪枝子弹都齐全。写了信给县署，勒索三万元，一个星期内得交款，分文不可少；否则便立刻攻打县城，劫掠乡镇。这风声传出，各村镇团防忙着联络布防，通路都日夜加岗。一有行迹可疑的人，便检查询问。

大叔是个团董，整天在团防局里办事。我在家里太无聊，也每天上那里去坐谈，听新闻。有时捉住了形迹可疑的人来审问，那就更有意思。团防局是设在我们村上的宗祠中。这两天团董都在这里聚会，谈天。

“上半年出了扫帚星，我便知道是大乱之兆。”一位团董这样说，“——听说这股土匪和过激党有联络。地方上不早想法子给剿灭，将来羽毛丰满了，那时看好世界！”

“也是地方上的数运到了。古话说，劫数，劫数，凡事都有个数。我们不要看别的，只看哪个村上，哪个镇上不是一天天败下去？十家就有九家穷到没饭吃，十个铺子就有七八家关门倒账。这不是数是什么？”一个老头子持着胡须，话是十分有道理。

最新奇的议论是由我的一个在外面做店友，新近才回家歇暑的远房堂兄说出的：

“地方上一天天败下去，并不是什么数。依我说，是把钱给外国人骗夺去了的缘故。记得我们小时，村上哪一家不是纺棉花，织土布？哪一家不是点用豆油灯？就说吸烟吧，也是打火石点了纸捻吸旱烟；几曾看见人划了火

柴吸大英牌、小刀牌的纸烟？东西自己制了自己用，钱是流来流去在自己人手里。那时是谁也不愁没饭吃。后来可不同了：纺了棉花，织了布，是销不出去了。大家都知道洋布衣裳、竹布衫裤是又便宜又好看。豆油灯嫌不亮，要点美孚亚细亚洋油灯了。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想尽法子制了来骗中国人的钱的；钱骗走了，没法弄回来，你叫地方不穷吗？还说什么数？——到近来，更不同了：种田的一年忙到头，交了东家租谷，缴了什么捐，什么税，只落得两手空空。要喝碗糙米粥，也不是容易事。谈做生意的吧，也没法维持了。地方上有钱的人都望外面跑，大家都晓得现在外面是热闹好玩的世界。他们要坐汽车，看看电影，谁耐烦在内地乡下住？——好比说，我这位堂弟，不就一天到晚上海上海的不肯在家里住？”

“你莫扯上我！”我红脸笑着说，“你自己不也是喜欢在外面住！”

“就是这个话呀！”堂兄继续说，“——有钱的人到外面过世界去了，小康人家一天天贫窘起来了；留下的只是些穷光蛋，赤手空拳头，做一天，吃一天糙米粥，那有多少钱买东西？你说店铺不关门，倒和谁做买卖呢？——好了，种田的不种田，做生意的伙计，朝奉，也一个个在内地找不着生意做，——你说跑到外面去吧，外面也一样，失业的人还比内地乡下多。这些人不去做强盗土匪倒做什么？你说什么是数？”

“无论你说到天边，数总有个数。”老头子反驳着说，“要不然，为什么从前外国人就不会骗中国人的钱，单单在这时就来骗呢？这不是数是什么？”

“从前我们中国是闭关自守呀！”堂兄真是会驳辩的人，“从前外国人不许到中国来，自从打了败仗，外国人进来了，你看中国不就一天天穷了？”

“听说，外国也是乱糟糟的呢！前几天报上不是说美国失业的工人有多少百万，日本失业的又是多少百万，这不是中国外国都逃不了这个数！——我说，归根结底，总是个数。”

说老实话，我对于这些议论是丝毫不感觉兴趣的。我只希望把守通路的团丁多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来，看那审问时的情形，真是有趣极了。像有一回，捉着五个变戏法的山东人，有两个女的，听说却会飞墙走壁。审问了许多次，大家都不敢放；没曾证明他们是土匪的探子，又不能就地正法。到结果还是送到县城里去发落。

一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是在一天中午发生的。就在离本村三十里薛家镇的团勇忽然押了陈小秃子来。

团勇带有薛家镇自卫团的信。信上说，捉住的这陈小秃子，不但行迹可疑，而且在他裤腰缝里搜出一封七星岭土匪给大凤山土匪的要函（大意是约日子攻打县城），显然是土匪的信使无疑。因为盘查了，知道他是我们村上人，所以特意交由我们村里团防局来发落。

这事真叫我吃惊不小。

陈小秃子是比较好了，见了大叔和我就极力申辩，说自己没有做土匪，是在北河镇做小本买卖。因为好久没回家了，特意回来看看的；走到薛家镇就被误拘了。裤子则是在旅店中和另一客人互相穿错了的。腰缝里有信，自己也并不知道。但薛家镇团勇却说，他走的路不是到我们村里来的路；是到大凤山的路。他是土匪的信使是无疑，用不着再盘问的了。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料子！”大叔骂着说，“看你种我家田时，你和

你老子就会狡猾；去年在上海，你又敲竹杠！好呀，这种败类不办，地方上还了得！”

大家的意见都相同，说这龟子吊起一双眼睛，一脸杀气，是个大凶手；不杀一儆百，是天理也难容的。

事情做得非常神速。小秃子立刻就反绑了手向南材河滩上牵。他竟横起脸，瞪出了眼珠望着我们，一点都不怕，还要求放他回家会一会娘老子和妻儿，这当然没有准许。

因为要杀一儆百，大叔主张不枪毙，干脆用大刀砍。由团勇里挑出一个杀猪的充当刽子手。这人一脸黑麻子，喝了满肚高粱烧，捏把马刀押在小秃子后面走；两只醉红的眼睛，也构成一个凶面孔。但是我看这面孔实在不如小秃子的可怕。小秃子的那神气叫人看了不由得发抖。

河滩上是挤满了人。

小秃子押到河滩上；大叔叫那刽子手用脚踢倒他。可是刽子手踢不好，就胡乱用手把他推倒在乱石上。这小秃子到死不降气，还故意把头颈贴在一块大石上，扶也扶不起来。刽子手没办法，双手把住刀柄，不住地抖，没法砍得下去。大叔过去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才像砍柴似地乱砍了三四刀，把马刀口砍成狗牙齿。

看的人都严肃无声息，只有几个野孩子拍手嚷。

小秃子被乱砍了几刀，鲜血溅满在乱石上，已经僵卧不动，刽子手也被其他团勇扶着走了。忽然那尸首又挣扎起来，举着双手，像个恶鬼凶神似的放着尖嗓子叫嚷。大家都吓得向远处逃避，嚷的嚷，跌的跌。大叔变得口白面青，把我拖了就跑。我们连跌了几个跟跄。只有几个胆大的庄稼人走拢去撮弄。我是吓傻了，紧紧拉着大叔的手不放。

“你们可想得起这人去做土匪！”

“怕是个星宿转动呢，看他那气概，也算得是条好汉了！”

一路上都七嘴八舌的谈这事。大叔只是骂刽子手和团勇，说他们都是些脓包；但后来打趣说：

“这龟子的血现在可不值半文钱了，去年要卖五元一个奈特啦！”

我和大叔回到团防局，却看见我的奶婆披头散头，由局里大哭大嚷走出来：

“我毛毛的爸不是土匪，我毛毛的爸不是土匪！”奶婆张大嘴巴像发狂似的直着嗓子嚷，“黑天大冤枉！黑天冤枉！团防局我家也出了钱，出了钱叫你们来杀人！黑天大冤枉呀！”

嚷着就往河滩上蹒跚地奔。许多孩子妇人跟在后面看。人丛里钻出铁芭蕉嫂子，赶上去，一把拉住了哭嚷着的奶婆，放着青蛙似的男人声音骂着说：

“你这婆娘才叫屎迷了心窍！你这老公就配零肉细刷——杀了还是造化了他！你不回去给我家官官挤奶子，却碰着五通神似的哭你娘的什么丧！你……”

1932 . 3 . 28

（原载 1932 年 4 月《清华周刊》第 37 卷 1 期）

蓁竹山房

阴历五月初十日和阿圆到家，正是家乡所谓“火梅”天气：太阳和淫雨交替迫人，那苦况非身受的不能想象。母亲说，前些日子二姑姑托人传了口信来，问我们到家没有；说“我做姑姑的命不好，连侄儿侄媳也冷淡我。”意思之间，是要我和阿圆到她老人家村上去住些时候。

二姑姑家我只于年小时去过一次，至今十多年了。我连年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每当想起家乡，就如记忆一个年远的传说一样。我脑中的二姑姑家，到现在更是模糊得如云如烟。那座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古书的学房，以及后园中的池塘竹木，想起来都如依稀的梦境。

二姑姑的故事好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她的红颜时代我自然没有见过，但从后来我所见到的她的风度上看来：修长的身材，清癯白晰的脸庞，狭长而凄清的眼睛，以及沉默少言笑的阴暗调子，都和她的故事十分相称。

故事在这里不必说得太多。其实，我所知道的也就有限；因为家人长者都讳谈它。我所知道的一点点，都是日长月远，家人谈话中偶然流露出来，由零碎摭拾起来的。

多年以前，叔祖的学塾中有个聪明年少的门生，是个三代孤子。因为看见叔祖房里的幃幔，笔套，与一幅大云锦上的刺绣，绣的都是各种姿态的美丽蝴蝶，心里对这绣蝴蝶的人起了羡慕之情：而这绣蝴蝶的姑娘因为听叔祖常常夸说这人，心里自然也早就有了这人。这故事中的主人以后是乘一个怎样的机缘相见相识，我不知道，长辈们恐怕也少知道。在我所摭拾的零碎资料中，这以后便是这悲惨故事的顶峰：一个三春天气的午间，冷清的后园的太湖石洞中，祖母因看牡丹花，拿住了一对仓惶失措的系裤带的顽皮孩子。

这一幕才子佳人的喜剧闹了出来，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小姐一时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放佚风流的叔祖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若干年后，扬子江中八月大潮，风浪陡作，少年赴南京应考，船翻身亡。绣蝴蝶的小姐那时才十九岁，闻耗后，在桂花树下自缢，为园丁所见，救活了，没死。少年家觉得这小姐尚有稍些可风之处，商得了女家同意，大吹大擂接小姐过去迎了灵柩；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

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并不多么有趣；二姑姑要没这故事，我们这次也就不致急于要去。

母亲自然怂恿我们去。说我们是新结婚，也难得回家一次。二姑姑家孤寂了一辈子，如今如此想念我们，这点子人情是不能不尽的。但是阿圆却有点怕我们家乡的老太太。这些老太太——举个例，就如我的大伯娘，她老人家就最喜欢搂阿圆在膝上喊宝宝，亲她的脸，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又要我和她接吻给她老人家看。一得闲空，就托支水烟袋坐到我们房里来，盯着眼看守着我们作迷迷笑脸，满口反复地说些叫人红脸不好意思的夸美的话。这种种罗唆，我倒不大在意；可是阿圆就老被窘得脸红耳赤，不知该往哪里躲。——因此，阿圆不愿去。

我知道弊病之所在，告诉阿圆：二姑姑不是这种善于表现的快乐天真的

“火梅”天气：我国长江下游，每年四五月间，梅子黄熟，连日阴雨，被称为梅雨季节。因为太阳和淫雨交替迫人，又叫“火梅”天气。——作者注

老太太。而且我会投年轻姑娘之所好，照二姑姑原来的故事又编上了许多的动人的穿插，说得阿圆感动得红了眼睛叹长气。听说二姑姑决不会给她那种罗唆，她的不愿去的心就完全消除；再听了二姑姑的故事，有趣得如从线装书中看下来的一样；又想到借此可以暂时躲避家下的老太太；而且又知道金燕村中风景好，篁竹山房的屋舍阴凉宽敞：于是阿圆不愿去的心，变成急于要去了。

我说金燕村，就是二姑姑的村；篁竹山房就是二姑姑的家宅。沿着荆溪的石堤走，走的七八里地，回环合抱的山峦渐渐拥挤，两岸葱翠古老的槐柳渐密，溪中暗赭色的大石渐多，哗哗的水激石块声越听越近。这段溪，渐不叫荆溪，而是叫响潭。响潭的两岸，槐树柳树榆树更多更老更葱茏，两面缝合，荫罩着乱喷白色水沫的河面，一缕太阳光也晒不下来。沿着响潭两岸的树林中，疏疏落落地缀着二十多座白垩瓦屋。西岸上，紧临着响潭，那座白屋分外大；梅花窗的围墙上探露着一丛竹子；竹子一半是绿色的，一半已开了花，变成槁色。——这座村子便是金燕村，这座大屋便是二姑姑的家宅篁竹山房。

阿圆是外乡生长的，从前只在中国山水画上见过的景子，一朝忽然身历其境，欣跃之情自然难言。我一时回想起平日见惯的两式房子，柏油马路，烟囱，工厂等等，也觉得是重入梦境，作了许多缥缈之想。

二姑姑多年不见，显见得老迈了。

“昨天夜里结了三颗大灯花，今朝喜鹊在屋脊上叫了三四次，我知道要来人。”

那张苍白皱摺的脸没多少表情。说话的语气，走路的步法，和她老人家的脸庞同一调子：阴暗，凄苦，迟钝。她引我们进到内屋里，自己跚跚颤颤地到房里去张罗果盘，吩咐丫头为我们打脸水。——这丫头叫兰花，本是我家的丫头，三十多岁了。二姑姑陪嫁丫头死后，祖父便拨了身边的这丫头来服侍姑姑，和姑姑作伴。她陪姑姑住守这所大屋子已二十多年，跟姑姑念诗念经，学姑姑绣蝴蝶，她自己说不要成家的。

二姑姑说没指望我们来得如此快，房子都没打扫。领我们参观全宅，顺便叫我们自己拣一间合意的住。四个人分作三排走，姑姑在前，我俩在次，兰花在最后。阿圆蹈着姑姑的步子走，显见得拘束不自在，不时昂头顾我，作有趣的会意之笑。我们都无话说。

屋子高大，阴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谐调的。石阶，地砖，柱础，甚至板壁上，都染涂着一屋深深浅浅的暗绿，是苔尘。一种与陈腐的土木之气混合的霉气扑满鼻官。每一进屋的梁上都吊有淡黄色的燕子窝，有的已剥落，只留着痕迹；有的正孵着雏儿，叫得分外响。

我们每走到一进房子，由兰花先上前开锁；因为除姑姑住的一头两间的正屋而外，其余每一间房，每一道门都是上了锁的。看完了正屋，由侧门一条巷子走到花园中。邻着花园有座雅致的房，门额上写着“邀月”两个八字。百叶窗，古瓶式的门，门上也有明瓦纸的册叶小窗。我爱这地方近花园，较别处明朗清新得多，和姑姑说，我们就住这间房。姑姑叫兰花开了锁，两扇门一推开，就噗噗落下三只东西来：两只是壁虎，一只蝙蝠。我们都怔了一怔。壁虎是悠悠地爬走了；兰花拾起那只大蝙蝠，轻轻放到墙隅里，咕语着似地念了一套怪话：

“福公公，你让让房，有贵客要在这里住。”

阿圆惊惶不安的样子，牵一牵我的衣角，意思大约是对着这些情景，不敢在这间屋里住。二姑姑年老还不失其敏感，不知怎样她老人家就窥知了阿圆的心事：

“不要紧。——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时都打扫一次。停会，叫兰花再好好来收拾。福公公虎爷爷都会让出去的。”

又说：

“这间邀月庐是你姑爹最喜欢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来，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里面全是新崭崭的。”

我探身进去张看，兜了一脸蜘蛛网。里面果然是新崭崭的。墙上字画，桌上陈设，都很整齐。只是蒙上一层薄薄的尘灰罢了。

我们看兰花扎了竹叶把，拿了扫帚来打扫。二姑姑自回前进去了。阿圆用一个小孩子的神秘惊奇的表情问我说：

“怎么说姑爹？……”

兰花放下竹叶把，瞪着两只阴沉的眼睛低幽地告诉阿圆说：

“爷爷灵验得很啦！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我也常看见的，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

阿圆扭着我的袖口，只是向着兰花的两只眼睛瞪看。兰花打扫好屋子，又忙着抱被褥毯子席子为我们安排床铺。里墙边原有一张檀木榻，榻几上面摆着一套围棋子，一盘瓷制的大蟠桃。把棋子蟠桃连同榻几拿去，铺上被席，便是我们的床了。二姑姑珊珊颤颤地走来，拿着一顶蚊帐给我们看，说这是姑爹用的帐，是玻璃纱制的；问我们怕不怕招凉。我自然愿意要这顶凉快帐子；但是阿圆却望我瞪着眼，好像连这顶美丽的帐子也有可怕之处。

这屋子的陈设是非常美致的，只看墙上的点缀就知道。东墙上挂着四幅大锦屏，上面绣着“篔竹山房唱和诗”，边沿上密密齐齐地绣着各色的小蝴蝶，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很灿烂。西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钟馗捉鬼图》，两边有洪北江的“梅雪松风清几榻，天光云影护琴书”的对子。床榻对面的南墙上有百叶窗子可以看花园，窗下一书桌，桌上一个朱砂古瓶，瓶里插着马尾云拂。

我觉得这地方好。陈设既古色古香，而窗外一丛半绿半黄的修竹，和墙外隐约可听的响潭之水，越衬托得闲适恬静。

不久吃晚饭，我们都默然无话。我和阿圆是不知在姑姑面前该说些什么好；姑姑自己呢，是不肯多说话的。偌大屋子如一大座古墓，没一丝人声；只有堂厅里的燕子啾啾地叫。兰花向天井檐上张一张，自言自语地说：

“青姑娘还不回来呢！”

二姑姑也不答话，点点头。阿圆偷眼看看我。——其实我自己也正在纳罕着的。吃了饭，正洗脸，一只燕子由天井飞来，在屋里绕了一道，就钻进檐下的窝里去了。兰花停了碗，把筷子放在嘴沿上，低低地说：

“青姑娘，你到这时才回来。”悠悠地长叹一口气。

我释然，向阿圆笑笑；阿圆却不曾笑，只瞪着眼看兰花。

我说邀月庐清新明朗，那是指日间而言。谁知这天晚上，大雨复作，一盞三支灯草的豆油檠摇晃不定，远远正屋里二姑姑和兰花低幽地念着晚经，

洪北江：即洪亮吉，清乾隆时的进士，研究经史、地理的学者，善诗文，著作有《洪北江全集》。——作者注

听来简直是“秋坟鬼唱鲍家诗”；加以外面雨声虫声风弄竹声合奏起一支凄戾的交响曲，显得这周遭的确鬼气殊多。也不知是循着怎样的一个线索，很自然地便和阿圆谈起《聊斋》的故事来。谈一回，她越靠紧我一些，两眼只瞪着西墙上的《钟馗捉鬼图》，额上鼻上渐渐全渍着汗珠。钟馗手下按着的那个鬼，披着发，撕开血盆口，露出两支大獠牙，栩栩欲活。我偶然瞥一眼，也不由得一惊。这时觉得那钟馗，那恶鬼，姑姑和兰花，连同我们自己俩，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

阿圆瑟缩地说：“我想睡。”

她紧紧靠住我，我走一步，她走一步。睡到床上，自然很难睡着。不知辗转了多少时候，雨声渐止，月光透过百叶窗，映照得满屋凄幽。一阵飒飒的风摇竹声后，忽然听得窗外有脚步之声。声音虽然轻微，但是入耳十分清楚。

“你……听见了……没有？”阿圆把头钻在我的腋下，喘息地低声问。

我也不禁毛骨悚然。

那声音渐听渐近，没有了；换上的是低沉的戚戚声，如鬼低诉。阿圆已浑身汗濡。我咳了一声，那声音突然寂止；听见这突然寂止，想起兰花日间所说的话，我也不由得不怕了。

半晌没有声息，紧张的心绪稍稍平缓，但是两人的神经都过分紧张，要想到梦乡去躲身，究竟不能办到。为要解除阿圆的恐怖，我找了些快乐高兴的话和她谈说。阿圆也就渐渐敢由我的腋下伸出头来了。我说：

“你想不想你的家？”

“想。”

“怕不怕了？”

“还有点怕。”

正答着话，她突然尖起嗓子大叫一声，搂住我，嚎陶，震抖，迫不成声：

“你……看……门上！……”

我看门上——门上那个册叶小窗露着一个鬼脸，向我们张望；月光斜映，隔着玻璃纱帐看得分外明晰。说时迟，那时快。那个鬼脸一晃，就沉下去不见了。我不知从那里涌上一股勇气，推开阿圆，三步跳去，拉开门。

门外是两个女鬼！

一个由通正屋的小巷窜远了；一个则因逃避不及，正在我的面前蹲着。

“是姑姑吗？”

“唔——”幽沉的一口气。

我抹着额上的冷汗，不禁轻松地笑了。我说：

“阿圆，莫怕了，是姑姑。”

1932 . 11 . 26

（原载 1933 年 1 月《清华周刊》第 38 卷 12 期）

黄昏

到家是在下午五点钟。洗洗澡，吃吃饭，快近黄昏了。看到这个阔别的古旧家乡，一种亲热之感，正如看到我的年老的母亲一样。我想打听一些事，就笼笼统统地问我女人：“近来，家乡情形怎样？”

我女人要回答，又觉找不出头绪；想一想，伶俐地笑着，叫小玉搬张竹榻放到院子里。

“你且到院子里去乘凉罢。”

我坐到院子里，小腿架在大腿上，着着院墙头上一抹紫红色的落霞衬托着几茎狗尾草在轻轻地摇动。我女人点一根驱蚊子的栗花绳子放在我脚边，坐下来，说：

“在家乡过六月，白天里太冷清：听听古旧板壁的干裂声，看看蜻蜓在绿苔阶沿上爬行的蠢样子，就想睡。一到黄昏可不寂寞了：左右邻近的屋子，院子，巷子都发出声音来。你听着，想着他们的故事，真叫你——”

“卖鱼呀！……师娘，今天销我点鱼？”一个赤膊瘦汉子挑着一担箢篮出现在院子的耳门上。

“饭都吃过了，买鱼？”我女人说了，掉头继续向我说：——真叫你不不知起些什么感想。”

我仔细看看这卖鱼的汉子，是认得的。大宗祠里有他祖爹的“内阁中书”的匾，传到他父亲，一味的只知道买花置妾，终天和朋友讲究些诗酒风流的事，把家产败了大半，年纪很轻便死了。这汉子在他祖母和母亲两代孤孀的过分溺爱之下养育成人，学会的是养鸟雀，斗蟋蟀，钓鱼，放大风筝，抽鸦片，推牌九，勾引人家女子一类事。于是，接他父亲的手，用另一种方法，把剩余的一点田地产业，住宅家具全部花费完了。这汉子是个丈夫：他赤手空拳头，就拿捕鱼扎风筝这类本事维持着如旧的荒唐生活。到如今少说也有四十多岁了。

“这不是家庆膏子？”我低声问我女人。——家庆是名字；因为他的鸦片瘾不是用枪斗吸可以满足的，传闻他每天要生吞三四两鸦片膏子，所以大家叫他“家庆膏子”。

我女人点点头。

“大先生新到家，师娘，你买点做早饭菜。”

“你明天捉了，早点送来，我买你的。”

“师娘，做做好事，少称一点。——你看看，全是上色鱼。师娘，你不买点，我苦人到那里寻饭吃？”

“寻饭吃！”小玉插嘴说，“人家只吃白饭，你还要吃黑饭。”

“你莫刻薄我呀，小姑娘。”家庆膏子用肩头的披巾抹着额上的汗说，“今天中饭也没吃，还谈吃鸦片？”

从这种乞怜的无聊口吻，我知道他的生活一定不像早年那么好了。我问他：

“你一天卖得多少钱？”

“大先生，世界不同了！往年这样子溪鱼是四十个钞一斤，挑上岸，几条巷子走一转，不等太阳落山就空篮。这两年，嗨！卖二十多个钞也没人问价。我今天到此刻还没有发利市，说谎的你你骂我。大先生，你买点。”

“村上几个有饭吃的？还谈得上吃鱼！我今天是不买的。明天你早点送

来。”我女人说。

说着话，一阵锣声由远而近。锣声停了，就听到一个沙喉咙拖着喊，但听不清喊的什么。

“什么事敲锣？”我问。

“是天香奶奶不见了三只猪。”家庆膏子很熟悉地答。他依旧不走，把秤杆敲着秤盘丁丁作响，眼望着篮子里，无聊的样子。

“那个偷天香奶奶的猪，也算作天大的孽！”小玉叹息地说。

“说不定就是她自己的儿子偷的。”我女人说。

“师娘，”家庆膏子踌躇着，慢声说，“你不买鱼，我还有两只鸭，大老鸭。你买了我的？”

说着就呆手呆脚从篮里捧出一个麻布伞套来，掏了半晌，两只鸭“呷，呷，呷！”放声大叫了出来。我女人用手碰一碰我的臂膊，会意地向我神秘地笑一笑；而后，敛了笑，说：

“你赶快放进去，鸭子我家里有，不买你的。——你这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也不敢要。”

“师娘，说谎的你你骂我，鸭子是我自己的。我是没钱买米才拿出来卖。那个事不是我家庆膏子做的。笑话，师娘你莫多心。”

“你自己的？”小玉神头鬼脸的说，“你自己的，为什么藏在套里？”

“你你你莫刻薄我呀，小姑娘。我我是我是……”说了半天说不出，就用手心在嘴沿上抹了两抹。小玉噗嗤地笑起来。我和我女人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

“鸭子你赶快放还原，我买你一斤鱼罢。”我女人没奈何地说。家庆膏子把鸭捉还伞套里，打上了一个结，望篮里一丢，用披巾抹抹汗，说：

“师娘，今天的鱼是上色鱼，算把你三十二个。”

“你自己刚才说的，二十多个也没人要，怎么又三十二个？”小玉很生气。

“算二十八，二十八。”

“就算二十八罢。”我不耐烦地说。

秤好鱼，小玉就拿到井边去打鳞剖肚。家庆膏子这才慢手慢脚挑起担子，赖洋洋地走了。

“卖鱼呀！”一种低幽沉浊的鼻音。

“他今天恐怕真没有过上瘾。看他喊卖都是有气没力的。”小玉一面自言自语地说。

“他从前不做这种偷窃的事。”我叹口气说。

“如今在村上住家的人，东西眨不得眼。年纪轻的汉子都找不到营生做，飘飘荡荡的。有娘有老婆的，就偷娘老婆的；没娘老婆的，就偷人家的。捉住了；骂一场，打一顿，东西到底给自己换钱花用了。横竖做小偷又不犯死罪。”我的女人这么说。

“桂花嫂子今天丢了七只鸡，”小玉说，“都是正在生蛋的鸡。说屋前草墩上挑稻的撒了些稻，桂花嫂子看见了，惜不过，就把鸡放出来吃。一竿衣裳刚晾完，走出来，鸡一只也没了。——中晌找到我家来，说怕是迷失了路，钻到人家鸡窝里。我说，我家九只老鸡，十六只小鸡，一共二十五只，多一只只是你的。——桂花嫂子一面尖起喉咙‘州州’地呼，一面拾起衣角揩眼泪，也可怜。”

“那一定是——”

“听，锦绣堂三太太喊魂。”小玉打断我的话，偏着头凝神地说。

大家一静默，一缕凄哑的喊魂声从左面屋上落下来，断断续续传到我耳里：

“福宝子呀，你上学放学，大路小路上受了吓，跟奶奶回家呀！福宝子呀，你墩上水边，攀高下低，狗子猫儿，牛羊牲口，吃了吓，奶奶的万年火照你回家呀！福宝子呀，你明处暗处，受了惊吓，跟奶奶的万年火回家做太公呀！……”

这声音来回地喊着，到后来低哑得听不清字眼，只成了一片模糊凄切的哭啜声，散布到模糊的昏暗里。

“福宝子病了十多天了！”小玉说。

“这三太太是最可怜的了。”我的女人吐了一口长气说。

“三太太，”我诧异地问：“她不是有个赚钱的好儿子？”

“可不是！去年春上，她儿子开的店折了老本，倒闭了。债主都来追逼存款，状子雪片似的望县衙里投，县差终天不离门。儿子没法想，把老婆两只金耳环吞下肚就死了。老婆接过了回煞，也殉了夫。——可伤心！一家热腾腾的人家，就这么——就这么剩下一老一小。——小的如今生天花，也是死的多活的少了。”

“噢！败得这么快！”我不由自主地叫一声。

“这鱼就用油炸喽？”小玉提着洗好的鱼，来往地摇着篮子问。

“今天晚了，你凉凉罢。你只用盐拌一拌，放到纱厨里去，明朝再下锅。”我女人掉头又和我说，“败得这么快！一个星期里我亲眼看着她家出两起棺材。三太太哭得那里像个人样子？快七十岁的人！”

这时候，我又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号哭声。这声音近得很，又加上十分的泼悍响亮，把三太太凄哑的喊魂声完全掩盖了。我凄苦地笑了，我说：

“唉，果然热闹。——这是谁哭？”

“这个女人你没见过。是去年腊月里娶过来的，是隔壁松寿针匠的老婆。”我女人停一停，忽然兴会地说，“这对夫妻也真惨——”说着就长长地伸了一口气。

小玉重复走出来，愁苦地说：“只见这对夫妻，一天哭三顿，三天哭九顿！”

我想起那个瘦小个子的针匠来：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依旧童子音，不像发育过的。

“松寿针匠在外面做活的日子呢，”我女人继续说，“媳妇一个人在家里，那倒相安无事。打春上起，因为生意清淡，丈夫被他老师傅辞歇了，在家里住闲，碍了媳妇的眼了，媳妇就借题目天天哭闹。说丈夫没出息，说他白顶了个男人头。丈夫只好皱眉皱眼，一口也不敢回；上个月忽然疯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那声音真怕坏人。他娘替我家洗衣裳，来一次，就哭巴巴地谈她媳妇一次：说儿子歇了工，那是个运气；又不曾饿了你，又不曾苦了你，苦做苦过的是我，是我这个老棺材！你就丧了天良，把丈夫逼成这个病！”

“还谈她媳妇那些个丑话，丑死人！”小玉又插一句。

“你晓得什么？”我女人笑着说，“你莫乱说！”

小玉不做声了。她的黑影子忸怩地移到院子耳门上站着，说：

“三太太还在喊魂呢！——‘玉匣记’也看了，福林庵也许了愿了，三天魂喊完了，还不好，不晓得可有别法子搬弄了？”这后面一段是她的独白。

“荷荷荷，荷荷荷！”一种阴惨的，鬼哭似的笑声。

“松寿针匠笑了，松寿针匠笑了！”小玉叫。

“你听听，可怕人！”我女人望我身边移一移。

四周已经黑得一团漆。除了满天星斗，几点流萤，和地上栗花绳子的火头外，连屋脊的轮廓也看不清了。远处有笛子二胡的合奏声，尖嗓子哼着“十个月怀胎”的歌声，和松寿针匠夫妇的哭声笑声，三太太微弱的喊魂声打成一片，各找个空隙传到我耳里。

我看着我女人呆呆地凝神的身影，握了她的手，我说“难为你在这个环境里住这几年。”

“住惯了，倒也不觉苦。就是不知应该做什么才好，精神上一天天颓丧下去。我相信我简直像个老婆婆了。我现在神经很衰弱。”

“下年找到事，我们就出去。这地方没法办，不是你我住得的。”

“我最怕的是冬天，家里又没个男人，板壁响一响，老鼠跳一下——”

“又敲锣！”小玉说。

我倾耳听，这锣声很急躁。

“可是那家失了火？”我猜疑地说。

锣声继续不断，广广广广的敲了一阵，就听到喊了：

“各带——锄头——簸箕——筑东村堰呀！”

“是筑堰。”我们都轻松地伸了伸腰。

筑堰，我是懂得的。我们这山乡地方，河床太浅，近年又久已没曾修浚；落了几场雨，山洪暴发，坝堰不拆毁，就有淹没田禾之虞；刚晴上三五天，山洪退落，田水也干涸了，于是坝堰又得重新筑还原。这办法已行了多年，也并不是新近两年才有得的。

那锣声越敲越近，渐渐进了我们这条巷子了。

“老八哥，今年挨你的差？”小玉喊。

“挨我的差。”浑浊的喉咙连咳了两声。

那个敲锣的人走到门上站住了，把手里的破灯笼向里面照一照，说：

“师娘，辣椒上市了，明天我送点过来？”敲破竹筒似地咳了几声，“大先生回府了，那天到的？”“今天刚到。你的身体还结实？”

“大先生，没谈头了。前年冬天得了这个咳嗽气喘的病，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了。”灯笼照着他下半个胡子蓬松的脸，我看见他在凄凉地笑着。

“今年年成不差罢？”

“全靠天老爷慈悲——”忍了好一会，终没把咳嗽忍住；咳完了，说：

“听说外面稻是一块五？——外面到底可太平了？”“没呢，日本兵还在北边闹呢！”

“南京新近在美国借了五千万棉麦，可是真的？”我女人忽然想起来似地问我。

“说是复兴农村呀，怎么会假呢？”

“那这么说，稻价不是还要跌？那这么说，年成好有什么屁用？”老八哥咳得弯了腰，喘不过气来，一面还愤愤地挣着说，“那……那不是那那，五千万棉麦，娘的！”

“你进来喝碗茶。”小玉怜惜地说。

“唉——唉”好容易伸出了一口气，喘着说：“多谢了，我还有几条巷子要敲一敲。——娘的，那好，五千万棉麦……”刚说着，又咳呛了起来。

“辣椒明天送二斤来。”我的女人招呼他。

广广广的锣声重复响起来，敲着喊着渐远了。我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忽然听见近处铁器敲着木板“朋的”一声响，接着一个尖嗓子嘶叫着的声音从后面草墩上跳过院墙来。因为只有一墙之隔，我们都吓得怔了一怔。

“偷奶奶的鸡的短命鬼呀，你偷了奶奶的鸡换钱买棺材！”——“朋的！”——“你这永世讨不到人身的贼呀，你今晚是活不过半夜子时就要挨天雷劈死的呀！”——“朋的！”——“你这绝子绝孙的下油锅的贼呀，你偷奶奶的鸡换钱买米，吃了要七窍流血呀！”——“朋的！朋的！”——“你——呜呜——”——“明的！”——尖嗓子由强亮的嘶叫而变成嚎陶的哭诉：“你丧了良心的贼呀，呜呜呜——你害得奶奶孤儿寡妇怎么过呀！呜呜呜！”——“朋的！”——“呜呜呜——奶奶减吃减用养的七只鸡呀！”——“朋的！朋的！”——“你这烂了肚肠的贼，奶奶……呜呜呜……”——“朋的！朋的！朋的！”

“哟！”小玉惊惶的声音，“是桂花嫂子砍刀板咒了！”

我女人怔了半晌，拉着我的手，显得有点紧张。

我又深深地吐了口气。

“你疲倦了罢？——听半夜也是听不完的。”

我的确要睡了，我说：

“小玉，你问上门罢。”

小玉一边杠耳门，一边说：“这个偷鸡的真伤了桂花嫂子的心。”

我向屋子里走着，不知几时心口上压上了一块重石头，时时想吐口气。桂花嫂子的咒骂渐见得有点低哑了。许多其他嘈杂声音灌满我的耳，如同充塞着这个昏黑的夜。我觉得我是在一个坟墓中，一些活的尸首在呻吟，在嚎陶，在愤怒地叫吼，在猛力挣扎。我自言自语说：

“家乡变成这样了，几时才走上活路？……”

我的女人没答话。

一九三三年十月

(原载 1933 年 11 月《文学》第 1 卷 5 号)

卍字金银花

一九××年的夏天，我照例回家歇暑。村上几位谈天下棋的老朋友，因为家境大坏，在外乡奔走着衣食，这次都没在家。妻又新添了一个孩子，把大部分兴趣由丈夫处拿到孩子们身上去了。我每天起来，都有一个无聊的悠长日子等待打发，渐渐觉得有点受不了；就去请得我的一位远房大伯的同意，每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学诗。

我的这位大伯年纪已经六十多，晚景很是不好；可是天生风流倜傥。到而今还不失为一个老少年：终日在家吟诗填词，品玩金石古器，见了人就张开盖着花白胡须的口唇哈哈大笑，把身世的不满，全不放在心上。

我每天早上八点钟去，读些两汉魏晋人的作品，又学点声韵之学，大约总要花费两三个钟头才得回家。大伯的口才是很出色的，许多朴质的诗篇，都被他老人家讲解得兴致油然。这已经够叫我对于这件每天一来一往走得满身流汗的苦事发生浓厚的兴趣；还有一点，那趣味或许更在这点之上。那便是在我抱着书来往的路上，我就想起幼年时上蒙塾读书的情趣。我从前上蒙塾读书也正是走这条同样的路。路上每座屋子，每堵断墙，每棵树，每方青石，虽然现在或许更破旧更不齐整了，但都能使我生起一种亲热之感。我往往忘记了自己已经娶妻生子，忘记了自己已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恍惚重新回返到童年。

这样了，我继续了两个多星期。有一天，我拟了几首曹子建的乐府诗，从大伯那里得了一顿夸奖，满肚子快乐高兴地向回家的路上走，一边且把诗卷上打双圈的句子一再地吟看着。忽然一阵微弱苦痛的呻吟从很近的地方传到我耳里。我抬头向四周一看，自己正走到司马第 破屋基的旁边。这是条静僻的小路。破屋基上堆满乱杂的瓦砾，垃圾，和些怪样子的野草，宛如一个癞痢头似的难看。离路约有一丈多的地方，有半截破墙。声音正从这破墙的另一面发出来。

我以一种小孩子的好趁热闹的神气走近那堵破墙，心想发现一点新奇有趣的事情，回去讲给妻和母亲听，大家好讨论一番，在生活里添一点资料。那破墙的一段仅仅齐我的腰部，里面的景色和外面一样，也是堆满瓦砾和野草。这时已听不见那呻吟声。我抹着额上的汗，痴痴地站了一会，却听到几声断续的喘息。我跟着声音的来处找，才看见左边靠近破墙较高的一段，有一顶用敝败的竹篾芦席搭盖的小棚了。

我跨过那截破墙，三步走到那小棚子前面，从两片没搭合的破竹篾的空当里向里面望去。那里面歪歪扭扭地摆着一张竹床，上面铺着一床薄被。一个蓬头散发的穿着时式大花褂子的女人盘坐在野草瓦砾之间，佝偻着背脊，一手支撑着腰部，把另一只手臂枕着头放在竹床上面。背部一起一伏地喘着气，由上面芦席的罅隙里照下来的太阳光的点子晃动不已。

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女人病了？挨了公婆丈夫的打？做了什么坏事？我心里盘算着：我应该问一问明白，还是怎样？我用手帕抹一抹汗，咳了一声。

那女人把头抬了一抬，又重复埋到手臂里。

“哎呀，做好事的……人，倒口水……给我喝一喝吧！”我想，到哪里

去弄水呢。

“积福的人，我是真……真没……力气动了。做做——做做好事……那地上……”她哼着，喘着，把一个指头指着竹床头边。我这才看见几棵车前草的丛里放着把瓦壶。我收了手里的洋伞，和书一起放在地上，侧着身挨进棚子里面。这时候已快中午，太阳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棚子里一团闷热的汗气，和着野草土砾的怪味，熏得人头晕眼眩，我把瓦壶提到手里，却找不到茶碗。

“就用壶喝吗？”

那女人挣扎着稍稍抬起头来。我就托住她的前额，一边把瓦壶的嘴子凑上她的口。我想看一看是哪家的女人，是否是认识的。但我站的部位是在她的背后，她的头又低着，究竟看不出来。她像个饿孩子吃奶似地吮了两口水，很快地又伏到竹床上，喘起气来。

“你是哪家的嫂嫂？”

她不回答我的话，重把头抬起一点，说：“我还喝一口。”

这回头抬得较高，可是头发遮盖了半个脸，我依然看不清是谁。但有一件东西，很唐突地打入我的眼里，那便是在她的怀里，挺着一个庞大膨胀的肚子！这女人的衣著风态和她这离奇的所在地方已经就绝不相称，又加她的手腕及半个脸庞也都相当的年轻丰美，并无病色，我心里稍稍有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对不起了。”她掠一掠额发，重把头枕上手臂，喘着说：“真是做了好事。”

“没什么。”踌躇了一会儿，我说：“这地上怕有毒虫子呢，到竹床上躺躺不舒服点吗？”

“我不晓得是怎么……我是——我是没奈何。我也……真是——我也顾不得了。”

我拘束地托住她的肩膊。她哼着，用力向上挣了一下，支起一只脚来；转过身，像个酒醉的人似的向竹床倒跌上去，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把那双疲乏的眼珠向我望着。她脸上泛着可怕的热红色，浸淫着汗和泪，却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就是她现在这种悲惨的情景和狼狈的样子，也并不曾把她的秀丽之点破坏多少。我打量了半晌，终认不出是哪家的女人。

她羞怯地望着我凝神很久，忽然现出点惊讶的样子。提着微弱迟缓的声音说：

“你是天竹堂的？”

“呃，我是的。”我有点纳罕了，我说：“你是哪家的？”

“我——唉，我不是你们村上的。”

“那你怎么认识我？怎么在这里？……”

“我小时候到你家去过。你家有卍字金银花。……”

我怔了半晌，渐渐从她的尖俏的眼眶和棱角格外清楚的口唇上幻见到一个梳着两条粗辫子，套着一只银项圈，穿绛色长袄，蓝缎金花小背心的男孩装束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来。我恍如回忆到一个梦境，依稀想起一个九月的傍晚。那天正是我们村上九月会节最热闹，同时也是最后一天。我逃了学，跑到戏场上看戏，看到断黑才记得回家，走到离家门口不远的巷子拐处，

看见有个小人在跺着脚嚎陶地哭喊着奶奶。天已大黑了，我仅仅看得出是个比自己略矮一点的男孩子的影子，声音听来十分陌生，不像是村上的熟识孩子。我看他哭得太伤心太急躁了，走上去拉拉他的衣裳说：

“你的奶奶是谁？你是哪家的亲戚？”

“我的奶奶！我要我奶奶，我的外婆奶奶！我不晓得，我要我外婆奶奶！”他摇摆着身子，只是来回的乱哭乱嚷。

“你是走迷了路？你怎么和你外婆脱了伴？”

他一点也不理我，依旧提着稚弱的嗓子哭喊着。我哄他莫哭，要他到我家里来。我说我会带灯笼同他去找他外婆的。他一半被我勉强拉着，一半他自己无可奈何地跟着，这才走到我的家里。在灯光下一看，我不觉呆了。原来是个美丽的女孩：那双漾满着泪的眼眶，波俏而多睫毛；那两片不时因哭后的哽咽而抽动的口唇，棱角画得格外清楚。我呆了半晌，不知还该怎么同她周旋，就红着脸把原由告诉了母亲，自己却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坐立不是，手足无措起来。

这天我母亲留这迷路的小姑娘在家里吃祭神的饭，并且叫我好好陪她玩。母亲的吩咐，使我由衷的欢喜，同使我难为情一样。我拘束地想了许多话和她谈，可并不能使她开怀：依旧忸怩的样子，把胸前的项圈捏弄着，把背心的边角在指头上缠绞着，不时凄楚地伸口长气。我又把自己一点点好玩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在她面前，逗她玩。她看见其中有数盒子洋烟画片，这才问我说：

“你有赵子龙吗？”

“有的，有的。”我高兴得如同看见春天来了一样，连忙在盒里检出那张赵子龙来。并且表示如果她喜欢，这些画片我都愿意送给她。她摇摇头：

“我就只少一张赵子龙。”说着仍把那张赵子龙放回盒里。

“你怎么不要？”我惆怅地问。

“你自己不是没有了？”

“我不要，不要紧。”

她忸怩地把那张画片放在一边；又把盒子里的画片全都拿出来，分门别类的给整理了一番；并且叫我以后要像她这样子理好，莫弄得乱七八糟的。而后向我要了一张纸，把那张赵子龙包好，放入她的背心的袋里。她把包画片剩下的半张纸按在桌上端详了一会，问我说：

“我摺个东西送你。——你喜欢什么？”

“我无论什么都好，随你。”

“我摺顶纱帽送你。”她偏着头含笑说，两个很深的酒窝显现在她丰美的腮上。

她用一种灵活熟练的手法，很快就摺起一顶纱帽来。这顶帽，完全和戏上的没二样。我高兴得说不出，寻了好些油光的五彩纸出来。她摺了一顶又一顶，大的小的，红的蓝的，摆满一桌子。玩了一会，渐渐没题目玩了，她忽然又悠长地伸一口气，不自禁地把头一摆动，喉咙里发出一声哽咽的咿嚤。

“你可喜欢花？我家园子里有卍字金银花。”我怕她重新哭起来，想了半晌，才想出这句话。

“什么卍字金银花？”她无精打采地问。

“你不晓得这种花？——是很好玩的一种花。一朵朵的都是卍字形。春天开一次，六月开一次，九月开一次。——这时候正开得好看。”

“花也会写字的？我喜欢。”她凄愁的脸上放出欣喜的光，那两个很深的笑靥又显现出来。

我马上点了枝芒杆，刚刚走出房门，听得外面有锣声。那人喊：

“丢失一个男装小姑娘呀！年纪是一十又一呀！身穿绛袍蓝地金花马甲呀！佩有一只银项圈呀！哪家收留了，放爆竹请吃莲子茶呀！”

“广广，广广，广广广！”

家里马上忙乱起来，路出三四个人去开了门招呼。不一会，一个衣冠方正的中年男子同那敲锣的走进来，爆竹放得震坏耳鼓。那男子高兴的样子，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我的那位小姑娘从房里跳出来，亲热地喊他大舅爷。

我心里骤然像压上一块沉重的东西，拿着点了要去摘卍字金银花的芒杆，痴痴地看着他们。

“他家园子里有好看的卍字花，我要了我再走。”小姑娘望望我，向她舅父这样说。

她舅父笑起来，摇着头说：“你外婆婆在家里急得跺脚呢！花明天再来讨。——你这害人的东西，散戏的时候，怎么一挤你就不见了？”

“我不晓得。我要卍字花。”

舅父又哄又劝地拉她向外走。我拿着手里的芒杆和母亲送他们出门。芒杆的火光把他们的影子远远映在对面墙上。那影子渐渐模糊下去，一会就看不见了。我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怅惘之感，犹如刚刚找得了一件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转眼又把它失掉。

我打听那小姑娘的外婆家是在“笔峰墨沼”门内。第二天上学时就采了一大束卍字金银花送到那里，却只有个老太太出来。我说：

“你家的小姑娘要这个花。”

那老太太笑起来，说：

“好相公，她刚才已经动身回家去了。——正是啦，她走的时候还念着这花呢！”

我呆了许久，浑身像浸到冷水里，眼鼻之间感到一阵难忍的酸楚，转过身就飞跑回家，对着桌上纸摺的纱帽整整发了一天痴。

这位小姑娘从此我没有再见过她，也不曾知道她一点点消息。我在外乡过了十多年，这件旧事对于我已经如一个梦似的缥缈；而那小姑娘正也似乎在梦里见到。然而连她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如今在我面前的这狼狈可怜的女人，就是十多年前的那位小姑娘吗？我疑心我自己又在做着一个梦。

那女人看见我恍恍惚惚地出神的样子，喘息着哼了一口长气，向外挥挥手说：

“这地方热得受不住，你快走吧。真对不起你了。”

“你会摺纱帽？‘笔峰墨沼’是你外婆家？”我抹着头上的盗汗，像呓语似地问。

“你还记得起这些事？……你还给过我一张赵子龙的画片。你说那卍字花一年开三次。唉！”她先凄清地勉强笑了笑，马上两颗大泪珠由眼里滚到耳朵边，抱着大肚子侧过身，呻吟了一声。

“呃，卍字花现在正开着，我明天送些来？——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

“笔峰墨沼”：旧时士大夫为自己住宅起的名字，以显示其为“书香门第。”——作者注

在这里？你外婆呢？”

“那真好。我是……我是没一个——一个亲人的。我外婆……早不……不在了。哎呀！我……又又……又来了！”她说着，脸上泛出一种可怕的样子，牙根紧咬起来，汗和眼泪像骤雨的急来，在竹床转侧不已。刚才我在路上听到的那痛楚的呻吟，此刻又在旷荒的四遭打着回旋了。

她那痛苦的呻吟的转侧挣扎的可怕样子，使我渐渐从我激动的梦的神志中回复到现实的思绪里来。我努力镇静了自己。我想到这是“阵痛”的现象。我该替她做些什么？我难道就这样看着她发呆就行了吗？……我该替她雇一个接生婆来。但是我拿什么名义？……那么我就走开不管了吗？……

我心里生起的纠纷一团火似地炙着，同这六月中午的太阳所蒸晒出来的恶劣空气一样，使我头上如同箍上一顶铁帽。我连连呕出了几口酸水，眼前缭绕起乱星。我几乎支持不住了。

“这地方……哎呀！这不是你……你来的地方。”她一边像一个被鞭子痛打着的囚徒似地转侧呻吟着，一边连连对我向外面挥手。

我游魂似的出了小棚子，拿起地上的书和伞，踉跄地重新走向大伯家。十多年前我采了满手卍字金银花，欣跃地向“笔峰墨沼”门走，以及从那里又酸着鼻子拿着花回家时的心绪，此刻也还依稀记得。我眼里晃动着那个可爱小姑娘的影子，我的耳里塞满了那小棚子里女人的惨痛的呻吟。……

见了大伯，我把从前一个小姑娘迷路和刚才在那小棚子中所见的事都约略告诉了他。我要求他老人家去“笔峰墨沼”主人那里打听是怎么回事，用他自己的名义帮助那女人不受那残酷的刑罚。大伯十分兴会，答应我就去照办。并且说我的脸色很是沮败，恐怕中了暑邪，叫我快回去将息。

回到家里，我已经支撑不住。我生了一次很危险的热病。病中五六天昏迷不醒，乱打乱嚷，满口不离“卍字金银花”。妻和母亲整天对我流泪，我一点也不知道。

等我的病逐渐平复，妻才告诉我，说我的故事她都已经从大伯口里知道。那女人已经在当天晚上不在了。孩子并未出胎。那女人是个寡妇，因为年轻，做了为社会所不容的事。家里已经没人，想偷偷到外婆家来求舅父帮助。但舅父是个名教中人，又过于固执，因此闹下这场惨事。

妻要我静心养病，不必再惦着这事。就在那天早晨，妻到后园里采了一大束卍字金银花，走到我床前，和我说，她已打听得那女子的坟墓的所在，她愿意拿这束花去祭奠，替我还那个十多年来两次终未得偿的愿心。

1933.11.1

（原载 1933 年 11 月《清华周刊》第 40 卷 3、4 期合刊）

一千八百担
——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

时候已经是七月中旬，天气依旧很闷热。天上满布破旧棉絮似的云。雷声一阵响，二十多天没下的雨，像是喘着气没命飞赶来的，打得遍地冒灰白色的尘烟。但是已经太迟了：连阡累陌的田禾，有的呈着老绿色，矮矮地拥挤在干裂的土壤上面，像初春的麦苗；有的虽也结了稻，但只是一些灰白的壳子，干瘪得犹如老婆婆的乳房；有的是早变成焦枯萎黄的稿草，挺直着头和腰，在微风中轻飘飘地摇摆着了。

这天是七月十五。宋氏大宗祠高大庄严的中门洞开着，显然是有重要的事。

宋氏义庄管事柏堂愁眉皱眼背着手站在门上，对着面前帘子似的急雨呆呆发痴。两边两只大石狮，各张开大口，在对着他幸灾乐祸地打哈哈。

祠堂前门是一片旷荒的废基。那是洪杨乱后的遗迹。日长月远，早被垃圾泥土所盖没，变成一块高低不平的大草场。平时猪羊牲口在上面懒散地咩着草，野狗在上面咬着一块破布条什么的，发狂地奔跑着，打着滚；小孩子在上面放风筝，会节时在上面唱戏谢神，放暑假回家的年轻学生们在上面露天讲演。现在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远远突兀地挡住眼前的，是一座几根没去皮的杉木柱和几条桥板几片竹篾搭成的高棚子。这是半个月前搭起的龙王台。

台上神座里摆着只瓦缸，急乱的斜雨打上去，发出沉闷的丁丁声响；远远听去，好像关在缸里的那条“真龙”正在有所诉说。龙王台下面，没遮盖地蹲着一位癞痢头孩子模样的菩萨，浑身淋着雨，脸上含着一种似乎觉得“糟糕”的苦笑，样子怪狼狈。龙王台左右，零乱地插着些雨旗。旗上写着的那些什么“风调雨顺”，“沛然作雨”，“油然作云”，“五谷丰登”之类祝词，已经狼藉不堪。久旱的泥地上从垃圾堆里，野草丛里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闷热瘴疠气味，不住地向柏堂的鼻官里吹扑。柏堂伸了个呵欠，露出急躁不耐烦的样子，重新踱回里面去。

“双喜！双喜！”柏堂喊着，空阔的祠堂里四面嗡嗡地起了回应。

住守祠堂的双喜浑着喉咙答应着，由下堂耳门走出来。这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厮，头上盘着一条小辫子，眼睛时时沉着，像在打瞌睡。

“柏老爷什么事？”

“你是不是每房都请到了？你把帖子拿给我看。”

这位脾气好的菩萨，叫做“西风癞痢”。据说玉皇大帝是他的外公。外公派他一件有趣的差使：职司山乡地方的晴雨。每逢六月，也不知他是孩子气玩乱了心，还是其实做不得主，天老是一晴就晴上十天半个月，让太阳把田里土壤晒开裂，河水干涸到露出滩石；正要飞速地发长的稻棵，都变得垂头丧气，一天天萎黄。大家一看这情形，急得不得了。照例先禁三天屠，表示向这位癞痢头孩子以及他的上司下属忏悔求情。还不下雨，村上人把锣一敲，邀上一百二百人，戴起杨柳圈，赤着脚，排成行列，火把，龙旗，香案，鸣锣放铙，星夜跋涉三四十里乱石荆棘路，到承流峰顶的龙王潭里捉起一条鱼鳅，虾，四脚蛇……总之是条“真龙”，关到瓦缸里，鸣锣喝道走回来。由地方上有体面的大老乡绅接着，供到这里龙王台上。这是瞒住癞痢头孩子，贿赂恐吓他的下属的办法。如果仍然不下雨，那可不客气了：选几个粗壮汉子。跑到斗南山西风庙里由神座上把癞痢头孩子绑押到这里来，叫猛毒的太阳把他一头癞痢晒得出汗冒油。——作者注

“我是——小的是照帖子请的。”

双喜在“掩襟”的短褂里掏出一张大红折帖，双手递给柏堂。那折帖上列着很长的一排名字。大般名字下，都已签了“知”或“到”。柏堂皱着眉心看了一会，说：

“多少不到的？”

“就是守耕堂竹堂少爷不在家，‘知’字是石堂少爷代签的。其余签了字的老爷，少爷，相公，都答允到。”

“唔，唔。”柏堂一面把折帖放入自己衣袋里，一面哼着鼻子说，“你在里面做什么？”

“小的在烧茶。”

“东官厅你打扫完了？”

“东官厅漏雨，恐怕——小的恐怕用不得。”

“漏雨？——早怎么不说？早怎么不修理？你是个老管家呀，你怎么也越活越转去了？嗨！嗨！”柏堂把个亮光光的秃头摇得像卖货郎担的大鼓。

“是瓦眼里溅进的斜雨。一是雨太急了，瓦沟里流送不及。小的——小的——”双喜阴沉着脸毫无表情地说。一边心里却想：五月里落梅雨，已经就漏，告诉你老爷说得修，你老爷却说是今年公堂里没这些闲钱花。修祠堂也算花闲钱呀！太祖爷爷在流泪哩！——但是双喜不曾说出口。

“嗨！”柏堂像有那么回事的叹着气，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把正摇着的头停住了，回身改过口气说：“那么你把正厅里安排几张桌子椅子吧。”

“是，是。小的就去摆。”说着话，就向后退着走。

柏堂走到阶沿上，抬头向那个巨大的长方形天井望一望，雨是稍稍缓和了，天依然没个晴朗的意思。天井里几块太湖石，一边拥着棵高出屋檐数尺的大柏树，一边是三株瘦长的天竹。雨点打在上面，淅淅飒飒地响，衬托得这郎当高大的周遭分外岑寂寥廓。柏堂要压住满腹乱麻似的思绪，没法压得住。昨夜预备了整半夜，不时醒过来还要默记几次的那篇也许备而不用的尴尬的开会词腹稿，此时又断断续续涌上来：

“今天这个会，大家不催促，我也早就打算要开的。我柏堂值年管这个义庄，素来手续清楚，大家都晓得。我柏堂是承诸位看得起。——我要对得起祖宗。去年‘夹收旱’，租是照对折交，共总一千八百担。大家头上同是一块天，大家都晓得。稻价那时跌到两块五，两块二，是我柏堂不忍得拿来当泥土卖，存在仓房里，大家查看。培坤小学是只好停办。女子念书不过是那么作兴。培英小学教员钟点费减到一角五。那是为地方尽义务，大家是一片热心。下学期开不得学。市房空着没人租用。是月斋老叔热心教育，急公好义，借了一千二百元。自卫团解散。今年是第五年。二十七天不下雨，籽草无收。报了荒，县政府不准，呃，不准。那不是我柏堂弄弄什么，大家可以查问的。……要加租、佃户都闹着联合退佃，要去逃荒。呃，那自然是不行的。……我柏堂为义庄，五年来是鞠躬尽瘁，大家都晓得。今天这个会，大家不催我，我也早就要开的。我如今要提出来，请大家商量的是：第一，这一千八百担积谷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千八百担是，呃，另有正用。钱粮附加每亩六角六，垦务局特捐每亩四角，那是要交清的。呃，……月斋老叔今年三溪镇苍坊亏折太甚，培英小学那笔借款是心定要还的。月斋老叔是一片好心，我们是不能辜负他的。呃，第二，要大家商量个办法镇压佃户客民。……退佃是办不到的。呃，那是句笑话！第三，大家……呃，是第三。”

我们钱粮出不起。呃，大家议个呈请书要县政府执行加租。呃，每亩二十斤是加得的。呃，第四，保甲，壮丁队，清查户口，鄂豫皖剿匪办法，……那是，呃，没钱举办的。第五，培英小学今年是，只好停办一年，来年再设法的。村上的子弟如今真能念书，真有天资的——呃，太少，太少。村上的子弟，呃，在家里也好自修的。呃，念书也是没多大道理。……我柏堂是鞠躬尽瘁。这一千八百担，是要作正用的。……”

“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啊哟！”

柏堂吓了一跳，回过头来。大门上进来两个人，一边笑着嚷着，一边在收伞，踩着脚上的泥水，拍着身上的雨珠。那个四十多岁，穿一件旧直纹纺绸长衫的矮胖子，是谦益堂子寿，恒昌祥京广洋货布店老板，商会会长；那个二十多岁，一头油光光的时髦头发，穿一件月白生丝长袍，领子又高又硬直撑住下巴的清瘦长个子，是紫荆园松龄，一位上海什么专门学校毕业生，如今是在家专门当少爷。

“来得好，来得好。”柏堂扮个高兴的样子喊，“大家诸位，请到西官厅坐。”

“这场雨，他娘的腰！这场雨——我说，柏堂哥，”子寿收了伞，把上面的积雨摔着说。

“子寿。”柏堂答。

“这场雨要早下这么十天，嗯，啊，嗯？”

“老弟，这个话就提不得了。”柏堂不胜感慨的样子答。一边招呼着松龄说：“你今天居然肯冒着雨劳驾？”

松龄嘻嘻地笑着，不作声，把长袍高领子整一整，颈子扭一扭。“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子寿说，“这个话他要我——”

“里面坐，里面坐。”

三个人同走到西厅里，双喜赶来接了两位手里的雨伞。西厅里一张旧木榻，两连几椅。香烟果盘都已摆好。子寿向榻上一躺，顺手在榻几上取了枝烟，直着顿了两下，凑到眼前看着说：

“我如今是越穷越懒，看见榻椅就想躺。——柏堂哥，你这买的是什么烟？”

“是双喜买的。说是什么司太飞。倒公道，十三个。”

“所以你这个人容易老：样样事要望钱财经济上打算。我抽惯了大英牌，这些新牌子——”

“我晓得你的心事，要是在这个榻上设一盏烟灯，那就正合了你的意思。”

“不是那个话，不是那个话。这是什么地方？那就不成体统了。——我们还是谈正经的。松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到你府上连找了几次；你老哥财忙，都不在家——”

“我是半个月没落家，在庄上住了七天，城里三天。这个会延迟到今天开，也就是这个原故。天生一副贱骨头，有什么说的？——松龄那个话，我也——”

“你听我说，听我说。他是为了几笔存款取不动，如今已经选好了八月里的日子动土，就缺这笔钱用。柏堂哥，你说祖先的黄金 难道好长久抛露在

土面？所以这事做子孙的无论如何不肖，也是要做的。义庄这几年紧迫；我晓得。——”

“岂但紧迫？去年培英学堂开不得学，不是向月斋老先生借了一千二，不是长年二分起息？”

“那不错。听我说，听我说。松龄那座竹山，——我们是谈家里话，句句如实说——如今是鞭长莫及。松龄自己又不会经管，一个住山棚的佃户又是个脓包货。每年出的笋子，竹，都给当地的王八蛋偷个完。反正晓得主子是个软弱书生。在县政府花了不知多少钱，请当地乡绅的酒席已经不知请了多少次，立的“禁牌”都是聋子的耳朵，吓苍蝇也吓不动。这座山，和太祖的坟山是一支龙。这你老哥是晓得的。如今他急等钱用，打算硬起心肠，只要个两双手的数目。除竹木不计外，山上有五十多亩田；单单这五十多亩田，就不止二千元！这个好处，他不忍得造化别人，他是死心一个点要卖给义庄。叶落归根，凭这一点心，就是个好子孙。柏堂哥，你无论如何也得成全成全。义庄里去年的稻子一千八百担，不曾卖，我晓得。你说义庄紧迫，那不错，那不错。如今就在这稻子里出价。——柏堂哥，你说这事可行得？松龄是为了安葬祖先的黄金。这是正事。你成全了他，你有阴德。”

“你这个话，我也略知一二。可是这个义庄，不是我宋柏堂的；要是我柏堂的，那，那不谈竹山的话，就是白手借这么二千块，我也放心。”

“不打那个官话，不打那个官话。柏堂哥，松龄要你老叔说的话是一滴水一个泡，你究竟是肯不肯成全？就是这一句话。”

“子寿，你也是市面上替大家做事的。你不能拿这斩钉截铁的话来填我的胸口，那你叫我做不得人。我不妨把我荷包里的邋遢在你老弟面前抖一抖：义庄这一千八百担，是我忍不得拿来当土块卖，才勉强留下的——那也难怪我半夜给鬼摸了头，心想驮一年息，看今年价钱可好点。谁知反而望下跌，又遇到这个大旱年；今年是籽草不收。这不是我柏堂糊涂，大家家里都是有田的。如今这点蛮留下的稻，总共不过一千八百担。按市价一块八角算，不到三千五百元。只还月斋老先生那笔借款连本搭利就是一千五。老弟，你想想：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开支望那里出？报了荒，县里不准，钱粮附加每亩六角六，望那里出？垦务局的田亩捐望那里出？壮丁队的开办费望那里出？培英小学就死心关门了？——这些都不谈。老弟，我问你一句话：你晓得和你老弟同样情形，要通融这笔稻的人还有几多位？”

子寿赤红了脸，由榻位上跳着站起来，嚷着说：

“不是那个话，不是那个话！你老哥说话怎么拖泥带水的！是松龄要安葬他两代黄金，拿竹山来卖给义庄；是他托我来说这个话。你怎么说我子寿要通融义庄这笔稻！——柏堂哥，你这不是个笑话！你这不是含血喷人！”

“你坐下来，坐下来。不要走气门。就是我说错了一字半句，也反正是一家人。——那这话就格外好说了。——松龄……”

松龄坐在左边太师椅里，直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望在对面柱子的半边楹联上：柱子裂开了无数的缝，把楹联上一一个个端方的字体扭扯得很狼狈。一只壁螭从这个字爬到那个字，爬到裂缝里又重复爬出来。他把每个字在膝盖上照样描画着：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画了一次，又画第二次。柏堂和子寿的谈话，虽近在耳朵边，但仅仅跳进断断续续的一句半句来。盘绕在他脑里的，是昨天晚上在则古轩瑞卿嫂家

打牌的情形：燕姑娘打五索，他有意做个丑脸说“对”，燕姑娘就红着脸格格地笑；他把脚踹住她的那双尖瘦美丽的小脚，她就红着脸向他丢个半嗔半笑的眼；他把胆子一大，用右脚把她的脚挑着搁到自己的左腿上，握着，捏着，手由裤管里伸进去。……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都是奇迹！他想不到燕姑娘那么尊贵美丽的人，是这么容易上手！

“十个女人九个肯，只怕男人嘴不稳！……”他心里痒痒地想着，一边仔细再把每个举动回想着，一边手在膝盖上无心地画着字。子寿跳着嚷起来了，柏堂喊自己了。

“呃，柏堂叔，柏堂叔。”松龄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把眼睛眨了两眨，牵住领子扭着颈项答。

“侄郎官，不是我做叔叔的今天要对你说不三不四的话。你毕业后回家刚两年，只经过我的手的，就已经卖去五十多亩田；三河镇市房不算，在恒裕烟店抽的残股不算。你怎样两代黄金还是抛露在土面？侄郎官，先人创业不容易。你年纪轻，上头还有个老嫂；下面，刚动头就已经有两个孩子。你是受上等教育的。你要顾点后路。……世界是一天一天坏，钱是在水里的。”

“我今年——我我我……”松龄苍白的脸上飞起几朵红云，把身子扭了两扭，由太师椅上站起来。

外面格笃格笃地一阵皮鞋响，又夹着几双钉鞋和好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闹得正堂里嗡嗡然。

“我说怎么找不到人，原来你们在这里！”

说话的是博学堂大房步青：五十多岁，胡子已经花白了，是怡昌豆腐店老板，肩背有点驼，辫子是民国十七年割的，而今留着个“鸭屁股”在头上；接着进来的是审问堂二房庆甲，六十多岁，可是光滑滑的一个扁皱的下巴，找不到半点胡子根，这位老先生，人家背后都喊他“肚脐子”，意思自然是说他除了烘火，晒太阳，拿把扇子走走河岸，带小孩子玩玩，上街买买东西外，再不曾做过其他什么事；第三个是明辨堂四房子渔，或紫瑜，或子愚，总之是个满口野话，爱哈哈大笑，会做呈子状子，会打官司的人，四十多岁，一张元宝形的胖脸上，留着几根仁丹须；第四个是慎思堂三房叔鸿，一位北京什么大学毕业生，二十七八岁，左眼下一大块乌青色的疤痕，痕上有几根毛，如今是在省城中学当教员；第五个是笃行堂五房景元，一脸干巴肉，三十多岁，有个口吃的毛病，是个忠厚的生意人，自被店里辞歇后，在家已闲住三年，脸上那几条新伤痕，说不定便是他尊夫人给抓的。——这是铭公分大五房的五位代表。

柏堂丢开松龄和商会会长子寿，连忙站起来，迎着说：

“劳步劳步。湿了你们的脚，湿了你们的脚。”

说着就高声喊双喜倒茶敬烟；一边抬头看一看天：雨已小得多，几块乌云飞跑过天井。

“柏堂，你这个话错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弓着背把伞靠到墙边，举起手里那根毛竹旱烟袋看了看，慢慢地在钉鞋上敲着烟蒂说：“我是为了落雨才出来：这个‘秋燥’，还了得！”

子渔，当讼师的那一个，手里拿着两根新制的蟋蟀草，笑开脸，指着柏堂说：

“我说，柏堂哥，这个天是有意调皮，是有意；也像人，是个绝种！”

“不是那么说的，子渔。”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在榻上柏堂先前坐的那位

子坐下来，接了双喜敬的茶和双喜说：“你拿‘净丝’来，我不要这个洋烟。——子渔，不是那么说。那个年成的事，是只当瞎子死了儿子，横直没眼睛望了，可是这个‘秋燥’，人要紧，人要紧。这场雨，到底还是雪中送炭。天有眼，天有眼。”

“天有眼！天就有眼，也是生在后脑上的！”

“慢着。自从南京建都，我们这里的天，到底是有眼的；天心是归顺的。你看《申报》上，陕西一带是个什么样子？陕西要是靠近南京，就不会变成那样子。这是一定的目的。我怎么晓得天心是归顺的？我早上又看见渭生。渭生瘦了黄了，那难怪。十几天来，他连在家烧一管‘净丝’的功夫也没得。这个‘秋燥’，嗨，郎中出生意，药店出生意，棺材店出生意。”

“你老哥干子豆腐的生意也不坏呀？”子渔向大家做个鬼脸，笑开了，把蟋蟀草拂着自己的仁丹须说。

“你莫打岔。”步青老严正地继续说，“就是我们这个村上，这几天害秋瘟的有多少？一色的病：寒热不分清，烧黄了眼珠。说是‘半更子’不是；说是伤寒，也不是。你说是什么？就是个秋燥的病！我家春狗子，头天晚上吃了两块香干子，还同他姊姊唱革命歌，好好地。半夜架天架地烧起来。第二天，认不得人了。我接渭生来诊看。渭生说，用不着看，用不着看。——一色的病，他一天不看不看也要看五六十，那自然不用看。他配了一副碧玉散，叫我只管放心给他吃。可是要想病完全好，那还等菩萨洒下柳瓶里的净水。——他这个话就是有宗旨。你说天没眼？今天不落这场雨，人还了得？所以，天心到底是归顺了的。”

“肚脐子”庆甲老瘪着那张没一很胡须的嘴动了两动，眼睛望着天井，独自个点点头，表示对步青老这番高论已经有所领悟。

子渔扮了个滑稽的笑脸，望一望大家。看见大家都不作声；又见步青老在吸着烟，摇着脚，那么副得意的神气，心里有点难容。有意逗着说：

“就依老哥这么说，下场雨，杀杀秋瘟，病人好过点。那这个天，越发是个绝种了！”

“毫无目的，毫无目的。”步青老摆着脑袋说。

“听我说完。步青哥，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是像你的那杆烟管，不那么——不那么容易吸出烟来的。这个却不谈。步青哥，你晓得，人活了，不死，那是天有眼了，可是籽草无收，活着没饭吃；买吧，不管稻子多便宜，也是买不起的。这样子，索性病死了，倒不差似登仙。如今给这场雨救活了，反弄得不死不活的。那是猫儿耍耗子。不过制你多受点灾难。火烧纸马店，迟早是要归天的。你说这个天怎么是归顺了的？怎么不是个绝种？怎么是好爷爷扯的！”

“毫无目的，毫无目的！”

叔鸿，大学毕业生，静静地听着，忍不住噗嗤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子渔也尴尬地笑了，“叔鸿，你是个有学问的，你说我这话可对？”

“老哥，我得罪你。”叔鸿把头发向后摸一摸，苦笑地说：“你莫拉上我。我是不懂你们这些经纬的。”

商会会长子寿一直躺在塌上抽着烟卷，喷着圈儿玩，想心事。这时忽然

坐起来，问叔鸿说：

“叔鸿，你几时上省？你那件债务官司？……”

“学校是早开学了。就是这件官司绊了我的腿。我现在打算两天内就动身。”

“官司了了？”

“了了？光景一辈子也不会了。”

“是件什么官司？”柏堂插嘴问。

“你不晓得？——呃，你是个忙人，你是不晓得。”讼师说。

“就是万源油坊那笔存款，二千二百元。……”

“就是殷楚江的那个万源油坊？那不是笔铁稳的债？殷楚江纵然不在了，他几千亩田总是长翼膊也飞不掉的。”

“我不是说这笔账不稳。是我要钱用呀！这二千二百元还是先大人手里存的。那时先大人和殷老是亲密知己，你老哥总晓得。那时他——”

“我晓得，我晓得。”柏堂说，“那时他在长江南北有几个金字号店。他那个活动的能力，是谁也佩服的。”

“殷百万，数一数二的乡绅，数一数二的乡绅！”步青老把旱烟管在鼻上擦着油，摇着腿说。

“就是我毕业那年，一分八厘息还是上了的。忽然无缘无故的听说他死了。——有人说他是钱店倒了，债务发作，吞金子自尽的。那不管他。——我由省城赶回家，想和他令郎接一接头，免得以后我们两方隔代人，将来生瓜葛。那知他奶奶十把眼泪九把涕，要求止息，三年内分期还本。我就吃一惊。但是两方面是世交，难不成看他家出了凶事，我不帮帮忙，反来窘逼他？所以我和我母亲商量，就依他止息，可是款子要在一年内还清。这是前年的事。谁知当年不曾还，去年还是不还。我想，就是完全依你那个话，两年内也该还个大多数了；你如今佯而不睬，一毛不拔，那是个什么意思？——你晓得他是个什么主意？他要拿田抵！”

“毒主意，毒主意！”步青老摇着头说。

“那你不能开眼睛吃老鼠药啊！”柏堂关心地说。

“所以，我想一想，这个世界是谈不得情义的：我与人以德，他却报我以怨。反正我父亲是不在了，殷老也不在了。他令郎你大家总晓得，看那副形样，就要惹我生气：不是近视眼，要配副平光镜。用紫的绿的纺绸线春做四不像的西装，中山装，学生装穿。一只手要戴上四个宝石戒指。一天到晚靠在烟榻上听留声机。外埠到的娼妓，一个个喊到自己家来胡缠。你说我和这种人讲什么情义？我借给你的是现钱呀，你怎么拿田抵？这且不谈。自从我先大人——我父亲过世，丧葬费用了六七百；我弟弟几年上学校，一年用四五百；家兄离婚，花三四百；又结婚，——”

“伯鹤结婚了？自由的？”子寿问。

“在北京，在北京。”叔鸿答非所问地继续说，“又结婚。……近年家里又添了几个孩子。我们自己在外面混，是老爷管不得老爷的。唉，我们这个家，就叫没法想。这且不谈。家里一点点产业，你大家大概都晓得。一百多亩田，去年反贴了几十块完粮纳税。今年更不谈。几个合股店，呐，合茂糟坊是北伐军到境那年倒闭的，股洋五百元，完全没了，还摊了一百多元债。同姓布店，去年损三哥要做一批茧，克叉，蚀了五千！只分了点卖不掉的洋货布匹回家。福康一笔存款，店主如今是押在衙署里，我问那个去要钱？恒

丰烟店一笔，如今三老爹这个店半开半关支撑着；三老爹年尊分长，利也不给，本也不还，这口冷粽子我只好硬起颈子吃。我一家十多个人，吃用望那里开支？我是狗急跳墙，我并不是好讼。”

“县里是怎么判的？”子寿关切地问。

“县里是拖延。他破产抵债，自然没话说。可是他这个产，是田，是破不了的。我是个卖田的人，我受他的田？”

“这年头，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哈哈……”子渔，那个讼师，笑着说。

“那你走了，官司那个问？”商会会长子寿问。

“我托我们的子渔哥全权办理。”

“子渔，叔鸿这事你要尽点力。你把钱弄到手，我给你存放生息。长年二分，长年二分。”

子渔哈哈大笑起来：

“听听这个话。八字没见撇，他倒先伸腿了！”

“子寿哥，莫想这个心思。我是等着钱还债，等着钱做盘川。我要是有钱存放，我也不打官司了。如今你老哥是大老板，是商会会长，你借给我，我的是长年二分五，行不行？”

叔鸿说着，大家哈哈笑起来。

笑了一会。叔鸿走到柏堂跟前，说：

“柏堂哥，我有句话和你说。”

柏堂怔了一怔，被叔鸿拉着出了西厅。

这时候已经快十点半钟。雨已变成鹅毛雨。西厅里一块长方形的太阳光骤然由天窗上照下来，依旧是那么炎烈可怖。天井阶沿的湿地上不住冒白色的水蒸汽。

大家都皱起眉眼来。

“步青哥，”那个讼师笑着说，“你看看这个天，可像是有眼的，可像是归顺了的？这不是猫儿耍老鼠！这叫人怎么活？”

“子渔，亏你是个讼师。你这些话，毫无目的。生了个天，难道不出太阳？”

“不谈这个话。”子寿，商会会长，不耐烦地插着说，“子渔，我想想，我们这个义庄，给柏堂官拿在手里，弊病太多。如今这一千八百担，他就是想把持，不打算拿出来。”

“这个话你错了。”步青老装着旱烟袋说，“柏堂是个正直君子，人精明，把稳：他是个掰住卵子才肯过河的。他是个天天在铜钱眼里打秋千的。有这个义庄，就少不得这个人。这是一定的宗旨，一定的。”

“精明！把稳！一个笑面虎！——步青哥，我不是和你说，你养养神。”

步青老满不在乎的样子，擦着火柴吸烟，摇着脚，怡然自得。商会会长接着说：

“去年义庄的田是照六折五折收租：一千八百担。那时候他在庄屋里收租，小厮是带的他自己家里的长工，却开庄上的账；还把他两位少爷带去住，吃。那些佃户辛辛苦苦一年做到头，碰到旱年，自然只好东佃两家认亏吃；他不，还是天天要佃户送鸡来，送新上市的青豆来，吃不了，带着走，大担小担差使佃户望他家里挑。恐怕那些脏物直到而今他还不曾吃得完。这都是额外的讹诈，却饱了他个人的腰。这是说的去年。前两年十全十收、弊病自

然更多。”

“那不出奇，子寿，”步青老闭着眼，晃着身子，忽然又插一句说。“那不出奇！那是佃户的孝敬，那是他应得的酬劳。你这些怜惜佃户的话，都是猫儿哭鼠，都是猫儿吃不到墙上的干鱼……”

“你这话怎么说，步青哥？你六十岁搁在头上的人，说话怎么总是囫囵的？不是白吃了你五十多年的饭！”

“莫走气门，莫走气门！”步青老继续晃着身子闲闲地说。

“子渔，你听我说：那些就算是额外的孝敬，不谈他。一千八百担稻，那时候市价还有个两块多近三块。他存了个私心，打算垄断了，好自己赚钱上腰包，留着搁在庄上；不放心，又打庄上牲口，挑子，担子望这里运。这些手脚多一遍，他的额外酬劳就是多一次。这还不谈他。稻一搁搁下来，到今年碰这个荒年，籽草不收。稻价却跌到一块七一块八。这个损失该由那个去担负？这不谈。义庄早两年十全十收，也得价，那些钱是无论如何也是开支不尽的。除开买了我们子孙几百亩田，却不见剩一个钱。钱是不会不剩的，他拿在手边做资本，做茶叶生意，做蜜枣生意，放高利贷给穷人给佃户，每月二十个钞一块的息。培坤学校由他关门，培英学校开学还要借月斋老先生的债；明明是一分八的息，他开二分的账。”

“你这话，我相信，我相信。”讼师回答。“可是世界上的老虎都吃人，都不是好爷娘扯的。所以我是赞成瓜分义庄，先分稻，后分田，大家平分。我们先来个共产。哈哈。”

大家都吃一惊，看住讼师子渔那个哈哈笑着的脸。——像只破散了的元宝纸锭。步青老站起来，用旱烟袋敲着地，说：

“子渔，你这个话，早就有人这么倡，可是你今天公然在祠堂里说，你不是个姓宋的子孙！我比你穷，我就不敢作这个非分之目的。你这话太没良心，太没宗旨。”

子渔把头靠在太师椅背上，继续张着嘴笑；笑了好一会，坐直了，说：

“老头子，在‘家堂菩萨’面前，这是。你老哥抠屁眼赌个咒。分义庄，你心里想不想？说谎的不是好爷娘扯的！”

“太没良心，太没宗旨。”

子寿会长非常痛快地笑了一会，高兴的样子和子渔说：

“还有那个话：义庄这一千八百担稻，如今变成板凳头上的个鸡子。柏堂官就第一个想一口吞。而且，这个大荒年，我们做东家的籽草无收。客民佃户呢，他们难道天给落下米来？他们如今要退佃，要逃荒，可是不能插起翼膊飞呀，而且飞到那里去！狗急跳墙呀，他们没得吃，难不成一个个成仙学道？难不成一个个做菩萨？那个笑面虎只一味的屎填了心窍，想把持了自己一口吞，好像就没想到这一点。子渔，你想想。我今天是要提议先分这一千八百担。我们做子孙的没得吃，我们不能让柏堂官一个人玩手段，上腰包；我们不能等着客民佃户来抢粮——这抢粮的话，你说可有个七搭八？”

“有之，有之。利令智昏，柏堂不肯这么想。不催他开会，今天这个会他还不见得开。”子渔把蟋蟀草拂着胡子说。

坐在最末那张太师椅里，瞪着眼始终没作过声的景元，那个小店伙，这时忽然赶着咳了咳，搔搔干巴脸上那几条伤痕，站起来。非常严正地说：

“我我我——今天是七七七月半，客民佃佃佃——佃户做盂兰会。要防，要防防防防一着。”说得太吃力，口沫冒满在嘴沿上。

“没那么快，没那么快。那里真的说抢就抢？那是个笑话。”子渔说。

景元梗着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回身坐下。

“这个话就难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不谈。”子寿说，“柏堂官把持这笔稻，是和月斋老先生勾串好了的。刚才你晓得怎么着？松龄要葬风水，缺笔钱；这可也是子孙的大事？松龄要我替他串说，把一座竹山要义庄买。他死心一个点不肯成全也罢了，还打官话，还说是我自己打主意！我们这位松龄官松龄在抽着烟，窝住嘴吹着不响的口哨，想心事；听到提自己的名字，马上又脸红了，把领子牵一牵，颈项动一动，凄苦地笑了一笑。

“又是个扶不起来的汉献帝。教他曲子唱不响。柏堂官，那个笑面虎，玩了个手段，摆起了叔叔的架了，六二三，八二四地把他教训一顿。我们这位松龄官，就三百钱买了个瘟猪仔，死活不开口。”

“不是我不开口呀，我就开口也没用呀！”松龄忸怩地说。

“哈哈！”子渔笑着说：“那是实话，那是实话。说破了舌头，也不过是对石壁上呵了口气，柏堂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还是想拖延日子，垄断这笔积谷来给自己赚钱。都不是好爷娘扯的！”

“就是这个话呀！那个笑面老虎还说，还有人在对付义庄这一千八百担。你晓得还有那几个？”子寿问。

“我晓得的就是叔鸿要卖三十亩田，否则就借五十担稻。他等着钱做盘川，布置家用。叔鸿这事柏堂官是不能不答允的：他领了第一个月薪水就归还。鑫樵老头子要提议领‘古稀俸’，这个话是不行的：我们活不到七十的，难不成就白做一趟姓宋的子孙？肃堂官要‘靠’三亩田契，那是少数。再还有就是他——”子渔说着把那蟋蟀草点一点景元。

“我我我——”景元梗着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说，“是没没法想。我我我家里没得吃。”

“他那个媳妇，”子渔说，“是貂蝉转世，不是个好爷娘扯的。景元官也太软弱，不像个有屁的！”

“怎么，这两天又打了架？”子寿问。

“你看他脸上挂的彩！”

“我我我我——”景元摩着脸上的伤痕说。

“也难怪！”子渔说，“他歇了生意，在家里闲住三年多，家里几亩田，够不得三个月粮。他那个貂蝉，又是个猪婆转劫：今年生一个，明年生一个……那些小狗扯的一个个都是哪吒投胎！全靠貂蝉一双手做点鞋，洗点衣，养这一家人。而今的女人，有几个是好娘扯的？她吃了苦，她就想做皇帝了。”

“子寿叔，”景元站起来，红着脸，梗着青筋，走近子寿身前，恭恭敬敬他说：“我我我我想托老老老老老叔在街上，找找找找个生意，可行？”

“这话你二伯娘和我提过多次了。——你可曾上过街？”

“我我我我——”

“你可看见街上有几家店开敞了门？街上有几个买东西的主顾？”

“做做做做做好事喂。”

“啊喂！侄郎官，你找错门路了！你莫看我顶着个商会会长的头衔；我这个会长是破庙的斋公，我是天天求人家做好事的。”

“哈哈！”子渔又大笑起来。“实话！实话！你要他给你找饭碗，那是捉住个丫头要屁割！哈哈！”

步青老在榻上独自个闭着眼，晃着身，摇着脚，听着子渔子寿等的谈话，觉得已再无插嘴的机会；装上一管烟，吸着离开座位。正堂上许多人谈话哄笑的声音传到他不十分聪敏的耳朵里，吸引他踱出了两厅。

正堂里，上堂，下堂，东西拐角，两边，和正中的椅子桌子旁，都已六个一堆，五个一组地聚着来赴会的宋氏子孙。——共总不下三十多人。步青老刚走到下堂大白柱子跟前，贴西边近大龕的那个桌旁的人堆里，有个人站起来向他招手。

“步青哥，这边来，这边来。”

步青老走近一看，原来是渭生。渭生四十多岁，穿一件上黄下青的多罗麻接衫，一只厚嘴唇，翻得像猪婆嘴；白眼珠上网满红色经络，一秒钟里要眨二次眼皮。他除做郎中，兼通阴阳，是个有名的风水家。

“几时来的？你今天也有空到祠堂里来？”步青老高兴地说。

“是这个话，老哥：我是私不废公。不怕十顶轿子摆在我门口，等我去诊病，只要祠堂里有事，我还是要到的。‘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我也就是个不忘本的意思。——你早就到了？”两只红眼睛眨得如有机器开着的一样。

“我是落大雨的时候来的。——渭生，你这个话就真有宗旨。今天这场雨，抵得你几帖碧玉散？我春狗子吃得半饭碗了。”

“这场雨，甘霖，是甘霖，只是炎威不杀，元阳太旺，还是个‘秋老虎’。古人说：‘江海以濯之，秋阳以曝之。’为什么不说是‘夏阳以曝之’？这是有道理的。这就是个秋老虎的意思。何况这场雨没断雨脚，羲和就来高临？阴阳相克，人最容易中邪。藿香丸是离不得身腰的。”

“渭生叔，我说藿香丸远不如仁丹。”

插这句话的是云川，尖尖面孔，是个上学校上到中学二年级就辍学的青年；穿一件翻领短袖ABC的衬衣，一脸红颗粒，不时要用手去剥弄。他说这话时，就正在脸上剥弄着。

“人丹？那是骗人的。岂可人而有丹？除非赤松子下凡了！”

聚在一起的叔鸿，柏堂，还有石堂，——一只眼睛，四十左右，穿一件加染的灰色纺绸长衫，一脸烟色，是个落魄的小政客，曾在安武军里当过司书；肃堂，——五十多，是个老实可怜的塾师——等人都停了自己的谈话，笑起来。

“不是中国人丹，是日本仁丹。”

“那更不然了。倭寇乃虎狼之邦；它那些药，也都是个霸道。贤侄官，你记住我一句话：治病如治国，总是王道为尚。你们现在讲究新学的，就都忘记了这个道理。”

云川望一望大学毕业生叔鸿；叔鸿和柏堂继续谈着他们自己的话，没来理会；云川顽皮的样子，再插一句：

“施德之济众水怎样？虎标堂万金油，八卦丹怎样？也都不及藿香丸？”

“贤侄官，那些药，说破了不值一文钱：什么济众水，十滴水，万金油，你看装潢得那么好看，卖人家那么些钱。其实里面是些什么药？也不过薄荷，甘草，冰片之类。对上一二点酒料而已。世界上岂有个酒能驱邪者？酒鬼，酒

鬼，酒自己就是个邪道了。”

“这话就不尽然。”石堂，那位小政客，眇着一只眼睛，把手在桌角上一拍，说：“济众水里的是白兰地酒。这是味圣药。心脾胃隔有点小毛病，喝这么一小盏，药到如神！我从前在天津，也是六月里，住在我的一个‘拜把’的公馆里。那天晚上几个人去听王瑶卿的戏，没到压轴子，我就觉得心隔阻恶，一手心冷汗。我想我这可要进医院了？那知不然！我的那个‘拜把’跑到咖啡房里弄来一小盏酒，也不过这点点（比着茶樽里的茶脚）。我那时是喝不得酒的，勉强沾了一点点，就觉得意思满对。喝完了那一小盏，——是个高脚玻璃杯，这家乡是没得的——胸前豁然开朗！我一问这是什么酒，就是白兰地！施德之怕就是我的那位‘拜把’传授的。所以，外国人是有一个研究的，不能一概抹杀。至于仁丹，那诚然是个霸道！”“有吗啡！有吗啡！”步青老点着头说。

“这话就不对劲！”云川嘻笑着说，“你们到广济堂药店去问一问，一个六月，销的是仁丹多还是藿香丸多？我昨天给我婶娘去抓药，那里十三个买药的，就有五个买仁丹。中国的人丹不要，咬定一个点要日本仁丹！我打听朝奉，说是一个六月销了七八千包！长江沿岸还在抵制日货呢！难道这些人都都要吃吗啡的？”，“抵制日货，那是个笑话，那是个笑话。”石堂摇着头说。“如今街上生意是家家清淡，家家亏空，只有药店是好生意，好生意。”步青老叹口气，沉着眼睛说。

“你老伯的宝号总是不会打倒的。这……”云川说。

“那是家常必需之目的，蝇头为里（微利），蝇头为里（微利）。”“不谈那个话。”石堂补上说，“我说，要抵制，就该不分日，美，英，法，各国皆应在抵制之列。买日本货固然是利源外溢，难道买西洋货就不是利源外溢？我们中国穷那就只穷在买日本货上？还有一层：这抵制外货的事，靠学生演说，抄查，是无济于事的。人民是穷得这样子，买东西自然是拣便宜的买，何况外国货自然是比中国货好？——这个事应该由政府里出力！”

“政府里怎么个出力法？”云川问。

“政府里应该——这个话，你们是不懂的。我说的关税。外货进口、加重关税、自然国货就爬起来了。这话叔鸿就是明白的。”“什么？”叔鸿问。

“我说，要抵制外货，振兴国货，该先加重关税。”

“得罪你，老哥。我不懂这个话。”

“哈哈！”云川顽皮地笑起来。

“你大学毕业，不懂这个话？你是学社会的呀？”

“我学社会，没学到这个。你莫考我。我怕考。”

“哈哈！”云川笑。

“老哥，”叔鸿笑着说，“你那是说的句天话！是外国人在中国加重中国货的关税哩！你晓得连长江沿岸都有洋关哩！重要海港都插着外国旗子哩！”

“不谈这个。”石堂眨着一只眼睛，皱了皱鼻子说，“云川，你们年轻学生露天讲演什么的，总是个笑话。好比六月里，你们夜夜在这个门前讲演，说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话，——”

“我们说的只是破除迷信，抵制外货。我们没说什么无法无天的话。无法无天的话是你家竹堂叔说的。”云川辩着说。

“你们不能学他！他是个目无法纪的人！”

“石堂，”义庄管事柏堂沉着脸，很严重的样子说，“你那位令弟，你得管管。这个责任在你身上！家里花那些钱培养他，乡村师范毕了业，就应该在村上好好做点事了。——培英小学请他当教员，他不干；要到上海去进工厂，做工厂。体体面面的教员不做，要做汗一把水一把的工人！这不是天生的下流性子？这不是辱没姓宋的祖宗！这也罢了。做工人又不安分，给官厅缉捕，跑到家里来躲身，仍然是坐不住热板凳，天天和些客民佃户搅在一起，从中闹是寻非！满口‘俄国’‘俄国’的，他到底是个什么主意？外面人都说他‘当’了共产，这可不是个玩笑的事！将来有了是非，连累的不是别个，就是你石堂！”

“莫提这些话！莫提这些话！”石堂皱着鼻梁摆着手说，“我如今是只当没这个人。反正和我远得很，不相干！拉不到我身上来！要是我的嫡亲手足，我是早就送他到衙门押起来了！免得像敏斋老的那位耀祖官，给外国人捉住了坐西牢。——柏堂哥，你今天的折帖就不该列他的名字！”

“那不然。”柏堂说，“我是挨房头请，反正他是不到的。——叔鸿，耀祖怎样了？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他是个嫌疑犯，光景不要紧，——不过也难说。”

“唉！这两位都是——”步青老叹了口气，要说什么，睁开眼睛来，看见双喜领着两个杨柳春茶楼的伙计，挑着热腾腾的竹盒担子走进来了：“点心来了！吃点心，吃点心。”

吃完了点心，叔鸿一边接过双喜送上的手巾抹着嘴，一边自言自语地笑着说：

“点心是吃了，会可不知到几时才开得成？”

“快了！快了！”柏堂啣动着舌头，喝着茶说，“这里是铭公分，昌公分都到齐了，熙公分差三个，锋公分差两个，彦公分差四个，锡公分也齐了，彬公分……”

“我们姓宋的八大分，”商会会长子寿嚼着满口烧卖，浑着喉咙说，“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别个都是顶房头，到了会也是做菩萨；只要月斋老先生一到，凡事都行了。所以，以后不必多事，开什么祠堂门，老老实实‘素雅一块玉’地请月斋老独断独行。”

“子寿，不是那么说的。”步青老撮了五块发糕裹在手帕里，预备带回去给他春狗子吃；一边说，“月斋老叔是年尊分长，凡事有宗旨。他就是独断独行也不出奇，大家心里都服。”

“老哥，”商会会长说，“我们两个是谈不上来的。我说话，你莫插嘴！我和你老哥豆腐贴对联，两不粘！”

大家都哄笑起来。

讼师子渔笑了一会，捧着茶樽走到叔鸿跟前说：

“这里开祠堂门，不比你们学堂里开学生会，急是不行的。这里开会，是且谈，且吃，且走！会开不开没关系。”

“今天可不行，谈了，吃了，可走不得！今天是一千八百担稻，几千条性命！”

“又来了两个。——三个，三个。”云川嚷。

大家一着，来的三个人第一个是熙公分老二房逸生，穿一身月白竹布褂，

腰上系一根“通海”，胯下拖着络须，快近三十岁，是个“三江党”同志；第二个是彬公分礼约堂敏斋，五十多岁，苦心经营着他的“每文斋改良学塾”；新近为儿子不知下落，满脸愁苦样子；最末一个是培英小学校长翰芝，四十多，民国三年江南师范毕业生，穿一件旧纺绸长衫，满面白风斑。

“来得正好，来得正好！点心还有的。”柏堂招待着说。

“三江党”同志坐到白面少爷松龄的桌上，拿起筷子箝了一块糕送到口里，吃着说：

“我是命里有屎吃，到处是茅坑。我刚才在杨柳春和几个朋友刚吃的。”

“你这个绝种！”讼师子渔走过来，对逸生嘻笑着脸骂着说，“你初八日答允捉蟋蟀给我，怎么七八天不见你狗脚迹？”

“老叔，老叔，”逸生缩起头，做个防备讨打的样子说，“莫火我！莫火我！三溪镇唱‘目莲戏’，我去赶了一场。我是小狗掉在粪坑里，吃了一个饱。我昨天半夜赶回来，八十多里路，走得我臭死。——蟋蟀子我替你打听了三四头：万生竹匠的儿子在柏荫园捉了个‘桂花王’，我看了，是个‘红沙’，大概有个‘五七半下软家’，要是得得的。我隔壁小寸子捉了个‘麻王’，可惜折了一条腿。”

“你不要一只油花嘴！我不管你那些个蛋。三天里你不送几头来，你小心你那条狗腿！——真是绝种！”

“老叔，就这个话，就这个话。离‘白露’远得很，多了不敢承担，二十头出在我身上。不算话的我是二百五，你老叔送我下城，你拿鞭子整我家法，你把我的‘宋’字掉过来写。”

“这就行，这就行。”

“可是我有一句话，说了，你老叔莫多心：你老叔是叫化子嫖院，穷快活。”

“绝种！”拍的一掌打在那个光头上。

“老叔，老叔。”逸生缩着头，眨着眼，格格笑着说，“我我我不晓得你老叔养这些虫子和谁打？村上的‘撮棚’前年就没开；连三溪镇今年也没‘棚’。你老叔就该‘素雅一块玉’地在家躺躺灯了，还要一个点——一个点差使人！”

“我晓得你这绝种是一张婊子嘴！”

“老叔，老叔，你是饱人不知饿人饥，我我——”

逸生看见叔鸿走来了，就停了嘴。叔鸿走到桌旁，笑着对松龄和子渔滑稽地说：

“村上这么些人，恐怕只有你们两个最快乐。你是闲情逸致，打蟋蟀，养雀子；你，是温文风流……”

“叔鸿，松龄官有个奇癖，你不晓得。——其实不算奇，可是在他就奇了。他是个‘小脚狂’！”

松龄窘得脸上通红，扭着高硬领子上的下巴说：

“别糟蹋人，我我——”

“我糟蹋你？——松龄官，你赌咒，你赌咒。学堂毕业生不喜欢剪发女学生，倒是喜欢——他不是喜欢，简直是‘狂’！他们骂他‘封建遗孽’，

指蟋蟀的体重，“下软家”是“弱”的意思。——作者注

是斗蟋蟀的地方，为私人所开设。——作者注

那真不错。”

叔鸿笑起来，打趣地说：

“松龄，你爱小脚，少不得到山西去一躺。山西大同的小脚只有二寸半。——难怪你在家住不再想到上海去。”

“别瞎说。”松龄硬着颈项，红着脸站起来，想走开。

“别走，别走！”子渔哈哈笑着说：“他这个小脚狂，是到家了的。面貌不在乎，年纪大小不在乎。”

松龄挣一挣，到底溜走了。

“哈哈，真不是好爷娘扯的。”

“叔鸿，我有句话问你。”一个沉浊的喉咙在后面喊。

叔鸿回头，是敏斋老，每文斋主人。他和鑫樵老一起坐在东边桌子旁。

“老叔，什么事？”

“我问你一句话。耀祖到底是不是共产，你一定晓得的。”

耀祖是敏斋老的独子，同叔鸿曾经在中学同过学，和小政客石堂的从弟竹堂是宋家两位革命家；在上海一个大学读书，刚不久忽然被捕，到而今不知生死下落。敏斋老问的就是这回事。叔鸿说：

“这个我不知道。听竹堂说，也不过是个嫌疑犯。他是个用功的。你老叔尽管放心，想不久就会释放出来的。”

“不是这个话。他要真是个共产，那碎尸万段，罪有余辜。不但我痛快，祖上也是除一害。官厅不杀他，我也是不容他的。”敏斋老摇着一把鹰毛扇，说着，老花眼里漾满了眼泪，始而悲壮的声调，继而有点哽咽了。

“老叔，不会怎样的。你老人家尽管放心。我早就写了几封信托人去打听了，得了回信我就通知你老人家。”

“贤侄官，我们这个村上，如今只有你家有几个像佯的人了。我们这些人，是算不得姓宋的子孙了。”

要向义庄拿“古稀俸”的鑫樵老，用襟上挂的胡梳梳着满嘴花白胡子，秃起舌头念着说：

“‘广平望族传江左，荆里名家住水西’。叔鸿，谈到当年我们姓宋的，唉，你们小辈子是不晓得的。你只看看这里的匾，那个官职，那个科甲不是齐全了的？‘五世同堂’，‘百岁齐眉’，那件瑞祥不是齐全了的？不想五十年来，一败至于此极！”

“是的，是的。”叔鸿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从前姓宋的走出一个人来，都是像模像样，有貌有礼的。那时候祠堂里每月三小祭，每年二大祭。子孙走进来，按辈分，坐的坐，站的站：尊卑有次，长幼有序。老辈子不开已，小辈子那个敢哼一口气？而今是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个放牛场了！敏斋，这个家法，我说，还是要整顿的。……”

敏斋老独自在沉思，不曾注意鑫樵老的话；停了一会，和叔鸿说：

“今年正月，耀祖动身的时候，我就不该让他走的。他一脸黑气，我晓得是走上了恶运。叔鸿，耀祖这一趟是凶多吉少呀，我连着三夜，都梦见他满脸血污地跪在我床前呀！”两颗转了半晌的泪珠终于从眼眶里流下来了。

“那是不会的，老叔。”叔鸿愁闷的样子，勉强扮了个笑脸说，“你老叔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梦都是和事实相反的。你老人家放心。”

“呵，我放心么？……”

上堂两边近大磐的那地方，还是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医生兼堪舆家渭生，

义庄管事柏堂，小政客石堂，中学辍学生云川坐在那里。不过新加入两位：一位是四区区长绍轩，五十多岁，镶着个金牙齿在口里，脸上有几点黑麻子；还有一位便是培英小学校长翰芝先生。

他们正谈着组办“保”“甲”壮丁队的事。翰芝先生对区长绍轩说：

“依我说，绍轩哥，你这壮丁队办起来就很棘手。第一件，便是个壮丁问题。照鄂豫皖剿匪清乡的规程看，是家出一丁，不分姓氏，不分贵贱，而且不准雇人顶替；这就行不通。好比说，松龄，你叫他背杆枪去当壮丁队？好比现今在家里闲住着没事做的失业者，店伙，做裁缝的，做小贩的……他们就大般是在‘三江’里。他们内无隔宿之粮，外无半文之产，你叫他当壮丁队，他保护那个？你可记得前年土匪破城？难不成当真是土匪打进城的？不是的，是当地流氓地痞开城门欢迎的。这，三岁小孩子也知道。这些失业的年青汉子，那个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再说村上的壮丁，是好的、都在外面做着事、比如叔鸿，那自然也是少数；凡在家住着的，有几个是品行端正的？客民，佃户，那更不然了。他们饭也没得吃，一年到头苦工做得头碰了脚，他们那有个闲空来练操？来放哨？来替你保护地方？除了客民，佃户，失业者，流氓，还有那个是壮丁？第二层便是枪械问题，村上共总不过三十多杆枪，县里自卫团借去了，土匪破了城，就送给土匪了。如今你上那里去筹款买这批枪？纵然壮丁队没有薪俸，是自卫，是尽义务，可是制服费那个出？茶水，开销那个出？”

“不错，不错！”绍轩区长不耐烦地说，“只是，我如今是遵照上头的命令行事。这是势在必办的。无论如何棘手，也得办。我初十进了城的，二区三区的办法我都仔细参考了。我也就这么办。枪枝暂不发，反正一时是用不着枪；壮丁是不含糊的，料想他们也作不得乱。”

“呃，好在不是真的有枪械。”云川顽皮地插一口。

“你小孩子别乱插嘴！”区长摆出威严的样子。

“我是说的实话呀！”云川红着脸不高兴地说。

“开办费，自然是义庄里出。好在为数也有限。”

“那不然。”校长说，“义庄今年是籽草不收，有得的还是去年柏堂蛮留下的一千八百担。这笔稻，是非办培英不可。难不成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几百个姓宋的学龄儿童，连一个小学都没有？依我说，连培坤都还该恢复。上年培英男女同学就很糟，好的人家不肯送女子上男学校；那些不三不四人家的姑娘，是……总之，一句话，地方上穷得这样子，有饭吃的人家，是筛上面的米粒，点得出的两三颗。纵然有土匪来，我们也没个什么给他抢。壮丁队是多余，我们不需要保护。我们要紧的是教育子弟。”

“那是笑话，那是笑话！”区长很鄙夷的样子说，“碰到这种大荒年，是瘫子老太婆说不定也要做土匪的。土匪不是从别处来，就在你们村上出！壮丁队办起来了，至少壮得住我们的胆。要不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这个责任由那个负？你校长是不管我的死活的。”

“绍轩，你这话有宗旨！”豆腐店老板步青老沉默了半天，这时插嘴说，“土匪是非剿不可，非剿不可。这一向你看报，江西皖北一带共匪都……”

绍轩区长觉得他的话文不对题，瞥了老头子一眼，接着说：

“说教育，何尝没学校？敏斋老不是有个顶刮刮的改良私塾？肃堂兄不是有个馆？就说学堂吧，城区里不有的是学堂？”

步青老见话不投机，摇着腿自掉头和医生兼阴阳家渭生说：

“嗨，总司令剿匪真是马到成功。这里面有个道理。渭生，你恐怕就没有悟到。你说吴佩孚为什么成不得正果？张作霖为什么成不得正果？孙传芳为什么成不得正果？这就是个‘人’字的讲究：张吴他们的‘人’字在偏傍，是缩着的；总司令的‘人’字张开来，盖在中顶上。——这就是个真宗旨了！”

渭生惊了一下，大有所悟的样子，连连眨着那双红眼睛点着头。

区长和校长继续讨论他们自己的，不曾来理会。校长说：

“城区学校的经费靠的是丝茧茶叶捐。这两年茧子没销场——连松龄的那块大桑园都完全砍掉做了菜园了。这几年有几家是养蚕的？这不谈他。县教育局去年亏空两万多，教员的薪水四五月份都不曾发。你不晓得吧？教员去索薪，逼得没办法，每人给一个街上买货折子，你不晓得吧？下半年说不定城区的学生就都要下我们村上来进学校！”

“那不管、那不管。”

“那不管？你要叫姓宋的子孙都去做放牛的野孩子？绍轩哥，我看你这话说不出口！”

只眼的小政客石堂站起来挺了一挺腰，尴尬地鼻子里笑了一声，脸向着柏堂说：

“仔细想想，学堂这东西也真是欺人之谈。读到一个大学毕业，化的洋钱就上万；毕业出来了，做什么？知县也弄不得个做做，最好的就是当教员。像松龄，就只好当少爷。化那些个钱，你说学点什么？我从前在北京的时候，我是天天眼望着的事：今天你和我比球，明天我和你比跑。赢了，把帽子脱下来望天上摔，喜得打哈哈。再不然，打架了；再不然，演戏了；再不然，要露天讲演了；再不然，男的女的手挽手去逛公园看影子戏了！我说，学堂是不办也罢；只要有塾馆就行。我就没进过学堂，我做司书的时候，学堂学生就要讨教我。”

柏堂窘苦的样子望一望校长的脸，校长沉着脸不作声，柏堂也就不作声了。

“哈哈！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区长得意地笑。

“月斋老叔的那笔借款，”柏堂无精打采地撇开了话锋，说，“是我经手借的，我得经手还。今年他的那个三溪镇阜隆泰巷坊蚀四千多，他要拿这笔款去换本，重振旗鼓。他已经说过多次。我自己痢的屎，我自己要埋。你们办学堂也好，办壮丁队也好。这笔款我是还要还的。”

“月斋老先生那个巷坊，就吃亏在心肝太张大了。去年秋天，他老先生看见稻价一跌落，跌到两圆八，心想再也没得跌了，把钱店里的存款全都取出来，一进就是个两千担！弄得那个小钱店也坍了台；到结果，自己也人马两翻！”区长说。

“要不然，他也还蚀不到四千多。他那个亏，就和我们这一千八百担一样，就是不相信价钱老是个两块；心想留着，价钱总要望上升点子。春上那时候，要卖稻，是容易的。稻贩子天天和我罗唆着，要我。我咬定一个点不肯。我是为大家，为对得起祖宗。那知到今天，这个大荒年，反而跌到一圆八。而且找稻贩子，稻贩子倒佯而不睬了。”

“这叫做垄断积谷，请君入瓮，吓吓吓！”小政客胡谄地说着，第一次笑起来。

“石堂，你这个话错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说，“这是柏堂的一片忠心，是他的个把稳处。他不留这点子稻在这里，这时候，我们这些宋家子孙

籽草无收，吃什么？刚才子寿他们就提议要挨房头公分这一千八百担，那自然是个没良心的话。可是，大家买‘公稻’，还是照从前荒年卖‘积谷’的老例子，照市价对折出价，是行得的。祖宗留个义庄，不过是为我们子孙；我们做子孙的吃祖宗的稻，嘴里是个香甜的。我就是这个主意，你说可有个宗旨？”

“这个义庄，如今大般是我们子孙私己的田。——那自然只怪我们子孙没出息，日子没得过，靠卖田来维持。可是这样子集中，集中，集中到所有子孙的田，都变成义庄的田，我们子孙将来怎么过？子寿官那个话，倒是个一斤十六两的足话。买‘公稻’做什么？许多人倡着要公分义庄，我觉得都是理路上的话。”

“石堂，你这话和子寿，子渔的话一样，究意是个说不得的话！这是在宋氏大宗祠里，祖宗都在听着的。你这是个非分之目的，是说不得的！”

柏堂苦闷地摩着那个光秃秃头顶，深深地叹了口气。

叔鸿听鑫樵老和敏斋老说了一大堆“不胜今昔之感”的话，觉得不耐烦，抽身走到柏堂这边来，第三次催问开会的事。柏堂愁苦的样子说：

“就是等月斋老叔一个人。”

“普通开会的规矩，是只要过半数就行。现在一百多房，已到了五十多，这就开得会了。这什么专等月斋老一个人？”

“老弟，”柏堂说，“这祠堂里的事，和你们学堂里的就不同。现在大家的意见都很分歧。这一千八百担，如今变成个叫化子手里的黄金、要做这样，又要做那样，粥少僧多。即使开了会，也是没法解决的。月斋老叔不到，这个事我负不了责。不只这件事！还有来年的事，也得他老人家来想个主意。钱粮附加税捐这么重，每亩只有个二百几十斤的租，十全十收的年成，也只落得个三厘四厘的利。加租的事，我说还是要执行。”

“佃户客民都要逃荒了，你老哥还记得个加租！”

“逃荒那不过是句话，不行的。他们也只是天高皇帝远，一句无法无天的话：你说逃到那里去？那里再有个地方，能比得我们这个东南富庶之地？今年是荒年，来年未必还是个荒年呀！”“加租的事是行不得的。你老哥是在乾砧上，不晓得水里怎么个冷法。这个事，我虽然不常在家乡住，我倒晓得点。各有各的苦。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年，家事压到我身上，我计算着家里一百多亩田，就只有一个六七厘的利。我想，为这六七厘的利，一个秋天忙烦死了人，我何不把来卖了，将钱存到外面银行里去，既稳妥，又安静？——那时我不晓得田是没人受的，田卖不掉，我就算计着想加点租。那知一打听……”

“老弟，你是个书生，你不晓得佃户的狡猾处。你那些听来的话，都是一片谎话。”

“不然，不然。我是实地调查来的。我家那个住守门房的客户戴老四，他是个老实人；他又不曾种我的田。他的媳妇是我家的一个老丫头，他们干什么要和我说话？你听听：一次秋收，最好的田只有个五六百斤，主东的租稻就交个二百五六十斤，剩下的只是一半。化在耕种上的：耕田，翻板，铲田堰，做秧田，插秧，耘田，车水，看水，筑堰，割收，打稻，每亩要化十三四个工。伙计每工三角三。上年的菜籽，下年的冬菜只够得肥料，牛租、水车租，秧种，伙计长工的伙食。你算算，他们一年忙到头，赚得个什么？可够得一家人的吃用？”

“那自然，那有什么稀奇？他们是赤手空拳头，还想赚个什么大钱？”

“他是个书生之见。”小政客石堂皱着一只眼睛插嘴说，“像我的那位老弟竹堂先生满口‘平等’‘无产阶级’‘打倒地主’说起来，那更是个不得了！”

“我不懂那一套。我是个实事求是的话。种田自然不是赚大钱，可是总得有饭吃。像这两天，那个戴老四吃什么？天天一家人上山采松子，采野菌。前天采了些菌，吃得一家人嘴肿舌头僵！几个小孩在床上滚来跌去，大哭大叫！那才惨！”

“老弟，这是个荒年呀！就是我们姓宋的子孙有几个是有饭吃的？”

“不是荒年又怎样？稻价跌得这样子，政府里还借大批美国麦。”

“这近二十年来，荒年也实在多。”小政客撇开叔鸿的话，叹口气说，“我在家快十年，就只有两年是十全十收的。也真不晓得是个什么讲究？”

“石堂，”豆腐店步青老把烟管擦着鼻子上的油，摇着脚说，“是个什么讲究？我有八个字，说出来你明白：是‘人——心——太——坏，——天——理——难——容。’一边掉头向阴阳家渭生说：“渭生，你说我这句话……”

“还是个气数，还是个气数。”

“自然是气数。”

“柏堂哥，”叔鸿，那个“实事求是主义”者，笑了一笑，自和义庄管事说，“我家那点田，已经是卖也卖不掉。我想和佃户商量，开掘几个塘。他们出力，我出田。我想义庄的田，也该掘塘。”

“那不行，那不行。”

“怎么不行？我说给你听，我是仔细想了的。我们这山乡地方的田，不比外面的圩田：我们不怕水荒，怕的就是旱灾。前年大水灾，我们这里倒是个大丰年。从前在我们祖先手里，堤埂年年修，堰坝筑得坚固，河床也掘得深，浚得远。天下落雨，尽管不愁水。这几十年，大家穷得过不得，那个来修浚河道？河岸都塌了，泥沙乱石把河床填得和岸一般高！三天不落雨，田里就无水可车。如今我们地方上才真是‘靠天吃饭’！你说今年是荒年，明年就未必是？这样子是明年，后年，一直无数年，还是荒旱的！所以我想办几亩田不算数，叫佃户给我们掘塘：一个塘，管十亩田。”

“老弟，你是个书生。文章学问是你的，这些耕种经济之道你还是莫问的好。——你说的都是外行话！”

“外行话？你——”

“你听我说：这些事，你得讨教我。你那些空想是行不通的。家乡的田，泥脚最厚的也不过三四尺深；再下去，就是石头了。你把神仙请来也掘不动。再说，佃户肯白费工夫给你掘塘？你刚才说的，佃户是一年四季那么辛苦，那么忙迫呀！”

叔鸿塞了嘴，搔着头发伸了口气。

“你们书生的笑话还多着啦！我再说个笑话给你听：三溪镇大富户方永清的令郎，南京一个什么农业学堂毕业，闹着要自己种田，试验什么科学方法，化了上万的洋钱到美国买了架耕种机。试用机器那一天，请了许多人去参观。大家想，一定好看了。那真好看：烧起了煤油，一开就开不动。一看，是坏了个什么钉。这可就拉倒了！到上海请机器师来修理，机器师说要到美国才配得好那个钉。这可了得？机器上坏一个钉，也是常有的事；像这样坏

一次，就上美国去修一次，那种出来的稻子该划多少钱一粒？方永清家产破了一半，买这鬼磨子，以为儿子是个能手。就这样一个能手！你们书生——”

“那活该！那活该！”小政客石堂吓吓笑着说，“乡里狮子乡里舞：中国是个用锄头犁锹的国，硬学外国人怎么学得来？”

外面远远传来一阵零乱的破锣鼓声，夹着小孩子的嚷喊，像戏台上出将官的那般空气。时候已经快下午三点。大家谈笑着，喝着茶，吸着烟，似乎都不记得开会那回事；好像一切的争论，一切的主张，都可以用这散漫不经的谈话来解决实现了似的。

在西厅里榻上躺着默默想心事的子寿，那位商会会长，这时忽然沉着脸，走到正堂里来，大声嚷着说：

“柏堂兄，今天这个会你是存心不打算开了？”

柏堂望望子寿那张想寻是非的脸，苦笑，说：

“老弟，你这话是个什么意思？我怎么有意不打算开？是在等月斋老叔——”

“宋月斋死了呢！我们姓宋的不活啦！——大家诸位，我们是受人家的欺！我要打倒把持公堂侵吞义庄的白蚂蚁！我……”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莫名其妙，吃一惊，都瞪眼望着他。柏堂堆了满脸的苦笑，走上去说：

“老弟，莫走气门，莫走气门，犯不着，犯不着！”

“犯不着？你这个笑面虎就是白蚂蚁！你和宋月斋勾串好了侵吞义庄！今天这个会，不是大家催迫你，你是不会召集的；现在你借口等人，你就是延宕着想不开这个会！一千八百担好让你两个盘剥上腰包！”

“什么事？什么事？”大家争着问。

“你们还不晓得什么事？这笑面虎掐宋家子孙的咽喉！他把持这一千八百担！”

“我把持？我是承大家推我做管事呀！”

“你鸟管事！你只晓得饱私囊！东官厅漏了你都不修！你和宋月斋狼狈作奸，一手抓天！你们就想侵吞这一千八百担！”

“老弟官，犯不着！犯不着！你不过是生意失败了，债务要发作，想拿义庄的稻去维持！你拿着个松龄官来唱‘托傀儡戏’；没唱得成，你就恼羞成怒。你纵然是狗急跳墙，可也真不通世务。这一千八百担，有多少正用？怎么挨到你来沾？打开天窗说亮话，那个野梦你不必做。”

商会会长像一只疯了的野狗，跳过去就要抓住那位一脸干笑的义庄管事。大家拉开了，说：

“这是祠堂里，不能这么撒泼！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现在就派人去请月斋老来。也不必等了，就开会！就开会！”

“本本广！本本广！本本则本则本本广！本本——本本——广！”

那阵零乱无节的破锣鼓声和着小孩子的呐喊，这时近在外面的广场上了。大家都探头向中门那边望出去：被派了去请月斋老的景元，那位脸上有伤痕的失业店伙，忽然由门外跑进来，气急败坏的样子，挺直了眼睛，梗着两根指头粗细的青筋，嚷：

“抢抢抢抢抢粮粮的！客客客客民佃佃户望望望望这这边来，带带带带了家家家伙的！抢抢抢粮的——抢粮的！”

大家怔住了，每个人脸上都似乎立刻少去了一件要紧东西，只显着两只大眼和一张洞似的嘴。那门外的草场上，正有一大群赤膊人，嘈嘈杂杂向祠

堂这边涌过来。破锣鼓打得更零乱，一些穷孩子喊着，跳着，打着口哨，像鬼叫。

“双喜！双喜！关大门！关大门！”是柏堂嚷。

双喜沉着那双晦气眼，像刚刚从瞌睡里忽然被人一巴掌打醒来似的，由下堂耳门奔出来，没头没脑的一阵乱窜，像个掐去了头的苍蝇那样子。

“关大门！关大门！你你你给鬼捉去了魂！”

中门太大太笨重了，双喜刚刚斜着肩膊推着一片打算关，那一大群赤膊汉子已经浩浩荡荡到了门口了。这群汉子和些乱嚷乱跳看闹热的小孩子搅混在一起，拿木桶的，拿畚箕的，拿笊箩的，挑着箩筐的，抱着麻袋的，把个祠堂门前堆满了。每人都是一身干巴的肉，两条黑瘦的臂膊。有的脸上用烟煤石灰涂成各种的鬼脸子；有的把笊箩畚箕什么的戴在头上，学着“目莲戏”中小鬼那么一晃一闪地蹲跳着。混乱的嚷喊，锣鼓和尖锐的口哨声，直像铁锤子，不住望人耳里敲。

其中走出一个满腮蓬松胡子的黑汉子，把手向后面摇摆一阵，走到祠堂里面，喘着气嚷：

“我们是借粮！我们是借粮！我们找柏先生，宋柏堂！”

祠堂里面的宋家子孙都像一群碰见野猫的鸡，有的向东西官厅里躲，有的正望门口人堆里窜。柏堂拖住四区区长绍轩，口唇只是抖。

“这个事，你负责！你负责！”

外面那群汉子早潮水似的望门里涌过来，直向后堂仓房那边窜。箩筐，笊箕，木桶，满堂乱舞。锣鼓和嚷喊声放大了数十倍，连那一棵棵的大石柱都在震跳着。其中一群打锣打鼓或嚷着打着口哨的空手黑汉子，涌到柏堂和区长绍轩跟前。

“你你们是强盗！你你你们还想不想活！你……”

那个最先进来的阔脸汉子，张开臂膊跑过来，拍着手嚷：

“抓住他！宋柏堂！宋柏堂！——不要怕：他娘的！脑袋砍掉也只碗口大的一个疤！”

那群空手汉子拥上去，拖住了义庄管事和区长；义庄管事和区长直着喉咙叱嚷，乱跳乱挣扎。大家抬的抬，拉的拉，拖的拖；锣鼓，呐喊，口哨直拥送着出了祠堂的门。

门外草场上拥着无数褴褛的男女和孩子。有的是宋家子孙，有的是客民和佃户；有的头上扎着布，一脸菜色肉，想是正病着；有的拿芭蕉扇遮住偏西的太阳光，远远向祠堂里面张着；有的正搬着箩筐家伙大呼小叫的望祠堂那边跑。野狗疯了似的，来回地奔窜着，叫着。一种闷热的野草垃圾泥泞怪气弥漫在空气中。

义庄管事和区长像两只敬神的祭猪，被那群汉子扛着拖着到龙王台下来。龙王台上那只瓦缸不知几时已被人推下地，把原先蹲在下面的西风癞痢打翻在泥泞瓦砾中。那张苦笑脸子已经粉碎了。有些年轻汉子在地上拾起一只破草鞋什么的望义庄管事头上脸上胡乱扔过去；另有个瘦孩子在西风癞痢的遗骸旁边捡着一条干瘪的大鳗鱼，——是条真龙！——也学着别人扔破草鞋那样的向义庄管事那个光秃秃的头上打过去。

祠堂门口进进出出乱窜着人：挑着，扛着，驮着满满家伙稻谷的，口里“杭则！”“哎呀！”“咳则！”“杭呀！”地应答着；拿着空家伙的，口里打着唿哨，旋风似的望里面卷。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和那位口吃的景元，不

知几时也回家拿了箩筐家伙，正在人堆里挤挨着；松龄少爷刚从门里窜出来，硬着颈项跑，像一只被狗子追赶的鹅！

双喜伏在门口的台阶上，呜呜咽咽哭着：“太祖爷爷呀！……”

两只大石狮向着他打哈哈，像打得气也喘不过来的样子。

一九三三、十一、十

（原载 1934 年 1 月《文学季刊》第 1 卷 1 期）

天下太平

话说丰坦村上有个庙。庙是被后面山坡上浓浓密密的高大树木簇拥着，耸立在田畈边。它的形容虽因年久失修，显得很晦暗败坏了，但是在那巍峨堂皇的建筑上，一种威严的气魄还是存在的：四角的飞檐玲珑翘曲地横展着，宛如神灵的巨爪；庙脊正中的那顶子，高过山坡上参天的树木，像一顶神灵的法冕，几十里外的人也看得见。那顶子是一个硕大的霁红朱砂古瓶，瓶口伸出三枝方天戟，戟的上下左右各缀着一个金属铸就的字，是：“天下太平”。

这“天下太平”四个字，并不完全是句谎话：丰坦村的天下实在是太平的。年远的时代不说它，便是在近年，他们常常听说那里那里打仗，洋炮轰死几千几万人了，外国人杀死多少中国人了，什么地方屠杀或逮捕多少革命党或过激党了，东洋鬼子又占了什么什么地方了：这和丰坦村不相干。邻近许多县城和乡镇，挨过多次过境大兵的抢劫奸淫，遭过多次大股小股土匪的攻打和绑架；而丰坦村地方小，僻处在山隅里，并不曾遭遇过这些可怕的事。

丰坦村的天下从来是太平的。也许是由于所供的那位神祇的权威，也许是由于风水位置的扼要，大家似乎相信着：丰坦村的太平是这座神庙赐与的。因之丰坦村人民都把每个良善愁苦的心寄托在庙身上。他们有时为了盘算着债和米的事而失眠，或者由梦里醒过来，听到山坡树林里猫头鹰郎郎地唱着可怕的歌，就预感到有什么凶事将发生，恐惧得浑身起疙瘩。但一听到风吹着庙檐上铁马丁当地响，沉雄而威严，于是他们吐一口长气，想起有那座神庙在镇压着一切邪魔，心里稍稍轻松了。有时他们看见天上出了“扫帚星”，大家惊惶得瞠目相对，牙关震抖得酸痛，知道这是大乱之兆，劫难将临。但一见到庙顶上那“一瓶三戟”映着满天星月，闪射着耀目的金红色光芒，那么神秘，那么有力，于是意识到有神庙正保佑着这个村，心里稍稍镇定了。——这信念不是没有缘由的：据传说，从前这神庙的门墙涂着红色，村上就常失火；庙墙涂成白色，村上就接二连三地出丧事，生瘟疫。这传说是属于从前丰坦村富足兴盛时代的，是否准确，如今丰坦村人都没有亲眼见到。但这却是一件眼前的事实：这涂成蓝色的庙墙，如今已晦暗斑剥，显得十分败坏了，而现在的丰坦村也和庙墙一般地败坏暗淡起来，丰坦村人民正也和庙墙一般地褴褛难看了。

富足自得的丰坦村人民渐渐贫穷愁苦起来，就是这近数十年的事。到现在，情形是很坏了。村上妇女纺的纱，织的布，早不能在镇上销售，纺车织机已积着寸厚的灰尘，堆到墙角里，或当作柴火烧掉了；村上的田地也因河道堤坝长久失修，年年闹着水旱灾荒，而且种出的稻谷当泥土的价钱也不容易出卖了；镇上的茧厂已四五年没开秤，于是村上春夏两季的蚕事索性不去忙，连有些人家的桑树林也学着邻近各地的新办法，把来砍掉，改种起鸦片或菽黍了；村上几个在镇上作店伙的人，都陆续哭丧着脸回家，寄生到娘和妻的身上了。但是丰坦村人民不管是大多数种田人，或是少数的几个失业店伙，都个个是善良的。忠厚做人，耐劳苦，安本分，从祖上传下来的这种种教训，已经变成他们的天性：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那神庙，安着本分，尽能力挣扎着，忙劳着，喝自己所能得到的一点子薄粥，或竟饿着肚子。所以村上纵然穷苦到现今地步，四邻地方都常常闹着匪，而丰坦村到底还是太平的。他们看到庙顶“一瓶三戟”上那四个字，他们愁苦的灵魂得到安慰了。

如今由于一件惊人的非常事故，只说王小福那一家。

隔着田畝正面和神庙遥遥相对的一排古旧瓦屋中，那正中一座屋脊较高的，便是王小福的家。王小福是丰坦村几百个壮年男子中的一个，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晦涩的眼珠，瘦小的脸庞。脸的表情犹如一只猴子：时时愁苦着。他的衣履神态，虽已和乞丐差不多，但微微驼曲的肩背，伸探着的颈项和迟钝笨拙的肢体，仍旧保留着一个站柜台的身段，——一个科班店伙的身段。

他曾在离本村五里路的镇上作了二十三年店伙。他十一岁那年进那个店作学徒。每天的功课是服侍老板朝奉的茶水，扫地，抹台，通烟袋，搓纸煤，倒尿壶，抬驮货包，跑腿，挨老板朝奉甚至锅司务的巴掌……像一只小小的牲口，他每年每天这样忙劳着，不说一句闲话，不躲一点懒。忠厚，孝顺，勤劳，节俭，每个丰坦村人民所有的性格，他都不缺少。老板每半个月给他五个铜圆剃头，他两个月剃一次，留下的钱，连同过年过节，二十个四十个铜圆的赏钱一起找熟识的村上人带回去交给自己的娘。三年学徒完毕了，他开始做“伴作”。数年之中，大大地得了老板的信任和赞许，升作朝奉。每年就拿得四五十元的薪资了。

这期间，他有过许多美丽诚朴的幻想：他想他娘把自己所赚的钱积贮起来，慢慢积多了，就自己开一片小小的店。他将不像老板把价码打得那么大，也不用这么多的“伴作”和朝奉。他相信自己能担当一切上下粗细的事；他将把利钱打得低低地，赚一点自己安心，神明菩萨不罪责的本分钱。发了财，他将买些田地，让儿子耕种，并派一个学着经营自己的店务。他将为爹和娘买一座发旺的风水，为儿子们各娶一个勤俭耐苦的媳妇。他要照顾村上贫苦无依的孤寡，他要重新修建那座关系着丰坦村盛衰祸福的神庙，使自己的村子重新兴盛富裕起来。……

但这些美丽的幻想，和他劳苦的操作，并不能阻挡住地方上和自己家里的破落。他的劳苦的耕种了一生的爹死得过早，除了那三间古旧的祖遗瓦屋而外，没曾留下半点产业。他升做“伴作”时，村里镇上早盛行着既漂亮又便宜的竹布和花洋布，娘的纺纱织布的工作已不能维持下去，而一个“伴作”照规例每年只支得十多元薪资，最好的年头也不过勉强支二十多元。这工钱除了做一两件不可省的衣服外，仅仅只够得补贴娘花用。娘何尝不想给儿子积点钱？无奈饿了要吃，冷了要穿，任凭怎么捱着忍着，母子俩一年忙劳到头的结果终还是两双空拳头。他作了朝奉后，薪资是比较多了，四五年里娘减吃省用就积起八十块钱，给他娶媳妇成了家。媳妇只是性情急躁一点，略有点刁泼，在他跟里是稍稍觉得不上正道的；然而吃苦耐劳方面则正是一个自己理想的妻。成了家以后，接着就生了孩子。不久年头显见得大坏了。店里的“乡账”渐不能如数收齐，款项的移挪渐渐呆滞，生意渐渐清淡，货盘也跟着缩小。不谈分红的事，连他原有的薪资也减少了。但许多同事都干脆被辞退，因为老板要减裁店员，缩小开支，自己算是老板最亲信的人，能留在店里保持住饭碗，究竟是万幸，他还敢有什么怨言？这时他已有两个孩子，一家四五口靠他那点工资补贴着过也过不来，积钱的事只好睡在床上作作梦了。

他渐见得那些美丽本分的打算都快变成天上的彩虹，慢慢地要消散了。但他并不灰心，还是希望店里重新兴隆起来，好让自己的幻想终有实现的一天。可是世界愈来愈坏，镇上生意更萧条了，每年总要倒闭几片大店：那家

朝奉上外埠办货被强盗绑架了，那家账客被大兵截劫了，那家亏折几千血本了，那家股东打官司要求退股了，那家老板自杀了……每天耳里口里轰传着这类消息。他所做的店不但毫无恢复的气象，二十多个同事是由十多个减成四五个，每年两三万进出货盘的店是紧缩到仅仅勉强支撑着门面了。到去年年底，老板突然被押到县衙里，一家资本号称雄厚的大老店，终于落上了镇上其他许多店同样的命运：存货被封，店门紧紧关上，照例贴上“召顶”的横字条了。

他像在瘟疫流行死亡相率的时季，守住一个依托自己的染病的亲人似的，对这个店，总在万一中希望它有一天会转机，让自己一家人不致无所依靠，让自己的美梦继续做下去。但这个亲人到底死去了。他失去了唯一依托所在，连同以前那些美丽诚朴的幻梦！他很懂得现今一个没半文积蓄的人，在失业后将有什么样的悲惨的遭遇。另谋店伙的位置是一个天大的妄想！要做点小本买卖，三块五块的本钱也没处告贷。他看见镇上和村里许多壮年男子怎样从体面的店伙，大朝奉，甚至小店的老板，变成窃贼和乞丐，或是流落到外乡去当了兵，入了匪伙。离店的那天，他像个小孩子似地扑在柜台上伤心地大哭了一场。那是奇怪的：那柜台是自己站了二十多年的柜台，那光滑古老的台面自己曾经依傍抚摸了二十多年！他在这里作过许多美丽的打算，在这里操劳着消磨了他的最精彩的大半生！如今是不得不走了，带着他自己原有的一双空手，和一个栗惧绝望的心。

在同店的朝奉和五六个作店伙的同村人之中，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店回家的。他的失业自己是没半点过错，娘和妻纵然懊丧得要命，但除了相对着哭泣几场而外，责备和埋怨的话究竟是说不出口的。

娘已快七十，眼睛老花得仅仅比瞎子好一点，一双小脚冻烂了七八个趾头，依旧不放闲；每天倒倒歪歪地摸索着，到山上拾点柴火，出外捡点破布条之类消度日子。妻正怀着第三次孕，挺着大肚子，照常不息地操作着。她在屋后开了一块地，种着四五畦冬白菜；从镇上兜揽些女红做。她是个会做的，两天里能在烧锅洗衣之余做好一双鞋，半个早晨能把四五畦菜浇好粪。但是年头太坏了；蔬菜每天只卖得十多个铜元，还得送到镇上才卖得掉；一双鞋子只落得四五十个铜元的手工钱，而这生意也真不容易兜上手。一家四五个饿瘪肚子全靠她一个女人挣钱来填饱，这事怎么行？

曾有几个旧同事和王小福商量着同到外埠大地方去谋生。这邀约曾经一时动了他的心。但仔细打量，到底走不得这条路。外埠大地方是个什么样子，自己虽难以揣摩，可是那里有层出不穷的杀戮和战争，那里有军警和外国人任意捉人杀人，是自己常常听人说到的；家乡人到那些地方去的，不是一去永无下落，便是不到三两个月又重复狼狈不堪地回乡来，变成流氓或匪盗，也是自己所熟悉的事。娘和妻儿，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性命，都是自己所切爱的。娘吃了一生一世艰难困苦，只留自己一个儿子，他不能远离她。他的儿子大的十二岁，小的只六岁，一个还在妻肚内。这些小生命也是他不忍丢开的。安着本分好好做一个神明菩萨不罪责的人，做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负责的父亲，这是他平素做人的信条。离开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离开自己的故乡，到那不可捉摸的生疏可怕的外埠去？此刻的王小福在睡梦里也做不到！

“那里又没有熟识人，我也没这笔盘川。”王小福瞪着两只钝滞的尖眼睛这样回绝了他的同事。

于是他丢开一个大朝奉的身份和体面，开始他下贱的小卖生涯。

他做了许多种不需资本的小营生。他上由拔野笋，采蕨，挖山葛。老是黎明时候就上山，带一袋粗锅巴。到午后才携了所得的东西下山到镇上去喊卖。在起初时候，他是感到万分羞辱的。他最怕遇见熟识人，最怕人家用一些无裨实际的怜悯话夸说他的过去。他用一顶破旧的帽子遮住半个脸，用一些破布条掩住脚趾套在草鞋里（因为他的脚趾是大趾和二趾拼搭着，一双曾经穿袜裹布的店伙的脚），低着头看在地面上走着。他听到自己凄沉不入调的喊卖声，就感到极端的不自在。但当太阳偏西，卖得数十个铜元买了米向自己村上走，远远看见山坡树林头上的“一瓶三戟”，听到铁马的丁当声响时，他觉得自己是在安着本分做一个人，神明菩萨是看在眼里的，并且想到马上就到家，把米交给妻去烧粥，一家人不做声地呼呼喝饱了去睡觉，他阴沉的心里感到欣慰了。

然而这类营生只在春天时候有得做，一交夏天就不行了。在这时他有了最坏的日子，成天找不到一点事做，是完全寄生在妻和娘甚至孩子的身上了。

娘和大孩子新做的营生是卖油条。在近年，做这营生的太多了，变得比乞丐不差多少，只有老人和小孩能做得。他们在镇上油条摊上领了货，能穿到每户人家去，说一串哀求的话，博得人家一点怜悯，纵然不吃这东西，或是已经吃过了的人家也可销得一二根。卖一早晨，销售四五十根，就赚得十多个二十个铜元的扣头。当他看见娘和孩子被猛毒的太阳蒸晒得满脸赤红，浑身冒着汗，由镇上携了一斤二斤米踉跄地走回家里时，当他喝着这米做成的稀粥时，他焦心地痛苦起来。

“自己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呀！自己挣不得钱来养娘和妻儿，却反让娘和儿子挣命似地赚给自己吃？”他独自一人在心里想。

有几次他曾老着脸到种田人家去探问要不要“忙工”？但这是不会有效果的：佃户人家呢，因为近几年稻价大跌，连年又多荒歉，田东家都尽量加租，把捐税加到佃户身上来，佃户们驮不起，有的退佃，另找生活做；有的退不脱，勉强耕种着，尽家里几个人手不分昼夜地忙乱着，雇工是万万用不起来的。那些情况较好的自耕农，忙急时节虽也雇短工，可是每天花二角三角的工价，他们要雇的是科班农人，谁愿意雇他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生手？

“你是个大朝奉呀，你怎么下得田？你这是说笑话了！”他几次的探问，换来的只是这样一句难听的俏皮话罢了。

有一天他到镇上去，试着想找点偶然的机会弄点零星工作做。他打听几家仅存的店铺，要不要粗工下河搬货包？打听几家鲜货摊，要不要人挑鱼，挑瓜果？这样的红着窘苦的脸子连问了几家，到最后，才遇见一个熟识人告诉他，有个人家打算砍掘桑树开块地种鸦片，赶快去探问探问，说不定可以独揽这一件工作到手。

“我只想一角半钱一天，我只要一角半。拜托你帮我去说说。”王小福眼里一阵亮，恨不得把这件事就揽到手，缠着那个人这样说。

那个人告诉他那家的地点姓名，叫他自己去探问。王小福不放心地踌躇着，怕那人家不认识，没由没缘地走进人家屋里去，会碰个大钉子！他满脸堆着难看的笑，说：

“老哥，我只要一角半。人家二角，三角，我只要一角半。你替我说成了，我请你吃香烟，我感你这个恩情。”

“啊嚏！”那个人不耐烦了，皱着眉，鄙夷地说，“你这就是罗苏了。”

饭么，要自己去找来吃；难不成等人家找得现现成成的，搬到你枕头上来？”

这话是没得回说的。他硬着头皮一口气跑到那人家，却看见已经有一个粗工挑了满满畚箕瓦砾由侧旁桑园门里出来。他抹着满脸汗，晓得这场欢喜落了空了。他懊恼得说不出，问那个粗工说：

“你是替这人家砍桑树的？”

“唔，我是的。”那粗工是个外乡人，一脸粗横肉，样子很不和气，向王小福眨眨恶狠的眼睛这样回答。

王小福感到浑身不自在，想到镇上的工作竟落到外乡人手里去，这是不应该的。他无言地站在旁边，看那粗工把瓦砾挑到垃圾堆上倒了，又走回来。这时园子门上走出一个体面的先生，托着水烟袋，像是在监工的样子。他想这一定是主人。

“先生，”他嚅嗫了许久，问：“你这粗工雇的是什么价钱？”

“贴伙食，二角钱。”那先生拨拨纸煤上的灰，含笑地说。

这先生很和善。王小福从心里透出一点希望来；走近他身边，低低地说：

“你若是雇我，我只要一角半，一角半。”

王小福正瞪着眼睛，等待那先生的回答，猛不防后面扁担一声响。那先生惊骇的样子拉开王小福。王小福回头时，这才看见那粗工恶狠狠地举着扁担正要向自己身上劈过来，一边咒着：

“你妈的！”

王小福急切要望那先生身后躲避时，已经在左膀上挨了重重的一击了。

“你这是撒野了！”那先生拦住那个可怕的粗工说，“我既雇定了你，自然就让你做到底。你打人做什么？快点去挖地，快点去挖地。”

“我不过是问问看，你就这样凶！你又不是强盗！你……”王小福按着被打的那只臂膀，挺着那对钝滞的眼睛分辩着。

“好伙计，你快点走吧。要不然，他们外乡人是素来强蛮的。”那先生挥着手里的纸煤苦笑地说。

王小福一边垂头丧气地走着，一边想：这粗工虽是外乡人，但也是穷苦人。自己一时情急，想抢他的这碗饭，究竟是自己出了坏主意，这不是本分的。他着着实实地气恼了一会，这样一想，也就气不得了。

一次，他在一家鲜货摊找到一件下塘掘藕的工作。那塘是在镇上一个住户家。他走到那门口，看见娘提着油条篮子，气急败坏的样子，挣命似地拄着拐杖从门里倒倒歪歪窜出来。一边哀求地嚷着说：

“我再不来了！我再不来了！唉唉，我我我……”

后面一个年轻少爷追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挥着，像闹着开玩笑似地骂道：

“你老不死的東西！你再来我就敲断你的脚！我侄子吃你的油条都吃得发热了，你还要天天来缠！”

王小福怔了许久，才看清是自己的娘。娘喘着粗气，一口一口地喘不上来，狼狈可怜的样子简直像一只被人打伤了的老狗。一团火热的东西喷满自己一脸子，他眼里缭绕起乱星了，急忙放下肩上的蔑篮，走上去扶住娘；一边和那少爷说：

“少爷，是老人家，七十岁的老人家。你打不得呀！”

“骂她她不听，我自然就要打！”

王小福望望少爷那顽皮胡闹的样子，觉得没奈何。无言地搀住娘走开去。

娘一边拄着拐杖倒倒歪歪地倚在儿子身边走，一边还回头向那人家门上说：

“我不过是没得吃。我不是……不是有心要害你家小宝宝。你老太太是好人……是好好人，你老太太就没赶过我。我不过是……不过是……”

那少爷在门上站了一会，就打着口哨扬长地进去了。王小福搀着娘走了几步，问娘说：

“可曾打了你老人家那里？”王小福还想和娘再说几句什么话，但他说不下去了。

“怎么就碰到你？他不过赶赶我……他没打我。我不要紧。你只管去做你的事。”娘扁着皱折的嘴巴努了两努，鼻孔扇动一扇动，拾起衣角揩眼睛。娘是流着眼泪了。

至于那个十二岁的大孩子，虽是一头癞痢，瘦得不像个人样，却有个耍脸逞能的小脾气。每逢卖油条生意不好的日子，一早晨所得的钱，不够买一斤米（一斤米是十个或十一个铜元），他就不肯回家。忍着饿，任肚子咕噜噜地唠叨着，任饿汗满脸满身冒；依旧提着篮子，拖着双从垃圾堆里捡起的又破又大的男人鞋，走遍镇头镇尾，撕开两角干裂白脏的嘴巴，尽自己气力叫卖着。直到过了中午，看情形实在再没生意了，才像个有病的小牲口似的，一步一步颠动着小小冒油的癞痢头，紧紧握着铜元或是一纸包米，鼻里响着浓鼻涕回家来。有几次，这傻小子挨饿挨狠了，又在田沟里喝多了凉水，一到家就口里呕吐清涎，两眼泛白，小脸子由紫红变成青灰色。奶奶就急得满屋乱窜，王小福只瞪着那张猴子脸，掐住他人中，“小辫子！小辫子！”（就是这癞痢孩子的名字）地喊叫。只有娘是个有主意的：娘晓得这是发“饿痧”，用碗口蘸点菜油，在背上使劲刮一阵，一边口里不住骂着“这死货！这死货！”或是“这小鬼！这小鬼！”骂着刮着，背上就渐渐现出紫红色血晕。那“死货”或“小鬼”呻吟几声，吐几口清痰，就能走到炉灶边吃两碗开水淘的锅巴；而后，用手背抹抹额上的盗汗和唇上的鼻涕，拿起扎着竹竿的手炉盖，就又冒着猛毒太阳出外拾田螺去了。

王小福成天把这些事看在眼里，兜在心里，想到他平常做人的种种心念，痛楚难过是不必说。可是在他刚刚失业时候，这些事似乎也曾隐隐约约预料到的，现在却都无可搭救，无可避免。他只能深长地吐一口气，偶尔在无意中自言自语地说一两句自己谴责或是对娘和孩子表示惭愧和罪疚的话。话刚说出口，妻就免不得要抢白他。于是就只好双手捧着头，无言地坐到门阶上，瞪着那对枯涩的眼睛看住对面神庙顶上那“一瓶三戟”和那上面的字，独自去呆呆沉思了。

妻是这个六月初生产的，生的是一个女孩子。家里加了一个奶孩，自然多出许多麻烦来。妻的工作忙不过来时，就要拿那个只会撕开大嘴号哭的小生命出气：“你这小鬼呀！你落地时怎么不死呀！……我前世和你有什么冤结呀！”或是：“阎王怎么不来捉你呀！不来捉你，我就杀你吃！杀你吃！”咬着门牙这样咒骂着，一面就把那奶孩在地上，床上，摇篮里重手重脚地攒，像真要攒死了才快心一般。妻平常虽有点刁泼，却从来没曾这样大咒大骂地虐待过婴孩。这情形，王小福有时忍不住，就要劝她几句：

“小辫子妈，丫头也是条命，神明菩萨是看在眼里的。都是我运气不好，也没法，你这样恶口毒言的做什么？她是投生的，不是投死的呀！”

奶奶也是要劝说的，奶奶说：

“大娘，你这性子要忍忍。家里越穷，孩子越要当宝贝。我们上代都是

厚道的，丫头也是当小把戏（男孩）一样看。都是你的块亲血肉呀！你要忍忍你的性子。”

婆婆和丈夫的劝说都柔软无力量，而已也的确无裨实际。六月里，炎天暑热的，洗衣烧水等等零星事比平时格外多；自从添了这奶孩，喂奶，换尿布，一天无数次；留下的空闲往往不能把由镇上兜揽来的针线活计如期做成。忙到三更半夜，汗在头发里，破褂上，凝成白色浓霜，满身的皮肉溃碎了，又痛又痒，气味连自己闻着也难受，却抽不出空来洗浴一下。她愁着明天的盐，明天的米，愁着无穷尽的未来漆黑一团的日子；遇到这不懂世故的奶孩无理哭闹，惹得心里火着似地焦躁起来，自然就找着个地方发泄了。直到满月以后，和婆婆丈夫商量了一场，大家奔忙十几天的结果，终由熟识人在镇上介绍到一件特别的赚钱事，她对奶孩才温慈起来了。然而那奶孩却反倒一天天瘦黄了。

那赚钱的事，就是卖奶子。本来，她是这样打算的：她要把新添的这“赔钱货”送给人家，自己到镇上去找个奶妈的位置，每月拿得三两块钱工钱，家里还可以少一张吃饭的嘴。按照向来山乡规例，把女孩给人家作养媳，那人家领去了，吃个三四年辛苦，既可以有一个使唤的丫头，到了相当年纪，从灶门前拖出来，开了容，穿上一身红布褂裤，拜拜天地祖宗，就成正式媳妇，又用不着花那笔浩大的抬娶媳妇的费用。这是一件合算的事，大家都是愿做的。但是近年却大大不同了。托许多人在邻近村子打听，终没一个肯来认抱的人家：如今的山乡妇人，都要留一双手做点出来吃，要留自己奶子去赚点钱，维持一家子目前的生活；儿子还小，娶媳妇是将来的事，是谁也没能力去管了。不过王小福的妻主意是很多的：她的身体还结实，劳苦生活磨难不倒她，她的奶子还是十分富足。“赔钱货”送不出去，也算了；她托熟识人找到了零买的主顾。主顾一共有两家：一家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老爷，为家产的事操心太过，近来患了咯血的病，听从医生的嘱咐，每天要喝一碗人奶，另一家是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子，新近死了娘；孩子很病弱，应当继续吃奶，只因手里紧迫，雇不起奶妈。只好每天买两樽奶子，补贴米糊粥汤之不足。她每天大早起抱孩子到镇上去，挤完奶，就赶着回家烧锅洗衣做活计。两处每月共拿得两块四角钱：一处是一块，一处是一块四。钱是可以三天五天拿一次，有时碰巧，还可以在主东家吃顿早饭。家里有了这笔大进款，日子过得从容些。婆婆就被要求着不再到镇上卖油条了。

可是那孩子的食粮从此被别人抢去大部分，派自己衔到的常常是空瘪的乳房，吮半天吮不出一口奶子来。于是娘就拿自己吃的粥呀，饭呀，蔬菜呀，一类东西胡乱往她嘴里塞，只要塞到不啼哭就算了。这样子过了不久，孩子竟显见得瘦黄了。——只有肚子却变得又硕大，又挺硬。

这件赚钱的事，王小福本该不能允许妻做的，但他竟没有阻挡妻这么做。每天睁开眼来，每个日子都得过；这一家人，连同自己在内，每只饿瘪肚子都得填进食物。自己堂堂一个壮年男子，如今是完全变成一个寄生者，整天只有坐在门阶上捧着头，痴痴看住庙顶出神的分儿。娘是那么衰弱老迈了，卖油条的工作眼看得实在已经挣扎不下去。他要爱惜那一个呢；辛苦一世的娘呢？这无瑕的孩子呢？不管怎样，自己都是毫无主意，毫不能参加意见的。从前做人的种种心念都已顾不得了；他的心也渐渐不如往常那么敏感了。他每天照常吃三顿现成的粥或饭，那是妻的血，孩子的肉，他都想不起。他的心渐渐如一块铅，变得那么沉重，那么阴暗乌黑，已经很少有过神什么反应或

感触了。

这年又是个旱年，六月里半个多月没下雨，那些种田的人家因为收成大受亏损，稻价反倒只见跌，齐腰挨到两个致命棍，退了佃，改作挑担抬轿或是弄点钱胡乱作小本买卖的非常多。好比王小福的紧邻阿富哥就是这些种田人之中的一个。他把二十多亩田退还田东家，自己到镇上入了轿行，做一个轿夫，自管自己过活；阿富嫂则拿手头仅有的一点私己积蓄在镇尾上摆一个小馓摊，靠自己特有的一点手艺做糯米芝麻馓出卖，养活自己和两个小孩子。对于这些种田人，尤其阿富哥一家，王小福夫妇的羡慕之心，是比同情多。因为他们的遭遇虽然是和自己一样惨，但是他们有农人的气力和粗壮身肢，能挑得，能驮得，田退了不种，马上就可以去抬轿或是挑长路担，至少能勉强得个人一张口，不致寄生在妻和孩子身上。而王小福就没这个体力和这个本事。阿富嫂摆馓摊，每天虽然忙劳得不像个人，但赚的钱很够买米养活孩子。而王小福就没这笔制办家伙和买糯米、芝麻的资本，——纵然只是三五块钱。妻就常常为这些事在王小福面前指桑骂槐地罗唆着。王小福晓得妻是太苦了，自己太不行，当然没得回说，从中劝说的只有奶奶了。奶奶说：

“大娘，各人头顶一个命，都是神明菩萨注定的。你热眼别个做什么？小福子也不是个没用的人，就是运气不好罢了。”

老奶奶自从停止卖油条，在家没过几天轻闲日子，就生病了。病是入秋后地方上流行的一种时疫。先是泄泻了两天，慢慢转成痢疾，里急后重，一天上茅厕上个没次数。在开始的时候，还能勉强支撑得住；三四天后，不行了：整天躺在床上，也不吃，也不呻吟，满身像有火烧着似的那么炙热。王小福瞪着那张晦气的脸子，只有到镇上药店去说好话，接了善心的医生来诊看。医生说是受湿中暑；开了几味驱暑疏气的药，也不过尽人事罢了。那药吃了几帖，自然毫无动静，倒白白在药店里除了几角钱的帐。

然而王小福是不肯就这样罢休的。他还有神明菩萨得去求助。那天，他买了一支香，到那神庙里去求“仙方”。磕了头，把香灰用黄表纸包好。“仙方”求得了，而后还要向菩萨神明讨个吉凶的话。他在神案上取了签筒。重新跪伏下去，把签筒小心地簸动起来。簸了老半天，菩萨显圣了，那签筒里却出乎意料地落下两支竹签来。他迟疑了半晌，把两支竹签都拾起，照上面号码在神案上查看签书。一个是：

第七十六签 中吉

浮云固锁姮娥月，便是朦胧混沌天。

顷刻风来都扫尽，山光湖景又依然。

另一支是：

第一百二十三签 下下

梦中得宝醒时无，应诡巫山只是虚。

若问婚姻并病讼，别寻生路得相宜。

王小福曾经念过两年书，这两支签文虽不能完全明白，但一支大约是说眼前有点灾难，过不久就会好的；另一支则显然是凶多吉少，这个大意是懂的。然而那一支才是真签呢？这个取舍太严重，他不得不问住庙的斋公了。

“老师父，不敢问：菩萨是赐了两支神签，应该那支是真签？”

“自然是先落地的一支喽。”那老头子坐在街沿上，捉着布袜里的跳虱，浑着喉咙说，“你问什么呀？”

这叫王小福阴沉愁苦的脸上现出欣慰的光彩了。他把娘的病状和那斋公

说了，并且和他谈了许多别的话。他说娘吃了一世辛苦，到老来却过这种受罪的日子。神明菩萨总该可怜可怜，等自己脱了恶运，尽几年孝心，让娘也稍稍过几日安乐日子。那斋公把那第一支签文接在手里，皱着细眼睛，呻吟了一会，点点头，慢声说：

“不要紧，你放心。”

王小福拿了“仙方”。一边来回地默念着签文上的诗句，三步跨过那一片灰褐色的荒旱的田畈奔回家里来。那高兴的样子，是他几年来所没曾有过的。

可是王小福没想到那斋公的话却错了。灵验的倒是第二支签！到了家里，娘在床上被妻托着上半身，两个孩子围着大呼小叫地唤“奶奶”。奶奶是挺着一对死灰色的小眼珠，喘着又粗又大的气，没回答。看情形是很不对了。等他急乱了一阵，七手八脚把“仙方”照规矩冲好“阴阳水”（冷热水各半），送过来时，娘的牙关已经扳不开；勉强倒了两匙进去，也都由口角上重新流出来。“仙方”也济不得事了。娘就在这时候，把鼻子人中一扭动，做个丑脸子，留了一大块粪秽在床上，登仙去了。

王小福扑到娘的那个瘦得如竹竿做成的细小尸体上，直着喉咙号哭起来，声音完全像半夜里山上猿猴的嗥叫。哭到晚上，嗓子也破哑了。隔壁阿富嫂走过来劝说道：

“七十岁的老人了，这年头，活着也受罪。你只是哭哭怎么行？你得起来办办后事呀。”

“我娘不是终的天年呀！我娘是一个六月卖油条才生这个病呀！神明菩萨不保佑呀！”那样子不像个小孩也像个傻子。

然而阿富嫂的话是对的，只是像个小孩似地哭哭有什么用？他得担当这笔意外的费用。但这笔费用却出在那里呢？

第二天，夫妻俩到那位咯血的老爷家去跪求。这是妻想了一夜才想到的唯一的一条路。那老爷被缠得没奈何，答应出面作保，在一位放高利贷的太太处借了一笔钱。那太太是个寡妇，五十多岁了。手头有百把元积蓄，她自己小心盘放着。对借钱的贫苦人素来是恶毒无情的：利钱稍稍拖延几天，她就拄着拐杖上门来，寻死寻活地迫索。王小福这笔借款是八块钱，利息是每元按月交二十个铜元。那太太说：

“你们量量力。我的钱是我的血。我是不能说情的。你们要有这个肚子才吃得这块脯子。呃，我的话喜欢说在先。利息我就在老爷的奶钱里扣拿。是老爷出面作保，我没法；要不然，你们这没根的萝卜，我是不能借的。”

夫妻两口子揩揩眼泪，自然只好忍痛承谢了。

老奶奶上山后，小辫子，那个癞痢头的大孩子，也病倒了。病是和奶奶的情形一样。王小福是完全麻木了。对于终天劳苦地奔走操作的妻，对于病损可怜的儿女，如今都很少感到愧恨和痛楚难过了。自失业后到而今，不过七八个月，伤痛难忍的经历是太多了。这些经过都变成黑色的重铅，一块块沉到他的心底，堆塞到他的神经里：自己从前做人的心念，都渐渐模糊了。他有时给大孩子扫扫满屋随地乱拉的难看的粪便；有时抱着那瘦得没人形的奶孩坐到矮凳上，给她拭拭眼毛上浓厚的眼眵，无所感动地摩挲她那一天天硬挺起来的肚子，或看她撕开大嘴，放出小猫子似的微弱声音啼哭；有时则照他的老习惯，坐到门阶上，双手捧着头，呆呆看住对面神庙的顶子，也不动，也不响，一坐就是老半天。过不久，山上的毛栗，山楂，都成熟，他有

营生做了。然而他每天阴沉着一张猴子脸，瞪着那双晦滞的眼睛，只是本能地这样做。他脑里是如一张黑厚的纸，如一块结凝的旧棉絮，是什么思想或感应也没有的了。

大孩子的痢疾一直没见好，但食量却和没病时一样。正合了村上“饿不死的伤寒，吃不死的痢”那句俗谚。至于那奶孩呢，是一天天不行了。以前还成天放出小猫子的声音啼哭着，到后，小脸子浮肿得如同黄蜡一样，身上的皮肉干皱起来，犹如皱折的桑皮纸。一天下午，当王小福由镇上卖完野栗回家时，妻正抱着那奶孩坐在门阶上呜呜咽咽地哭泣。王小福挺着两支干涩眼睛，像个僵尸似的走上去，毫无表情地放着低幽沉浊的嗓子慢声问：

“不行了？……”

妻摇摇头，更伤心地嚎陶起来。王小福却没有悲伤的样子，也没流眼泪，只拘挛着手，抚摩了一下那小尸体，无言地走到墙角里，取了一把锄头夹在腋下；而后，由妻手里接过那小孩，像个游魂似地挺直着眼睛蹒跚向山上走去了。

女孩子的死，给与她爹和娘的不是哀怜和悲痛，而是焦虑，是绝望！在断气的前两天，那孩子就已经吮不得奶子了。王小福的妻看看自己奶子逐渐稀薄，急得到各处去打听，去求人，看可有要雇用奶妈的人家。——要雇用奶妈的人家不是没有；但一经晓得是一个垂死的病孩吃的奶，就都摇摇头不愿承雇。两家挤奶的主顾也都在这时先后停止买卖。这样挨延了几天，奶子完全变成淡色的水，终于干瘪了。

那是明显的事，那放高利贷太太也急了。她三天两天拄着拐杖到王小福家里来，先是用她惯常向借户要钱时说的那套穷酸话说：

“小福官，问你借点钱去买斤米。”

以后，就不这样客气了：

“我是个半边人，我身无所依。我的钱就是我的血，我的命。那没法，你剝肉也得还！要不然，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

说一句，就把拐杖在地上敲一下。那张脸子板得像连大斧也砍不进。样子叫王小福两口子看了不由得不只是打寒噤。

两口子照例跪在地上哀求。但那是白费的：太太早已说在先，她是不能通情的。于是妻做针线，卖小菜所得的钱不够缴付利息时，就连旧衣破被褥甚至正要下祸的米也给要了去。

有一天，妻一时不晓得动了什么灵机，忽然想到屋子上来。她想这三间破旧屋子，虽然整个儿卖不脱，但是拆成砖瓦，便宜作价，说不定可以卖得一笔钱。这主意太好了。那不只是砖瓦可以卖钱，其中另外还蕴藏一个叫人心跳的希冀：听上代人传说，从前祖先时代因为金银元宝多，没处存放，常常埋藏在土内，或是砌进墙壁里去。

“早先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妻在心里自埋怨。

他们先拆那座门墙。两个阴沉的心都充满兴奋和惊奇的期待。他们挺出了枯涩的眼珠，脸上现出严肃紧张的神情，手抖着，气喘着，每拆去一层砖，里面泥土瓦砾乱杂地翻落出来，他们心就跳到腔子里，跳到咽喉口；同时四只手就在土砾里忙乱地拔捏，搅弄起来。这样子到午后，他们感到没曾经验过的疲乏。

“还是先把砖挑出去问问吧。”妻抹一抹脸上混和着灰土的污汗，深深叹口气，这样说。

王小福把砖整理成叠，用草索兜成担子，挑到镇上去。先在那条冷落的街道上喊卖起来。街上人都惊异地望住他那游魂样子。几个小孩子跟在后面顽皮地轰笑着。每遇到稍稍熟识的人，他就放出吃语似的阴沉低缓的声音，瞪着眼睛问：

“老哥哥，你晓得那家修屋子？可有那家要砖瓦？”

有的人打趣地说：

“你这人也真稀奇！这又不是开门七件事，怎么也好挑着喊卖的？”

另个人告诉他说：

“西街头长发旅店隔壁赵先生家里的风火墙挺了肚子，你去问问看。”

听了这个话，他的疲乏身肢涌上一股劲，歪着肩臂直挑到西街头。对着赵先生家大门的那座风火墙，果真挺出肚子，砖都消解成粉末，一块块散落下来了。他踉跄地敲了门，开门的是赵师娘。

“师师娘，”他嗫嚅地说，“听说你家要砖瓦？”

“没这个话。”

“这风火墙……我这砖便宜呀！”

“这样年头，那个……”赵师娘说了一半，忽然改了口气，抢着道：“你们年青小伙子，不好好做营生，却天天拆屋子卖！”

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王小福被兜头浇了一桶冷水，疲乏的身肢整个地软瘫了。他在他的砖堆上坐下来，抹着汗。那时赵先生家的紧邻长发旅店挤了许多镇上人，手里拿着各种古董，正缠着一个收买古董字画的外乡人罗唆着。王小福疲乏地坐了一会儿，看见那外乡人戴着一副阔边眼镜，黑缎嵌肩敞着披在胸前，古铜色的脸上堆满很深的皱纹，紧蹙起一对粗黑眉毛把那些古董一件件仔细看验着。他一连看了几幅字画和几只古式的砚石，都摇摇头摆在一边。到后，有两只霁红花瓶，却一口就出了六块钱的价。……

这事直到他像头病牛似的，把一担砖照原样挑回家去，走到离神庙不远，抬头望见那个映着偏西太阳，光芒四射的庙顶时，突然又重新想起来。——是的，这座神庙的顶子是一件稀世宝物！他自小常听见村上人互相传说着：这是朱皇帝杀了三十六名大将烧成的三只宝瓶中的一只，落到丰坦村，就做了庙顶子。神庙因这只宝瓶而灵赫，丰坦村因这只宝瓶而邪魔不作，有了过去的兴盛和从来的太平。村上人常看见它在黑夜里放着光，映红了半边天！隔壁阿富哥一夜车水就亲眼看见过。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心里一闪，全身疲乏冷凝的脉管起了急剧的跳动。他心里感到没曾经验过的紊乱，感到没曾经验过的畏惧和惶恐。觉得将有不可捉摸的可怕的事会落到自己身上和自己村子来。他下意识地放下担子走进神庙里，对着菩萨虔敬地跪拜许久，他的畏惧惶恐的心才渐渐镇静了。

日子照例麻木地过着，那太太还是不时地来，每次来了，两口子就打叠起所有的求情的话，要求把拆下来的砖瓦抵还本钱和利息。（他们屋子的门墙和后墙都早已拆完了，只有左右龙虎墙是和邻家毗连着，不是自己一家私物，所以没曾拆。）那太太先是抵死不允，说自己借出的是现钱，在而今，这砖瓦白送给人家也不见得有人要，怎么好抵债？到后来，看看这人家实在已经再无更好一点的东西可要，也只得自认了晦气，叫王小福把拆毁两座墙的砖瓦全部挑了去，并且大大咒骂了一顿，从此也就少来迫债了。

到冬天，王小福采卖野果的营生又没得做，而妻兜揽得到手的针线也因

年终岁迫骤然少了。这时候，一家人常常弄得成天没一粒米下咽；只到山上采点松花，熬成稀薄的糊，或是撇点菜蔬的老叶做汤喝。大孩子有病在身，吃不饱，就扁着嘴巴，哭丧着丑脸子，无声地啜泣着。妻有时“死鬼”“活鬼”地咒骂他一会，有时就和丈夫偷偷到人家田地里拔几只红薯或萝卜给他吃。然而最难挨度的是每个悠长的寒夜。屋子前后都敞着，咬骨的寒风由门窗里自由地吹进来，棉被是早都给那太太抱去抵算利息了。一家四个人，全都蜷缩着头和手，藏在槁草里，那样子一个个像刺猬。每个喉咙都整夜咳嗽着，宛如敲破竹筒一般。两个孩子每到夜半挨不过冷，就冤鬼似地放出惨厉颤抖的声音号哭到天亮。……在白天，王小福无事可作，是听从妻的嘱咐，拿把锄头在屋前，屋后，地板下，后园里，遍地挖掘着，希望一锄头能敲到一个青石板，或掘到一个瓦缸子什么的，找到大堆小堆的银元宝来。

那是一个下雪天。那个被三四个月慢性痢疾，和冻，和饿，缠得如同细竹竿扎成的癞痢头大孩子，放出已经没声音的哑嗓子整天哭号着。菜叶汤他已经没法吃得，连头颈也软了。

“我想吃一口米粥，一口米粥……”他闭着深凹的眼眶，歛动着嘴，无声地哭着说。

这天晚上，在镇上摆课摊的阿富嫂，突然在家里像疯狂了似地哭嚷起来：

“伤了我的心呵！伤了我的心呵！要我的命呵！要我的命呵！”她来回地哭喊着，拍着手，顿着脚。

邻舍人听到声音，有缩着头和手走来探问的。阿富嫂告诉他们，她从镇上做完生意，带小孩冒着雪回到家时，看见自己锁好的门被人托开门白，歪斜在一边了；到房里一检点，发现失了一床旧棉被和半罐子米。

“我的半罐子米，是我几个月，熬钱减两积起来，要留着年底抵还田东家的欠租的呀！田东家不肯放过我们的呀！狠心的贼呀！我的被窝——我通家尽产只这一床旧被呀！我的孩子挨不得冻呀！狠心的贼呀！怎么到我叫化子身上扯破布呀！好毒的心呀！”

阿富嫂只是这样疯子似的拍手顿脚哭嚷着，一点主意也没有。探问的人有同情怜惜她的，有为这件村上少见的事觉得恼恨的，怂恿她说：

“阿富嫂，这事你不能马虎，你得报告更棚去追查。哼，我们村上出这种事，这还了得！”

阿富嫂马上蹒跚哭嚷到村上更棚里去。打更的头目来看验了一回来踪去迹，到第二天傍晚，就在王小福家里查获到赃物：那被褥藏在地板下，米是没有了。

有的说：“想不到你也做这个事！”

有的说：“好兔不吃窝边草，小福官，你也真给鬼摸了头！”

有的说：“这年头，那个不是饱一顿饿两餐的？只有听凭神明菩萨指点呀！个个像你这样子，世界不早就反了！”

有的同情地叹口气说：“唉，也真是逼上梁山没奈何呵！”

阿富嫂抱着被褥坐在门阶上，哭着说：

“忍得偷我的呵！我的米是熬钱减两积起来抵还东家田租的呵！好毒的心呵，你要还我呵！要还我呵！”

王小福夫妻俩脸上都变成死灰色，也不回辩，也不哀求。直到王小福被剥光了上身衣裳，反缚了两手，吊到田塍上的树上时，妻才野猪似地蹦跳着嚎陶起来。

牛皮鞭子抽在那瘦瘠的光背上，一鞭一条紫红色的血痕。王小福先是像头受伤的狼，高提着嘶哑的喉咙哀叫着，抖索着，挣扎着；到后来，渐渐喊不出声音，只张大着嘴，艰难地喘着粗大的气，挺直了眼睛，扮着狰狞的怪脸子，已经失了人形了。

等他回复知觉时，是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妻坐在身旁像个鬼似地呜咽着：“我们怎么过！怎么过！”

他感到浑身钻心的痛楚。但神志倒有点清楚了：他晓得自己已经做了什么事，晓得自己已经变成什么人，自己一家子已经是在一种什么情境中。他模模糊糊地想到过去，想到将来。他觉得这村子自己已经不能再存身。……

他挣扎着支撑起上半身，伸手摸一摸大孩子，大孩子佝偻着瘦身子没头没脑蜷缩在稿草中，鼻里响着涕，咳嗽着；小孩子缩在自己脚边，发出难听的鼾声。

“给我吃！给我吃！”小孩子嚷着，嗒动着嘴，钻动着小身肢。

王小福哼了一声，重复倒下去，想到许多烦乱的事。他想到上年同事约他到外埠谋生的事，想到那不可捉摸的外埠情形，想到埋在土里，砌在墙里的金银元宝，想到……

“上外埠去！上外埠去！”他呓语着。

他忍着痛楚，挣扎起僵硬的肢体，下了床。窗户上是映满银白色。他拖着肢体到墙拐里摸到那锄头，而后再把自己肢体拖出房外。外面高高低低的雪地映着下弦月，迷蒙着一片夜气。他蹲着拖一会，匍伏着爬一会。屋前屋后积雪里都是翻松的泥土和乱石，他找不到一块自己没曾挖掘过的地。村上是一片死寂的气氛，隐隐约约妻还在屋里呜咽着，像个鬼在哭。……

“外埠去！外埠去！盘川钱！盘川钱！”他自己喃喃地呓语着。

他听见断断续续一阵铁马声，抬头看见那神庙的顶子。那“天下太平”四个黑色的字体，衬托着雪和月，分外明显；那朱砂古瓶照常闪射出耀目的金红色光芒，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依然潜在着。突然，他记起西街头长发旅店那个胸前敞着嵌肩，戴着阔边眼镜，古铜色脸子的外乡人。他像着了魔！

他是怎么像头蜗牛似地慢慢爬过那田畈，爬上那山坡，怎么攀着山坡上树林爬到庙墙头，上了那庙顶，他自己是一点都不曾晓得的。他控住气喘和呻吟，蹲到那倾斜的瓦沟里，手指触到“一瓶三戟”。……

不知花了多少工夫，他拆去那砌牢瓶底的花砖和云瓦；而后用尽所有气力，一手扳住那瓶口，一手托住那瓶身，连同自己身肢震摇了几下，那“一瓶三戟”就整个儿搬动，抱到自己胸口了。

霎时间他眼里一阵金星飞舞，看见神龛里那菩萨，看见许多祖宗，许多钢鞭和许多威严的、铁青色的、古铜色的脸。忽然天翻地覆了。他觉得自己身肢腾了空，又从云彩里飘落；满天金星围着“天下太平”四个白亮的字，红的，绿的，五彩的字，飞逐着，缭绕着。忽然訇的一声巨响，眼前大亮！他看见他的娘，他的女孩，看见他的妻，他的两个孩子了。他们在云雾里飞跑着。渐渐眼前变成一个深邃的黑洞；自己有八个，十个，无数的头，腾了空。

最后，他像只虫子似的飞进了那黑洞里。

一九三四年一月

（原载 1934 年 4 月《文学》第 2 卷 4 号）

樊家铺

八月里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寂寞的桂花香气绕着那个一排茅铺的村子幽淡地飘散着。

这座村子名叫樊家铺，是从西南乡各村镇到县城，或经过县城到外埠去的一条要道。茅铺约有三四十家，坐西朝东，连成长长的一排，面当着乱石砌成的大路。那些低矮的土墙，大都裂开了粗阔的罅隙，有的用一支杉木抵着地，勉强支撑着；有的已掉下大块的泥土；有的甚至露出腐朽的屋梁和顶棚，看去已不像还有人在居住各家茅铺的门前，笼罩着大路，都有用稿草和杉木搭盖的过亭。过亭上面盖着的稿草，和茅铺顶上的一般样：在明丽的阳光里呈现着一片灰黑的颜色。稿草上面络成斜方格子的草索，完全松散断乱；连杉木的梁柱也多半歪歪倒倒不成个样子了。过亭的里面，杂乱地摊着些稿草堆：有的想是从屋顶掉落下来的；有的则是外乡逃荒来的乞丐打田畝里搬来作床褥用的。几张积着厚灰土的薄板台凳，都已残废不堪，零零落落地倒卧在乱草堆里。

这时有个女人从一家茅铺里走出来，手里捏着一茎狗尾草，插在牙缝里挑弄着；一边把背靠到一棵杉木柱的旁边，向路上眺望。

这女人大约二十六七岁，蓬松着黑发，样子显得很憔悴。太阳穴上一边粘着一片正方形的黑色头痛膏药。两条又浓又粗的修整的眉毛下覆着一双生涩的眼睛。眼睛想是有了风火病，勉强瞅睁着，露出络有淡红经络的白珠。身上穿着一件齐膝的竹布褂，上面已经有了几块补钉，但是洗得很干净。

她用手掌罩住前额，皱着眼皮眺望了许久。望了一会路的南段，又掉过身肢望北段。两头的大路弯弯曲曲直通到山坡下，并看不见一个过路的人。

整个的樊家铺是沉浸在死寂里，除了隔邻茅铺里断断续续发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声和一两声婴儿的啼哭。

寂寞的桂花香气随着微风吹送到她的鼻官中，她抬头从顶棚的破隙里望望那棵高大的桂花树，满枝琐碎的花朵闪着黄金的微光。她又望望这连成长排的破败的茅铺，望望这摊乱着稿草的过亭，她扔去了那茎插在嘴里的狗尾草，悠长地吐了一口气。

“都死完了么！”她喃喃地低声自语着。

她渐渐想到数年以前这里的热闹景象。

从前，各家过亭里原都整齐地排列着长条的木板台凳，茅铺门口也都各有一张板桌跨在门槛上。上面摆着插有黄蔑筷子的竹筒，几只叠着的放好茶叶的粗茶碗，几盒“仙岛牌”“小刀牌”的香烟，和几盆子红椒炒黄豆，炸溪鱼，炒韭一类小菜。各家灶沿上都有两三把炊壶冒着腾腾的热气，跳动着盖子，像个倒了嗓子的花旦似地哼唱着。那些过往的客人，有挑担的，有抬轿子的，有推小车的，有赶牲口的；有的是店铺的老板伙计或朝奉。他们或从外埠把大批盐，糖，煤油，洋货，布匹之类货物运到西南乡各村镇去，或把各村镇的稻，棉，丝，茧之类土产运向外埠去。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打这里过，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自己和邻舍的“板奶奶”或“板姑娘”都穿着新浆洗的竹布褂裤、胸前系着花布围裙，鼻上渍着微微的汗，热红着两腮，提着水壶或拿着饭碗像春天的蝴蝶似的忙乱着，从过亭飞到灶沿前，从这一桌飞到那一桌；一边脸上含着轻盈的微笑，和客人答着话。

那些过往的客人刚刚承受了自己和别家女店主一番殷勤招待，跺跺脚腿

上的尘土，擤擤鼻子，脸上含着辛苦安详的笑，重新上道时，就又听到漫田漫野的歌声传入耳里来。那正是自己丈夫和邻舍男子们在田里工作时随口唱的“花鼓腔”。每到秋收过后或新年正月里，田里没事了，他们照例在茅铺后面的晒稻坦上搭起一座简单的戏台，你家拿出锣，我家搬出鼓，几件简单的行头，配上娘的老婆的衣服首饰脂粉等东西，连夜把“七仙女下凡”“蔡妙风辞店”“送香茶”“祝英台”之类烂熟的故事精彩地扮演出来。自己家里人，亲戚，邻近各村的男女老幼以及住宿的过客们都来聚精会神的作看众。有趣的时候哈哈大笑，悲惨的时候牵起衣角擦眼泪；到“会腔”的时候就前台，后台，甚至台上，台下一个声音一个调子接应合唱起来。……

“线子！”

大路的北头有个矮矮的人影蹒跚地走近来。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老婆婆。一手拄着一根树枝作拐杖，另一手用树枝驮着一个大衣包在背上。女人听到声音猛然从凝思中惊醒过来，掉头向路北望去，看见是自己的娘。

“娘么！”线子嫂懒懒地说，“又回家去做什么？”

那老婆婆走到过亭里，自己动手从草堆里扶起一条板凳，把包袱放到地上，一边坐下，一边把额上扎着的“包头”解下来，对着那张胖而皱的脸子扇拂着，微微喘着说：

“回家做什么？回家去养老！娘也快要饿死了！”

“饿不到你头上来。”

“你这没有天良的×，你当娘怎么了？东家怕土匪，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土匪写信给县衙里，十天之内要五万块，五万块。——啊呀，八月的天还这么热！天也不是个天了！”说着把包头放到板凳上，两手牵起衣角扇动着：“你这里还是没生意吗？小刀子呢？打了多少稻？”

“人都死光了！鬼都不上门。”

“小刀子呢？打了多少稻？够得租钱开销吗？”

“打了多少稻？莫问那个话。我们饿死了也不问你老娘贷一个。你放心！”

“你这没有天良的×，你当娘怎么了？你当娘是个有钱的？你当娘腰里留着多少钱？”

“有钱没钱我不管。”

女儿的说话听在娘耳里，犹如生吞了几块冷石头。娘望望她那张冷硬的脸子，觉得自己的苦楚都无从说出来；擤擤鼻子，叹了口气说：

“不倒碗茶给我喝喝吗？”

“等一会吧，还要烧。”说着懒懒地走到里面去。

北路又走来一个人。瘦长的身肢，穿着一件宽大的灰布长领衣；小小的脚，套在圆头鞋里，如同一对小鲫鱼。走一步，打一个跟跄；手里一根龙头拐杖抨击着石路，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个圆光光的头在太阳光下两边晃动着。老婆婆认得她是西昆山地藏王庵的尼姑莲师父，站起来，招呼说：

“莲师父。从城里来吗？”

“城里来。——好桂花香！”站住了，左手捻着香珠子说。

这是一块叠着的黑绸。由做儿子的花钱送到地藏王庵里盖上一个“法印”，拿回来给娘系在发额之间，直到进棺材。据说有这个东西的，到了阴间可以减刑赎罪。乡中有儿孙的老太太无论贵贱大多有之。——作者注

“听到消息吗？土匪写信给县衙里，十天之内要五万元，五万元。有钱的人家都搬走了。——路也真难走。莲师父身肢倒结实。歇歇吧。”

“你还是在西门赞治第赵老爷家伺候么？回来看姑娘？”

“就是的呀。莲师父你请坐。”说着让莲师父同在那条狼狈的板凳上坐下来：“我在赞治第头尾帮了九年工。现在赵老爷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上海去了，昨天走的。东家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东家。太太要带我到上海去。我怎么个去法，我家里大大小小一大窝？我把骨头送到外乡去？给赵老爷拖上一个大累赘？我想想，我不去。东门元康祥三老板说雇我。我今天去问，又说不雇人了。土匪土匪的，家家手头都是难的了。”

“你是个有福气的，也该回家养养老了。”

“莲师父，说那里话！我养老？有那个命根？我养儿子孙子的老！一个女儿还同我红眉毛绿眼睛的。”

“几个大汉？我倒忘记了。”

“三个没有用的货，八个小的。这几年稻子不值钱，丝茧没人受，老大到城里当了团丁了，还是赵老爷的面子，天大天大的面子。老二老三在城里做杂货店，一个一个做了‘茴香’了！这一家饿瘪臭虫，不就在我一个老棺材身上叮血吃？一个女儿还同我红眉毛绿眼睛的！”

“线姑娘脾气扭一点。”那尼姑说着把声音放小了：“上次在这里碰着你，我看她那颜色，也真不像个见娘的颜色。看不得，唔，看不得。你是奶头上送来的呀，唔，不嵌肉也难怪。”

“早先不是这样的。”喉咙也跟着低了：“就是去年小狗子——

我女婿，交不得东家田租钱，东家招呼区公所派了两个弟兄来讨，要拿人。线子到城里去求我，说近来茶棚饭店没生意，手里没一文钱，要我填一填。你看她说话多容易！我又不是在城里当知县，我到那里弄钱填？这几年丝茧没销场，那家不是看风转舵不养了？

他两口子却屎垫了心，还要养。说人家不养我偏来养。痴心想发个大财，一养就养了个十大盘。自己一点桑叶不够吃，挨到三眠快见老，没叶了。又是叫我拿钱出来买叶子。你饭店又没生意，又没叶，又没钱，你养什么蚕，莲师父？”

“年轻人做事都冒冒失失的。”

“那我管不上。你自己疯的屎，你自己吃。我不管。——不是我不管呀，我拿什么管？我一家十多个身分，十多张嘴，不吃不用了？就是我一个老棺材是该死的？”

“唔，唔，可是呀。”那尼姑锁起扁皱的嘴巴，连连点着光头说，“到底自己身边的要紧呀。”

“她屎垫了心，说我有钱上人家的‘会’，就没钱借给她。要死嘞，我

“大汉”是儿子的客气称呼。——作者注

“茴香”是“回乡”的谐音，是失业回家的意思。——作者注

“嵌肉”犹言亲热贴心。——作者注

这是民间一种很巧妙的制度。由需钱的人作“会首”，约定九人，各出钱若干，交会首收用。以后定期开摇（或一月一摇，或一季一摇，或一年两摇，各视其财力而定）。摇时卜龟决定先后，以骰子入碗中挨次摇之，谁的点子最大，谁就得会，与会者各出钱如前数交与得者，并由会首付极轻的利息若干。凡已得会者下次不得与摇。如此递减，直至九次后，大家都得一份，会遂解散。此法在邀会者（即会首）可以极

上人家的会？我上了多少会？大不了老前年张嫂子丈夫死了，出不得。太太的面子叫我上了她一脚五十的会。一年摇两次：三月一次，九月一次。今年四年了，我还只是付，摇不到手。看看只好得未会了。那几年，大家手头还过得，我才上的呀。我要卖，我要顶。求爹爹，拜奶奶，那个顶你的？人家正求你顶他的，上他的呢。两年了，都是借钱付。就是春天在你庵里借了五块钱去付会，她看见了，要我转借给她买桑叶。我付了四年的一个老会，我不要了？我把付出了的都白丢了？她就和我结了仇，当我是个有钱的，当我百万豪富，当我藏着金银元宝不肯拿出来帮衬她。我辛辛苦苦做到头发白，我做了强盗？抢了人家？我肉里出钱？现在好了！东家走了！走了！大家一样了，都要饿死了！给她眼见了！”老婆婆说着，老花眼里漾满了泪珠；颤抖着手从掩襟里伸进去，掏了半天，掏出一块手帕来擦眼皮。

“嫁出门外的女，泼出门外的水。一口长气叹了，也罢了。人呢？”

“在里面烧茶。看我走了十来里路，汗一把，水一把的，茶也不赏碗给我喝；还要讨，还要我自己讨。”

“人心大变了。菩萨托了梦，听到说过吗？上个月的事。菩萨手里捏着钢鞭，一脸怒气。从来没见过那怒气。我看见手里有钢鞭，我晓得不好了。民国推翻那年也是捏着钢鞭的。阿弥陀佛。慈悲慈悲吧。”那尼姑显出一脸严肃骇怕的样子，把嘴巴锁得满沿是皱折，连连捻着香珠子，吐着气。

“呃，菩萨说了什么？”

“菩萨把钢鞭望西北方一指，半天不开口。我跪着，头都不敢抬。怎么敢抬？半天，半天，说话了。声音像打铜锣。——平时不是这样的。说大劫要到了：白头发去一半，黑头发一齐算。就只两句话。半天，半天，不开口。我求着说，超度超度吧。”深深换了口

老婆婆盯着眼望着那光头，也挺一挺腰，吐了口气。

“菩萨还说什么呢？”

“果然呀。菩萨托梦的第三天，五龙山的土匪动作了。你刚才说土匪要五万，问我可晓得？——可晓得呢！赵老爷不是我关照，他肯搬了走？这都是人难，算不得数。人心大变了，菩萨也不能容的。十月初四起，天要黑七天。”

“菩萨说的？”

“我说是那个呢，莲师父说话呀。”线子嫂皱着眼睛从茅铺里探出头来，毫无表情地说。

“莲师父谈菩萨托梦，劫难要到。线子，你来听听吧。”

“有钱的怕劫难。我们不伯。天掉下来，还有比我们长，比我们高的。你们打打主意吧。”说着重新进去了。

“听听这个话。”

“唔，唔。”莲师父连连摇着头，哼着鼻子说。

“还是没茶吗？线子，线子。”老婆婆高声喊。

线子嫂提着一把瓦壶和两只大碗走出来，望地上一顿，把眼睛揉了揉说：

“那里真的就渴死了？灌吧，灌灌足。”

老婆婆吐了一口长气，弓着背在地上取了碗，先倒了一碗给那尼姑，而后才自己倒了喝。喝了一碗，又喝第二碗。

“莲师父，我这样的人，活一年，是一年；活一天，是一天。仔细想想，都淡了念头了。人家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我呀，我现在是现在——”

“怎么样？”线子嫂远远向南路上招着手，高声喊，“还是不肯饶么？”

来的那个人赤着上身，肩上披一块蓝布披巾；黑布裤子直卷到腿弯上。身肢虽粗壮、脸子尖尖地，却很有点清秀。一看样子就像个花鼓戏里的旦角。

“是小狗子吗？”老婆婆把茶脚泼了，拿着空碗说，“去做什么来小狗子不作声，一步一步走近了。那脸上，流满汗珠，板得像木头雕就的一样。

“小狗子，”老婆婆说，“娘现在好了！赵老爷走了。一家人都到上海去了。现在我们都要饿死了，都要饿死了！土匪要五万块，写信给县衙里。”

小狗子还是不作声，用披肩抹着脸上的汗；又从额上除下“汗吸子”，拿在手掌里挤捏着；汗水滴在自己的赤脚上，把脚跺了两跺，地上冒起了一层尘土来；转过身，走进屋里去了。

“还是不肯饶？找到稻贩子没有？”线子嫂钉在后面问。

“稻贩子！稻贩子！都要吃人了！”小狗子在屋里嚷。

“一块六，还只肯一块六？和城里砮坊里的价线一样？”

“想发财！一块六！做乱梦么！”

那尼姑瞪着眼睛，瞪了老半天，拄着拐杖站起来，说：

“太阳快偏西了。还有三里山路。人心大变，阿弥陀佛，慈悲慈悲。”

“就走了么？”老婆婆问。

那尼姑刚开步，就打了个踉跄。用拐杖拄定了，回过头说：

“你坐一会儿吧。我比你走得慢。”

说着，蹒跚走出过亭了。

老婆婆望着黑洞洞的屋里，发了一会呆；半晌，弓着背，在地上包袱里摸了一会，掏出几支红蜡烛和一块肥皂来，慢慢走向屋里去。

屋里低矮而且昏暗，只从东边一个瓮口窗上透进一线淡光。刚进来，眼前缭绕绿色的花晕，简直瞧不出人是在那里；渐渐有点看得出了。小狗子捧着头，坐在板房的门槛上。线子靠在灶沿旁边，用葫芦瓢舀着水，一瓢一瓢倒在木盆里。

“线子，线子。赵老爷家还愿的神烛，我要了几口：要烱了，放个阴凉地处吧。”说着走到一只水缸边，把蜡烛给放在缸拐里，“这是一块日光皂，风干的，也是太太给的。”

“你留着自己用吧。”

“我有的。——到底怎么的，小狗子？今年田租钱还是不够付，小狗子？”

没回答。

“还是不够付，线子？”

“六亩八分田，打了二十五担稻。前几天问砮坊，只肯照一块六算价。今天找稻贩子，说一块六也不行了。只抵还砮坊的‘放青’就快三十块。东

是一种麻绳编的东西，用线套在额上，借以吸收汗液，免得流入眼睛里。——作者注

内地砮坊有兼售粮食杂货者，农人食用均在此赊取。每到秋收，即以稻子抵偿，此系一种变相的“放青”，然其剥削之酷辣，则无二致。——作者注

家的租钱只好拿命去还了。东家漆黑铁硬，半文钱不肯饶。稻子打一粒，要一粒去。三个朝奉看守着打，都扣在砬坊里。”

“是那一家？”

“问那些做什么呀！——是阜丰泰，又是你赵老爷的店？这些烂了心肝的都一个个是阎王！春上时候，稻子称出来给我们，两块五两块六算价；现在我们抵账只肯一块六。——一块六还不肯！杀人不见血！”说着，把木盆端进板房里：“洗澡吧。”

“这个田种不得了，小狗子。快休兵，要赶快。”

“他娘的！老子要杀人！老子从阜丰泰开刀！”小狗子嚷着站起来，走进板房里去洗澡。

“是真的呢！这个田种不得了。你们村上这一溜可还有几家是种田的？”

“不种田，做什么？吃什么？”线子嫂冷笑着说，“风凉话！我们可不比你老人家呀。我——”

“不种田，做土匪！听陈扁担说，隔壁老四，老三，推车的小三花，大毛子都上了五龙山了。老子也来干：你不杀人，人就杀你。颠倒这么的！”板房里面的声音。

“小心点嘴巴吧！”线子嫂看看娘。

老婆婆僵着站了一会儿，重新吐了一口气。一边向外面走着说：

“我走了。现在好了！大家都要饿死了。”

天上乌洞洞地，四面的山峦都被雨雾封锁着。蒙蒙细雨牛毛似的漫天漫地飘飞。一阵凉风吹过来，茅铺前后的那些树木瑟瑟乱响。桂花树上凝积着的水点随着憔悴的残花，从过亭上盖着的稿草的破罅处洒落下来。

过亭下的乱草堆里一簇一簇地坐卧着褴褛不堪的乞丐。那是从外地来的逃荒者。妇人们有的赤露着胸口，跌坐在稿草上，一边整理着脚边一大堆的污秽的破布条，一边任小孩爬在地上钻到自己胸口吮着乳；有的手里捧着一只缺口的瓦钵，里面盛着从田畈里扫捡来的农人们遗落的稻粒，一把一把地抓了望嘴里塞，皱着眼皮，舔舐着。男子们有的坐在地上，在一块缸瓦的破片上面攒着粘泥；有的在用模子铸着粗劣的小泥人，一只一只晾在墙脚下；有的手里拿着一支竹竿，竹竿头上扎着草把，把粗纸制作的红红绿绿的人物鸟兽插到上面去。小孩子有的拉长了肮脏的丑脸子高声号哭；有的在潮湿的泥地上乱爬；有的随手在地上捡拾着从上面洒落下来的桂花，一颗一颗地塞到嘴里去，满嘴上都沾着污泥。

茅铺里有个妇人把一个乞丐推出来。那乞丐的背上用草索捆着一个小孩，手里捧着一个破瓦钵，里面也是盛着混有泥土的稻粒。

“你要抢么！”那妇人说着，把茅铺的板门掩上了。

那女丐捧着钵子苦笑了一会，把嘴一撇，打着满口外乡话说：

“奶奶的！——草又烧不着，借炉子使一使也不行吗？”说着，低头在钵里舐了几粒稻子在舌上，慢慢嚼动起来。

远远一阵不成腔调的军号声破空而来：

“低低低打——打——打得打！”

许久以后，从南路的山坡下转出一支队伍来。队伍渐走渐近，零乱的脚步声震得四野里一片响动。

那队伍共总不过四五十个人。都穿着不称身的灰布制服，绑腿胡乱缠在下腿上，袜子穿草鞋，泥泞直齐脚踝。每个人都用一种不自然的别扭姿势驮

着一杆枪在肩上。有的驮的是来福枪，有的是猎人用的“土枪”及长到一丈多的“过山龙”。一个四十岁上下，留着仁丹胡子的长官，戴着白手套，架着眼镜，整齐的中山装上斜挂着一排子弹，手里打着一把雨伞，挺着胸口跨在马背上。腰下的指挥刀碰击着铁镫和皮鞋，铿锵作响。俨然一位大将，威武非凡。

队伍的前面，一个旗手领头。那旗杆又粗又高；旗手歪着嘴巴，露出半边牙齿，把旗杆的下端抵在自己的肚子上，一挺一挺地走着，显得十分吃力。旗子白布黑字，已被蒙蒙细雨淋透；偶然有风吹来，很勉强地把叠折处微微吹开：是“××县人民自卫团第三分队”几个八分字。

“立——定。稍息！”走近了过亭，那长官放出尖溜溜的嗓子威武地喊。

茅铺里走出几个憔悴的妇人，站到门口张看。过亭里那一群乞丐，也都各自停止手里的工作，对队伍瞪着害怕的眼睛。

那长官走到过亭里，收下雨伞，下了马，脸向着乞丐群，立定了，右手把着腰下的指挥刀，板着威严的脸子；半晌，举起手做着手势，打着不成熟的普通话，说了：

“你们，听好了：你们，自己都有家乡。你们，都有。现在，我们，地方上，很是紧急。——很不，平靖。你们，应该，都知道了。你们，要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地。三天，三天。懂了没有？三天之内，离开，本地。别处的也招呼了。一律，离开。都一样。外乡人，我们，不许，停留。”

回头转向那几个看热闹的妇人，改了本地话问道：

“家里有男汉么？”

“不在家。”妇人们答道。

“店里住了客人么？”

“没有，那有客人嘞？这两年——”

“好。听清楚：以后如有形迹可疑的旅客，你们要随时报告我们局里。地方上不平靖，我们已经有个准备。大家安心做活，不要惊慌。”

大家都鸦雀无声。

过亭外面，冒着雨“稍息”在那里的队伍里走出一个矮个子团丁，他手里拿着的那支“过山龙”几乎比他自己身肢高过两倍。他踌躇着走到一家茅铺门口，苦笑着那张扁脸，向一个妇人低声喊道：

“线子！”线子嫂看见喊着自己的这人一副狼狈滑稽的样子，起初惊了一下；接着，认得是她大哥，撇着嘴，笑了：

“恭喜你得了好差事了。”

“我就是操不好，没法操得好。我们昨天下午放哨出城的，出东门。——狗子宫呢？听说他出了事——”

“归队！”那长官尖声叱嚷。

“低低低低低”那军号也照例吹奏起来。

那矮子扛起“过山龙”，颠起脚尖像一只鹿似地窜了出去。队伍集好后，那威武的长官再发一声号令，打起雨伞，跨上马背；自己压在后面，踉踉跄跄地向北路去了。

“奶奶的！”乞丐的堆里喧哗起来，有的这么喊。

“你们不打算搬走吗？”茅铺门口的妇人问。

“搬他奶奶的！”

线子嫂却不曾有兴致和那些乞丐们打谈。她听了她大哥一句没头没尾的

话，像听到一个霹雳，冒出一身热汗，满肚子起了疑团，掩上板门，回到屋里。

刚走到里面板房的门槛上，她突然像疯了似地三脚两步重新跳出茅铺，跑出过亭，喘着气向北路上喊：

“大哥！大哥！”

“低低低打——打——打得打！”

那别扭的军号声已在远处，队伍踉踉跄跄地快走近山坡了。

线子嫂瞪着眼睛望着队伍的影子，呆了许久，憔悴的脸上渐渐泛出灰白颜色。她觉得她的心肝在腔子里像个小老鼠似的乱跳乱窜，她觉得她的脚下踹着棉花。

她把那双干涩的眼睛揉了揉，想镇静自己。半晌，回身走到铺里，掩上门，坐到板房的门槛上；曲着手肘抵着膝盖，手掌托住贴有膏药的太阳穴。

她的头脑像受了突来的一击，非常昏乱。

渐渐她想起那天晚上的事。

一天黄昏时候，一个满头长头发的粗大汉子走进来，手里捏着一把芦杆，亮着熊熊的火光。火光里显出一张狞恶的醉脸。

“哎呀，不是老扁担吗？”自己惊了一下，问。

“小狗子呢？”

“上城去了，就回来。”

“怎么还没吃饭？”

“作兴他在城里吃了再来。”

“你晓得吗？我同他约好了，有事。”

“他没说起。什么事？”

“回头告诉你。”

不久丈夫就推门进来。两个人把炊壶底上凝结着的烟煤各抓了几把，涂满一脸。

“你们打算干么呀？”自己牙齿也颤抖起来。

“你莫管。”

“小狗子，你可做不得那事呀！你……”

“也要试试看。”丈夫镇静地答。

“那不行，我不许去。”扯住他的裤带。

丈夫把自己一推，两个人拉开铺门飞跑地走了。

这一晚自己不曾睡觉。

到三更时候，才听到卜卜的叩门声。开了门。丈夫回来了：黑色的脸上露着一张紫红的嘴唇，唇上挂满牙齿血，浑身瑟瑟地抖着，踉跄地走到里面板房里。

“当是个大财喜呢，他娘的！”两片红嘴唇不住地震抖，喘着粗气，说着，抖着手在腰上的“通海带”里摸着；摸了一会，掏出八块大洋，两张钞票，另外一只金镯，望板桌上一丢。

“要死嘞！是那一家？”

“西昆山。好厉害的眼睛呀，一见面就认得我了，就喊，就抓我。”

“认得了，啊？”睁大眼睛嚷。

“低声点！——老陈兜胸给她一拳。翻在台阶上。老陈还不放心，拿了一只铜香炉没头没脑给她一砸。”

“要死！”自己禁不住叫一声。

“低声点。我说，这可是你自己讨死的啦！——自己讨死么！”

线子嫂坐在门槛上，迷迷糊糊，把这些情节翻来覆去地想着。但是越想心里越像火烧。她拿不出什么主意来。她渐渐把头低到膝盖上，用手捧着。坐了很久她也不知道。

外面有个人推了门进来：

“有人在家么？”

线子嫂猛地从昏乱的思绪里惊醒，抬起头，从门槛上站了起来。

“谁呀？”

“是我，板奶奶。”

那人走近了，撕开嘴在笑，露出两个金牙；穿一身华丝葛旧夹袄，脚上的胶皮雨鞋发亮，倒提着雨伞；瘦瘦的长方脸，平顶的头。线子嫂认得他是县衙里的“班副”，顿时心肝跳到喉咙里。

“王七爷。”

“是呀。”

“七爷什么事？”线子嫂努力镇定了自己，闲闲地问。

“没事。——到分界渡有点小事。路难走。进来喝碗茶。”

“多久没下乡了。”

“并不久。上次提一个佃户归案，过这里，天晚了，我没进来喝茶。”

“真丢丑，茶还要现烧。没生意，七爷。”

“不忙，你慢慢烧。”

“是呀。那佃户什么事？”说着走到灶沿前去烧火。

“还不是那些事。——眼前，各事都难。种田的更难；年成不好，稻价又只是落。”

“是呀。”

“你说种田的难呢，田东家还要难：开支大，钱粮附加重；稻价落，钱粮税捐不落。”

“那事归根怎么判的？”

“还不是那回事？佃户欠两年租钱。自然不是他不肯交，是交不出。是个福气人家，家口实在不轻。——可是田东家不能依呀。你一年不交、两年不交，东家要产业做什么？是不是？”

“唔。”

“县长是个善心的人，凡事都马虎。只打了几板子，押到‘三班’里，我看他可怜，人也老了。——是个老头子，那佃户。”

“是呀。”

“我这个当衙门的，不行。天生我吃不得这碗饭，我心肝软。看见差不多的什么事，能帮衬人家的，我总要帮衬。人活在世上做什么？吃了这碗衙门饭，是没法。我不行，我总要帮衬苦人。”

“七爷是好人。”

“这话可只有你说。人家可不然，背后就骂我。所以，好人也难做。——还是说那佃户，我叫他家里拿出几个小钱赏赏班里的弟兄。弟兄也都听话，好打发，也就放了。租钱好说，叫他慢慢做了还，总得还。”

“那是呀。”

“狗子官不在家吗？今年收成总不差？”

“进城了。还是前天进的城。七爷没见他？”说着肠子里一阵热，像被开水浇着了一般的感受。手里抓着一撮茶叶望碗里放，撒满了一灶沿。

“只要年成好就行。”班副好像不曾听见她的话，自管自接着说，“铺里生意冷淡点，不碍事。碗里没了，锅里有。这就行。”“那里话呀，七爷。种着六亩几分田，去年就是借债付的租钱“今年的总没借债了？”

“怎么没借债！”线子嫂心里一跳，睁大眼睛说。但随即镇定了，说：“呃，比去年总算好点。”

“狗子官人能干，我就喜欢他。”

“七爷疼惜。”

“不是。我最喜欢他的‘七仙女下凡’。那，那，唱的做的都到家。身段，——那身段！板奶奶，他打扮起来比你强。我不说偏心话。——也多年没唱了。”

“是呀。”

“那年正月里，听说这里有戏，我特意来看。果然，‘七仙女下凡’。隔壁老三扮董永。卖身葬父，孝心感动天心。狗子官的七妹。我说，板奶奶，不怪你两口子恩爱，我都爱。吓吓吓！”“七爷说笑话。”

“不是笑话。多场子我真还想着。”

“一个热腾腾的樊家铺，人都散尽了，七爷。只好叫他一个人唱给你看。”

“所以呀，我这是说笑话。就有人，也唱不得。地方上这样紧急！——这两天风声好个紧法呀，板奶奶。”

“是呀，听说五龙山又有信给衙里？”

“岂止五龙山？就是西南乡近来也出了几件抢案。”

“是么？”线子嫂平静下来的心，突又起了震荡。脸上喷满热气，低着头把开水冲到碗里，送到班副面前，说：“七爷，你用茶。”

“得罪。”那班副把手里的烟蒂扔了，吹着碗里浮着的茶叶。

线子嫂重新坐到门槛上，瞪着班副那尴尬的神气只是凝神。

“出了几个枪案。还有一条人命。”

“人命？”

“事情你听到了，这么近？县里刚晓得。打算明天去验尸。”

“那里的事？没听人说。”

“做案子的你总认得：挑八根索的陈扁担。长头发，大个子的那一个。他的担子老是一百多斤。记得这个人罢？”

线子嫂制止不住突来的激动，不自觉地站起来，又坐下，嘴唇抖着，要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想不到这个人做这事。”班副继续慢慢地说，眼睛溜着对方，“也难怪。年头太坏了，那个存心要做坏人？也是没法。这事人赃都有了，前天捉住的。是前天。”

看见对方埋下头，用双手捧着；他喝了一口茶，有意长长地叹一口气，说：

“他太心急了，那老陈。胆子也痴大，不晓得忌讳：他把一条金簪——并不是金的，是包金。——想拿到城里去换钱。天黑了，把守城门的团丁不放他进城。他当是平常时候，不要紧，就和那团丁吵起来。那团丁是个衙里的老卫队，是个‘老公事’。这就该倒霉：要是个本地的土团丁，事情也就罢了。”

线子嫂原还唔呀唔地答应着，这时却没有声音了。班副不管她，索性说下去：

“那‘老公事’要搜他。一个心虚，不让搜；一个想，你不让搜，我偏要搜。这样，就抓到局子里。一搜，果然，搜出那根簪子来。还有五张上海钞票，一块的。”又嚼了一口茶：“问他，你那里来的金簪和钞票？这家伙是个脓包：担子是挑得，一百多斤，一把牛气力；却是个李逵哥，肠子是直的，没心窍。头一句就问呆了，答不上。局子里把他扣住了。第二天，——就是昨天。昨天就送到衙里。起初不肯说，上了夹棍，还不说；火链子烧红了，拿出来了，不能不说了。”

线子嫂半天没作声，突然双手捧着脸，号哭起来了。

“这怎么说，这怎么说，板奶奶？——我清楚！他是诬攀的。我清楚，我清楚，板奶奶。”

班副扮着正经的脸子劝说着，走去拉她。线子嫂不理睬，摔开班副的手，像个小孩子似地拍着膝盖一仰一合放大声音嚎啕着。

“啊嚏，这是我的不是了。”

线子嫂嚎啕了一会，忽然止了哭；牵起衣角抹抹眼泪，抽搐地扁着嘴，使劲忍住硬咽，说：

“七爷，七爷……”喊了两声，又重新伤痛地呜咽起来。

“我清楚，我清楚。他是吓胡涂了，就诬攀你狗子宫。”

“七爷，七爷，这事我只好求七爷。”呜咽着，歪抽着下巴，走到班副跟前，像要下跪的样子。

“这怎么说！这怎么说！板奶奶？你要折我的寿了。快莫，快莫！我王七还想再活两年。”一边说，一边托住线子嫂的手膊，放她回门槛上，说：“我还要你来求，板奶奶？我们多年交往，狗子宫是我的朋友。我要你求，我今天就不会自己上门了。”

线子嫂连连擤着鼻涕，还在哽咽。

“狗子宫是黑天大冤枉，我清楚。我把事情谈谈完，免得你家驮了冤屈，还找头不找尾：那陈扁担照实说了：说东西是西昆山地藏王庵里的。‘案上’把‘击子’一拍，说：你胡说！庵里那里来的金簪和钞票？——‘案上’是个好人，不晓得这里的庵，都有点田，手头都是有二个的。这个莲师父人就能干：积了几个香火钱，盘放得日长夜大。板奶奶，说句不见笑的话，前年我过不得年，我就享了我媳妇两只戒指在她处押了七块钱，春上才取的。——那陈扁担说，庵里莲师父……都说了，都说了。问还有那个是同伙？他就他就攀了你狗子宫。也凑巧，狗子宫在阜丰泰算帐，那里晓得冤枉凭空飞到头上来？板奶奶，你放心，尽管放心。昨天没开审，收在收存收在……”

“人是收在那里呀？”她不哭了，很着急地问。

“所以稍稍不好办呀。要是在‘三班’里，凡事我作得主，不就好办了？”

“‘大号子’？”“人命，抢案，怎么不进‘大号子’？所以这事我有点含糊。不好办，的确不好办。这是在‘头班’的手里。我们这‘头班’，是个侂子：铁面无情。就是因为我这做朋友的没用处，帮不得忙，我才来和板奶奶商量商量。总要想个法子。”

内地县城的监狱分两种：一种是“大号子”，专收案情严重的囚犯，一种是“三班下处”，简称“三班”，拘押窃贼小犯。——作者注

线子嫂重新呜咽起来，歪歪倒倒再走到班副跟前，哽着喉咙说：

“七爷七爷，替我替我做做主。”

“板奶奶，这不是哭的时候。你坐下来，坐下来。我们慢慢商量，总要想个办法。狗子官我们好比亲兄弟，亲手足。这事我也脱不得责，还要你求？我自己要出力。我把情形讲给你听：那陈扁担招供了——攀了，是攀了狗子官。‘案上’当时就发出传票。两个弟兄，傻里八气的，也不和我说，一径到街上找；一找就在阜丰泰找着了。找着了，也不通知我，一径就交到‘头班’里。等我晓得这事情，生米煮成熟饭了。我心里一急，我想，人命关天，这个，狗子官吃不了，我得尽点力。我就去找‘头班’。‘头班’晓得我好管闲事，喜欢周全人，把我兜脸一顿骂，回我三千八百里！我也放下脸子。——我心肝是雪白的，板奶奶，我不怕他。我说，这个是我的至亲把弟，是个正品人。你要是当真办他，你就先办我。‘头班’也究竟到底是好人，见我这么一说，嘴里就松了。说，既是这样子，大家都不外，我也愿意帮衬。看他口气，光景可以不把事情闹穿，可以掩盖过去。光景可以掩盖。不过，‘头班’肯帮衬，他手下那班虾兵蟹将，通不过。我去说，我去疏通。我说，这人是至亲把弟，大家看我这破面子，要包圆。那些弟兄究竟眼光浅，看不远，还是那一套：要我给赏钱。——衙门里的事，唉，真是他娘的！我说，这可不行呵！我这把弟是个种田的，这两年年头这样，板奶奶的饭店茶棚也都没生意。你们都清楚，叫他到那里弄钱？不是存心要迫坏人？”

“什么数目呢？你直说吧。”线子嫂不耐烦地说。

“板奶奶，那就不能依他们了：头班里上上下下总共就十五六个人。你一人给个一双手，你就只好请财神爷爷了，还了得！现在，我不能依他们。狗子官，狗子官，——”那班副说着，掉头向那瓮口窗里看看天色，忽然说：“哦呀，我要误事了！怎么天就要黑下来了？怕还有大雨。我还要到分界渡，还有十多里山路。我坐不得了。这样子，板奶奶：你随便借借看，你老太太路头多，借借看，弄到几个算几个。交把我，我要拿我这个破面子和他们碰碰看。”

在往年，就好办。这几年衙门里的弟兄也真是干滩上的鸭子，不给几个总不行。”

那班副说着，站起来，拿了雨伞，走了两步，重新回头说：

“板奶奶，你放心。过堂的时候有我，我要尽力。人不会吃苦的。掩盖，也总有法子掩盖，你放心，交在我身上。你也宽宽心。”

不要愁。不要急。”

线子嫂望着那班副的后影，直瞪着眼。半晌，半晌，突然奔到板房里，倒到床铺上，双手捧着脸，呼天抢地地号哭起来。

第三次桂花开了，又谢了！桂花树上的叶子也有飘落下来的了。时候已经是九月中旬。

田野里飘散着野花野草的香气，吹在面上的风已经很有点凉意。温和的太阳照着樊家铺一片灰黑敝败的茅屋上；茅铺的过亭里比平时热闹了。

过亭稿草堆里东倒西歪的几张台凳，能站得起来的都站起来了，台凳的旁边歇着一两堆男女过客。那些男女各有一张白晰的脸，都含着忧虑不安的容色。轿子，担子塞满在过亭里。有几家茅铺的板奶奶，憔悴的脸上稍稍恢复了一点高兴样子，又提着水壶进进出出地忙乱着了。

一个剪发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低着头，把短枝上累累的毛栗的小刺团放

在脚下踏动着，踏一会，把刺团拾起来，尖着白晰的手去剥弄。嘴里一边舐咂，一边和旁边一位愁眉苦脸的太太说：

“娘，这毛栗比家门口买的甜，你吃吃看。”

那太太苦笑了，和对面另一位太太说：

“我们这姑娘，一点不懂世故呀。别个心肝都飞在半天里；她呀，她一点都不愁，快乐的很：一路上要下轿子摘毛栗。”

“十几了？——她们在学堂里的，就是这样子。也是呀，这样世道，也乐得开达点。愁愁，急急，有什么用？你说吧，东西一点都带不出，一个大宅子，交给一个用人去照管。想不得，太太，想不得。依我，我不逃，就是死，死在家里也安快点。那是数。”

“我也是这么说呀。她爸爸死命要我们走。我说，我走做什么？要么，你带她避一避，我看家。我一个老人家，我怕什么？我不怕。土匪也是人呀。”

“你们是到哪里？”

“那有地方去？先是说到外埠去。那里来的那笔盘川？现在就只好到她奶妈家里去，在水竹山。你呢？”

“是我的一个表妹家。风声一紧，表妹就传口信要接我去。我“哎呀，圣公会余师母也来了。”那小姐嚷着，丢了脚下的毛栗团子迎上去。

北路上来了两顶轿子。前一顶轿门上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国旗，迎着风不住飘拂。轿子到了过亭里，里面跳下一位四十多岁的剪发太太，胸前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后面一顶轿子里跳下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先生。那小姐看见女先生，亲热地跳过去，喊了：

“哎呀，刘先生！”

“宝珍么！”那女先生牵了她的手。

“那边怎样了，余师母？”一位太太站起来问。

“还是扎在青枫渡，拼在那里。是临走的时候听我们会长说的。太太，这一下，北乡的人民可遭难了！”

“可是呢！早晓得他们不肯罢休，就一块两块地凑个五万给他们也罢了。不晓得这边可抵得住呢！可真要死！”

“走了好，太太。我们会长说，这边自卫团不行呢！打了电话给省里，省里又不理。”

“要真不行的话……”

另外有位始终没说话的太太这时无声地嚼位起来，用手帕蒙着眼，不住的擤鼻涕。旁边有个少年男子在给她拍着背，劝她喝口茶。几位太太也都伤起心来，红了眼睛叹气。

“余师母，你们到哪里？”那小姐问。

余师母正要答话，一个梳西装头的男仆，走到她跟前，瞪着眼睛，低低地在她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余师母顿时脸上改了颜色，走向那女先生跟前来。

那女先生用手帕蒙着鼻子和嘴巴，眼睛厌恶地皱着，瞥着那些肮脏的稿草堆，站在那里一口一口吐着唾沫。

“是些逃荒的弄的，真肮脏。”一个茅铺的板奶奶很抱歉地说，“自卫团撵了多次，也撵不走。白天呢，大家到山上躲起来，就在山上弄点野食吃；到晚上就又回这里睡。”

“刘先生，我和你说话。”余师母喊道。

余师母和那女先生咕噜了一会儿。女先生脸上也现出慌乱的样子，招呼那正拿了碗要泡茶的板奶奶说：

“不要泡茶了。”一边喊轿夫：“我们走嘞，就走嘞。”

那男仆也接应着催轿子快走。那小姐站在那女先生跟前，觉得莫名其妙，仰着脸，眨着怀疑的眼睛问：

“刘先生，什么？”

“前一响，”那女先生低声说，“前一响，——你们也走罢。你叫你妈跟我们走，不要在这地方多坐了。”

那边余师母和那太太也咕啷了几句。那太太顿时从凳旁站起来，把桌上的钱袋一把握到手里，一边惊骇的样子说：

“是的么？是的么？就是这里的事么？就是这里的事么？”

“离这里三里路，叫西昆山，一个地藏王庵。”那男仆说。

说着话，大家都站起来要走了。另一位太太的轿子落在最后，她就很急乱的向前面喊：

“余师母，等我一起吧，等我一起吧，等我一起吧。我沾沾你的光，你有那外国旗。”

余师母已经坐上轿子，嘴里一边高兴地应诺着，一边招呼那男仆把轿门前的那幅美国旗子张一张好。

“余师母，你的轿子打前走，我们的跟在后面。”一位太太高声地嚷着。

“是呵，是呵。”余师母答。

一霎时，轿子，担子都走完了。这里依旧是一个冷落敝败的樊家辅。

几个板奶奶在桌上收拾着茶碗和茶钱。有一个手里抱小孩子的，望望北路上，和另一位说：

“算是土匪闹一闹，我们沾光出点小生意。”

“什么生意呀，就只有早上一番。太阳一过那棵柱子，就再没有人来了。昨天也是这样的。”

这板奶奶说着话，看见南头过亭里走进一位矮胖的老婆婆来。那板奶奶兴会地招呼道：

“怎么样了，亲家婆？线子没出来作生意呢。”说着，向右边掩着的板门里努一努嘴。

“这可叫我怎么办呢！”那老婆婆皱着眉头说，“开先七爷说的是随便凑几块。掩说得过去，不要紧。前天线子到我那里去，又说风紧了，衙里要赶快办，办得很严，差不多就是没手脚做了。既是没手脚做，那也，那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听说头班里要个囫囵数呀？”

“可是说天话！到那里去弄这笔钱？线子还和我红眉毛绿眼睛的，只当我有钱，当我百万豪富。要死嘞！我作了知县？我肉里出钱？她们自己无法无天，昧了天良闹出这场事，你叫我有什么法子想？赵老爷又全家到上海去了，要不然，我就和她去求求赵老爷。现在可叫我怎么办？——你晓得怎么的？前天线子到我那里去，就用话压我胸口。她说的好：说小狗子的命现在就捏在我手心里，我要他死就死，活就活。这话怎么说呀，板奶奶？我叫他去抢人家？我指使他去杀人？我真的要活活给他们气死了！”

“没法呀，亲家婆，他们也实在太恩爱。”

“恩爱！这样的女婿，真把我的脸都丢完嘞！不是我说狠心肝话，就是

真的平平安安出来了，这个女婿我也不能认：肉臭同味呀。”

“哼！”那板奶奶红了脸，冷笑着说，“现在的世界就都这样子，像狗子宫的人也多。”

老婆婆莫名其妙，不知就里，继续说：

“依我说，依我说，你自己年纪也不老，你也不必老虎守着个石狮子……”

那板奶奶掉头自管拿着茶碗进去了。老婆婆话没说的完，扭一扭嘴唇，也不望下说了；拿起拐杖，出了过亭，向北路上走去。

“亲家婆，”那抱小孩的板奶奶喊道，“不进去看看她了？多天没吃东西了。”

老婆婆听到喊，回过头来，说：

“不进去了。我到城里还有点小事，回头再来。”

“城里的风声好紧了呢！打前天起，这里过去的逃反的就已经几百人。今天最多：从天亮起，一批一批过了七八十起。——听说离城只有三十多里了。”

“是的么！”那老婆婆的脸子顿时愁苦起来，呆了半晌，忽然很快地迈开脚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口里一边说：“那我赶快去，赶快去。”

“亲家婆，光景不去的好罢？”

老婆婆已经听不见。

刚才进屋去的那板奶奶这时又走出来了，撇着嘴说：

“你喊她作什么呀，你这么关心她，她听你的话么！”

“什么事就这样要紧，放着在难中的女儿也不进去望一望？”

“她今天摇会。五十块洋钱，可比女儿女婿要紧？”

“哦，今天九月十五呢！难怪这样急。”

“可是呢！”

“要是得了会，不晓得可肯借给线子用一用？”

“屁！你刚才没听见她的话：说这样女婿死了倒好。说就是放出来了，她也不能认。说线子该改嫁。女婿还没死，就叫女儿改嫁！一个马泊六么，是娘！”吐了口唾沫在地上。

那板奶奶说着话，过亭顶上飘下一片桂花树的黄叶，咕噜噜打着回旋，落到她颈子上；板奶奶吓了一跳，只当是条毛毛虫，赶快用手去捉摸；摸着了看看是片黄叶；就把那黄叶放在嘴唇里含弄着。她急于要把许多话去告诉线子嫂，从那个掩着的门上的缝里张了一张，推门进去了。

太阳快落西山了。过亭上面的桂花树涂满了淡黄色的夕阳。好像那凋枯的桂花树又重新开放着满树花朵了。

北路上慌慌张张步行来的人，过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背上驮着包袱，有的手里提一只藤篮，有的拖着孩子，有的挑着一担箩筐，——箩筐里除包袱东西而外，一头坐着一个样子傻傻的小孩，手里拿着一块炒米糖什么的吃着。

他们一批一批地打过亭里走过，慌慌张张向南路而去，并不停留。

其中有个老婆婆，拄着拐杖，走进过亭，抬头看看西山头上的夕阳。夕阳已变成淡红的颜色，衬托着几抹橙黄的紫红的晚霞，十分鲜艳悦目。几只青自在打天空飞过，悠闲地叫了两声，没入山峦的暮霭里，看不见了。

老婆婆踌躇了一会儿，喘了一会儿气，用手按一按额上的包头，走到掩着门的茅铺前，推开门，进去了。

屋里是一团漆黑，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手掌。

“线子，线子！”

没回答。

“线子，线子！”

“唔。”板房里的声音。

“娘来看你了。七爷来了吗？”

“哼！”板房里答。

“吃了点什么吗？娘不放心，娘特意来看看你。”说着摸进板房。

“哼？你来看我！”

“原是呀，我从城里来，我去打听打听狗子——”

“哼！恭喜你拿到会钱了。”

“莫提会吧，我真要急死了。”

“哼！”

“晓得吗？不好了：自卫团退了，——退了二十里。自卫团胆子小，见不得真场面。城里的人逃光了，知县也逃了。谈得上未会钱？白送了，娘是白送了，线子。”

床上冷笑了一声。

“要是土匪真进了城呢，线子，你莫愁：一进城总是先破监，我们小狗子就有救了！”

“哼！”

“就怕就怕就怕——线子，线子！”

“唔。”

“就怕——我听人说，就怕自卫团退到城里守住了，一时打不开”。

“那还不好？哼！”

“我怕你大哥，你大哥——”觉得说不出口，叹了一口气。停了很久，问：“有油灯吗？”

老婆婆得不到回答，默坐了一会儿，深深吐了几口气；站起来，摸到灶沿前，摸到水缸的拐角里，摸到前回放的那几支神烛；拿了一支，重新走到板房里。

“洋火在那里？”

还是没声音。

“在枕头底下吗？”

老婆婆说着走到床前，摸到满是泪水的潮腻腻的草枕，摸到枕头旁边，摸到了洋火。她擦着一根洋火，点亮了那神烛。看见女儿侧身睡在板床上，面向着里墙。她把洋火放还那枕头边。

“天晚了。娘要在这里睡一夜，明天再打听。”停了好一会：“娘现在不行了。没走上几里路，浑身骨头都痛了：——娘在那里睡呀，线子？”

说着话，望着手里拿着的那红通通的神烛。烛头上流下一滴烛油，流到手指上。

“你的烛台呢？线子？”把手指在凳边上擦了一擦：“在板厨里吗？”

说着，就到靠墙的板厨里去寻找。上展寻了，没有；在下展的拐角里寻着了。她把那对送嫁的小小锡烛台拿出一只，关上厨门，把铁签上裹着的残剩的烛蒂剥掉了，插上那支神烛，放到板桌上。

她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用手按一按额上的包头，疲乏地又伸了一口长气。

站起来，重新开了那板厨，在上展抱出一床被褥，放到空着的小竹床上，铺好了，脱去衣裳，吹灭了烛，睡了下去。

不一会，这胖婆婆就呼呼地睡着了。

线子嫂在床上躺着，听着娘的鼾声，脑子里昏沉沉地发痛。她麻乱地想着一些事，半似梦寐，半似清醒。她清楚地看见小狗子的脸在眼面前，看见他的赤着的粗壮的上半身。她看见他穿了自己的竹布褂，在后坦上扮唱各种动人的花鼓戏；看见他在田里佝偻着背脊工作，一边哼着花鼓腔。她看见他愁苦着脸从东家来，从城里来；看见他脸上抹了烟煤，牙齿上流着血。她看见王七爷尴尬的神气。她起着白天隔壁三板奶奶告诉的娘说的那些个话。她看见知县的狠毒的胖脸，看见小狗子血污狼藉的尸身。

她转侧了许久，重新又想起那些翻来覆去已经想了千万遍的种种事。

娘的浓沉的鼾声连续不断地传入耳里，她觉得心内如火烧着了似地发烦。她翻了一身，向南墙上一个瓮口窗子望一望。窗外映着一片皎白的月光。

她慢慢坐了起来，觉得头脑昏沉欲坠；用两手捧着，闭着眼睛停息了一会，摸着枕边的洋火，点起那板桌上的神烛。

娘蜷缩着肢体，像一只大兔子似的睡在竹床上，双手伸出被外，捧住额上的包头，嘴脸埋在臂下。

突然一个念头跳进了线子嫂的心里。她以一种探求一个秘密，揭发一件阴私和侮弄一个讨厌的动物似的心情，拿了烛台，蹑手蹑脚地走近娘身边。

在娘身上覆着的衣裳荷包里摸了一会，摸出一块污秽的手帕和一把钥匙；她失望地把东西放还荷包里。她看见娘双手捧着的额上的包头。

她轻轻移开娘的一只手。娘稍稍扭动了一下。她再轻轻摸了摸那包头；在几层折叠的绸子下面，觉触到一沿脆硬的纸票。

她心里跳了几下，一股不可掩息的忿怒从心尖直冲上来；咬着牙，捏住那包头使劲一掀；不曾掀得下来。娘却惊醒了；急剧地抓住她的手，直着喉咙嚷起来：

“哦呵！哦呵！包头，包头！抢我的包头！”

嚷着，就像条鱼似的跌跳着，双手抓住线子嫂的手乱抖；抖得女儿手里烛台上的烛油溅满了脸上，身上，被上。娘死命抓着，只是不放；线子嫂向后一挣，那支神烛从锡台上震落到地上。

房里顿时黑了。南墙上的瓮口窗上一片月色，映衬着线子嫂手里不住抖动的烛台。她看见烛台头上的那根尖尖拔拔的铁签。——说时迟，那时快，她倒过那烛台，对着娘头上猛力一阵乱扎。

娘尖叫了两声，倒在床边，没响动了。

线子嫂手里抓着那包头，呆了半晌，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她模糊恍惚地看见落在脚边的那支半明不灭的神烛。她抬起那神烛，点着了板床被褥下面的垫草，点着了帐子和被单，……急促喘动着，把包头紧紧卷在手背上，拉开板门，跑出茅铺。

外面光明如昼。过亭下翻着乱稿草，逃荒的乞丐们一个都不在，他们涌进城里去了。线子嫂像被什么推送着似的，两腿不知那里来的劲，不由自己地向北路上飞跑而去。

刚刚跑近那山坡，迎头有个剃着秃头的汉子一把拉住了自己。

“望那里跑呀，线子？”是熟稔的声音。

线子嫂眨着疯狂的眼睛。向那汉子脸上望了一下：那是一张熟稔的清秀

脸子。

“你你你，啊！是你么！城真的……”她喘着，觉得腿下一软，身体摇晃着，恍惚是在梦里。

樊家铺响起一片急乱的锣声，茅铺上探出的火舌已经舐着那棵高大的桂花树了。

一九三四、三、十九

（原载 1934 年 4 月《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女人

这个女人二十来岁，扁扁的嘴巴，扁扁的鼻子。手粗，眼粗，身腰粗。她轻轻地推开门，蹑手蹑脚走进来，说：

“太太，我想我想我想……”说的时候两只粗大的手互相紧握，扭捏着；圆而大的眼睛望下沉，盯着她自己的脚尖。——那脚趾头也在扭动着，是赤脚。

她这忸怩的神气好像是用功夫做作出来的：她的形状很不宜于用这个方法来说话，来表情。

太太和她年岁不相上下，但看来比她年轻得多。两个人摆在一起，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一个粗糙，笨钝，象一件刚出土的二三千年前的瓦器；一个精巧，聪明，像一只光彩美丽的电木玩意儿什么的。她站在太太跟前，只是一只粗劣的人坯子，一只没修改润饰，没打蜡上油的人坯子。

太太刚才因为先生看了电影，没曾约自己；又想到昨天晚上做了许多菜，等先生回来吃，等到八点先生才回来，先生说吃过了；“吃过了，早就不能告诉我！”气得太太楞了一夜肚子。于是和先生吵起来。先生有他自己的理由，不肯认错；也不肯拍拍肩膀，贴贴腮巴，哄哄她。因之太太越想越生气。

“我晓得你心里早没我！”两颗眼泪流下来，就伏到床上去抽咽。

先生捧着一本书楞了一会，戴上帽子笃笃笃地出去了。

太太一个人在床上躺着，觉得没有趣味；枕头上弄得潮腻腻的，腮巴贴在上面有点冷，就坐起来，拉开五展柜，把里面乱七八糟堆着的各色各样丝袜拿出来整理着。

理着理着，看见这个女人推门走进来，忸怩得那个滑稽的样子。

太太一看见这个女人心里就想笑，觉得“顶有趣的。”（一个礼拜前这女人由荐头行送来，先生问怎么样，太太说：“看那傻样子顶有趣的。”于是就留下了。）现在，太太虽然刚拭干眼泪，肚里还憋着气；可是她觉得很闷，很无聊赖，她愿意有个人和她说说话。她掉过头，耐心地问：

“你想什么？你说不要紧。”

“我想太太给我看封信。”

“可以的。”太太很骄傲很尊贵地点点头。

那女人拂开衣角，在腰上掏了一会，掏出一封没封口的，已经皱折得不成样子的信，忸怩地递给太太。那信上说：

内人见字之悉。启者。无别。所汝生气离家。不觉已去两月。音信不见。是何道理。前在城中。所人说汝今在南京。为此特托人带信奉。嘱汝务要回信。所翁姑之言。皆不必听。且小炭子无人吃奶。家下深未锦念。望速寄钱代下。以就燃眉之即。即即之要。对于翁姑之言。目令稍未甚好。明年汝务要反家察秧。必然不可打骂。望请知照。即即之要。所我气中之言。皆谓宽慰。不在言中。即即之要。统此不令。并请坤安。

良人汪得贵上言。刀七再启者。无别。所如回信。即交鸿胜先千万可也。即即之要。

太太把信仔细看了两遍，撇着嘴笑了一笑，说：

“唔。是你丈夫来的信。”

那女人想说点什么，把头抬起来，却又重复低下，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脚趾头动了两动，到底没说出什么来。太太接着说：

“你丈夫说，他和你吵了嘴，他很懊悔。叫你明年回家去插秧。他不再骂你。你公公婆婆也不再打你骂你。说小炭子没奶吃，叫你赶紧寄钱回去。……”

太太把信上的话说了一次，又说一次。说着，注意那女人的动作和表情。那女人颈子红红的，渐渐红到腮巴上，红到耳朵根。

“捣妹——”咬住了，恨恨的再爆出两个字：“死鬼！”

一下子的功夫，她刚才那种忸怩的样子一点都没有了。

太太觉得顶有意思的，笑了。打着一种和小孩子说话似的口调说：

“哦，你原来是吵嘴逃出来的？你胆子可不小！你怎样逃出来的？你家在哪里？你说点给我听听看。”

那女人把手扭了两扭，又稍稍忸怩一下。嗫嚅着说：

“我是黑非，黑非。我家里种田，种稻子。两个老不死天天打我，骂我。那年水荒，说我带来的；今年不下雨，又说又说我带来的。我带来的，我也不是存心带来的。好比，可真的我带来的？好比，那捣妹的死鬼也夹在当中骂。我插秧，我耘草，好比那小鬼的，好比那小炭子的，还在背上哭呀哭的。六月里哭呀哭的，好比我车水，车到晚上，汗水臭哄哄的。露水下来。那小鬼哭呀哭的，哭到天迷迷子亮，就发烧。把我背上捱得一背子痲子。就说我把痲子——把小炭子弄得病痛痛的。拿锄头把敲我腿直骨。就敲，就敲我，就敲我。——”咕嘟咕嘟咽了两口唾沫。

太太看她说得那种急样子：唾沫咽了一口又一口，头一点一点的，身肢一晃一晃的。太太忍住了笑，扮做很惊讶的神气，说：

“哦！打你？虐待你？岂有此理！——你慢慢地说，唔。”

“捣妹的，我不过吃了你家三碗——三碗锅巴饭！捣妹的！我想想，我就气不过。就气不过。就——就——就气不过！我把我娘给的一根簪卖把红毛鸡，贩银子的，做银子生意的。红毛鸡是个老头子喂，老头子。我跟红毛鸡走。红毛鸡不肯带我。我晓得他到上海。我死乞白赖跟他走。一走走到南京。我用了一吊三百钱。我就我就到行里。三丁子，新嫂子，二嫂子，富头的妈，都都在行里。都不种田了喂，都进行了喂。……”

“都是你们村上熟人？”

点点头。

“真好胆子！”太太松了松腰，赞叹着。

“那鬼老头子，红毛鸡，还拿话吓唬我喂！吓得心里本东本东跳。那鬼老头子说，南京上海有洋鬼子捉人挖眼睛，有洋鬼子，说。还说飞鸡摔弹子，说。还说，还说，出来了，只好当叫化，说。还说，还说，说。——捣妹子才不怕！不吃那口气饭！自己做，自己吃，捣妹子才不怕！”

“那你的孩子你不管了？小炭子？”太太不知几时有点感触，态度骤然正经起来；关切地问。

那女人不说话，看看自己的脚巴鸭子动了两动。半晌，才说：

“我问太太借两块钱。我托太太写封信。”

“钱倒可以预支给你，没问题。可是你的信不好寄呢。信上说寄到鸿胜先，什么东西呢？是个人，是家店？又在什么地方呢？”

那女人把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望到窗子外边的天，说：

“怕是在城里：是家店，是家茶馆。姓鸿的开的。”

“那有个姓鸿的呢？没这个姓。”

“捣妹子也不写清楚！”

“是你丈夫写的吗？”

“那捣妹子写得出信！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识！——我去问问二嫂子。”
就卜秃卜秃出去了。

太太深深吐了一口气。回头看见那枕上潮湿了的一块，她就觉得自己腮上火辣辣的。她不再“觉得这女人顶有趣的”。她佩服这个女人，她羡慕她。但是对于她自己，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想着。……

一九三五年

（原载 1935 年 1 月《太白》第 1 卷 8 期）

某日

阴历九月初的天气，晌午的太阳晒在身上也已经不觉得热。天是深蓝色的；上面满布着稀薄的，鱼鳞似的白云。有些不知名的小鸟，在那云里回想着，飞得极高极高，看去只是一个一个的黑色小点。风从远处吹过来，田塍上的野草和快要枯萎的扁豆藤叶直挺挺地一阵摇曳，那些正在叫着的金铃子和其他的昆虫都被吓住；有些不怕吓的，仍然叫着，声音微弱地发抖，零零落落的。

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割了。有几丘还留着灰黄色稻根，浸在浅浅的泥水里。但多数的都已犁过，泥板翻得松松的，正打算栽种萝卜和白菜。贴村子这一边，田塍上整齐地排列着桑树和乌柏树。那种乌柏树，比桑树要多好几倍，小小的鸡心形的薄叶下面，结满累累果实。风吹着，那些已经绽出了黑壳的白油油的果肉跟着短枝不住跳动，好像它们已经等得不耐烦，招呼主人尽先来戳采。它们要到油坊里去。

主人大毛正爬在一棵高大的乌柏树上，双手握着一根竹竿，竿头扎着月牙戳刀，聚精会神地在戳着那结有果实的短枝。他的背紧靠着树干，两脚使劲蹬住枝丫，累得满身渍着汗。太阳光透过疏薄的叶隙映在他脸上，使他的眼睛紧紧皱着。

他不过三十多岁，长方形的脸壳，高高的鼻梁和颧骨，神情那样的抑郁，动作那样的迟缓，一种严肃与寂寞的气氛笼罩着，显得和他的年纪，和这个明爽的天气，都十分不相称。

紧靠田贩跟前，一座低矮的瓦屋蹲着。那是三间敞旧了的简陋瓦屋。屋上的瓦有些被风雹打碎，弄了些芦席横七竖八地盖着，上面压着石头。墙壁也已破旧不堪，檐水淋得满处黑色痕迹，暗绿色的霉苔滋长着；有几处挺出了肚子，看去就要崩溃下来的样子。

门口一方晒稻场，黄豆秆和高粱秆堆得高过屋顶。几棵高大的桑树，满身叠积着稿草，臃肿得像些大胖子。大毛的姑妈，一个身高体健的老婆婆，坐在篱笆下一块麻石上，低着头，在用锡箔折着元宝纸锭。旁边蹲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一身肮脏的毛边白衣，白布孝鞋已经变成灰黑颜色；瞪着眼睛，对老婆婆的折动的手指好奇地呆看着。

“你乖乖，小牙子！”老婆婆用一种熟练的手法折着锡箔纸，一边亲热爱惜地哄着那孩子说，“你不要动手。这个动不得。后天你妈妈满七，你爸爸带你到她坟上去。小牙子拜拜，爸爸烧元宝。爸爸给小牙子脱身上白衣。妈妈在地下保佑你日长夜大的。大了，讨媳妇，做个好汉：耕田不用牛，一肩挑八百斤。”

小牙子歪着头，似懂不懂的听着。鼻涕慢慢顺着两条旧路流到嘴沿上。他举起袖口抹了一下，那带着横蛮劲儿的腮上立即画了一条黑印。

“我要！”他瞪着白黑不大清楚的眼珠，强蛮地说，“给一个小牙子，玩玩。”

“你乖乖，你乖乖。小牙子听姑奶奶的话，姑奶奶疼小牙子。你不要学你妈妈那个脾气。那不好的。你妈妈那个脾气，气苦了你爸爸半生子。那不好的。小牙子乖。小牙子不学妈。小牙子听话，小牙子好。小牙子不动元宝。”

她慌手慌脚地把身边装着纸锭的蔑篮摆到背后去，伸手拉小牙子到她的两膝之间，替他擤了一把鼻涕，拍着他。孩子给弄驯服了，抬起头，望着天

上那些回旋地飞着的黑色小点子。望了一会说：

“妈妈，呃个，呃个——大肚子，死了！”

“是哩！是哩！妈养弟弟，没养下来就死下！——妈死了，小牙子可伤心？小牙子心肝里可想她？”

摇摇头。

“不想她？妈不疼小牙子？”

“妈妈，打我。妈妈，吃——呃个——花生米，在床上；哭，扭爸爸头发；哭，骂他，好凶。呃个，呃个——哭，不起来，在床上。”

“哦，妈妈坏。是哩！是哩！——天天吃花生米？不给小牙子吃？天天和爸爸吵闹？不给安静日子人家过？这么个怪妈妈！好吃懒做的货，不是好人家姑娘！——小牙子脾气要好好地，要听话，不要学你那个妈。晓得不晓得？”

孩子不回答，转过身肢，远远望着爬在树上用心戳着乌柏果的爸爸。那树不住晃动着，短的枝丫连同累累的果实一朵朵地向田里掉落。他看得见爸爸半边瘦削的脸，眼睛皱着；裤筒卷得高高的，露着一大段黑大腿。

风在田野里回荡着，野花，泥土和草根的香味搀混着一点肥料的腐臭，到处淡淡地散布着。

肥料是堆在当着大路的茅房跟前，一些猪屎牛粪和垃圾。有只猪在那旁边躺着，懒懒地沉着眼睛，鼻子向前一掬一掬的。四五只鸡在拨着垃圾，找寻食料。

忽然那些鸡惊了一下，茅房后面，从大路上转出一个人，挑着一担空蔑箩，一晃一荡地走过来。

“梅花哥，”老婆婆说，“你真快，你一去一来四五里路，我只折了八个元宝。”

梅花脚笑着，黝黄的阔脸上划满又深又粗的皱纹，两片嘴唇，笑得露出了龈肉。他把空箩担子放到地上，用蓝布披肩抹着额，对田塍那边说：

“大毛官，刚才这一担六十七斤，连昨天的一共挑去一百七十二斤了。你记着。我是个石板心肝箠篮肚，我记不牢。——姑奶奶，你老人家也记着点。”

“今天油坊里那个掌秤？”大毛在树上懒懒地问。

“是聚宝先生，管事的。我还有句话告诉你：你那个宝贝丈人回来了。管事的说的，他昨天在镇上看见他。”

大毛停住手里的戳刀，心里扭起一个疙瘩；两朵粗眉毛跳了几下，随即紧紧锁到一起。他对着天空嘘了口气，十分厌恶地说：

“叫他不要回来！”

这样冷冷地说了，很快地掉过头去，继续戳着果子。

姑妈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可有点镇静不住；站起来，像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似的，非常关切地问着说：

“是的吗？是的吗？这一向不在家，弄得可成点器了？还抽大烟吗？他姑娘不在了，他晓得不晓得？”

“成什么器呢？那样一块料！”梅花脚蹲到地上，抽着旱烟说，“大烟怎么会不抽！管事的就是在烟灯上碰见他的。这一向，他就赖在他叔舅店里吃混饭。不知道又闹了个什么‘屁漏’，叔舅把他撵出来了。”

“毛头，”姑妈沉思了一会，提着干巴巴的嗓子喊着说，“我说今天你

去看看他。是好是歹总是你丈人。也算去报个信。只许他错，你错不得！——梅花哥，你想想我这个话？”

“姑奶奶这话是的。那是个疙瘩，不好惹。”

“可是呢！他姑娘死的时候，毛头没处去报信。我说，你到方三先生那里报个信，他是他本家，又是媒人；当初这个亲就是他一手包做的。毛头去报了信，放了轿子过去，请他过来看殓。他不来！他说姑娘家里没有人，他不管这个事。——这话里就有话，这就是个漏窟洞。——毛头！这不是你蛮的事！你今天就去一趟。”

大毛沉着脸，只管咬着嘴唇，更起劲地戳着果子，一口也不开。戳了一口气，看看这棵树上已经光了；跳下了树，向另外一棵走去，回过头来说：

“要去，过几天去。今天哪里有空？”

姑妈正要说话，回过脸来，看见小牙子不知几时抓了两个纸锭在手里，瞪着眼珠正在拆看。她急得连忙走回去，慌手慌脚地要夺它下来：

“对你说的，不能动，不能动。你这孩子不听话！”

孩子是个“顺毛狸”，顺着抚摩，驯服的很；摸倒了毛，立刻就要咬人的。——两个纸锭给扭得变成瘪塌饼，也没法夺得下手。那横蛮的小脸子气得发了黄，两颗白黑不大清楚的眼珠挺直着；瞪了一会，伸手又到箢篮里抓了一把。

“你这个孩子，唉！唉！”

大毛看到这边的争执，一步步地走了过来，直走到儿子跟前，站住了，用他两只愤郁的眼睛盯着儿子那个小小横蛮脸。

从这个脸上，他重新看见了他死去的那副凶脸子。那是一张扁扁的圆脸，一只瞎眼眶里突出着一团乌白色的肉球，像那乌柏果子；另一只睁得那么大，泛着火红色。“你嫌他？你把他处了死呐！”那尖溜溜的声音像一根根钢针，直望他耳朵里捣进去！

“放下来！”他喝着。

孩子和妈妈一样，向来是看不起爸爸的。他不大理睬他，他觉得这是个可欺辱的人，他没权力管自己。有时爸爸说：“看你那鼻涕，挂得那么长！”妈妈立刻从房里闯出来：“你难容他？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蠢相！狗肉不上秤的货，你配！”于是爸爸气得嘴唇一抖一抖的，在屋里转一个圈子，一口不开地走了出去。有时妈妈没在跟前，孩子就会歪起了脖子，说：“我告诉妈去！”只有当妈妈的脾气发到孩子自己头上，捺他在小凳上，咬着牙齿，拳头指头在他身上乱擂乱扭的时候，他才记得哭喊起爸爸来。可是爸爸只远远望着，气得嘴唇一抖一抖的，在屋里转一个圈子，拿把锄头走了出去。自从妈妈死了以后，他才开始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爸爸。在不知不觉中，他渐渐有点爱他，亲热他，尊重他。但是现在，他忘记了，他回复到一个多月以前的老样子。他在小小的脑子里搜寻着，要寻出一句骂人的话，来骂面前这个盯着他的人。

“卖鸡的！”他扔去了手里一团扭破的纸锭，恶狠狠地歪着脸。

“咳，这孩子！”姑妈吃惊地叫起来。

大毛眼睛里冒出一股热气，高的鼻梁连同嘴唇抖动几下，扔开手里的戳刀，拖了儿子往屋里走。儿子放开了泼辣响亮的喉咙号哭起来，赖在地上一阵扭跌；终于被拦腰横着抱住，手打脚踢着，张开嘴巴乱咬着，直被抱向屋里去。

“关到猪笼里去！”

“不要吓了他的魂嘛！”姑妈慌张了一会，迈开强健的步子跟在后面说。

“姑奶奶，”梅花脚摇摇手，笑着，“你老人家由他去。从小在娘跟前看惯了的，一点不怕他。也应当给他管管了。”

“不是呢，年纪究竟小，又是刚没了娘。”这样说着，到底迟疑地站住了；把地上几个扭瘪的纸锭拾起来，坐回麻石上，放在膝盖上珍惜地慢慢摊着，一边咕噜着：“好贵的锡箔！还是从油坊里赊得来的。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窟洞。”

“眼前好多了，姑奶奶。娘在的时候那样子，嗨！都是从小看惯学惯的嘛。”

姑妈继续折着纸锭，关心地倾听着屋子里。小牙子的哭声渐渐低下去了，只听见大毛在嚷着。

“只服拿钢鞭的，不服拿云帚的，真是怪东西！”

“我说呀，姑奶奶，”梅花脚把烟蒂敲在地上，装上第二管烟，连忙笼上那烟蒂，吸着说，“大毛的伯伯一生没做错事，只有结这头亲，直错到东洋大海里！”

“可不是吗！当初我劝他，我说：你是个麻雀，你不要想跟着凤凰飞。我们这样人家的媳妇，得是能吃苦能做事的。你不要害了我们毛头。人家是举人老爷的后代，豆腐翻了，架子没有倒。我们都是他家从前佃户。那个时候，他家的丫头也嫁不到我们这种人家来。一个姑娘，那里会看得惯，过得来？”

“什么举人老爷的后代！人家一个不成材的瞎姑娘，从小没家教，赌博窝里长大的，年纪到了，嫁不出去，就胡乱塞给了他！”

“我老二是个老实可怜的人。他当初那里不知道这些情由？他在镇上，亲眼看见姑娘叼着纸烟，在街心上指手划脚和人家吵骂。回来说，姑娘坏了一只眼呢，倒是小事；只是那种放浪样子，唔，真不像个大户人家姑娘！一连摇了二十多个头，长气叹得屋都动。——你不知道呢。方三先生是个天上的九头鸟，知县老爷也要让他三分。他出面要做这个媒，我老二敢回个‘不’字？是口屎也只好硬起颈子吞下去！人家又还拿甜头引着他，口口声声说是团箕大的面子抬举他，说要替我们祖上增光彩，说让我们家也有个大户人家撑撑腰。我老二是个老实人，祖上留下这几亩田，这家偷堰水，那家挖界牌，他真的想沾他点光！——花了一百块钱礼金，买来这个大疔疮！就沾了这么个好光！”

“听说大数目方老三上了腰，做老子的只落了二十？”

“可是呢！不然他为什么要压人家做这头亲！老子究竟是个脓包货，给方三先生装在荷包里的货！”

“一个五殿阎王现在也落了水了！那天我挑黄豆到镇上，他师娘满街邀人打麻将，拿彩头。了不得的大老，做这种事！这可连门面都不要了，姑奶奶？”

“是的哩！大毛从他老子手里种了方三先生十三亩八分田，这三年光景，卖去了十一亩。留下的二亩几分，今年送租去，也押掉了；租稻给押主扣去抵算利息了！他那样的人家，怎么会有长久日子过？那几年，他是红运当头，讼师做得叮咚的响；现在这样年头，大家都打不起官司了；知县换了，也不买他帐了。那种红呵呵的日子再到那里寻去？做做鹅，就做不来鸭。他和

他师娘还是一人一杆枪，加上那个小娘，三口子呜嘟嘟成天对着吹。这样的年头，你想想看！”

“你老人家倒是本‘万宝全书’。”

梅花脚微微笑着，把旱烟袋插到腰带上，两个手掌搓了搓，在那满是皱纹的脸上使劲摸了一把，站起来，开始到田畈里去抱大毛戳下来的乌柏树的短枝。他一连抱了几捆放到晒稻场上，一枝枝的在箩边上攒着。

屋里没有声息了。那屋顶上横七竖八盖着芦席的地方冒出了青色的浓烟。

“毛头，你烧水吗？”

姑妈抬头望了望，把锡箔和篾篮拿起来，走到屋里去。

屋里绕着浓烟。

炉灶在右边房门口的墙壁下。墙拐里乱杂地堆着松毛和棍柴。近水缸的那里，一只煤油桶制的炉子——旁边开了两个洞，里面涂着黄泥——正在烧着熊熊烈火，上面摆着一把瓦壶。大毛坐在天井里一只矮脚凳上，双手捧着那高高的颧骨，眼睛呆看着自己的脚，直瞪瞪的。

姑妈牵起衣角擦着眼睛，在屋里满处扫寻着；只看不见小牙子在那里。她走过堂前，左边她住的一间板房，倒门着门。她在门缝里张了一张，看见板床上躺着那个横蛮的小孩子。

“睡着了。可怜罢了！”

她把门上拴着的草索解开来，走了进去。

瓦壶里开始吱吱地叫起来，冒着热气。大毛不作声地愣着，眼睛被烟熏得怪难受；他揉了揉，无心无绪地各处望望：上面的屋梁和阁板都泛着焦黑的颜色，蛛丝灰尘满处吊挂着。寮檐下面，倒挂着各种粮食的种子：高粱、玉米、稻子、黄豆和辣椒，都连着枯干了的叶和杆，大捆大捆的用稻草拴着；太阳从天井里斜照在上面，发出一种金黄的光彩，在青烟里面闪耀着。门拐那里堆着各种农具，锄头耘耙和镰镐，新制的和敝旧的夹混在一起，堵满了两边门角落。堂前是被大的斛桶，大的团箕和稻箩挤塞着；几张薄板台凳靠在一边。地上叠着数十个大而扁的癞子南瓜。这就是他自己的家：是敝旧而且简陋的，看来却这样的宁贴！这样的热闹！这情形，在他眼里是很有点疏隔了。六七年来，这一切都是被那尖溜的钢针似的声音代替着，都是被那突出的乌白色肉球的凶横的瞎眼代替着。

他不自禁地对着天窗吐了一口气，压在身上的有点什么似乎稍稍松动了一下。他站起来，到他自己住的板房里抓出一撮焦黑的锅巴末，掀开那瓦壶的跳动着的盖子，撒了进去。

“大妈，”他喊着他姑妈说，“你老人家不要心疼他，我早就要别别他。”

他一边说着，一边高声喊梅花脚，叫他进来歇歇，喝口茶。

梅花脚在外面和一个人说着话，他答应着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细眼睛，阔大的嘴巴，一件棉布掩襟褂子敞开着，露出结实黑油油的胸脯。

“毛官，小斗找我们换工，他后天种萝卜。”梅花脚笑着，露出上面一段暗红色的牙根。

“你乌柏几时戳得完，毛哥？”小斗鲁莽样子，用衣襟抹着胸口和颈项上的汗，一直闯到板桌上拿了个青花碗，自去炉子跟前倒茶喝。

“我昨天刚动手，没有三天不得完。这样吧：你去把野猫头喊的来。——

—你有事没有？”

“卯事！——今天斫了两担毛草，和野猫头一块去的。这货色今天给我打下了马。我的担子一百九十斤只差二斤，他一担半也不到。”他张开嘴巴喝了一口茶，烫了一跳，皱起眼睛胡乱咽下肚去：“啊哟！他娘的！”

“你喊他来，叫他带戳刀；你也带，我们四个人打个平伙。”

姑妈折着纸锭站到门上来，关心地说：

“毛头，这样一换工，你到几时才有空到你丈老子那里去？”

小斗尖着嘴巴吹着碗里，睁大了眼睛说：“那宝贝回来了？叫我，我不买他账！去年他串我买他发财票，扯呀拉的，害我花了两角钱，毛都没捞着一根！骗子！知道他给我的什么：红红绿绿的，擦屁眼多几个字！——反正人是不在了。毛哥，我劝你和他一刀两断，惹那个疔疮不如搓卵子！”

大家看着这爽快小伙子，笑着。姑妈说：

“你年纪轻，小哥哥。恨只恨在肚里，礼数总要到。姑娘不在了，信也不报给他，正好拿个话柄子。”

“毛哥不是和方老三报了信了？他不来，管我们卯相干！——那方老三，他娘的！老子肠子上打了个疙瘩在这里！他姓方的没一个好种！”

“怎么的？你什么事也恨他？”姑妈不懂地问。

“什么事？没好事。”

梅花脚从小斗手里接过茶碗喝了一口，笑着和姑奶奶说：

“这两年，方家一个公堂给方三先生抢到了手。他和野猫官种了公堂几亩田。方老三一上来，就加他们二十斤租；今年送租去，麻壳秕他不收；家里称的好好的秤，方老三一过手，一担要少十来斤。告诉你个笑话，姑奶奶：他和野猫官裤带上都打了结。”

“肠子上的疙瘩看不见，我在裤带上打了个！”小斗扮做正经样子，滑稽地说着；一边挺起了肚子，从腰里揪出一段蓝布带子，把那疙瘩结扬着摇了摇，一溜烟跳着出了门。

屋里的人正在笑着，忽然这阔嘴细眼的小伙子重新走了回来，向里面招了招手，喊道：

“毛哥，你家来了人。”

梅花脚和大毛站到门上张看：从茅房那边果然转出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到晒稻场上来。

那人手提一个白布包，穿着一件泛成黄色的破棉袍，西装头，青灰色的三角脸，一对惺忪浮肿的眼睛，黄胡子疏疏落落的，从下巴直连到耳朵根。他拖着步子晃到了门前，本来沉思着的脸子忽然拉开来，扮出了一个尴尬的怪笑。

“你们还好吗？”他眼睛盯着大毛，用一种含糊不清的鼻音问。

这是出乎大毛的意料之外的，这老实人瞪眼看着面前这黄鼠狼似的家伙，怔了许久说不出话。

“啊哟，亲家公！”姑妈从里面走出来，惊诧地喊了他一声。

亲家公干着喉咙咳嗽一下，鼻子哼了哼，走进屋子里。大家怀着鬼胎跟了进去，好奇地在旁边望着。大毛皱着眼皮，从板桌下面拖出一条凳子，让他坐，一口不开地站到一边去。对于这个人，他是素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同他

周旋的。

“今天刚听油坊里说，亲家公回了府。”姑妈倒了一杯茶敬在桌上，学着斯文样子这样说。于是告诉他，毛头就要去看他的，因为忙着戳乌柏，挂住了脚。

“我姑娘呢，出去了吗？我来望望她的。”亲家公把手里的礼物包望桌子上一放，低着头干咳一声，不等姑妈的话说完，就哼着鼻音这样尴尬地说了。

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神气，使得满屋子的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姑妈瞪着眼睛向大毛看了一下说：

“你老人家没听三老爷说吗？姑娘七月里不在了呢。”

“不在了！”两颗没有神彩的浮肿眼睛挺了挺，做了个十分惊讶的样子；但随即低下了头，像做戏似地捏起拳头在桌上敲了一下，带着哭声道：“死得不明白！死得不明白！”

大家都被这过于突兀的风波弄傻了。大毛睁大了眼睛，太阳穴上梗起一根筋，嘴唇连连抖颤着。半晌，他说了：

“这话怎么说，你老人家？照你说，是我谋死她的？”

丈人把女婿的话只当没曾听见，自管自哼着鼻音，哭巴巴地干嚷着，拳头在桌上乱敲着，把一碗茶震得泼满一桌子。

“你阿爸买了这包酥糖来给你吃，不想你不明不白地去了！唉唉，咳咳，你死得好作孽！唉唉！”

于是他站起来，连连眨着眼睛，那张青灰色的浮肿脸子皱做一起，疯狂了似地向空中嚷着说：

“苦命的，你阴魂不远！你是怎死的？你告诉你阿爸！你祖上十一顶纱帽护着你，你太祖爷爷‘恩科举人’的执事牌护着你！苦命的，你阿爸替你申雪这个屈！”

大声的嚷完这篇鬼话，回头拿了桌上的茶碗向天井里一掼，叮当的打得粉碎，屑片溅满了一屋子。

“拿我的人来！我问你家要人！不然不定！”他敲着桌子，疲乏地喘着粗气。

姑妈搓着手，一直慌张地望着他；这时才吐了一口气，叹着说：

“唉，真是哪里话！”

小斗和梅花脚站在大门上，起先互相挤着眼睛，迷迷地笑着，像在看一出最有趣的花鼓戏；到后来却笑不起来了，只用愤恨的眼睛关切地望着直挺挺站在那里的大毛。——他的嘴唇已经发了白，鼻子在开着扇，一张一张地翁动着。丈人这一套鄙丑不堪的把戏，以往在另外的各种方式中，他已领教过多次的。他心里压着一块沉重的东西，连呼吸也好像窒息着。他很想闯过去，在那个浮肿的丑脸上重重地打他两个耳刮子。但这只是一闪的一念，他的身子依旧直瞪瞪的楞着在那里。

小斗走过去，在大毛衣上扯了一把，阔嘴巴扭了一扭，愤愤地说：

“他就是敲你的钉锤，做得又不像。”

“你是什么人！”亲家公抬起了头，摆了个威风的架子；但那个鼻音却低弱得拿不起劲；他实在过分劳乏了！

“我叫黄小斗，你认认看。”食指点在自己鼻梁上，“去年求我买你的彩票，不记得了？和我装什么呢？我有钉锤给你敲！”

姑妈急得拉了小斗，把他推出门去：

“小哥哥，你去拿戳刀戳乌柏。”

回头望望亲家公。亲家公却并没动声色，照旧低着头，坐在那里疲乏地喘气。这使得姑奶奶安了点心。她迈着强健的步子，到房里拖了小牙子出来，推在亲家公身边，说：

“这是外公。小牙子，你喊，喊外公。”

小牙子惶惶着两粒发红的眼睛，傻傻地望望面前这个黄浮浮的怪人，又回过头瞟了爸爸一眼，用袖口在人中上抹了一下，不作声。

“亲家公，”姑奶奶退了两步，两手握在胸前，斯斯文文地说，“结亲如结义，有什么不周到的地处，你老人家高抬贵手，赦过了吧！当初总算你府上抬举，肯把姑娘给了我们这样庄稼人家。我们毛头是个老实人，成天搬着把锄头，礼数不到的地处有。姑娘是七月里坐月子。她平素脾气随便点，你老人家知道的。那自然也难怪。六月里镇上唱龙王戏，她一连去看了七夜。路又远，露水也大，金枝玉叶的人，又耽着肚子，可是呢。就这样，受了风寒，浑身发了肿。再加吃东西也忒乱点，又是油炸臭干，又是花生米；生冷呢，吃个不离嘴，临睡还要吃西瓜。睡就睡大门口的一张竹床，絮被也不肯垫一床。——到临月，手呀脚的都肿得发亮，一个脸肿成了灯笼。请油坊里聚宝先生来看，抓了药来她又不肯吃。脾气也还是点得着火，一不如意就发作。毛头一个拿锄头的人，年头又坏，那里有出豁：祖上传下十亩几分田，加上租田，收的不够花用的。说起来是个自己有田的庄稼，寅时吃了卯时粮，常时罐里闹得没一粒米。稻子不够油坊里的赊账。……姑娘金枝玉叶惯了的，毛头是老实人，供应不到的地处有。说什么呢，怪只怪他老子麻雀要跟凤凰飞！”姑奶奶说着说着，不知怎么渐渐捺不住气；随即伸了一口长气，镇定了下来，接着说：“姑娘七月十六日早上肚子痛，跑茅房跑个没遍数。我去接了喜娘来，还有梅花嫂，三个人照应的。说起来是二胎，还不如头胎老靠，只在竹床上绞索似的，脾气放得着火，说呀劝都不行。这样痛了三天三夜，产门总不开。房里挂了三张催生神，厨门，抽屉都打开，家里的青花碗摔完，又到油坊里赊来十八个，摔得满天井碗碴子。——产门总不开。到二十日，姑娘看看软弱了。我叫毛头去三老爷那里报信，三老爷不肯过来。姑娘是二十一日亮火时光不在的。当夜毛头放轿子去接三老爷。三老爷说他不管这个事。亲家公，我们庄稼人家，都是粗人，自从高攀了这头亲，吓煞怕煞的当过这些年，我们力量用尽了：水桶大的葫芦也只这点蒂，吊不住，没法子的事！”

梅花脚板着阔脸。等姑奶奶住了嘴，他把他的厚嘴唇包了一包，愤愤地说：

“毛官肩膀上几个头？敢谋死你家的姑娘！你亲家说得出这种话！你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村里镇个哪个不晓得：毛官钩着颈子当服她，粗气都不敢在她面上透一口啊！连姑奶奶这样的老人家都挨她脚拐子啊！毛官在她跟前像个丈夫吗，‘断头鬼’‘洋炮铳的鬼’给她唱了歌，一不如意就扭着他头发拼命：‘你们这些泥漠腿，犯上奶奶你家灶蚂蚁都要充军！’那是不怪的，什么人家姑娘？自然把我们这些泥漠腿看不入眼的！在先，毛官那不是当她公主娘娘供着？可奈日长月远，总有个压不住气的时候。——天天不给

人家好日子过，那个受得了？一倒了她的毛，她就刀呀索的拿出来吓人！毛官吃了老虎胆？敢触犯她一个字？我不过是个邻舍，和我没来由。只奈你亲家说出来的话，怎么安得上去？你到油坊里问问聚宝先生看！”

亲家公依旧呆呆地低头坐着，像睡着了的一般，对于他们的话，没一点反应。这和刚才那一套疯狂突兀的把戏比照起来，叫人绝不相信就是这同一个人做的。——这样一种奇怪的章法，使得大家都在纳罕着。

门外响了一阵脚步声，小斗打着个赤膊，手里拿着脱下的褂子连连抹着脸，和野猫头同时出现在门上：野猫头手里拿着两把戳刀，瞪着两粒圆眼睛，歪着一张兔子嘴，向屋里打看着；后面还跟着几个别的村里人。

“还没走，这货色？他要怎着？”野猫头秃着舌头问。

“卖发财票的，”小斗说，“你想发财，这不是发财的门路，你趁早夹着尾巴走了好！”

“说姑娘是谋死的？叫他剖棺材验尸就是！”另外几个村里人这样说。

大毛楞在那里，这时瘦削的颧骨抽动一下，身肢挺了挺，说：

“你要把我怎么着，你说吧！”

亲家公抬起头来四周望了望，突然像从梦里被什么咬了一口似地跳起来，把面前桌子一推，乱舞着手嚷道：

“好凶！好凶！我只有下城！只有动官司！我叫我家三老爷做纸去！”

那鼻音嚷得过了火，嘎了开来；手舞着，提起布包，弯腰驼背，踉跄地往外走；忽又转来，眼泪鼻涕一把地指着女婿，喘着粗气说：

“你可不要懊悔啊！”这样威胁着，声音却颤抖抖地提不起来了。

大毛仿佛明白了所有的事，用一种粗拙的声音狞笑道：

“好吧，随你家方老三出主意办吧！”

大家都挤到门上，乱嚷嚷地看着那个黄鼠狼子似的后影拖着步子慢慢晃出了晒稻场。

“这是个脓包货，不用说是方老三出的主意，叫他来敲钉锤的！”

“要不是鸦片瘾发作了，今天他不见得走。”

“打官司！料他打不起！吓吓人罢了！”

“今天这一趟白跑的。我说他明天还要来，说不定方老三要和他一同来。”

大家这样你一嘴我一舌地嚷着。大毛一口不开地紧皱着眼睛，从地上拾起刀来，往田膛那边走；小斗和野猫头各已爬上一棵乌柏树。这时小斗从树上探出头来，高声向大路那边喊着说：

“卖发财票的！你是脓包，你不行。明天请你家方老三来，我们在这里等着。娘的，不给他猪屎吃不是人养的！”

姑奶奶搀着小牙子站到晒稻场上，叹了一口气，和攒着乌柏果子的梅花脚说：

“唉，真是！怎么做得出。”

梅花脚把嘴唇包了一包，笑咪咪地露出一口黯红色的龈肉，摇着头不说话。

太阳偏西了，风在田野里回荡着。天空里鱼鳞似的白云已经积聚了起来，泛成了晶莹透明的颜色，照得这田原村舍分外鲜明悦目。茅房那边，肥料堆上站着一只公鸡，这时拍了拍翅膀，提着老练的嗓子高声啼起来。

一九三六年四月

（原载开明书店 1936 年 7 月初版夏丏尊编短篇小说集刊《十年》）

铁闷子

老易，老朱同我，我们带着一个大家公用的勤务兵，押着一点简单的行李，在接到撤退命令的一个钟头之内，赶到了济南车站。这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敌人连续占领唐官屯与青州，旋即攻下沧州，节节向南进扑，眼看就要打入山东地界。这方面守军风纪败坏，无法抵御；本省军又袖手作壁上观。不肯接受司令长官总部的调度，且传闻他们胁迫驻设桑园的总部后撤，声言若不速撤，唯有以炮轰对付。总部处在敌人与自己阵营中败类的前后压迫之下，无力挽救危局，不得不下了撤退的命令。

车站上被黄黄的电灯光笼罩着，难民拥挤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找到了总部的副官，才知道总部人员的车辆随到随开，最后一列也已经在一分钟前开向徐州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老易故作镇静地问那副官说。

“有办法，有办法。”副官客气地说，“还有一列材料车，马上就到；可听说都是铁闷子，只好同站上商量看能不能另挂一辆。各位先生受点儿委屈就是。”

这副官招待我们到一间清静的候车室喝茶，他是被派来专为等在这里招呼我们上车的。

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是在济南办一个供给前线士兵阅读的八开张的小型白话日报。我们算是总部政训处的人员。上月十四日在北来的车上，我们接受这个任务，限令我们在两天后即九月十七日出报。我们深切认识这工作的重大意义，面无难色，满心兴奋地接受了命令。十四日午夜时分，老易，老朱同我，还有勤务兵刘大开，我们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住到济南一家旅馆里，开始想到达成这一命令的实际的具体的方面，才觉得我们的任务简直有点类乎到蛮子国求取金羊毛。这一夜我们不曾合眼。十五日大早一搬进新租定的房子里，老朱先打起“摆子”来；随后我也发冷发热。可是十五日一天之中，我们厨房里做出了热腾腾的饭；房子里有了电灯，电话，无线电收音机以及应用家具；写字台上一切文具摆得齐齐全全。十六日当老朱发着一百多度（华氏）的高热坐在那里记录无线电报告和总部来的电话战报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到本城数十家定户的定报通知；傍晚，我把副刊栏一手写好编成了；小社评和几则启事也由老易在捧着碗吃饭的时光写完了。十七日黎明，奇迹终于出现：当总部派来的副官打着手电棒上门取报的时候，老朱揉着发红的眼睛，疲乏地笑着，把早经打叠好的发着浓冽的新鲜油墨气味的四捆报纸递给了他；并且，附近街口上卖报孩子喊卖着我们这报的响亮的声音，也传到我们的枕上来了。

我们的这小报一共印刷五千份，以五分之四的数目供给前线驻防的各部士兵——手续是由总部的副官一总领去，除一千份带到总部散发，其余三捆都由他交给留守在车站的三部驻军的人员分送到前方各本部去。另外一千份，则销售给本城的民众。我们的报一共出了二十多号；这二十多天，我们简直不知道怎么过的：从清晨到上火，我们要记录五次新闻，写五六千字的副刊稿子，和一篇千把字的社评；夜间，我们把稿子编好，得到一家印刷所里去照管排版、担任校对，监催印刷。此外，我们还得办发行，办会计，办庶务，办交际，管理油盐柴米，以及一切说不清的麻烦琐碎的事。这样的生活，再加上疟疾病的折磨，我们三个人，同勤务兵刘大开，都疲顿得脸青眼

黑，肉少毛长，走出来不大像个人样子。

在候车室的长凳上坐下来，副官吃惊地对我们说：

“啊哟！瘦狠了！瘦狠了！这一回你们三位真的忙苦了！”

“忙是有点儿忙，可一点都不觉得苦。”老易把他鼻梁上的近视镜往上面推了推，照例作古正经地说；他重复着几句平日已经说惯了的话，不以为厌倦，为了安慰我们自己，也为了鼓励别人。“我们心里快乐，精神上高兴。想着前线有多少将士读我们的报，我们什么疲劳都化为乌有了：我们一个油墨的字，就等于一粒子弹！”

副官很客气地称道着我们办报的成绩，颂扬着我们的热心和毅力。于是慢慢谈到这方面战局，引出老易许多愤激的话。我们谁也没料到我们的总部撤退的如此之快。我们正对我们的小日报怀着许多远大的企图。司令长官已经批准了我们扩展规模的计划书，我们决定在满一个月之后即添聘人手，增加篇幅与份数，添设漫画栏，前线通讯栏，抗战故事栏等等，并已分函各地约请名家撰稿。我们将使我们的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士兵读物。但是现在，这一切美好的计划都完了，我们粗具规模的报社连同锅灶碗盏都丢掉了，我们消耗了血和肉培养出来的小报夭折了！

“但是我们的精力没有白费！我们做出一捆捆的报来，送到防线上，供给了将士们二十多天的精神粮食。自然，在目前好像没有见出显著的效力，但是有一天机会到了，就会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培养了潜在的力量，它活在将士们的心里！”

老易这样的说，神情颇为激昂。他说话永远像他手写的社评，严肃，峻峭，寻求着一点深微的，而必定具有乐观性积极性的意义。

勤务兵刘大开把我们的铺盖在长凳上摊开来，笑嘻嘻的强迫我们休息。

“车子到还早，躺一躺好点。”他低声地说，眼睛看在地上；好像是对他自己说话，其实是对我们下命令。

索性不管行文枝蔓，我要在这里把我们的刘大开介绍一下：他是山东西部人，才十八岁。个儿高大，面色红黑。在一个山村中长大，曾在平民学校念过几年书。自从他跟随了我们，我所观察感觉到的，是在他的意识里，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们三个人，没有别人，也没有他自己的存在；其次，他好像以为世界上一切人做的事，说的话，都是错的，不可凭信的，而唯有我们三个人做的说的，才无不正确有价值，无不是天经地义；再其次，他好像以为我们的报社是世界上唯一无二至尊至大的机关，若发现别人有什么对我们报社不敬的地方，他必定气得脸红耳赤，认为大逆不道。在刚到济南时，为了筹办一切，为了看护我和老朱的病，他有四五天的功夫不曾睡觉，因为他的铺盖卷放在我的床下，我确实知道他到那天才安顿了他自己的床铺。这时他自己也是隔日一发症，可是他一点不在意；叫他去睡，他瞪着发热的红眼睛，笑嘻嘻的低声说：“我不要紧，我餓得住。”于是照常出出进进的打点着，甚至每天为我们擦一次皮鞋的工作也不肯怠忽。对于抗战，他是个少有的热情者，若有谁说了什么我方弱点敌方优势这类话，他必大生其气，“你晓得！我们先生从来没讲过！你这么聪明，怎么没人请你办报呢。日本鬼子给你多少钱？你说这种话，你心肝都是黑的！”他如此嘟哝着，气得连连眨动着眼睛。他常为这类题目和厨子低声吵骂着：“我们先生从来没讲过！不信你去

问问看。”这就是他与人争辩时唯一不可动摇的论据。在为我们雇洋车时，若那车夫要价不公道，他也愤不可遏，“你爱国不爱国？我们是报社里的，你能这样瞎要钱么！”有一次他叫一个老婆婆送鸡来；他要两只白雄鸡，因为他听说吃白雄鸡对于我们熬夜少睡的身体最为有益，但那老婆婆送来的不是白雄鸡，“我们是报社里的，你不看看外面牌子！我们先生要吃白雄鸡，你能不拿白雄鸡来么！”他义正词严地说，仿佛是我们报社里要你的头，你也必得拿来，否则就证明你不爱国，那是可耻可恨的。若有客人拿我们出的报纸包东西，这最使他发生反感，他可以为此板着面孔嘟哝一整天。一天他发现我们门前贴的报被人撕破了，他气得和一个有嫌疑的人打起来，“你是汉奸！你撕我们的报，你不是汉奸？”他的眼眶红红的，觉得是世上最可痛心的事。关于我们身体的保养，他有权利强迫我们这样或那样。在一位医官跟前，他获得了一些这类的知识。于是他强迫我们每天吃六个鸡蛋，半夜里要拉我们喝鸡汤和牛肉汤，每顿饭都少不了一盘番茄炒猪肝；他要求我们躺在床上写稿子，瞅着我们有三五分钟的空暇，也笑嘻嘻的蹲下来为我们脱皮鞋，迫令我们睡觉。军界中有一句谚语，说：“六十年见一次黄河清，五百年出一个勤务兵。”这话若是果然，我敢说这近五百年出的一个勤务兵，就是我们的刘大开。

为了遵从刘大开的意见，我们偏过了副官，在候车室的长凳上躺下，等候将由桑园那边开来的最后一列铁闷子车。

大约两个钟头以后，我们的铁闷子才由一位参谋官带着二十几位手枪队的弟兄押着到站。这是很长的一列车，共有三十余辆，其中有七八辆敞车，其余全是铁闷子。敞车里装载的是马匹，涂上了黄泥的小摩托卡，一袋袋堆的山高的大米面粉，铁轨，电线杆与电线，以及许多说不出名目的军用东西：乱七八糟地架叠着，上面盖着柏树槐树的枝丫，算是防备敌机的伪装。铁闷子只有三辆是空的：一辆为押车的手枪队弟兄所盘踞，一辆作了那参谋官的卧室，一辆则堆着一点行李与厨房中的器物。至于那没头没脑关的严严的二十多辆车里装的是什么呢？

“这车子危险的很。”我们的刘大开跟在我们身后担心地低声嘟哝着，“那二十多辆闷子里全是炮弹军火，参谋官从前线救下来的……他们前头的好车子开的那么急，就不能等我们一等！”他生气地埋怨着，意思是建议我们最好另想办法，不要搭乘这种有危险的车子。

但这显然是可笑的主意。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车子安全。”副官对我们解释着说，“要开要站全由我们自己指挥，若有警报的话，我们说声站，它就得马上站住。弹药什么的全不相干。你们各位先生尽管放心就是。”

“而且我们要赶上前面的车子。这时候，还能管那些，你怕天掉下来压着我们的头了罢？”我们也开导着刘大开。

副官和站上交涉为我们大家挂一辆卧车，谈判了半天，是卧车已被我们总部调用完了，要挂呢，只可挂一辆三等坐位车；即此三等车亦须向下面车站去要，至少两个钟头以后才可调到。我们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看着站上满地黑压压挤着塞着的难民，看着几班开出的短途客车连车顶上都堆满了人，这是讲究舒服的时候么？但在先我们三个人却不好执意阻拦，因为乘车的不仅我们三人，参谋官和副官都是有点讲究舒服，尤其不肯白白放弃自己手中权力的。

这时我们三人力说愿意即坐铁闷子，用不着另外再挂什么车。我们到参谋官的车上去拜望，征求他的同意。

参谋官瘦瘦的小个子，是个出名的能担当能吃苦的角色。当他“在台上”的时候，不免要摆一点合乎身分的威严臭架子，但闲散时候，尤其在我们这种所谓文职朋友的面前，则极为和易而有风趣。我们原早就认识的。

参谋官完全赞同我们的意思，并且欢迎我们即到他听占住的这辆车里开铺，大家住在一起，一则可以说说笑笑，破除旅途的寂寞；二是多几个人挤着睡也可以暖和些。

车上点着一盏电石灯，放着凄冷的白光，中间两边的大铁门敞开着，把长约二丈多的车厢分成两部分：参谋官的铺盖摊在一头的角落里，他的小勤务兵住在另一头，此外什么也没有，显得车厢里面分外郎当空大。中间的铁门是车中唯一通气的所在，自然不可关闭；深秋的寒风吹送进来，又加上上下四面的铁板围罩着，使人心里透着森森的冷气。

“就是有点儿冷，”参谋官把他军大衣的领子牵得高高的，缩着颈子，闲闲地笑着说，“要不然比卧车好。可是比三等坐位还是舒服的多：可以伸直了睡，可以翻身。——冷，其实不是没有办法。是我走的匆忙，没来的及摆弄。”

于是参谋官说那边敞车里有五百多包大米，三千多袋面粉，可以大批的搬些过来，垫着地下铁板，作为床褥；再搬他百把包堆做两道半截墙，屏障着门。把车内隔成三间：叫勤务兵住那头一间，我们两武三文住这一间，中间的过堂是出入门路。这就变成住家三开间房子，什么问题都一下解决了。

“对！对！”副官高兴地笑着，连连点着头，补充着参谋官的意思，“面粉垫在下面，又软又暖，比席梦思还过瘾；米包作隔扇，比沙袋强，不但可以挡风，还可以挡挡炸弹碎片。你说对不对？”

一时大家都很高兴。参谋官说这必须立刻全体动员；于是大声叫起来：

“郭永刚！”

“有！”一个响亮的童音回答。

参谋官的小勤务满身是劲的走过来，腰上挂着一把小盒子枪，用手扶着，站的笔挺地。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看样子不过十四五岁。

“你的小盒子呢？”

“在这儿！”郭永刚摸着腰上的手枪，瞪出两粒漆黑的眼珠说。

“对呀！不要乱扳。站上人多手乱，弄去了不是玩艺账。懂不懂？”训了这一套之后，参谋官再慢慢地说：“你去请手枪队两位排长来，我要当面对他们说话。”

“是啊！”应了这一声，飞快地跳下车去了。

我们很夸赞这小勤务神气十足的样子。那点利落，爽脆，或响快的劲儿，在我们刘大开身上是找不着的。

“绣花枕头，里面一包草。”参谋官说，“玩心太甚，还得我时时刻刻照应他。交给他东西，动不动弄丢了。我有意交他这把枪，试试他。”

两位排长请来了，参谋官把搬米包面袋的话仔细指点了给他们，令全体弟兄出动，两个勤务兵也帮同着。

闷子车里的米包面袋的工程大约做到一半的时候，手枪队弟兄们在敞车那边喧哗起来。

“米包那边躲了一个人！”郭永刚飞跑着，报告参谋官。

“一——个——人？”参谋官以一种调侃的口气反问着。

“是个什么样的人？”副官提醒着问。

“不是咱们的人，是个——是个——不是老百姓，也是个当兵的。不像个好当兵的，不像个好人。”郭永刚弄得着了急，就乱七八糟地说了一大篇。

“带他过来！”

那人被一位排长歪揪着领口，两位弟兄左右掖拥着，拥簇到站台上——一棵有电灯的电杆下面。是个穿着臃肿的灰布军衣的壮汉，脸上的皮肉结实肥厚，粗颈子起着折棱，大眼睛，重黑的眉毛，嘴唇阔大，露出白牙齿，正作出一个极其严重，而又似乎极其自然的惨笑。我生平没见过这样的怪笑，获得一种狰狞可怕的印象。我总想着这不是个人，而是一头凶猛的野兽。

“吓吓，吓吓！”他笑着，“没关系。吓吓，请你放手。吓吓，我不跑，我不跑，官长跟前。吓吓，我跑不了。”

排长说，这人在米包堆子的角落里躺着，他们原不曾发现；被一位弟兄踹了一脚，他跳起来想逃，牛似的气力，两三个人拦不住他；要不是手枪掏得快，差点儿让他溜掉了。

参谋官把他的呢大衣敞了开来，两手插着腰，一步步地走了近去；他的头低抵地偏歪着，眼皮半睁半眨地下沉着，做出一种半死不活的样子，故意轻言细语，文文雅雅地问道：

“是干什么的呀，老乡？”

在参谋官这种奇怪派头与语气上，大家立刻感到一种不可漠视的威严；那粗大汉子的狰狞模样，一下就被这小个子的凛然气概压倒了。

那汉子现出慌张来，先说是属于某某部队的一个副班长，他们连长受了伤，在南京军医院中治疗，他们营长派他到南京去看望他。

“都是自家人，吓吓。”汉子皮笑肉不笑地说，“搭个便车。都为的公事，吓吓。官长行行方便，不要烦心。”

“哦，你们连长在前线受伤，会送到南京去医病？你们营长会派你副班长去看病？哦哦，这就是了。”参谋官自言自语地说，连连点着头，似乎表示绝对信任。但是厉声喝令手枪队：“看看他的符号！”

“没有符号。”排长牵着汉子的被揪得稀皱的上衣，那左胸口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本小簿子露出在荷包外面。

“符号掉了，洗掉了！”

“打他两个嘴巴子！”参谋官轻声地说。

排长重重地打了他两个耳光。

“说错了，说错了，官长。”汉子连忙说，用手摸着被打的地方，“啊哟，打得挺疼。”还是一副笑着的脸；好像刚才的被打，完全闹着玩似的。

于是说，他是济宁州的人，他请了假，回家去看看老母亲。“官长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不让回家，吓吓，我就回队。吓吓，好说话。”说的显然不是山东口音。

“搜一搜他身上！”

先摸下面的大荷包，在一个荷包里摸出一把散乱的红头火柴和一包扁皱的“哈德门”香烟，另外有一叠皱破了的手纸，几张角票和铜元票，一只烟嘴。在另一个大荷包里摸出大把铜元，一饼麻索和红色蓝色的丝线，还有一块天青色大绢帕，展开这绢帕，里面裹着一只女人做针线用的铜指环。

“是些什么东西呀？”

“官长，是我嫂子的东西。我嫂子叫我买的。”

“手帕子还有点儿土粉香味哩！”副官有趣地笑着说。

从上面的小荷包里，一边是用手纸包着的小镜子的大半个破片，一边是铅笔与小簿子各一。参谋官叫副官查看那小册子，同时令手枪队排长继续搜他的里衣。

他穿的是单布军衣，里面却臃肿的很。解开了外衣和一件污秽的白布衬衫，忽然露出一件翠绿色掩襟绸褂子来；绸褂的下摆直束入裤腰中，解开裤子与绸褂，落下一把白亮的小刺刀，里面是一套镶着绿花边的粉红色绒布褂裤；并且在绒布褂的荷包里掏出一叠五元与拾元的钞票，一只金子镯，金质耳环与戒指各若干个。

围拢着的人们兴会地哗笑起来。主人壮实的胸口露出一撮黑毛，披着一身娇艳夺目的女人褰衣，也撕开嘴唇随同大家哄笑着。这笑里，已没有了我先前所感到的那种兽性的狰狞与可怖，而是几分麻木的呆气傻气，像一个老实人当被人家百般恶毒取笑，已至忍无可忍，但又无可奈何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窘促的，自暴自弃与自嘲的难看神气。

“官长！”笑了好一会，汉子忽然不笑了，极其严肃地盯着参谋官说，“我求求情，放了我吧！东西好玩的事，官长不见笑，金镯子你留着吧！小意思。”又对搜他的几位弟兄说：“那几件你几位官长带着吧！没关系，吓吓。放了我吧。”

“胡说！”弟兄们怒叱着，但随即忍不住地哄笑了。

大家都大笑着。这回汉子却没有跟着笑；他双手提着解开的裤腰，大嘴巴连连抽搐着，眼睛直瞪在前面，现出一种绝望的，却非常镇静的神气。

副官这时把他检查过的小本子拿来指给参谋官同大家看。那上面东歪西斜的画着一些很大的铅笔字，多半是些莫名其妙的帐目之类：

“大木村南豆牛二条洋三十一元多李长胜小救子在了你”

“东关刘王庙十五元又加二十四元”

“王二姐出洋八元又洋五元共收她十三元金二个日他的算了”

“十六日大车三两行洋十九元李长胜王八旦日他的”

“好大奶子白屁古只有五十多元金二个两刀子”

诸如此类，大概每一项目占册子的一面或两面，中间还有一些秽褻的简单图画和不可解的字句。

大家有趣地哄笑了一会，参谋官问道：

“这个本子是你的吗？上面的字是你写的吗？”

没有回答。

“只有一把刺刀，你的枪呢？”

也是没声音。

他瞪着大眼睛，平静而自然，倚着电灯杆稳稳地站着。

“知道吧！”参谋官很温和地说，伸出一只手随便地挥着，“你犯的事不小，老乡：抢劫，强奸，糟蹋村子，恐怕还闹了人命。你还是老实说的好，要不然你自己吃亏。”

“你都知道哩，官长。”汉子坚定地回答。

参谋官怒声喝道：

“把他捆起来！回头交给军法处！”

这一幕突如其来的喜剧告了一个段落，大家都散了。老易，老朱我们三个

人在站台上来回踱着，心里都有些沉重。不是为这个汉子本人；是从这汉子身上，我们具体地明白了我方防军的真实情况，想见其精神与实力，因而为整个战局担着重忧。我们都是些书呆子，抽象概念的方面似乎知道许多，具体实际的一面却无不使我们大大吃惊。

“是这个情形！总部怎么能够不撤退？”我们心里都有这样一句话。

“这是个硬梆爽快的家伙。”老易打破了沉默，不胜感慨地说，提出了他的乐观性积极性的见解：“敢做敢当，从容坚决，一点不是孬种。若是稍许受到一点好教育的话，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绝对不要难过：你看我们士兵的本质多么好呀！”

老朱不明白那汉子要把女人褰衣穿在身上，要把女人用物如麻索丝线手帕之类藏在荷包里的心理与用意，因而深以为奇怪；而且自己把罪行记在簿子上，不啻自画招供。“听他要用那几件首饰贿赂别人，他说的那么坦白，那么直截了当，仿佛他以为这是很正当的行为。”老朱忍不住笑起来，而后说：“世界上奇怪的事太多了，我们知道的都太平常，太简单。许多事意想不到，也不能了解。”

我则以为参谋官的主意未必值得称赞。当部队的军风纪已经弄到如此地步，总部事实上无从予以改造；这方面战局已经不可为力，而总部也已经放弃了责任，这样的時候：偶然捉获一个犯法的逃兵，仅仅一个，要把他带交总部军法处，军法处再加一番审问，一切罪行属实，于是拿出去砰的一声枪毙了；他们部队自官长以至士兵还是继续干着他们的营生，敌人还是毫无阻拦的前进。这有什么一星点儿意思呢？

“原还以为是什么奸细。”我懒懒地说，“明明知道是个逃兵了，还不放了他算了？送给军法处，何必多此一举！”

老易沉思着。他的兴趣仍放在这逃兵的身上。他从言谈神态以及种种表现上推断这逃兵是个老实纯朴的角色，藉以证明他刚才说的“我们士兵的本质是好的”话不错。他说：“他造的那些谎话多么幼稚，简单！能骗的时候，他就骗；骗不过去了，他就承认一切。这完全是应该的。爽快的很，可爱的很。绝不是那种老奸巨猾，不可救药的坏东西。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这也都是必然会有的。他的社会环境他的部队教他如此做，鼓励他如此做，他为什么不如此做？他有什么罪？”

最后，老易说：

“我们找参谋官谈谈去。”

我们车厢里的工程很快的已经完工。米包堆成的半截短墙，留着一道小门，十分整齐别致。我们的“房间”内被面袋子垫得平平整整的，参谋官同副官的床位已经布置妥贴了。刘大开从候车室搬来行李什物，忙着为我们安顿床铺。

“看看咱们的屋子棒不棒！”参谋官得意的向我们笑着说，打着一句北京腔。

“好极了！好极了！”

他们两位各坐在自己铺位上，燃着烟卷儿，以那个逃兵为话引子，正说笑得热闹。副官谈着他亲见亲闻的关于部队糟糕的事实。据说，每个驻防单位各盘踞一个村子或市镇，向老百姓肆意索诈，要什么，有什么，比封建时代的王侯还要恣纵。他认识一位连长，到防地不过两个月，弄了四个“屋里人”，三个时髦儿的，一个古典派。一个小连长尚且如此，高级些的官儿不

必谈了。参谋官以其冷隽的口才补充着副官所说的；他说这是多年以来的传统，并不是抗战中新有的现象。老百姓太老实了，遇着这样的当道，就像严严实实地关在铁闷子车里，漆黑一团，别想透一口气儿。

“当了三年兵，”参谋官抿嘴笑着，安闲地喷着烟圈儿，“哪个不是财迷色狂！士兵们没教育，没纪律，成天看上级胡作胡为，心里火着了，胆子变大了，谁是该死的，不吃口荤儿？都是整个村子整个村子的给他们糟蹋了！说起来还不丧德怎么的！”

“这一位你打算怎么办呢？真的带去交军法处？”这时老易插进来说。

参谋官说，这样的事本来可以不管，但这家伙既自己送死送了来，总部就担了干系，不能掩耳盗铃。交到军法处，他个人的责任就了了；那时他们放也好，办也好，怎么都好。

“真他妈的见鬼！他自己倒霉也罢了，给我添这个麻烦！”停了半晌，参谋官又笑着说：“你们三位大文豪有什么高见呢？我讨教讨教。”

“依我们说的话呀？”老易把他溜到鼻头的眼镜向上面推了一推，郑重地说，“——我们是书呆子意见，你酌量酌量：我们建议你搜出来的东西都归还他，好好地招待招待，客客气气地找他谈谈，把他请到我们车厢里来住。你看怎么样？”

不等老易说完，参谋官和副官都失声大笑，把老易笑得脸红耳赤起来。说老实话，我也没料到老易会出这个妙主意。

“不是笑的事。”老易强作镇静地说，“我觉得我们的这办法比你那个高明，你考虑考虑。”

“对，对，对！”参谋官说，渐渐敛住了笑，做出正经模样：“你们三句话不离本行，你们是政训处的。”

“你们三位先生要做点政治工作，是罢？”副官也笑着说。

参谋官立刻站起来，皱着眼睛考虑着，一边感到有趣地连连点着头：

“我从善如流，没有问题，决定接受你们的办法。对，对，对！好好地招待招待他，给他个天上掉下来的意外欢喜。我马上告诉他去，让他吃一惊。”

这回参谋官也没叫他的小勤务郭永刚传令，他自己跑去找了手枪营排长，要回刚才搜出来的全部细软什物——只留下那把刺刀——用那块天青色绢帕儿提着，走到逃兵跟前。

逃兵自肩臂胸口以至脸部都被棕索紧缚着，反剪着手膊，拴在电柱子上面；他的里外衣服袒开着，翠绿色与粉红色的女衣乱七八糟露出边角；他的剃光的头微微低着，皮肉结实的脸子与嘴巴松懈无神，惘然地望在前面远处，没有恐惧，也没有烦恼。

参谋官在嘴角上叼着半截烟卷，笑嘻嘻的皱着眼，一口不开地解开绢帕，先把钞票金镯等摸出来，拿在逃兵眼前样了一样，而后给塞还那红绒衣的口袋里，再把其他零物连同绢帕一一塞到别的荷包里。他无声地这样做着；那另一个的眼睛随着他的手的活动而转移，但并无什么惊诧的表情。等到绳索完全解开，参谋官把嘴里的烟头扔了，拍拍对方那厚实的肩背，于是耸了耸肩，笑着说：

“老乡，刚才失礼的很，对不起。我们当你是敌人的奸细，是汉奸，懂不懂？那知道我们闹错了，你不是汉奸。我们刚才查得清清楚楚了，你是咱们的弟兄，都是自家人。我们现在只打日本鬼子，别的账都不算，自家人好说话。你明白不明白？所以现在放了你，请你到车里坐坐，抽支烟卷儿，谈

谈，休息休息。你要上哪儿，咱们车子送你到哪儿。咱们交个好朋友。懂不懂？”

那一个瞪出着眼睛，盯着参谋官脸上正经的微笑，因而也反射地现出一种傻笑。但是没作声，只是时不时匆忙地扫看着四遭，好像一个人从梦中乍醒而忘其所在的那种略带慌乱的样子。他一边下意识似地向前走着。

“把衣服扣好！”参谋官在后面跟着，指告他走向我们的车子：“上那一辆车。东西都还你了，回头自己看一看。刀子我替你留着，行不行？”

“官长，你……”他说。

因为车头机件发生故障，无法行驶，站上向袞州泰安去另调车头，我们车子一直没有开动的消息。我们并不着急：因为副官已经与总部通了电话，他们决定在泰安停留到明天上午，我们可以赶得上他们；再则，我们在车中很舒服自在，而且一点不寂寞。

那逃兵被请到我们“房间里”，受到我们——尤其参谋官和老易的极客气的款待。但是他一直被邀请在老易的铺位上坐着，从没改变一下他脸上那种莫名其妙的尴尬的笑。这笑里有几分傻气，有几分疑虑与不安。他们的谈话濡滞呆板，两方面的隔膜无法解消，精神无法融洽；其唯一病窦恐怕即在于那逃兵不了解这些人的用意所在，尤其不信任参谋官的好心。但他又想不出大家对他施这手段，做这圈套，毕竟有什么恶意或歹心。因此他对他自己的怀疑与戒备之心，也不能相信；可又不能完全不相信。

老易单刀直入地问他许多关于他们部队的情形以及防地的状况，他的回答是甚至他们营长的姓名都不知道。老易颇有点生气，以为大家如此看待你，而你还是要扯谎，你真辜负人家的好心了。

“那怎么能够呢？你说你已经入伍三年多，怎么连你营长的姓都不知道呢？——不要怕，我们不过随便谈谈。”

老易递给他一支烟卷，他最初也说不抽；后来说，在官长面前，他不敢抽；终于，他以一种纯粹乡下人的姿态，捧着双手接受了那烟卷，自己点燃了，极其饕餮地吸着。副官这时问到他知道他的奸盗行为该当何罪。

“报告官长：砍脑袋！”他赶忙吐出口里浓浓的烟，未加思索地回答；肃然地傻笑着。

这突兀的回答引出一阵哄笑。参谋官以一种像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气，极耐烦地（使人显然看出来，他是为了顺从老易的意思才勉强如此做，不是出于他的本来心意），带着一点作弄或取笑的意味，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什么车，我们都是些什么人，等等一类问题。对方回答的都大致不错。参谋官坦白地告诉他，我们这是军火车，一辆辆的铁闷子里都是前线撤运下来的军火。我们怕的就是汉奸作祟，对于像他这样的逃兵，大家都愿意原谅，并无加以处治的责任。于是参谋官拿出极正经的神气，叫对方不必对我们大家的这番好意存着怀疑与戒心。

“呃，呃！对了。”老易高兴地说，觉得参谋官的说法和态度极好，足可打破对方疑惧之心了，于是故意用一种估量可使对方理解的话语补添道：“我们现在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不然，我们就永远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不如猪，不如狗。是不是？你想想看。因此，所以，我们只对付日本鬼子同汉奸。我们自己弟兄，怎么不好，也比日本鬼子同汉奸好些。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你想想看。”

那逃兵点着头，还是傻笑着，没有什么话说。副官介绍着我们三个人，

告诉他我们是政训处的人员，专门办一个供给他们士兵看的报，“劝”士兵们爱护百姓，和百姓合作，努力抗战，等等。

“你看过我们办的那个报没有呢？”老易关心地问，说出我们那报的名字，比着篇幅的大小。

对方先莫名其妙地点着头，随后又摇摇头，说：

“官长，我们没看过报。”

空气一直是呆滞僵硬的。我私心中已经厌倦了这种场合，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压着我，使我觉得老易的作为简直有点可笑。我说：

“休息休息啵！明天再慢慢谈啵！”

我的意思是，所谓友谊不是马上可以建立起来的，要想从他嘴里听到真实无伪的话，像用这种方式也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们都应当睡觉了，趁着车子尚未开驰的这样安静时机。

参谋官和副官极力附和我的话，他们的耐心也显然已经达于极度。于是老易高声呼叫刘大开；他决定从他自己的铺盖中匀出一床多余的被子，令刘大开招待这逃兵同铺去睡。过了很久功夫，参谋官的小勤务郭永刚才下车把刘大开找了来。但新的意外事故发生了：我们听到刘大开一边走着，一边呜咽啼哭着，并且似乎诉说着什么。这使我们十分惊异。

“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站到车门上问。

“你看看，你看看！”刘大开手里提了几大捆东西，极其伤心地诉着，泣不成声，像一个受了人家欺侮的小孩见了自家大人一般，“这些，这些，你看看，你看看！”

他的手不住颤抖着，要解开那几捆东西给我们看。我已看出来那是几捆报纸；老易提了一捆到里面，就着电石灯拨看了一会，嚷着说：

“噢！是我们的报！怎么搞的？哪里弄来的？”

刘大开结结巴巴地说，他把我们的铺盖打理好了，刚才想起恐怕候车室里遗落了东西，所以跑去仔细寻检。不想就在候车室的一圈长凳下面找到这些报；那些凳肚子里塞的满满的，全是这些成捆成捆的报；他只提来了这几捆，那边存着的还有六七十捆。

我们三个人彼此相视，半晌功夫没说出一句话。

“他妈的！你瞧这种的事儿！”参谋官说，望着副官。副官严肃沉闷的板着脸，分析这事的原委，要推寻那主使此事的人。但是他也太激动了，我们只听到他的怒骂。

“吓，好的很！原封没动！”我浑身冰冷，注视着—捆报的包皮纸上批的红字：“十月八日：本日报每捆壹千份，共三捆。”是老朱的笔迹。

刘大开靠着上半身在米袋堆子上面，把头埋在两手之间，放出难听的哽咽声音，不住低诉着什么，夹杂着一些詈骂的字眼。老易在车里走了几步，气得嘴唇连连颤动；忽然回过头来，勉强装出一副自以为旷达的惨笑，对大家说：

“没什么可难过的！他们不看，自必有人看。都还—捆—捆的在，这就太好了。我们留着给别人看。我们的心力总不算白费！”于是温和地对刘大开说：“哭什么呢，你这个小伙子！你去—捆捆的全搬到车上，我们带了走。都是好好的哩，又没有白糟蹋了！难过做什么？我们散给更多的人看去。”

那逃兵瞪着眼睛，注意着我们这一切情形；及至看见刘大开和郭水刚要下车去搬报了，他突然站起来，向参谋官说：

“官长！我也去搬？”

参谋官没有立刻回答，迟疑了一会，好像有什么不放心；但随即想开了似的，点着头说：

“好罢，你也去搬。——这原就是办给你们看的。”

老易也似乎唯恐这逃兵会乘机脱逃，站到车门上注视着。但是不久的功夫，那粗壮结实的家伙提着负着七八捆报，赶在两个勤务兵前面送到车里来；而后，不声不响地重新下车，飞跑到候车室里，又弄来第二趟。

“他不会逃。”参谋官对老易说，“他逃做什么呢，我们并没有扣留他？他真的逃了就算了，听他去。”

他们把七十余捆报纸一一送到他们自己住的那头“房间里”。刘大开照着老易所指点的，抱了被子过去，招待那特别的客人同睡一个铺。他们用面袋子垫作一个大铺，打算三个人同睡在一起；因为他们铺盖太单薄，挤着睡比较暖和些。

郭永刚到我们这边来倒开水，参谋官指着他身上挂着的小盒子枪，低声问道：

“睡的时候你打算把这个放在哪里，唔？”

“我挂在身上抱着睡。——还是搁在这边你枕头下面？”

“还是你管着。不要大意啊！出了事，你负责！小心你的脑袋瓜子！”

参谋官神秘而威严地说。

老易吩咐郭永刚告诉刘大开，把那些报拿出几份来，送给那特别的客人看，并且叮嘱他们不要羞辱他或取笑他，要想法子找他好好地谈谈。

我们都已睡下了。除了副官与老朱，我们都难入眠，在被中转侧着。参谋官找老易闲谈着，接二连三的抽着烟卷。于是越谈越起劲，先是讨论这方面战局以及此间病弊与补救的办法。末后参谋官大谈其沿站抢救各项军用物资的情形，老易则详叙我们办报的甘苦。

“唉，抗战！抗战！‘一方面是严肃地工作，一方面仍旧荒淫与无耻！’”老易引了一句书上的话，打着呵欠慨叹着。

我的神经本不健康，这时劳顿过度，受刺激过多，虽然疲乏欲死，却无法睡得着。但我什么话也不愿说，只静静地闭目养着精神。车站上已在敲着一点半钟了。

那边三个人也没有入睡，唧唧咕咕说着话，偶尔一句两句传到我耳里，十分清楚：

“你们上级简直没良心！伤尽了天良！简直是汉奸！……看看我们易先生，他原是胖胖的，现在瘦成一个猴子脸，眼镜都戴不住了，一会儿就溜到鼻尖子上，一会儿就溜下来。你总看见他用手往上推眼镜罢？……妈的！把我们的报都塞在凳子下面！”

“哼！我们参谋官……都听到轰——隆隆，轰——隆隆，清清楚楚的是敌人的大炮响了，他还不在乎，还要拆电线，挖电线杆……他拿着盒子在手里，钉着人家，说：‘不要紧啊！大炮远的很啊！不着慌啊！’……你亲眼望着罢，老总。”

“我到桑园才上车。”

“怎么没看见你呢？你躲到哪里呢？”

“车子一到一个站，我就下来走一走。你们忙，人又多，又乱……”

“若不是碰着我们这几位先生的话……”

直到天快亮的功夫，我们的列车才开始离站，向南驶动。走到党家庄，为让一列北上的快车，又等候了一个多钟头。到我们睡醒过来，已经九点多钟，车子快到泰安了。

我们在一个小站上接到总部车子从泰安打来的电话，告诉泰安正有空袭警报，叫我们即在此暂停，千万不要进站。我们一来指着这是个小站，敌机未必注意；二来指着车子四壁都是铁板，里面又有米包堵着门，心里无形觉得有一种保障，因此谁也不以为意。车子停下来了，我们还在被中躺着。望着草木丛中重露未干，我们着实不愿下车躲避。

大家都感觉睡眠不足，浑身疲软，舌头发麻，鼻子里喷着火气。我们三个人商量，我们应当做两个简单的报告：一个是关于那逃兵的，说明我们主张释放他，而不交给军法处治罪的理由，以及我们大家与他接谈的始末经过；一个是关于我们的报全部被扣，不予迭发的公案，我们主张致电质问，要求追查。老易和我各担任草拟一个稿子；老朱则受了参谋官与副官之托，代他们另拟一报告，也是关于这逃兵的事。我们三个人即坐着被头，就在小皮箱上面写起来。

副官买来一些鸭儿梨，我一边吃着一个梨，一边写稿子。不过写了两三行，就听到飞机的声音由远而近。刘大开下车瞭望着，嚷着说：

“一架侦察机。只有一架。”

轧轧的马达声已经临到顶空，可以明显的辨别出来只是一架侦察机，如刘大开所说的。我们沉不住气，还是走到车门口去探看。秋日的晴空皎洁爽朗，我们看见那侦察机的银灰色影子在前面绕了一个弯，重复回头，向东南面飞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那位特别的客人不曾下车，他靠在米包堆成的半截短墙里面，探头探脑张望着；看见我们，就恭恭敬敬地致礼，含着他那习惯的傻笑。参谋官对他说：

“我们给你写报告了：你到底上哪儿呢？若是怕我们车子危险的话，你就早点儿走你的罢。”

“他说他上徐州。”郭永刚抢着说。

“不上徐州，官长。”客人庄敬地分辩说，把眼睛望着刘大开。

“昨天晚上你自己说上徐州哩，你又赖！”郭永刚生气地说。

刘大开说：“他原是说要搭我们的车子到徐州，今早上又改了主意……”

“由你罢！”参谋官沉下了威严的脸，显然觉得腻烦。

刘大开似乎还想代客人再说些什么，但是看看参谋官的脸色，终于咽住了。我们刚回到铺位上，就接到车站的报告：敌人轰炸机七架，沿铁道飞近泰安上空。只一会功夫，我们就听到远处通隆隆几下低沉的声音，并且隐约听到闷重的轰炸机声。

“炸泰安了！这准是炸泰安了！”参谋官站到一棵槐树下面说。我们原想不下车的，但这时不由自主地跳下车去。我和老易老朱走到离站约有二百步的一道上沟下面；这里有两棵矮矮的灌木，我们即在旁边蹲着。参谋官和副官跑到路轨的对面，大声嚷着说：

“你们没下车的都不许动了，车里一样很安全。乱跑乱跑的……”

说话的时候，轰炸机的沉重声音越来越远，满天震响着，声势颇足吓人。我们三个人都在土沟中半蹲半卧的躺下来，神经很有点紧张。

“谁乱跑，对谁开枪！他妈的！”我们听到车站那边有人怒声叱嚷着。

我抬起头偷望，一共三架银灰色家伙，闪射着日光，已经飞临我们顶空了。说时迟，那时快，簌簌簌的声音动作了，跟着近处的地上就是统统的两三声，随着，尘烟翻腾而上；那三架于是分成两路，以我们的列车为中心，来回地飞绕着，一连投下七八枚炸弹，跟着又是几阵机枪扫射。

当机枪声开始的时候，老朱站了起来，把身体紧贴着沟里的土壁，向车子那边张看；我们忽然听到一声猛烈的爆炸声。

“不好！不好！车子炸中了！炸中了！”老朱低声嚷着，鼻里发出粗喘。

我也贴到沟壁上，看见路轨那面弥漫着黄黑色烟雾。我们列车的尾端连续闪着红色火星，密集的爆炸声有如鞭炮，正从车尾那里发出来，忽然从烟雾中出现两个人影子，向车头那边奔跑而去。一会儿，我们的列车开动了；可是丢下了短短的一小段，还在那里闪着红火，继续哗剥地响着。

我们的车疾驶向前，冲出了尘烟弥漫的地带；我们看的清清楚楚，我们的车身完好无恙。

“救出来了！救出来了！”

这时敌机已经扬长远去了。

等到那抛下的一小段车身的爆炸声完全停息，我们才回车站去。我们急需知道的，第一是我们的人员是否都平安，第二是我们的车子到底如何获救的。

参谋官和副官已经先在，他们围拢着一个倒卧在地的人。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近去：那人平伏在那里，穿着臃肿的灰布军服。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搀扶起来，地上一大块血泊。那结实肥厚的脸子已经泛成灰白，嘴唇微张着，眼睛已经挺直了。

他的衣袋里塞着几份我们的那个小报；领口敞开着，露出一沿红与翠绿的女衣领子。伤口在胸部，有两三个很大的血污的窟洞。

他的右手中紧握着一把小手枪；一看就认识，正就是郭永刚挂在腰上的那把小盒子。

据站上一位目击这事经过的工人谈，当车尾一辆闷子被炸弹破片击中而开始爆炸的时候，死者由车上跳下来，东跑西窜的乱了一阵，而后跳上车，拿着了手枪，重复下车，抓了车头司机过来，胁迫他冒着爆炸的弹药，把尾部两辆闷子下了挂钩，扔下了，而后逼令司机把车子驶出站外去。这时敌机还正在顶空扫射。但死者不像是被机枪射中致命的；他的创口在胸部，大家判断定是在下挂钩的时候，被自己的爆炸弹片所伤，而在押同司机登上车头的途中，他才倒下的。

炸弹都落在轨道两侧，除了车尾两辆闷子而外，仅只炸倒五棵小槐树。

刘大开和郭永刚最后才赶到站上来，他们是从开出站外的车上下来的。他们声告死者在危急中抢去盒子枪，下车逃跑，表示非常的愤慨；及至听明白了死者的英勇行为，以及我们车子和他们两人所以脱险的原委，刘大开呆了半晌，忽然趴到那尸身上哭起来。

死者是徐州府人，二十七岁，没有姓名。他在驻防的村子里犯了两件人命案，意欲潜逃回家。但今早上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回家，想请求我们收用他。这些，都是刘大斤后来告诉我们的。

1942.6.11 白鹤场

（原载 1942 年 11 月《中国青年》第 7 卷 4、5 期合刊）

散文

扬州杂记

白眼兄：

来信收到。你把我的游览态度曲解得那么好，叫我有点出汗。离扬后，生活如昔，想起那短短三天中的经历，已变成一场快美的幻梦了。

广陵游记迄未提笔。现在只在当时日记中拉杂抄了几则呈上，简直不成文理。但我想，做文章总不免有遮遮掩掩之处；这篇东西却没半句造作的话。所以虽然芜杂零碎，我却愿意给你一看。但望你不要当成文章也罢了。

我们的约定只一半偿愿；你几时到我的家乡来一趟呢？恐怕没有这一天了吧？

匆匆

×月×日芜帝上。

暑假将尽，接白眼兄信。信中问我北上确期，并约我顺路到他的家乡扬州去游玩几天。

说起到扬州去，原是旧事重提。暑假之前在学校里时我们原就约好的；说等我的毕业考试一结束，就结伴回南。顺路先到他的家乡，而后再由我请他到我的家乡游玩几天。盖我们对于彼此的家乡都神往久矣。这点小小的打算，原不多么奢侈。可是当他十分兴会地计划着时，我自己心里却是淡淡的。谈到这淡淡的心情，我很可怜自己。凡是略略知道我一点的朋友，都异口同声的给我一个批评：是过于冷淡。白眼兄就时常指摘我这一点，说从来没有看见我热烈地对待过一件事。我自己想想，也很是吃惊。我的年纪并不老大，但不知从几时起，我就用了这一种软木似的态度对付着人生。想到欣跃地计划一件事，想到热烈地等待一个期望，都觉得如自己孩提时代为过年过节喜得整夜睡不着觉的心情一般地渺茫不可追忆了。多年以来，我都为现实的生活紧紧桎梏，像一只在笼里关久了的鸟雀，弄得我不会飞，也不想飞。我只是每天每天吃着近边的一点淡水，一点死的口粮。我就这么过。从前何尝没热烈地希望过？何尝没欢跃高兴地打算过？可是我的打算，我的希望都很少有实现的，不管那希望是多么可怜，不管那打算是多么节约。因之，我先是不敢希望，不敢打算：渐渐我就不想希望，不想打算了，我有目前的一点淡水，一点死的口粮，纵然那是非常的难于下咽。比如偶然有了一个愿望，到头没能达到。我觉得本该如此，毫不足怪；有时那愿望竟出乎意料之外的达到了，我也是淡淡置之，觉得原不过如此，并不失望，也并不怎么欣喜。一个人活得变成这样，原大可不必再活了。然而我却无法挽救。因为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实是一步步于不知不觉间逼得我变成如此这般。我想要是世界不大大改变一下，我这人将这样不死不活地直到老死了！说起来该多么寒心啊！——喔，怎么笔头里就跳出来这些闲话！还是带住吧。却说我们那个计划，果然没有做到。因为那时不允，日本兵在惬意取得热河之余，直攻平津，我们等当局渐渐不能镇静地平和谈判，至终宣布不负生命安全之责的玩笑开过之后，即便各自奔命，连盘川也没弄到，游玩的事自然只好摆在一边了。

暑假里在家乡闷住了两三个月，由于个人特殊境遇的熏染和逼迫，我的心绪变得格外像一个乌沉沉的阴天。我这人心境太狭小，我跳不开，超不脱。可是却想拨一拨心上笼罩着紧压着的那些乌沉沉的云雾，求一个暂时解脱的

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接到朋友的信，提起那个旧约，心里十分的感激了。

在镇江下了火车，有一个旅馆茶役非常亲热地赶着喊我“少爷”，给他那么一喊，好像就非真的做他的少爷不可。我告诉他说，我要过江，我要到扬州。那茶役是个中年男子，戴一顶敝旧的草帽，穿着一件卫生汗衫，腰和腿有意弯曲着，把一张黝黄多皱的瘦脸扮成一个非常亲热非常凄凉的苦笑，恨不得凑贴到我的脸上来。他说：

“少爷，好久没回府了。我侍候。我侍候。”

说着，就在我的褪色的直罗长衫上掸拭着烟煤灰粒，把我手里的几件东西接了过去，请“少爷”自己暂且看一看行李，三步跑到马路上去叫车子。我盘算着该怎样装扮一个扬州少爷，没曾盘算得妥当，车子已经喊来了。他把我张罗上车，告诉我说：

“少爷，行李交把我，没得关系。”

到了轮站上，一切由他照管，不用我费心。并问我饿了没有，说渡轮还有一会才开，劝我吃一碗面。那轮站上有一个过亭，过亭里就有一家点心铺。他把我张罗到那铺子里坐下，叫伙计给我做一碗鸡汤面，并招呼要清淡一点，别弄得油腻腻的。一边就坐到我身边，和我谈天气，谈黄包车夫不规矩，问我住在扬州什么地方。我只好含糊地支唔着，因为我一时想从这人处享受一点扬州少爷的享受，而我的口音就怕有露马脚的地方。匆匆把一碗面吃完，走出那铺子，心里不禁有点失悔，想着一位扬州少爷或不应该到这铺子里吃一碗面的吧？

他把我送上那个轮渡，张罗我坐到一间十分体面的大菜间里，给我敬上一杯茶，替我擦火点上烟，就走到外面去。不久轮渡就开。同座的搭客除一位穿花花绿绿的衣裳的年轻少奶奶，另外还有五六位肥头大脸的上等男子。那几位男子都穿着大袖大身腰的米色纺绸或印度绸长衫，有两位把长衫脱了，里面也是穿的宽大的月白的米色的绸褂子。他们都是四五十岁上下，白的肉，圆的手，手里各捏着一把讲究的折扇。大家集中口舌向一位有胡子的开着玩笑。说一句，大家就放开有福气的洪亮喉咙哈哈笑个半天。一位镶有金牙齿，剃着光头，面上平平正正地悬着一只肉累累的宽鼻子的把扇着的折扇收了，在手掌上一拍，说道：

“听我说：今天是我们的王三爷东道主。秩序单子由我小兄弟拟。是这样子：先到我们的王三爷的金屋里。先来个四圈。这个话可通得过？”

“附议，附议！拥护拥护！”混杂着洪亮的赫赫哈哈，一致地回答。

“且慢！”有一位忽然把笑着的圆脸收住了，扮得像有那么回事的说道：“王三爷的金屋呀，……要记得今天是礼拜，门口说不定有只狮子！碰到了狮子，我们的王三爷吃不消。小兄弟也怕，小兄弟敬——谢——不——敏了。”这后一句是戏台上的说法，并把着双手拱了两拱。

“‘河东’交小弟支唔，没得关系，老哥不必过虑。听我的：第二个节目是富春‘下午’。——”

“反对，反对！我们要我们的阿娇亲手作羹汤。——”

“你们的阿娇？……你们的？嗨！……”

“该死！该死！”用扇子自己敲着光头：“王三爷的。王三爷的。——小兄弟一时失言，王三爷海函，不得见怪。”

被叫着王三爷的那位胡子，近在我的身旁，佯而不睬地只是迷迷笑着，

自管自展看着手里的一把折扇。那扇子上面画着一棵苍松，松树头上立着一只鹰。笔致苍劲，十分大方。题曰“英雄独立。××三兄大人雅嘱”云云。另一面写着一首韦端己的诗，王三爷品一回英雄独立图，又哼着鼻子顿着脚念一回：“……月明衣上好风多。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绿杨摧折……”他把诗句有意高声的诵着以抵制他的同伴的喧哗哄笑。

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里十分羡慕。这样一把年纪的人了，而能有这样肥白的肉肤，这样快乐天真的神气。十分叫我惭愧。我直觉地嗅到一点扬州气味。我觉得扬州是个好地方。

正在这无头无绪地想着，忽然有一个着很整齐体面的西装的先生从门外走进来，脱下帽子和我点头。我看看那张脸，并不相识，他从腰下夹着的一只皮包里拿出一件东西，直擎到我的鼻子前，把我吓了一跳。忽然，他向我背起书来了：

“头痛脑晕，受寒中暑，舟车劳顿，精神萎靡，四肢无力，……请用国货生丹，立见神效。如有不验，包退还洋，绅商学界，爱国君子，皆当提倡。振兴国货，责无旁贷。……自己不用，赠送亲友，皆大欢喜。……”

他像炒黄豆似的哗哗噗噗地念了一套，唾沫溅满我一脸。我心里很是惶恐，想着应该怎么对付这位有趣的先生。没曾想出一个所以然来，只好摇了一摇头。可是他不饶我，照样又念了一遍，把包‘生丹’硬要塞进我的手里。我无可奈何了，我说：“老哥，算我对你不起。——”

我的话没说完，他就抓起那包生丹立即转过身，大踏步走出去了。那章法有惊人的新奇。

不一会，轮渡已经靠岸，那茶役进来喊“少爷”不要忙，东西都由他招呼上汽车。岸上是一片田亩，数座茅棚之间停着几辆汽车。上车后，那茶役把东西一一点交给我，并问我几时出来？叫我搭信向老爷老太太少奶奶请安。我很钦佩他的创造天才，拿了一块洋钱给他，向他道了辛苦。

汽车道上拥挤地密缝着杨柳树，整齐地分成两排，画出一条修长的大道。那些杨柳树不十分高大，但枝叶却很繁密，静静站着，颇有温柔敦厚之致。从这些杨柳树上，我又直觉地嗅到另一种的扬州气味。

车行约一小时，便已到站。下了站，有个大华旅馆的茶役走过来招呼我。我把东西全都交给了他，便有纵目张望的自由了。站外一条河道，（大约是运河吧？）紧靠岸边便是一座古城。那垣墙正对着我敞开一道大门。门上有许多人进进出出，要以挑水夫居多。岸边有些穿黑褂子的女人，裤子直卷到大腿上，裸露出白白的腿肚，有的在淘米，有的在洗菜，有的在洗衣服。喧哗声和棒击声闹得一片乱响，把一座古城点缀得分外活跃可喜。

那茶役向对岸招了招手，那边马上撑来一只厚大的木板渡船。船撑到河中央，那些裸着大腿的女人已近在我的眼前。想到“扬州老妈”四个字，觉得机会不可错过，少不得约略看了一番。她们的腮巴和臂腕都和大腿一样？丰腴，浑厚。一时觉得那些杨柳树，这渡船，这座古旧的城垣，和城垣上的门，……都和她们有相同的调子：丰腴，浑厚。

大华旅馆门面不甚高，但里面却十分敞大。我在楼下要了一间很整洁的房间。洗了面，换了一身衣，便叫茶役替我雇车子到百花巷。

这百花巷是白眼兄令岳公馆的所在地。他平时在岳家居住的时候多，所以我该先到这里找他。那茶役一听就十分熟悉。问是不是×家？我说是的。

他就招呼那车夫拉向百花巷×公馆。

街道都是石板砌就，车子拉在上面并不怎么颠簸，有一点浑贴的感觉。转弯抹拐穿了许多大街，老看不见百花巷三个字。那些店房大般带着古旧的气色，偶然也有崭新洋灰门面的，但都是药房浴室之类，到底占绝对少数。店门上大部站着坐着人，有的是女人，不管年轻年老，也大般刚才在河边所见的一般气派：黑褂子，赤脚裸腿；有的是男人，肥厚的身材，一手撑着腰，一手摇着扇或剔着牙，在店门上站立，一种悠闲自在的空气弥漫在四周。

车子从街上转了拐，走过几条幽僻的小巷，忽然在一家门前停住，说到了。那门上跳出一位男子，黑脖子，黑背心，赤着臂膊，光头上的稀发，花白了，问我找谁？我说找姑爷。那人说：

“你站一站，我进去给你问一问看。”

他进去了一会就走出来，回说：

“姑爷不在，回家去了。”

“姑爷的少奶奶呢？大老虎小老虎呢？”

“都不在，都不在，回家去了。”是很不耐烦的回答。

我很失悔怎么找错门路，十分怅惘。问他家离这里多远，能不能领导我去？那人说远得很。说罢即掉头而去。

我抹着额上的汗，觉得这人和这古城，和这大条青石的街道，和……都不调和。像在一曲和谐的交响乐里听到一声刺耳的错音，心里觉得难过。

带了一点稍稍的不愉快，叫车夫向白眼兄自己的家拉去。重新走过大街，转了许多路，在一座总门上停住了。那总门内一条小巷，有许多黑色的便门。我有点迷惘了。我想该敲那一座门呢？想着，看见几个女人在巷里。我特意找住一位小脚的询问。那女人很对劲，吩咐她身边的一位肥头大脑的孩子带我去敲最里的一家门。

门里问：那个呀。开门的那人穿着白色短褂，含着一脸忠厚和平的微笑。那脸的轮廓和调子，差一点儿我就拉了他的手喊白眼兄！

看见这位开门的人，心里得到无上的慰安。我心里有数：这是白眼兄的令弟吧？

他延我走到里面，那是一座“对面笑”的房子。小小的堂厅里一张大皮椅上躺着一位赤膊的人。那人看见我，跳起来和我握手，赶忙披上褂子。

大家相视着笑了一回，乱糟糟地说着话，丝毫没有头绪。

洗面吃茶后，两位主人领我到右边的一个院落里参观。那院落不十分大，却很是紧凑。紧紧接着院墙头露出一沿城垣，原来这里便是在城墙根下。院中几座花墩，长满花木，留出一条方砖砌成的小径。小径被架上的藤叶罩盖着，太阳光碎乱地洒满一地。架上藤叶间挂着几串被鸟啄残的葡萄，墙拐里缀着蛛网，城垣上摇曳着数丛荒草。一种萧疏可亲的情景，叫我舍不得走开。两位主人亲自到里面搬出椅子和凳，就在那葡萄架下坐下来，大家高兴地吃茶谈笑，空气十分安详自在。纵然我是在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面前还有一位初次见面的主人，但我好像回到阔别的自己的家里，觉得花墩上一棵小草，架上爬着的一只虫豸，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确感到无上的舒泰宁贴。

座位跟着太阳的影子一次又一次向西边移挪，渐渐移到一棵白眼兄幼年时最喜攀爬的果树下，一壶茶已冲上数次，地上的烟蒂也已经可观，女佣送来百合汤；吃完百合汤，院落里的太阳已所余有限了。

拜看老伯母后，和白眼兄同出来。走出北门，就得过渡，在渡船上向西

望去，只见河上矗立着一片染满夕阳的桅墙，天空上散乱着大块的褐色云霞。那些云霞镶着皎亮的银边，像是一块块顶在桅樯头上，一座黑色的城垣反照得格外苍茫疏老。渡到对岸，白眼兄闲闲地捞起长衣袖，慢慢从里面衣袋里摸出两个铜子放到船板上。那派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趣味。

岸上是一片荒疏的丛林原野，几个赤膊的人佝偻着身子拉着船桅上的纤索默默地由岸边走过，我们随便走上一条小路，渐渐穿过一片树林，面前展开几口长满菱芡菱荷的池塘，塘那边遮着几片篱落，伴着几堆高高低低的土坟，有个小孩子蹲在塘边攀捞东西，一边用手剥弄着。我们走过去，和那孩子说了几句话，那孩子头也不抬，用一种稍稍含羞的样子和我们答着话。白眼兄说，这一条路，是他自少年时代最多流连的地方，并告诉我许多有趣的回忆。

由这里向西走去，不久，就到那汽车站，过了渡，走不几步，正是我住的那家旅馆。

我的房间的窗外，一个胖胖老婆婆正在替我洗着刚换下的衣服。那老婆婆听到客人回来了，由窗上探出头来，交给我一只表，和一串钥匙。抹抹汗，重新蹲下去了。原来我急于要和白眼兄见面，一时匆忙地将换下的衣服交去，衣袋里的东西都忘记取出，老婆婆把东西交还我的那种态度，使我感激得鼻子都酸了。

这一晚我睡得非常舒服，房里没一只蚊子，床上没一个臭虫，我像是睡在自己家里。

早上白眼兄来，要我搬到他的令岳家去，和他一起住，这事很叫我踌躇，但也不愿固执，就去了。

那屋子非常宽大，园庭住宅，规模甚都，虽然稍稍显得荒凉了。最里的一个整洁院子，才是白眼兄居住的地方。白眼嫂和大小老虎都是我十分熟稔的，也并不十分把我当客人看待。但我总时时意识到是在一个朋友的亲戚家里作客，一时颇为拘束，很想回到那旅馆去，或是到昨天喝茶谈心的那个萧疏可亲的院落里去。后来渐渐由谈话里知道一些实在情形，老太太看待客人又那样子亲热顾惜，才晓得自己的神经衰弱，就又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了。

富春茶社是在一条后街的小巷里。门面像一家小家庭住宅。里面几个简单的茶座，挤满客人；连外面隙地上也盖了棚子卖座。可见生意兴隆之概。客人都是中上社会的人士，有的吸着水烟，自在地说笑；有的手里展着一面册页，指点品评。茶桌上摆着数根点着的纸煤，袅袅地飘动着细长挺直的白烟，有如佛龕前的线香。几个褴褛悴黄的年轻人，拿着几件古玩字画在各处走动，听茶客自由索看，并没有急于求售的样子。我们同桌的，除白眼兄而外，还有一位白眼兄的亲戚。这是一位青年美术家。茶点后，同到他府上拜访，给我看了不少的佳作：书画金石都属质朴古淡一路，都大有汉魏风格。

瘦西湖之游，是在一次意外的风波之后。我由旅馆搬来的时候，在黄包车上遗落一只香烟罐子，那罐子里除几十枝烟卷而外，里面放着两张行李票。原来我过南京时，把一部分行李寄存在火车站上，预备回去时再取。现在把行李票弄丢了，我势必把寄存的行李白送了。这事惊动了全家，连老女佣也替我着急。我十分过意不去。当时发觉，夜已深了，白眼兄替我打电话托那旅馆代为寻查。旅馆回说要是真的遗在黄包车上，东西必可找回。这一夜我没曾好睡，原故并不是挂念那几件行李，而是看这一家人关切烦恼的情形，使我难过得没法饶恕自己。第二天大早上白眼兄就起身，同到那旅馆里，果

然把东西领回。一家人看见我们领回原物，欣乐之情，远过我自己数倍。我看见他们高兴，自己也就高兴了。

一时想起昨夜的情形，心里好像落下一块石头，一种轻松自如之感，恨不得学鸟雀飞到云端里去。白眼兄立刻提议去游瘦西湖。

谈到游山玩水，我得承认，我是个很没风趣的人。对于自然景物往往不会领略。所以每当人家十分兴奋地提议游玩山水时，我总是对之无可无不可。然而在那一场风波过后，我的兴致有说不出的浓烈，白眼兄的提议，使我从未经验过的高兴起来。

那是一个初秋的上午。太阳藏在晶莹明彻的厚云里，空气略略有点闷。走出城外，遇到一阵疏雨。那只是“云里雨”，洒在我们身上，添了不少清凉可喜之感。穿过几处茅舍，远远一片翠绿的树林，一望无涯。不数步就到绿杨村。一湾清澈的碧水，静静地躺在城垣下。浓绿的草木簇拥着两岸。城垣上颤动着繁密的藤萝薜荔，如一堵玲珑的篱藩。岸级下几只小舫停在那里，上面都张着白布篷，篷下摆着三两张藤椅。我们随便拣了一只坐上去。那撑船的是个乡下人，蓬头披发，穿一件敝旧的褂子，赤着一双大脚。她替我们买来几包瓜子之类的小食，沏来一壶茶，立即开船。

船身一掉转，没划动几下，就沿着城垣转了弯。几座水榭伸出面前。榭中郎当地堆着桌椅，椅子四脚朝天，放在桌面上。水榭边无数游舫，静静地排列着，空无一人。一个茶役懒懒地靠在栏杆边，低头对着水面上出神。从这阒寂中，下午的热闹情景，可以想见。这时间前望去，窄狭的湖面上盖着浮萍，迂委地直伸到远处的绿树丛草之间，宛如一条长带。岸上有几处台亭园囿，大都闭着大门，静静地蹲在一片浓绿的幕罩下面。

在徐园下船，略略走了一走，重新出来时，那个撑船的妇人和一个男子在那里吵骂争执。他俩抢着竹篙，相持不下。那妇人跺着脚，十分认真地咒骂；男子却一口不开，只傻傻地紧握着竹篙，瞪着笨涩的眼珠。我们重复上了船，他们还是拚在那里。那男子猝然用力把妇人一推，急剧地跳上船，一篙子撑离岸。妇人急得就要跳下水来抓他。看看抓不上了。只好跺着脚，放大声死鬼活鬼的骂起来，一边拾起石子追着打。白眼兄问那男子。

“是你的媳妇么？”

那男子抹抹头上的汗，点点头，手里继续用力撑着篙子，向前进发，一霎时那妇人的叫骂声已远在后面，听不清楚了。

我四脚四手地舒拥在藤椅里。喝着茶，磕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白眼兄话东话西；一边偶然看看岸上的景物，看看远处的天空，看看船身过去，撞破了又立即缝合的浮萍，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想起平时许多苦恼，犹如一个亡魂回到他的前生一样。

我们直到平山堂才回来，太阳把人的影子投在脚下，已是晌午了。

下午我们打了几圈牌。老太太买来许多佳肴，倒把我弄得不安起来。因为下过一阵雨，晚上分外凉爽。大家把藤椅竹床抬到大天井里坐地，吃肥白的大藕，谈各地乡风，直到二鼓方睡。

白眼兄问到我对于扬州的感想。我说自己能摆脱一切人事，忘记世界，到这里来作一个闲人。真是几生修到！

（原载 1934 年 4 月《清华周刊》第 41 卷第 3、4 期合刊）

村居记事二则

秦嫂子

到家的那天晚上，没看见秦嫂子出来和我啰唆，心里很是纳闷。问起家里人，说她已经死了；死得真离奇，说是在田埂上看黄豆，给人用石头打死的。

秦嫂子是前年到我家帮工的。那时门牙已经落掉四五个。黝黄的瘦脸上挤满很深的皱折，数茎黄茅草似的头发，远远就看得见发缝里的皮肉。看样子，已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婆了。母亲从前和她熟识；但乍见面却不认得。只因她是个“倒毛眼”，一根棉线终年扣在眉毛下，把上眼皮扣得向外翻转来，瞪出两只干枯红涩的眼睛，样子叫人看了觉得怪难受的。由于这个特点，母亲才慢慢认出来。母亲惊讶地说：“算起来你也不过四十罢，怎么就老得变成这样了？”

秦嫂子把倒毛眼眨了两眨，两片皱折的嘴唇扁得抽扯不过来，一种非常心酸的样子，哭巴巴地告诉母亲说，菩萨没眼睛，两年中，一家五口，死的死，散的散，只留下她一个人。

她丈夫是个泥水匠，说起来，我也认得的。那是一个忠厚的汉子：后脑上绕着一个辫子髻，终天只见他没由没缘地笑着。笑得又凄凉，又滑稽。父亲常常夸奖他的手艺，说他砌的墙挺直一条线，一点肚子也不露；说他蒙的地砖又平正又密合。村上年轻一辈子的泥水匠能有这样好手艺的，简直没第二个。这都是从前的话。近年来村上的屋子只见拆，连修葺的事也少有，动兴土木自然更谈不上。他的好手艺也就渐渐淹没无闻了。记得大前年我上学去，是他给我挑行李箱子的。多年没见他，他还是那副老神气：小小的辫子绕在后脑上，含着一种又凄凉又滑稽的笑。不过脸上额上加多了皱纹，眼眶四围尤其多，把一脸的笑容凑合得格外凄凉，格外滑稽了。我问他怎么改了行，干起挑担的营生了；问他一年赚得多少钱。他只是擤鼻涕，只是把鼻涕擦在手心上搓弄着，只是无由无缘地笑。记得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说听说太史第八老爷今年秋天要回乡安葬老太爷，到时候一定是叫他做风水。

秦嫂子说他就是这年死的。他抬轿子到外埠去，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队伍，被队伍拉去当伕子。他没见过世面，看见队伍就像小鬼看见阎王，吓得只是抖。又惦记着家里没米了，惦记着八老爷的风水。一天夜里想溜逃，不凑巧，被队伍半路捉了回来。队伍里说，你抬轿也不过是挣钱，现在给我们挑东西，那里就要你白费气力？你就要溜！说这事传出去了，会败坏他们队伍的名誉，非打一顿以儆效尤不可。这老实人本来就不大会说话；给那么一骂一吓，格外弄傻了，也不晓得求饶，也不晓得说好话。和他同逃的共有三个人，到头果真挨了打的却只他一个。说是用枪拐子打的，当时两条腿就站不起来。第二天还被逼着抵死走了五十里路。那是六月天，他又痛，又急；又害怕，走在半路上发了痧。队伍看他实在走不动了，才给了两块钱放他回来。当天他想住饭店。饭店见他有病有伤，不肯留；走呢，又走不动。结果是用翻倒的竹床抬回来。病损的身肢被猛毒太阳一蒸晒，病上添了病。到家后卧床不起，昏迷不醒。一会儿喊“兵老太爷饶饶我！”一会儿跳起来要去给八老爷做风水。屎尿都不晓得说，拉得满床稀污澜臭的。临死的几天喊口里苦，呕吐许多绿的黄的肮脏水。有见识的人说这是吓破了胆的缘故。

丈夫死后，第二年春上一个五岁的小儿子患“羊毛斑”，三天就死了；大儿子二十岁，在一家砬坊里作店伙。那砬坊因为折了本，休歇了。儿子和几个同事邀邀伴，跑到外埠去，一去迄无下落。现在只留下一个十二岁的女儿，是给一个庄稼人家作童养媳。

那时候她那病弱憔悴的样子，加上那一双怪难看的倒毛眼，使得大家都不喜欢她。然而母亲执意把她留下了。

她在我家帮工，很是勤快耐苦。只是有两点小毛病：一是喜欢缠着人唠唠叨叨地谈她丈夫，谈她儿子。把那些故事翻来覆去地谈着，一点也不厌烦琐。谈又谈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老是那一套。正和鲁迅先生一篇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不幸的祥林嫂的脾气差不多。二是逢时过节就要哭。有时偷偷摸摸跑到丈夫儿子坟上去，一哭就哭得不回来，还得家里打发人去劝她，拉她；有时躲在家里毛厕里，哭得一家人都疑神疑鬼的。

这两点小毛病，使得家里人格外厌恶她，有时甚至连母亲也有点不耐烦。但这些事都和我不相干。另有一件事，却是叫我感到万分头痛的，那便是关于她的大儿子的事。这妇人不知她自己是怎么个想法，总以为所谓外埠，只是一块有限的极小极小的地方，在她心目中大约顶多像我们村子差不多大小呢。因此，她不时和我啰唆。好比说，每次我要离家时，她就赶着制好几双鞋，一定要我把她儿子访问出来，把鞋带给他。告诉她说：“你儿子我从来没见过，他又没个正式名字，又不晓得在做什么事，那外埠纵然果真如你所想的那么小，我也是没处交代的。——鞋子还是莫带罢，我只能随时随地替你注点意，替你查问查问。那也是海里捞针，丝毫没把握的。”这浅显的道理不知怎么她就一点都不懂，一定要我带鞋子。

“大先生，积积德喂，做做好事喂。”她把两手握在胸前扭动着，用一种不知所措的可怜样子哭巴巴地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苦命的人喂。……”

接着就告诉我，她大毛子多么高，多么瘦，额头拐上有一块疤，是十岁时候爬树捉八哥跌坏的……她只顾说她的那一套，好像简直没听见我说了些什么。我没法说得她明白，只好如同做一件假事哄小孩子似的把鞋子带了去。（自然又重复照原样带回来。）每次回到家，又够她啰唆的。问我见她儿子没有？鞋子可合脚？还是胖了点，瘦了点？……她就这样自管自问下去，挺着两道难看的倒毛眼，非常兴奋，非常快乐，简直当她儿子毫无问题地已经被我找着了的一般。这事情真叫我没法对付。老实告诉她，你儿子我没法找得到呢，那她一定疑心我做事没真心，而且也一定使她大失所望，又够她哭几天嚷几天的；骗她说果然已经找着了，他在那里非常好，鞋子也合脚，百事都如意，那我这个谎该扯到几时才能完，将来又如何交代她呢？结果我还是只好支唔她，说我已托了许多熟识的人去打听，不久就会打听出一个眉目来的。

“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你放一百个心。一定找得到。包在大先生身上。”当她在毛厕里呜呜咽咽哭的时候，家里人就这样劝慰她。

平日和她走动的就是她的那个女儿，十二岁的那个童养媳。

那小姑娘不是倒毛眼，样子倒伶俐。也许是她为小儿子死，大儿子逃，因此伤了心，把一肚子做娘的慈爱弄得没处摆放，就全都拿来放到这个女儿身上来。三天两天的去看她，不时间母亲要点穿的吃的拿去送给她。这一下可害苦了女儿。乡间做童养媳的，那个把她当人看待？这几年庄稼人家，饭

也没法吃得饱，都挣命抵死的熬日子。她只顾发泄她的母亲之爱，把女儿这样金枝玉叶的看待起来，那女儿怎么能安心把童养媳做下去，做到头？于是婆家不愿意了。说养媳妇被娘娇惯得不成体统了：成天在家里不肯做事，不肯吃苦，没碰上就要扁着嘴唇哭。有几次那小姑娘就真偷偷摸摸逃到娘身边来，扯着娘的衣裳角，死也不肯再回婆家去。婆家来人说：“养媳妇不要了，还了你罢。你这位千金小姐我们这样人家配不上！刚好这两年我们一家也是九苦九难的熬日子，熬也没法熬得过，少一张嘴吃饭，我们巴不能够的。”秦嫂子急坏了，挺起两只枯涩的倒毛眼，十把鼻涕九把泪。大家帮着说说好话，才把女儿送回了婆家。婆家当着娘的面，把那小养媳妇吊到桑树上整了家法，答应从此母女不再走动。这是去年在家，我眼见的事。

去年我由家动身时，她又新制了两双鞋（连同以前的四双了），亲眼守着我放到我的箱子里。叫我告诉她儿子，说娘在东家十分好，叫他放心；说娘已替他积下点钱，三五年后积多了，就可以给他娶媳妇。我自然只好满口答允。但的确有点嫌那四双鞋子累赘，偷偷地要把它除下来。不知怎么她看见了，忽然要对我下跪。哭哭啼啼地求我，说这次一定能找到，说算命先生给他掐了课，是个“流连”课。“流连，流连，就在眼前。”说一定找得到。……

秦嫂子的死，要是把她的一生遭遇当作故事看，那似乎结束得太突兀。说是这样子的：秋天时候女儿的婆家因为年成不好，交不全田东家的田租，公公被押到区公所里，大伯子得了伤寒病。田塍上有黄豆没收割，不得不叫十二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小女婿去看守。

秦嫂子晓得了，心疼两个孩子会害怕，每夜偷偷地去和女儿女婿作伴。一夜，两个孩子睡着了，田塍上悉悉索索地有响动。她只当是只偷黄豆的小野兽，就把衣襟里预备的石头掷过去，“咄啊！咄啊”地赶。不想那小野兽一点也不怕，反倒越走越近。忽然，那野兽说话了：

“娘的！干你的事！是你的豆！……”

她这才晓得不是野兽，而是一个贼，一个深悉底细的贼！她晓得不好了，忙着推醒了两个孩子，三个人尖着嗓子叫喊起来。在平时，只要一叫喊，家里的男子或是别家田塍上看守黄豆的人自然都一涌而至，那贼也就给捉住，或是吓跑了。然而这时候却叫天不应，呼地不理。那贼肆无忌惮地自管自一把把拔黄豆，而且骂着。她怕黄豆给偷了，女儿会背累，一时情急，不顾死活地撞过去，一把抓住了那个大胆的贼。两个人扭做一团打起来。等到两个孩子敲开邻舍的门，喊了人来时，秦嫂子倒在田塍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喘着气；那个贼已经无影无踪了。

秦嫂子是被石头打坏了。头部和胸口满是伤，而胸口受伤更甚，一口一口地吐着鲜血。家里替她请医生来开方子，吃了“阿胶”，又用“七厘散”“万应锭”搽服，都无效。挨了五六天就死了。说临死的时候还扳着指头计算我回家的日期，说这次我回来，她儿子准有下落了。

三驼子

现在代替秦嫂子的位置的是一个年青的伙计。驼曲的背脊，矮小的身材，脸色虽然也很黝黑，如一般做粗事的人差不多；但眉目却颇清秀。大约是排行第三罢，大家都喊他三驼子。

他说话的时候，慢声吞气的，像卖弄似的不时夹些斯文字眼在里面。我

很奇怪，心想这个新伙计一定不是做粗事的出身。我问他说：“你从前是做什么的？”

他立刻脸红了，把手指在桌面上捺动着，忸怩起来。半晌，才说：“我从前是做生意的。”

家里人一半正经，一半打趣地说道：“莫看三驼子！三驼子现在是落了难，他从前是个斯文先生呢！——就是现在，还常常躲到你书房里偷书看。”又说，“他说他认识你。”

我却想不起几时认识他。我问：“你怎么认识我？”

三驼子含着满脸凄凉的笑，忸怩地说：“大先生想是忘记了：去年五月里大先生回府，歇在敝村那个茶棚里打尖。我在茶棚旁边一个三亩田里筑田堰。……”

他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去年放暑假回家，我在离家十里路的枫林渡茶棚里休息。茶棚临着一片田亩。那时田砧上有个汉子在伛偻着背脊筑田堰。我无聊地靠在杉木栏边看着他。他一锹一锹地在田沟里掘着烂泥，手法十分笨拙，样子很是吃力。一顶阔边旧麦秆帽遮去他的脸的全部。但是我看得见他的脚：那双脚一只浸在田水里，一只跨在岸上，大趾和二趾紧紧搭拢在一起，腿肚又瘦弱，又苍白。这样一双脚腿摆在这田里，不知怎么就显得十分不顺眼。我无聊地随口问他说：

“你老哥不是种田的罢？”

那汉子把脸背着我，站直身肢抹一抹额上的汗，低声回答道：

“我是没法，先生。”

当时我找他谈了许多话。他只是很简单地回答我，脸老是不肯朝我看。他告诉我他原是个做布店的，在那布店里做完学徒后，管了五年账。现在失业三年了。在家里赶了一年牲口，此刻又租了几亩田耕种。并远远指着北头山坡下的一块繁茂的桑树林，说那块桑树地是他自己的产业。在往年，或是自己养蚕，或是把桑叶卖给人家，很有一笔进款。这连着几年，这块桑地却变得一文钱都不值。那些密密丛丛的肥大的桑叶只好连枝丫剪下来，晒干了，当柴火烧。把桑树砍掉，种别的东西呢，心里又不忍。因之比如猴子拿了块姜，吃也吃不得，丢又丢不得。他说他有娘有老子，两个弟弟，四个孩子，连同妻和自己一家有十张吃饭的嘴。

这个人的印象留在我脑子里，十分深刻。因为在我们家乡，店伙失了业，为生活所迫，作了农人或他种苦力的虽然非常多；但是比较上级一点的，如司账大朝奉之类，则因平时摆惯了体面的架子，过惯了上等的生活，离开店后，一则碍于身份，二则限于体力，事实上却没法改行当。差不多十九是变卖祖上遗留的一点产业过活，寄生在娘和妻的身上过活。等到很少一点产业顷刻之间廉价卖完了，娘和妻也再担负不起了的时候，自己就已慢慢变成地痞流氓或乞丐了。如今这个人显然是个上等店员，可是却跌得下身份，吃得苦，马上租了田耕种，真叫我有点诧异。那次回家后，我把这事当做一件新奇的事似地谈给我的朋友们听。

现在这个人竟到我家作了伙计，更是我料想不到的了。当时我十分兴会，我问他：“怎么又不种田了？”

三驼子只是凄苦地笑着，忸怩地把手指在桌面上捺动着。半晌，才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了：

“大先生，做做鹅，又做鸭，怎么行。我也是没奈何，弄着试试的。说

起来，真倒霉！我歇生意的时候，我积了二十多块钱。那时候前途茫茫，二十多块钱够得吃几天饭？我就打算弄个营生做。几个同事劝我贩烟土。……那个事不说我外行，没法入得门；就是入了门，官厅里一记竹杠敲过来，我就吃不住。——我后边又没个靠壁山，我又没个夤缘大交情。——这笔发财的生意我不想。我买了一只毛口骡。心想给人家驮驮货，也不过跟着走走路，不算是苦交易。那晓得骡子买到家，谷子吃了我好几担；生意呢，是和和尚拜丈母的年！满街打听，求公公，拜婆婆，弄得一笔生意了，汗一把水一把的把货给运好了，——不给钱！今天讨，回明天！明天讨，回后天！这不是说笑话！我看看不对劲，硬起心肝把骡子过了手。二十一块钱买进来的，十四块钱卖出去。贴了七块现本不算数，白吃了我一家几个月的粮，憋了我一肚子的气。”

说着就又笑了起来。

“那你打错算盘了！”我说，“你是做布店的呀，你为什么不做你的本行当？你为什么不要弄个货郎担子，摇摇大鼓？你望着街上没生意，那个店铺肯进货？你买骡子做什么？”

“大先生，你这是外行话。货郎担子更没生意呢！说起这事来，我也有个笑话。我在店里最末的那年，店里已经没指望了。我想我老是坐在账桌上，怎么行？我说我也要练练，我要出担子。我在一个同事处学大鼓。——不要看大鼓这东西，学起来可不易。一个点子摇错了，人家就可以抢你的鼓。越是这种世界，这门江湖饭就越发不容易吃。——我学了十来天大鼓。记得第一天，从南乡摇到西乡，心里有点怕，腿也不抵用。天亮摇到黑，你说卖了点什么：三粒白壳钮扣，一只针环，四两白棉线。大先生，摇大鼓的比买东西的多好几倍！做布店的歇了生意，就都干这个！”

家里人听他说得那么狼狈，都不由得笑起来。

“这样的小本买卖我差不多都试过的。我没别的好处，就是肯跌架子。我不在乎。我只要能挣钱，什么事我都干。一家十张嘴，我不做，吃什么呢？我是没奈何。”

“你还做了些什么生意呢？”

“说起来，又要惹你们笑。我挑过豆腐干担子。我从豆腐店里发了货，到山里村子去卖。卖一块干子，我赚两个铜钱。一天赚二三十个钱。我干过。我家里做皮蛋卖。我有时挑出来卖。一块钱六十多个生鸭蛋，买盐，买石灰搓起来；卖出去卖得三四分钱一个。这算是笔好买卖。——就是没生意。大家饭也没得吃了，那个吃你的皮蛋？”

“所以你就种田了？”

“不是的。我是把田退还了东家，才做这些买卖的。我种了一年田。那自然是我穷无赖，憋着自己开个玩笑的：是我家隔壁一个客户，近两年，划算不过来，要退佃。东家不答允。我说笑话，我说我也来种一年田试试看。我从那客户处隔手租了四亩几分田。付牛租，付车租，……抵死要命的弄到秋天：算好的，年成倒不坏。真的凡事发‘暴手’，别人都遭了旱，我种的却是早稻，一点损伤都没受。可是交去了租，一盘算，剩下的几粒稻子刚刚够了长工的工钱，和药店里的药账。我白挨了一顿忙，赚了一场病。——索性病死也拉倒了，偏偏不死；死死，又活了转来。”

“你的身体倒不坏，亏你种下了台。”

“年纪青青的，我就不相信我没用处。我都要试试看。弄不好，也没

法。……”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真是没法想。依我想，在家乡弄不好，就到外埠去碰碰。可是不行。我想飞，我飞不动。——”

家里人插嘴说：“你就飞到了外埠，也不过去当了兵：不是去杀人，就是给人杀。这你三驼子怕不见得行。”

“所以呀，做人千万莫做中国人。好比说罢，我家那块桑地，多年不生一文利；要是在外国，那会有的事？听说外国人不会养蚕，就用机器把桑叶织成丝。新时行的人造丝，印度绸，不都是桑叶织出来的？……要是在外国，我自己不养蚕，桑叶卖给工厂里，我多少也弄得几个呀。”

“这倒没听说过。”

家里人打趣道：“那你快去做洋鬼子罢。”

（原载 1934 年 7 月《文学》第 3 卷第 1 号）

柴

天气一冷，山上树木落了叶，草也枯萎了。山居人家已忙完庄稼，日子很空闲。这时候他们上山斫柴，挑到村里和镇上出卖，算是一种业余的营生。他们所卖的柴不外三种：茅草，棍柴，大柴。第一种是最简单的，茅草这东西满山遍野都有，只要带一把镰刀，像割稻棵似的一束束割下，摊在地上晒一会，用草索捆起来，立刻可以挑去卖给人家烧用。棍柴大柴就不然，这是树木，斫起来，得用锯，用斧子，不像割茅草那样容易：斫下来以后，卖给了人家，也不是立刻可以烧火的；因为里面含有多量的水分，一时晒不干，烧时不着火；即使着上火，也是嗤嗤地叫着，浓烟直冒，熏得人流眼泪，暂时到底用不得。这是说棍柴。至于大柴，又要麻烦一点。棍柴是树枝，大柴是树干。从树干到可供烧用的劈柴，中间很有些手续。我们家乡的规例，卖柴者只将树干锯成两三尺长的木橛，这样就出卖。人家买下以后，还得用斧子和刀再加一番斫劈的工作，而后放到柴屋里，一堆堆积存起来，第二年才拿出来用。

茅草棍柴都是副燃料，用来引火，热炙已熟的食物，是行的；正经做菜煮饭还是烧大柴合适。冬天是收买大柴的季节。比较宽裕的人家都找一个合意的头脑，整趸的买一大批，以待来年应用。

收买大柴的时候是很有趣味的。每天黎明时候，仅有几只麻雀零落地在屋檐上叫，母亲走到床前，掀开帐子，低低地说：“懒坯，柴来了，起来打码子。”这时候房里还幽暗的很，仅只窗格子上露一点淡白的光。被里是极其暖和的，必定一次两次下很大决心才起得床。起了床，披上衣，瑟缩着身肢，拿了纸笔到后面院子里来。

院子里已经堆满了人和柴担子。柴都一橛橛排好摆在竹片制的套篮里；人都是一家人：祖父，父亲，儿子，侄儿和孙子。他们都穿着紧身棉衣，戴着厚布帽。脖子上吊一只盛锅巴的小袋，把在山上吃剩的锅巴末倒在手掌上，低头舔到嘴里，咀嚼着；不吃的人，把卷起来的长袖口捋下来，罩在嘴沿上，哈着气，藉以取暖。样子都是傻傻的。他们大都坐在自己的扁担上休息着，也有站着的。有那年纪很小的孩子和头白嘴瘪的老头子，因为路远，担子吃力，落了阵，别人都到了，他还不到。做老子，做哥哥或是做儿子孙子的，此时就放下自己担子，又回原路去接他；原意是想替他挑一肩的，但是本人却爱面子，很倔强，不愿意照办，歪着身肢，歪着嘴巴，硬要自己挑着，一路打着辫腿走进来。其实他的担子每头套篮里只摆着一橛二橛柴，看来不过二三十斤。要是这人是个小孩子，就有人不免打趣他，说：“看看和尚挑轻担咧！”“他刚才下山的时候还夸口说太轻了呢！”被打趣的人照例没得回辩，腼腆地放下担子，动一动压痛了的小小肩膀，用袖口抹抹小小额头上的汗，红着脸站到一边去。要是这人是个老头子呢，情形又两样。儿子孙子都开心地望着他，他打一个踉跄，别个身肢也不由得跟着歪一歪，好像这样就可以代替他出一把力气，减轻他的担负似的。这时大家脸上的表情都不约而同的很严肃，纵然老头子的那个不像样的担子和那种吃力的姿势惹人好笑。

对于他们，母亲都熟识。因为买柴的人家喜欢老头脑：老头脑的柴料都是上色的；同时卖柴的也喜欢老主顾：老主顾的秤比较的公平。所以除非不得已，十年八年难得换一次新头脑。有时这一年买了这个头脑的柴，到明年后年又找上那一个，换来换去反正都要互相熟识的。每年收柴，都是我的母

亲执秤。母亲嫁过来三四十年，就已经收了三四十年柴了。对于那些小孩子，前不久的那年冬天，就在这院子里，听到他的祖父说今年要替他父亲娶个媳妇了；他父亲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听到这话，就红了脸，把眼睛盯在自己柴担上，低着头，显得怕羞的样子；随后听到他祖父谈新娶的这个小媳妇多么贤德，多么肯吃苦，多么的有能干；又不久，就听到说家里又新添一个小把戏了；现在忽然看见这小把戏能挑得二三十斤柴到这院子里来，果然像个人样了，回头想一想，自然觉得格外亲切，格外有趣似的。对于那些老头子，母亲少不得要谈到他当年的时候，担子一百八十斤，二百斤，都是如何骇人的重；说那几年曾经有挑过二百斤出头的。老头子就喘着气，回答道：“没谈头了，奶奶。”“要落土了，奶奶。”说的时候眼睛里泛着凄清的光，神气很衰弱，很颓丧。大家听了也都不免替他感伤。要是安慰他说：“你有好接手的呢！你看你的接手的怕都比你强呢！”这老头子少不得望望他的儿子们，又望望他的孙子们，虽然摇摇头，表示并不见得好，但脸上已经含着微笑了。

于是母亲一壁称着柴，——青年小伙子和壮年人的担子都是一头一头的称，孩子和老人的两头并做一次称——一壁把斤两高声告诉给我，记下码子；一壁还劝那父亲要给他孩子少挑一点，因为问问年纪虽是九岁十岁了，但看样子好像不过六七岁，说这是因为劳苦得太过，伤断了缘故；同时自然也少不得劝劝儿子孙子让那老头子歇歇手，来年不要叫他蛮挑了。听话的人很感激。“是哇，奶奶的话是不错的。可是他们要逞能，要不服老呢！”“家口重了哇，奶奶，驮不起吃闲饭的哇，奶奶。”

但回答却是这样的。

这时候太阳不过刚出山，照在院墙的头上，涂着一层浅浅的金黄色。院子里鹅卵石铺砌的地上凝结着白色浓霜。大家嘴里说着话，都一口一口地吐着白色的气。称过后，他们把柴橛整齐地堆到院墙脚下，在挑到的柴的价值以内支取一块两块钱，而后把空的套篮挂到扁担的一头，驮在肩上（这上面往往还挂一只装油的竹筒），到街上买了米，打了油，才赶回家去吃早饭。

柴收齐了，得雇一个人来劈来斫的。雇来的那人劈着斫着，我们家里人就忙着把劈好的柴一篮篮搬到柴房里堆墩子。不知为什么，我小时候很喜欢这个堆柴的工作，并且当那人劈着的时候，我还喜欢站在一边呆呆地看。一橛橛的柴，有细有粗，质料也不一样。有那一种叫做“栗柴”的，往往圆径有一尺多阔。劈起来很是吃力。那人歪咬着嘴唇，双手举着大斧在头上，用力对准劈下去，立刻就分成两片，十分干脆爽快。但有一种疙瘩柴，却不那么容易劈开，常常连劈几十斧子，劈得那人发了火，还是劈不开。那人就好像对付一个最倔强的歹人，在手心上吐口唾沫，搓两搓，咬着牙，瞪着眼，拿出蛮劲来，要和它拚一拚。嘴里狠狠地骂着说：“娘的，看看是你硬，是我硬！”直要劈得成了碎片碎末才肯罢休。这种疙瘩柴，大般都是因为上面曾经有藤萝盘绕过，所以弄得遍身别别扭扭的。如果这疙瘩柴细巧，扭得又整齐，那就不劈它，讨下来，刨去外皮，做灯笼柄，做手棒，都挺别致挺好玩。

劈柴的人是客户居多，因为这种激烈的工作，从天亮做到点灯，中间除吃三顿饭，吸一口旱烟，喝一口茶而外，很少有休息的时候。这只有那些客户吃得消。因为他们吃惯辛苦，不在乎。客户，我们家乡又叫做“江北老”，因为他们都是江北人。他们的家乡常年有水旱，有兵灾，田租又缴得重，怎

么勤劳节俭也很难活命，因此都逃到江南来。他们来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头，给人家做短工，做长工；到冬天就给人家劈柴。赚得的钱，带回老家去养家口。也有很多十几岁的时候来，做到三十四十，积上了几十块钱，在当地娶媳妇成家，永远不回去的。

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劈柴的人，我曾经做过他的好朋友。这人的真姓名我当时是知道的，现在却不记得了。但样子，脾气，和当时许多情形，我还能说得出来。他是一个癞痢头，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只是一个发亮的，光秃秃的老黄色的头。（他劈柴劈得热了的时候，就把戴着的一顶老布和尚帽脱下擀到柴堆上去。）脸子干枯瘦削，有点像他用的那把斧子。身个子高得有点可怕；尤其是两条腿，又细又挺直，简直像缚了高跷似的。在起初，我有点怕他。因为我想像他像无常鬼。后来渐渐混熟了，发现他很喜欢我，并且毫无可怕的所在，我才渐渐不怕他。我给他取个名字叫鹭鹭哥，他也不否认，肯答应我。那时他大约快近五十岁，我是个小孩子。

他有一只阔大的嘴巴，像一只鼯鱼。那只怪样子的嘴巴只在劈柴用力的时候歪斜着撕开来，只在对我作怪样子的笑的时候撕开来，平时总是抿着，现出很苦恼很严肃的样子。他做事很小心，很卖力，好像生怕人家指说他，贬责他似的。比如：他吃饭只肯吃三碗，吃很少的菜。家里人劝他多吃点，他就添一碗；不劝他，他就只肯吃三碗。有时给他一碗较好的菜，比如一碗豆腐煮肉，他一筷子都不动，只当没那碗菜在眼前；要是劝他吃，他就很谨慎，很珍惜地尖着筷子，钳一块豆腐搭在饭上，分做几口吃。他吃饭吃得很快，满满一碗碰到鼻子尖的饭，一口吃去半碗，两口三口就现出碗底。但吃法却又很缓慢，很斯文，并没有饕餮的样子，这恐怕是因为他的嘴巴特别大的缘故。他不大咀嚼，我没有看见他咀嚼过，其实他是有很好的牙齿的。……吃完饭，用舌头舐舐牙齿缝，擤擤鼻涕，一边就弯着高大的身肢，在地上拿了斧子继续去劈柴。一点都不肯打闲偷懒。

有一天下午，我搬了两橛柴在院子里舞花棍。——说是舞花棍，其实我只看见过戏台上孙猴子舞得好看，不知不觉就学着想舞；到底是怎么舞法，我并不知道。

“你喜欢武艺吗？”

一个像用喇叭筒子放大的怪嗓子在我后边响着，把我吓了一跳。回过头来，院子里没有第三个人，是鹭鹭哥在撕着鼯鱼的阔嘴巴，瞪着眼睛对我傻傻地笑着。我从来没听见他说过话，也没有看见他笑过。他的脸子摆惯了认真和苦痛的神气，一旦笑起来，竟那么难看，那么不成样子。

他大约是因为院子里没有别人，所以才肯说话的。

他告诉我，练练武艺是要紧的：可以不吃歹人的亏，可以防身，可以操练身体。他说他学过几套拳法，他愿意教给我。一天晚上他下过工，我偷来一盏煤油“照子”。就在院子里，他偷偷地教我打拳。

我舞棍子，不过是小孩子的一时胡闹；对于武艺，并谈不上有多少兴趣；而他的拳法，也一点不能叫我感到兴趣。因为我看见他打得很吃力，有时连腿都站不稳：右腿踢了出去，左腿就难支撑得住，弄得高大的上半身两边乱晃；并且“赫何赫何”地喘着粗气。——那是奇怪的，他已经做了十几个钟头的最激烈的工作，他已是快五十岁的人。

拳虽没有继续打下去，但我们却因此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发现到这么个怪样子的可怕的外乡人，骨子里却是这样脾气好，这样的叫人愿意和他亲

近。

每到院子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那个很难得听见的，像用喇叭筒子放大的怪喉咙，就缓慢迟钝地拉开了。他告诉我各种柴的名称：那是青皮桧，那是白栗，那是“枫和尚”，“酸痴头”。那一种柴“干蚀”最小，也经烧，是上色柴；那一种柴，过一年，一斤只落得八两，烧起来像茅草。他和我谈打猎：野猪“坐了荡”，比老虎还要来得凶；“天赦”日干打不得獐，打了，是有罪的。又告诉我，碰到凶恶的狗子追在后面咬，不要理睬它；等它走近了，只要随便抬一抬脚后跟，就能刚巧踢到它的下巴颏，踢得它哭悲悲地叫了回去。……他告诉我许多事。一个字一个字地，像背书背不出那样的缓慢迟钝地说着。说一句，歪撕着大嘴巴，用力砍一下，同时鼻里喉头发出一声沉重的用力的声音：“哼！”

一有机会他就和我谈这些心，笑得那种怪难看的样子。有时有别人在跟前，他也偷偷地望我笑一笑，意思是等这个人走了时，他还要同我谈的。

渐渐他和我谈到他自己的事。

谈到他自己的事，他是用一种守秘密的神气，好像在和他的亲密知己报告一件最严肃的事情的一般，作古正经，一点不随便。那时候我还不曾遇到过大人肯这样认真地来和我谈心。我就不知不觉像大人一样，静心听他说，心里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但也有点高兴。

他谈的许多事情，有些我懂得，有些是超出我当时的理解能力之外的，有些是因为他天天谈，天天谈，老像谈不完，我就很难耐心仔细地听下去。我现在只记得一个大概。大约他在年岁很轻的时候就离开他的家乡，到我们江南来。他的父亲坐了牢，好像是“站笼”。他告诉我为什么他父亲坐牢，背了什么冤屈等等，我当时就没曾了解。他天天和他母亲到那个空场上，远远地看着他父亲站在“站笼”里。是六月天，太阳像火。他父亲的脖子架在上面托板上，身体笔直站在笼里，这样站了许多天。同样站着的不止一个，还有许多人，他说了名字的。看热闹的人也很多。站了几天之后，才把脚下一块板抽去，断了气。他的母亲好像也在那天死的，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死的了。他跟一个邻居到了江南以后，在一个农家做长工。那是一个富裕的农家，有许多牛，许多牲口，每年收许多稻，雇用着许多伙计。他自己是看牛的时候多。他在这人家大约住了很久。因为他的气力大，能做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主人特别看重他。他把这人家的情形谈得很详细的：一条牛有多少出息，一头牲口能驮多少货，一亩田能收多少菜籽，多少稻，多少白菜，他每天又做些什么事情；其他如牛打架的时候怎么对付，牛生产的时候怎么看管，等等，他都说过的。其后他犯了一件什么事，那人家把他打了一顿。他就离开那人家。大约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一次散兵，身上有几块钱全被抢去。那几个兵并没有枪械，力气也不见得比他的大，但他的钱竟被他们抢去。他告诉我，他那时要是会打拳，就不会怕他们。他说一个人只有蛮气力，不会打拳，是没有用的。他就吃了这个亏。因此立刻学了几套拳。

他年岁很大才娶亲。娶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丫头，花了他许多年的仅有

野兽被猎负伤，逃到一个便于防御与攻击的有利地形（如三面可以屏障身体的石岩下，去舔创口；猎人称此为“坐了荡”。）——作者注

在旧历书上，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之日都注明“天赦”，意思是赦过宥罪之辰。——作者注

的积蓄。这个丫头比他年小得多。谈到这个女人，他是很气愤的。

“娶媳妇，——哼！——我和你说，——哼！——千万娶不得——哼！——有钱人家丫头，——哼！——千万娶不得。——哼！——那娘的，——哼！——不是好东西。——哼！——那娘的——哼！……”

他的阔嘴咬得更歪一点，斧子下去更用一点劲，好像他正砍的是那丫头一般。他说那丫头好吃懒做，三朝两天和他吵闹打架。他们闹闹打打的在一起过了几年，生了一个儿子。他告诉我他那儿子有多好，是什么样子的。此时要是不死，应该像我这么大了。……

说是有一年发黄梅大水，他应差抬一个委员的轿子下乡催税。正走到一座板桥上，那桥断了链子，倒了，他们都翻到水里去。他舍去性命把那委员救上岸，文件东西都没捞着，那委员喝了几口水，又吃了惊吓，回去就生了病。委员倒是个好人，不一定计较的；但是委员的太太却不答允，把他拿到县衙里打了一顿，坐了三个月“班房”。他告诉我班房里的生活多苦，牢子多么不讲情。他叫我不要把这些话谈给别人听，说那是不体面的。他坐满班房回到家里，儿子死了，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家里一点点东西全都给她带走，连他的衣裳都没留下一件。这是当时前不几年的事。

如今他单身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庙里，白天给人家做短工。他心里的苦，很少有机会谈出来。他说老婆他是不想的，他很想念他的那个儿子。

“做事呀——哼！——总要小心。——哼！——小心是要紧的。——哼！——都是我不小心。——我，哼！——我和你谈呀，——哼！——做事莫冒失。——哼！——我不该——哼！——不该过那个桥。——哼！——他打呢，——哼！——给他打一顿。——哼！——桥是不过的。——哼！——不过桥，——哼！——我的儿了不能死。——哼！——不能死的。——哼！——我做了一生一世，——哼！——我就为儿子。——哼！——儿子死了，——我，哼！——我就没想头了。——哼！——我住破庙，——哼！——我不丑。——哼！——那娘的跟人，——哼！——跟人跑，——哼！——我丑煞。——我，哼！

到现在，我还好像约约隐隐听得见这个沉重迟缓的声音，还看得见那个瘦削的脸上的一双湿漉漉的眼睛，和那只歪咬着的阔大的嘴巴。但是这个人，应当早就不在世上了。

这几年我们家乡的光景已经大大不同。买得起整趸大柴的人家，有的只好烧烧那冒烟熏眼睛的湿柴，有的只好自己上山割点茅草，检点松针，去塞那常常几天不举火的冷炉灶；还有少数一部分人是逃到了外埠，总之他们都不能像从前那样安闲自在了。至于那些劈柴的，卖柴的人呢，我知道他们大半仍旧在当地天天和死亡饥饿挣扎着，但总之，他们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安心了。

（原载 1934 年 12 月《文学》第 3 卷第 6 号）

泰山风光

下午两点钟，我的老朋友来找我。在这个四四方方的寂寞古城中，这是我唯一的一位老朋友。我说：

“多天没见了啊，近来怎么样？”

“我告诉你，我沾了那几位教官先生的光，搬到泰山住下了。你到这里这些天，还不曾陪你好好逛过泰山，今天特意约你去玩玩。——这几天山上真热闹。”

“是不是还是上次说的那个庙？你们叫勤务兵去和道士说，道士不是不大欢迎吗？”

“不欢迎自然要叫他欢迎！教官先生里面一位足智多谋的，想了个主意。第二天，我们亲自去找那道士，说：‘当家的，咱们营房里的屋子已经不够住了，打算开一连弟兄到你们庙里来住。你的房子是空的，你不给住，难道叫我们去占人家民房吗？——我们现在来看看，看的合了意，就把咱们的屋子让他们，咱们搬到这里来。弄得咱们不高兴，咱们就不搬了，让他们搬吧，横竖一样的。’那道士还算是个知趣的人，给这么一说，立时竭诚欢迎起来，‘那，教官们愿意来住，俺们接都接不到。’……哈哈，欺善怕硬，就是这个世界么！”

“那房子还好？”

“房子好，空气好，样样好。比起城里这些破笼子，简直是瑶台玉阙了。——你去看看就知道。”

多天没出门，一到街上，情景有点两样。窄狭的石板街路上来来往往挤满了一种乡下人。他们的样子打扮都大同小异：干枯的瘦黑的脸，敝旧的深色的棉衣。有仅仅只穿一件黑布棉袍的；有在棉袍上面再套一件庞大的黑布棉马褂的。有戴毡帽的，有戴瓜帽的。帽上，衣折上，都堆着一层灰黑色的尘土。有些没戴帽，露着一头稿色头发；间或还有拖着辫子的。有些老年的，焦黑的口唇盖着一丛蓬松黄胡子。胡子上，头发辫子上，要是仔细看，也是沾着一层灰土。有的拄着龙头木拐，手里拿着一些粗劣的玩具之类；有的肩上背一只小小的褡裢，里面装着干粮，铜钞；有的拦腰系一根带子，背后歪插一根旱烟袋。他们的眼眶深陷，放着钝滞呆板的黯光。脸是板着的，严肃而又驯善。在街上挨挨挤挤地走着，每一个步子都跨得郑重而且认真。他们也不笑，也不说话，除非在货摊上买东西论价的时候。

这是一条城中唯一的大街，排着一些门面低矮狭浅的古老店铺。店铺大都是京广洋货铺，书籍纸张铺，图章铺，杂货铺。他们不大进这些铺子买东西，所注意的只是货摊子。这种货摊子都摆在店铺的门口。有的是店老板特意为他们设来应市的，有的是别的小本货贩摆设的。货摊种类不同，要都以小孩玩具为主。铜质的小锣小铛，洋铁的花瓶烛台，泥制的哈叭狗，不倒翁，屁股上能吹出声音来的小雀子，柳条编的元宝小篮，木头大刀，木头小鼓，木头拐杖，木头碗盏。——都用红绿颜料涂得很花骚。除了这一类陋劣的土货而外，那些京广洋货铺门前的摊子上还摆着另外一种玩具：小汽船，小飞机，皮球，洋娃娃，七星摇铃，翻杠子的“小东洋老”，一些又精巧又古怪的橡皮或赛璐珞的玩意儿。对于这类东西，他们很少过问，顶多也不过站着看一会。——这时候那贩子连忙把发条开足，那小小“东洋老”就卖命地“格搭！格搭！”翻起杠子来。看的人松开板着的脸，笑得那种有趣样子。于是

同伴里面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牵一牵衣裳角，走了过去。

这条古旧的大街，平常给我的印象就是个灰黑色。现在堆上这些灰黑色的人，——灰黑色的皮肉，灰黑色的衣着，灰黑色的神情——使我忽然觉得连空气阳光都变成灰黑色的了。

转了几个拐，出了大街，来到岱庙跟前。岱庙是靠着城墙再套一道小城墙，所谓“大圈圈套一个小圈圈”，宛如北京的紫禁城。外墙上平列着三道大门，三道甬路直通到里面。大门口，甬道旁，满都是上面说过的那种货摊；货摊中间的窄路上满都挨挤着上面说过的那种灰黑色的人。

岱庙里面一片锣声，鼓声，喧嚷声。灰土飞舞。

空场上东一堆西一堆，有耍把戏的，有卖西洋景的，有唱“托傀儡”的，有说书的，有搬弄刀枪，卖跌打损伤狗皮膏药的。——围成这些圈子的，也大概就是那些灰黑色的乡下人。

我和朋友随便挤进了一个人圈子。圈子中间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戴一副古式墨晶眼镜，握着一把黑油纸折扇，敲着手心，正在那里说得唾沫乱飞。这人身前没案桌，上面没布篷，不像说书的。

围着的听众，都一个个挺着脖子，聚精会神。有的独自点着头；有的愣着两只钝滞的眼睛，显出深深受着感动和悦服的神气。我仔细倾听，那人一口济南腔，说得斯斯文文：

“诸位伯叔兄弟，照小弟这话看来，可见天是没错的，神明是有眼的。所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古今中外，贫富贵贱，都逃不出这个理数。可是世上人能把这道理记在心里的，却是很少。弄到现在，这里土匪，那里兵戈，哄吓诈骗，奸淫掳掠，卖朋友，欺官府，打娘骂老子。诸位伯叔兄弟，你做了这些恶孽，别人没法奈何你，你说天可管得了你？神明可放了你？要不然水旱兵劫，小灾大难，都是那里来的？所以有一分善行，有一分善报；有一寸善心，有一寸善果，就譬如今天，小弟代表敝社同人在这里和诸位宣说这番道理，这么大的太阳，这么大的尘土，俺说得唇焦口干，腰痛背胀，不想诸位一个大子。——等一会，这地下的书还要奉送，不取分文。——俺不是个疯子吗？俺不是个傻子吗？请诸位想想看。……”

我挤进一步，颠起脚跟，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这才看见那地上四个小石头平平正正压着一张长条白布，上写道：“山东济南崇善社宣讲团”。旁批黑字：一边是“大难将临”，一边是“善者得福”。字旁密密圈着红圈。脚下又有一块布巾，上面堆着两叠黄面线装小书。书名“万善同归”。

“这是怎么一个玩意儿？平常倒没见过似的。”挤了出来，我问我的朋友道。

“什么玩意儿？”朋友很熟悉地答道，“很简单的一个玩意儿。一些已经‘得了福’的富绅阔老，阔老的太太姨太太，诸如此类，看见世界不成个世界了，看见人们饥寒交迫，都要沦为土匪盗贼了，所以慈心大发，一片古道热肠的弄起这么个鸟社，花钱雇了些人到处宣善，免得老百姓不安分，自造罪孽。现在这里是泰山娘娘的香火盛期，鲁西鲁东，甚至河北河南等外省各地农民都来朝山敬香。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

朋友说着话，把我带进一座芦席棚里。棚子的四壁，上上下下密密丛丛挂着大红大绿的画子。画子都是手绘的。“麒麟送子”，“八仙”，“关二爷看春秋”，“富贵有余”，“招财进宝”之类，另外还有歪脸歪嘴的胖娃娃，驼背扭腰的四季美人。那些人物无不奇形怪状，带着浓重的设色，给人

一种浑身觉得痛楚的强烈刺激。

棚子里面川流不息走动的人，比那里的人还多。这时我们旁边一个衔着旱烟袋的老头子同两个年青的黑汉子正在那里瞪着眼珠满壁鉴赏，神气又是严重又是慌乱。弄了半天决不定那一张好。最后一个年青的牵一牵另一个年青的衣角，指了壁上四张美人画叫他看。那美人手里都抱着或牵着一个小孩子，大红腮巴，大红眼皮，大红口唇，绿衣，红裙，裙下两只小得不像话的红绣鞋。看了一会，这个年青的在那个年青的耳根下嘟哝一下。那个年青的就去告诉那老头子，大约是说哥哥想买这四张画。老头子走过来仔细端详一会，摇着头，在四张里面指定了一张，问伙计什么价钱。

“要买就四张一起买。”

“只买这一张呢？”

“一张不卖的。”

那老头子嘟哝起来，埋怨他的儿子：“一张不就够了？要四张做什么？这又不是吃的！”嘟哝着，就走过去指了他自己原先看好的一张。那是一张“富贵有余”：几个奇形怪状的胖孩子合掰了一条大鲤鱼。伙计取下这张来，索价一吊五（十枚为一吊）。老头子把舌头一伸，一面数着那上面胖孩子的数目，数了两次，一共五个半留着“一片瓦”的歪脑袋（身体四肢都画得乱七八糟，除了数脑袋，就没法点得出数目来的）。老头子说：

“大前年俺买了一张七个的，只有七个大子。红的比你这个还多些。”说着话就要走。

“老乡，”伙计说，“货色也有好丑，你只管脑袋数目就对了？——回来，回来，你瞧着给，没有什么意思。”“五个大子儿。行吗？”

“你再看看，你看我这上面的小孩多——多好！——这鲤鱼！——咳，你瞧，——啊？”

啰嗦了半天，好容易十个大子成就了这笔交易。

出岱庙，走近北门。原来北门外一段街道就是这些香客们的大本营。那些低黯的卖香烟卖花生的小铺子，如今都打出黄纸黑字的招牌：“××香客老店”。店门口，店堂里，进进出出，坐的站的全是这些黑衣黑肉的不大说话的乡下人。天主堂，圣公会，都趁机会在这一带大肆活动，雇了些人满街散发“马可全书”“天国福音”之类的书，也有坐在店堂里和香客们讲道的。

一时也无心细看，和朋友从岱宗坊走上盘道。早先听说，这条盘道上的人家都以在香期中乞钱为职业，自七八十岁的老老以至三四岁的小孩都做这项营生。每人每期收入最好的可多至六七十元以至百余元。很多人家就以此起家，买地筑屋，变做小康。男人则大半不做事，整天悠悠忽忽，过无忧无虑的现成日子。据说这是乾隆爷封了的。现在我眼前的情形却大谬不然，我只看见很少的几个残废的乞丐——有瞎眼的，有没脚的，——坐在路旁，磕头叫嚷，为状甚苦。看看他们身前的乞盘里，只有一些煎饼的碎片和麻丝结之类，虽也有铜钞铜钱，但如月夜的垦斗，点得出的几颗。那些乞丐一边偷空拿麻丝结在膝上搓着细索（为自己扎鞋底之用，或卖给人家），一边胡乱把煎饼抓了塞在嘴里，咀嚼着。每有人过，就磕头叫嚷起来。往往叫了半天，无人理会。有一种带有小孩的，自己没讨得着，就叫小孩跟了人家走。这种小孩都不过四五岁，连走路都走不稳，却因要追赶行人，不得不舍尽气力，倒倒歪歪地快跑，一面喘气跑着，一面“舍一个钱吧，舍一个钱吧！”叫着，

一面还要作揖，打恭；到了相当的时候，又还要赶拦上去，跪下，磕一个响头。这种烦重工作的结果，十回有九回是苦窘着小脸空手而回。因为等他磕过头爬起来时，那行人已经早在远远的前头，再也追赶不上了。

这样的一种不景气的情形，说是能有那么多的收入，说是可以依此为业，变成小康人家，想起来未免离奇不经。我把这话问我的朋友，朋友道：

“那一点不假。这是真正的乞丐，那说的都是‘丐官’；我叫他们‘丐官’，等一会你就明白的。今天晚上你好歹别回去了，半夜咱们起来，看香客上山，那时候你会看见许多有趣的把戏。”

朋友这样说着，其时正有一个清秀的青年人在我们前面慢慢走着。朋友指着这人低声说：

“你看看这人像个干什么的？”

我一边注意这人，一边赶了几步，走到他前头。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西洋头，苍白清秀的脸，穿一件时髦的青灰色新棉袍，黑丝绒鞋子，一只又白又瘦的手上夹着一支香烟，口唇里悠闲地吹着哨子，看样子竟像本地一位少爷公子或小老板之类。

这时已经过了玉皇阁。盘道两旁开始有了人家。石头垒起的墙（本地建筑，多以石垒墙，俗谚，“泰安有三宝，石头垒墙墙不倒……”），茅草屋顶，——也有盖瓦的——虽然朴素，但看去很是整齐。家家门框上都贴了新的春联，红红绿绿好不热闹！那苍白清瘦的青年汉子就走到一个高门阶的门前，推开两扇新油漆的黑大门，走了进去。

朋友道：“这才是你刚才说的乾隆皇帝封了的丐家。你看看吧，像不像乞丐？不像吧？可是他们的祖宗以至他们自己，除了乞钱而外什么事也没干过。他们就一直安逸舒服地寄生在那些傻瓜身上的。”

左边连着一排屋子都是店铺的派头，敞着三间门面，里边满墙满壁都挂着些大大小小的元宝纸锭，不用说也是备办了卖给那些敬香的傻瓜的。其中一家店堂里坐着两个妇人，一个年老的，团面白肉，满身福相；一个年青的，抱着一个小孩，穿着都很不错。门口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不但白皮细肉，体面干净，而且旗袍皮底鞋，简直是本地十分摩登的了。这姑娘站在那里，和一个男子说笑。男子三十多岁，躺在一把帆布椅上，小腿高高地架着大腿，手里拿着一本“一折书”本的《施公案》在看。朋友告诉我，刚才那个苍白清瘦的青年就是这人家的。这是店铺，那是住宅。“说了你不相信，”朋友说，“这人家有一顷多地，简直是家富户。说是小康之家，还小看了他们！”

这一路之上，都有男女香客下来。女的都穿着大摇大摆的衣裳，红绿棉纱带扎着裤筒，头上挺着一撮“平三髻”，下面一双零仃的小脚，用后跟点着地，一步一个踉跄，看样子已经疲乏得不能支持。男的就是在城里看见的那种灰黑色的人，一手拿着龙头木拐，一手挽着衣裳，也已经走得倒倒歪歪，看去两腿似乎有千钧的分量了。

除了男女香客而外，还有三三两两倦游归去的游客。游客和香客是迥乎不同的。这从外表上第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来。香客都黑皮粗衣，神情严肃得带有苦痛成分，无论从那一点看显然都是乡下农人。游客则不然，洋鬼子，穿西服的摩登男女，穿绸着缎的白胖绅士，都坐着山轿，气派自然不同；就是那种步行的，也都是小市民或学生之流，一路上谈笑风生，纵然疲倦，但神情是愉快的。这分别，那些真乞丐就十分清楚，他们犹如辨认两种不同类的动物一般。对于那种黑衣黑肉的乡下人，他们喊道：

“朝山进香的老爷太太呀，给我一个钱吧。各人修好各人的呀。……”

对于那些华洋绅商学各界的，则喊道：

“游山逛景的老爷太太呀，给我一个钱吧，可怜可怜我吧！……”

这个认识给我极大的兴趣。我心里想：原来上泰山的人有两种：一种目的是朝山进香，一种是游山逛景。朝山进香的都是农民，游山逛景的则属华洋绅商学各界。我把这话告诉我的朋友，问他这是不是一个定则？

“原则上确是如此。但得有个注解：比如前数天×××和他二夫人来逛山，就在我住的庙里拜了菩萨，进了香。巨绅富商也间有来烧香的，但不只烧香，主要自的还是在逛山。他们烧香，无非是‘以资表率’的意思。像×××，我知道得最清楚，从前是个思想很新的人物，菩萨不但不信，而且曾经打毁过的。——目的纯粹，专为朝山进香而来的确乎只有农民。”

这样的随口乱谈着，不一会就到了朋友住的庙里。

这庙在盘道之侧，规模很大，是顺着盘道上山的第一处大庙。正殿之前有大厅，大厅之前有戏台。左右两边则有敞大雅洁的院落和屋子。朋友住的是右边高阶台上去的院子。

这院子高爽整洁，的确不坏。阶台之下一株夭矫婆娑的大古柏，据说是真正汉柏。院中有石桌，四边围以石凳，高大的柏树两株，梧桐，黄杨各一。正房四间，侧屋三间。朋友和他的几位教官朋友就分住了这个院子。房中窗明几净，家具应有尽有，都是借的庙里的。

那几位教官先生都是见过面的，彼此都如多年老朋友一般，一点不拘束。勤务兵泡了新鲜“大方”，拿了“白金龙”出来，大家就围着石桌坐下喝茶抽烟，乱七八糟地谈起来。

教官之中一位胖子，绰号哈代；一位瘦子，绰号劳瑞。瘦劳瑞语重心长地说道：

“他们这些庄稼汉呀，太可怜。饭吃不饱，不要紧；衣裳穿不暖，不要紧；菩萨是一定要信的。可了不得！瞧他们这些疯狂劲儿！唉，我见了，我心里就难过！这都是国家的主人呵，国家主人糊涂昏债得这样子！开通民智，开通民智，一句话，还是要开通民智！”

“开通民智！叫谁去开通民智？”胖哈代嘻笑着反对道，“人家唯恐他们一朝不信崇菩萨呢！你没听说过吗？宗教是补助法律所不及的。所谓社会秩序，就要这么着才维持得住呀。假如一天他们真的不信菩萨了，他们耐烦辛辛苦苦地替你种田种地？到那时候，比方说吧，你能舒舒服服地住在这样好的地方过神仙日子？……”

瘦劳瑞一口茶没喝完，就生气似地抢白道：

“我舒舒服服地过神仙日子？老兄，你呢？你自己呢？”

这两位先生不知是真情还是闹着玩，说话老是不和气，一开口就要互相找岔儿抬杠。我的朋友不愿意听他们这些大道理，另外提出一个问题道：

“真的，有一件事我老是想不明白。这样雄浑伟大的一座五岳之尊，怎么倒是一个娇嫩柔媚的娘儿们执管着？这个娘儿，所谓碧霞元君，到底出自何经何典？她的老爷是谁，是不是就是玉皇大帝？那么西王母和她又是什么关系？”

“中国这些神话，向来只是传说而已，那里有什么系统？任便一个王八蛋——比如说，和尚道士之类——信口来一个胡说八道，人家就拿来欺骗老百姓，盖起富丽堂皇的庙宇来，塑起活龙活现的偶像来，把戏就都这么玩起

来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些傻瓜蛋为什么死乞白赖信奉着？……”劳瑞先生说得脸上青筋直跳。

“嚇嚇，嚇嚇，”哈代先生笑道，“这个你就不知道。泰山娘娘，老奶奶，碧霞元君，你瞧她秀眉细眼的，骚劲儿满身都是。原来她是个狐狸精；一个八千年的老骚狐！当初洪濛初开，如来佛在云彩里看见泰山气派好，就想占领掌管；可巧这骚狐也正在打这个主意。两下里争执了起来，没法解决，没奈何跑到玉皇大帝跟前请求判断。玉皇大帝说，你们俩谁先发现这座山，谁就是山主。如来佛说，我先发现；狐精说，我先发现。玉皇大帝说，口说无凭；你们拿证据来！三个人同驾祥云，来到泰山。如来佛指着一座石岩说，这里面我放了一部‘佛经’为记，就是证据。骚狐正中下怀，暗自好笑。玉皇大帝打开石岩，里面果然一部经书。因和狐狸说道：这样，你该认输了？狐狸道：玉皇公公，请你把经书拿开看看。玉皇拿开经书，下面却是一双纤小的红绣鞋。可不是那骚狐的臭东西！因此如来佛认了输，骚狐一扭一摆来掌管了泰山。——是这个来头，千真万确！”

这故事虽然平常，说的却大有功夫，大家笑了一会。瘦劳瑞道：

“你这个屁那里捡得来的？”

“庙里当家的谈给我听的，千真万确。所以泰山上虽然也有和尚尼姑，但究竟还是道教的势力范围。你们看，王母池，老君堂，红门宫，斗母宫，……那里有如来佛，观世音的地盘？——就是这个来头，千真万确！”

这一个佯真扮假地说，那一个就装模作样地反驳，好像串演相声的一般。我静静地听着，一面把眼睛眺望前面。这院落，前面说过，是在几重高阶台的上面，正殿屋脊，都低低俯伏在阶台之下。屋脊上，展开的是半个泰安城，阡陌扑地，万家在望。东南西三面都是一望无涯的漠漠平畴，东一堆西一块地缀着些七零八落的村庄。这时夕阳映照，淡青的原野抹上一层浅黄，各处村落缭绕着淡淡的炊烟。对面徂徕山泛了淡蓝颜色，弄得变成瑞士风景照片的派头。汶河弯弯曲曲，从那一头绕过山后，又从这一头钻了出来。再远处，是漠漠平原；更远处，还是漠漠平原。渐渐入了缥缈虚无之间，似乎仍是平原。忽然前面几块晶莹夺目的橙黄色东西，山也似地矗立着，旁边衬护着几抹紫红颜色，分外鲜艳美丽。定睛细看，才知道那是云霞，已经不复是地面的东西了。

“你们这地方真不坏，”我打断他们的说话，“杜甫的《望岳》诗，‘岱宗复如何，齐鲁青未了’，不想这样壮阔的境界，如今就在你们几席之上。真是几生修来的清福！”

我这样酸溜溜地说着，站起来点上一支烟。劳瑞先生拉我走下台阶，要陪我到庙里各处看看走走。

一出那个耳门，看见两个人捉迷藏拟地隔着一道门在探头探脑，探着了，互相扭了起来，嘻嘻哈哈，滚做一团。两个人都是三四十岁的家伙，一个头上梳着小髻，穿一件齐膝头的长领棉袄；一个秃头，却是俗家打扮。他们在地上扭做一起，这一个探手到那一个腰里去掏，那一个怕嗝吱，笑得软瘫了，一件东西便被抢了去。原来他们是为一包“金砖牌”的烟卷，起了争执。这么一把大年纪的家伙，闹得如此天真有趣，真修炼到家，超凡入仙了！

“你不还了我，我放你！”梳小髻的一个嚷道。

“还你！还你一个蛋！”秃子嚇嚇地笑着说，“今天早上你偷我的香钱，你当我不知道！”

“狗操的！你的香钱？”嚷着就追了过去，追出了大门。

劳瑞先生告诉我，他们当家的上济南开会去了，所以他们就胡闹。这庙里大小道士以及打杂帮工的一共不下十余人。庙产很不小，香钱是不在乎的，当家的都不要，由着他们分赃，拿去吃烟喝酒，“跳墙头”。他们自己也有章程：每天的香钱，上午归谁收；下午又归谁收；外面还有痘疹眼光娘娘，那儿的香钱又归一个人收；香客丢钱时偶尔有丢到地上的，就是小徒弟的“外快”。如此划分，各不侵犯，比关卡税局还要划分得清楚。——这庙香火不盛，几个香钱只可作他们烟酒之资。上面红门宫，斗母宫的香火可了不得，一季下来，连小和尚小尼姑都弄个几十块。所以他们那边分赃的法子也格外严密认真些。

走过正殿，从左边一道门穿过去，那里一个大院子，五间敞大的正屋，派头不小，像是官厅之类。东西两面各有下房三间。下面院子拐角上，安置着一座大磨。其时正有一头骡子，眼睛上罩了块麻布，背着磨架在那里团团转。管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矮子，皮肉焦黑。他把桶里水浸的棒子小米之类一瓢瓢舀了，添入磨里；一面忙着又把磨出来的浆糊似的东西刮入一只钵里。骡子在他后面追，他就套着骡子的脚步走。添好一瓢，刮好一次，回个空跳出骡子走的那圆圈，舀了一瓢棒子小米，重新再跳进去，继续跟着骡子打转转。这样工作着，人是和骡子一样，不看别处，不作声，只沉着脸子，打转转。

磨子那儿一道破门，通另一个荒院。那里面一个大猪圈，一群鸡。门阶上坐着一个老头子，身边靠着一根龙头木拐，一只小褙褙，黑衣黑肉，却是个香客。他在咬着手里一块煎饼，挺着两只昏花老眼看骡子打转转，咀嚼着，不作声。

我和劳瑞先生看了好一会。他告诉我，这磨出来的东西就是做煎饼的。磨好了以后，拿一只鏊子摆在地上，下面烧起火，把浆糊一瓢瓢舀到鏊子上，就结成薄片：一瓢糊，一张饼。在山东西部这一带，普通农家都以这种煎饼为正餐。据说比窝窝头好吃，而且非常便于携带，保存。农人早上起来下地，带几张煎饼在身，整天可以不用回家；工人上工，也带这煎饼；寒苦人家子弟上学，也带这煎饼；做买卖的，小贩子，赶牲口的，出门行远路，一去十天半个月，也是带了煎饼去，歇店时候不用花伙食钱。

“你会摊煎饼吗？”劳瑞先生问那个打转转的长工说。“摊煎饼可不容易。火头不到，结不起来；旺了，就要烧焦。是不是？”

那板着的脸子笑一笑，随即板还原，同复一副苦相。

“你在庙里帮了几年工了？”

“两年。”

“喂猪，喂鸡，摊煎饼，还做些什么事？下地不下地？”“下地。”

“地窖子里那些盆花是不是你经管？”

点点头。

“打扫呢？”

点点头。

“出茅坑呢？烧茶烧水呢？料理牲口自然也是的喽？”点点头。

“这活可了不得！——当家的给你多大工钱？”

“十八块。”伸一只手比着说。

“一个月？”

“一年。一年。十二个月。”伸一只手比着说。

“十八块钱一年？”劳瑞先生像个呆子似地惊叫起来，“他妈的！你瞧。”那一个不做声，依旧跟着骡子跑圈儿。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那是你谁？”劳瑞先生指着那香客老头子说。

“是俺爹。”

“来进香？……就顺便进来看看你？”

劳瑞先生傻里八气的，把这些话问个没了时，直问到勤务兵来找我们吃晚饭才罢休。

吃过晚饭，又围着石凳喝茶抽烟，胡扯了几个钟头才睡觉。朦胧之间，朋友把我叫醒。我摸出表看看，不到十二点。隔墙盘道上隐约有人声，又听见一个两个的鞭炮响，远处有狗子叫，七零八落的。朋友说：“香客快上来了！咱们出去看去。”

哈代先生被我们吵醒，也起了身，要和我们一起去凑热闹。三个人同出来，庙门已经大开。白天摆在正殿旁边的一个灵官菩萨，此时连同龕子搬了出来，安放在摆在门口路当中的一张方桌上。桌上一盏豆油风灯，一只破罄，中间没有茶叶果子之类供品。那灵官圆睁眼睛，张嘴露舌，红胡子直拖到胸口，手拿一根钢鞭，端的威武。一个道士衣冠端正，眼目惺松的坐在一条板凳上，不住打呵欠。

“香客快上来了吗？”

“就来了！就来了！”

据说，这道士是当家的胞弟。这庙里香火不旺，唯独这座临时摆设出来的灵官菩萨跟前，因为当着要路，却是个极肥的肥缺。这肥缺别的道士沾不上，当家的放了他的令弟来承乏。每夜收入，大有可观。我看这道士，温文尔雅，果然很有身份的样子，不像白天抢烟卷的那两个家伙的下流相。

在这里站了一会，阒无人声。哈代先生不耐烦，提议往下走，去迎头拦看香客上山。往下走了一段。路旁所谓丐官家，都已开了门，点着灯火。妇人都已出了马，各占据一个要隘，带着孩子，拿着乞盘，火把，一切准备妥贴。所谓要隘，都是他们临时安排的：有的用一条或两条板凳，横着拦住路口，仅仅留下一人过身的空当，乞盘就放在这空当处；有的则是用石头垒成一段或两段障碍物，横拦去路，自己盘坐着，当着那空口。这些妇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都化了装：穿着破衣服，不是白天看见的那种整洁样子了。但是也有化装得很马虎的，往往破衣服下面露出的是粉红色新洋袜，新鞋子，鲜明洁净的印花布裤子。

还有一些男子，在路旁摆七个大石头，每一个石头上摆一盏豆油风灯，意思是替香客照路，但也摆着乞盘；一路上有小庙，像南边乡间的土地庙，里面却是灵官菩萨，也点了灯，有人守着。

在这些人里面，白天看见的那些残废乞丐，却一个也找不着我们慢慢地走下来，那些妇人看见，都忸怩着藏起脸来，有的竟连忙躲避到黑暗处。哈代先生有意找她们谈话，无人肯理睬。直走到一棵大树下面，那儿一个老婆婆，当着路口坐着，旁边还睡了一个小孩。哈代先生说：

“老太太，你辛苦呵！”

“不辛苦，哈哈！”那老婆婆不好意思的笑起来，“先生，你别见笑，我们这里就是这规矩。”

看见这老婆婆是个开通的，我们站住了。老婆婆客气之至，拖了一条凳子请我们坐下。那睡在地上的孩子也醒了，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皱着眼皮张看。

“这是你孙子吗？好福气呵。”

“是俺小孙子，哈哈，”一边押一押那孩子的被头，笑着说，“冷不冷？你好好睡吧，哈哈。”

“一夜讨得多少钱？”

“哈哈，没多少意思呵。不过五吊六吊的，好的时候也上过十吊。没多少意思呵，哈哈。”

“几位令郎，你老人家？”

“三个，三个。”

“好福气呵！家里有地吗？”

“几亩地。哈哈，几亩不好的地。横竖够吃的。哈哈。”

这时四野里一片昏黑，只有这条盘道上亮着些红的火光，东摇西晃，此暗彼明。一会儿功夫，西边一团漆黑里忽然钻出几点火。那火点子越来越多，像是从一片树林里绕出来的，渐渐成了一条长串。接着狗子叫了，远处涌起一片妇人的叫嚷声。老婆婆也忙了起来，把身边一把高粱秆点上火，瞪着眼等着。小孩子从被里钻出半段身肢，——却是个赤膊。

“奶奶，来了吧？……”

“不忙，不忙，小心招了凉。”老婆婆慌忙把他重新塞进被窝。

静寂的空气顿时热闹了起来。

那串火光越晃越近，妇人的叫嚷声低下一批，又涌起一批。等到前面近处也尖溜溜响起一片声的叫嚷，那串火光里已经隐隐约约地显出一些人影和零乱的脚步了。

老婆婆咳了几声，扫清一下喉咙，不好意思地望一望我们，伸长着脖子向前张看着。直到那一长串人影响着一个一个的铜子落入乞盘里，通过了前面一道道嚷声鼎沸的关隘，到了近处约摸一二丈的地方，她才用一种出乎我们意外的最敏捷的手法抱起了她那个赤身露体的孙儿，放到自己怀里，用衣裳掩盖着，同时放开洪亮的声音，唱了起来：

“烧的是平安香呵，舍一个如意钱。看你五谷装满仓呵，添子又添孙。……舍一个钱呵，各人修好各人的呵，舍的快发的快，舍的多发的多呵。老奶奶看在眼里呵！”

当她这样唱着的时候，那个行列已经到了跟前。她的孙儿自动地从她怀里钻出来，跪到地上，双手拱在胸口，一上一下地动着，牙齿发颤，清涕直流。

那批香客正就白天所见的一样，有老有少，龙头木拐，小褡裢，手里各秉一枝香，低着头，神气严肃得带着苦痛成分，一步挨一步地从障碍物中间留好的缺口处走过去。每走过三个五个，总有一两个从褡裢里摸出铜子，丢到老婆婆的乞盘里。有时也有摊开手心，或是拍拍褡裢，表示钱已经完了的，那老婆婆就有一种权利伸手去掏查他的褡裢；查看了，实在是没有，才放他过去。如果这样子的香客一连有这么五六七八个，那这个老婆婆就着了慌，一边咒骂似地狠声嚷着，“你是行好的呵，你是行好的呵！”一边就有权利去扭住一个香客的衣裳，不让过去，直到别人代给了钱，才放他走。

这一批香客过完，等这么三五分钟，又上来一批。一会儿，又是一批。

老婆婆一会儿把孙儿塞进被窝里，把火把用石头压死；一会儿又把孙儿抱出来，把火把摇亮。间歇地忙着，弄得气喘汗流。不久的功夫，看看那乞盘里已经琳琅满目了。

“奶，”那孙儿钻进被窝，探出头来抖颤着说，“今晚上要的钱都是俺的。”

“是哩，是哩，都是你的，都是俺小宝的。哈哈哈哈哈。”说着，笑望了我们。

“老太太，”哈代先生说，“你这钱该当给你小宝宝，他比你老人家还辛苦，好好给他做几件新衣穿，给他留着娶个漂亮媳妇儿。”

“是哩，是哩！哈哈哈哈哈。”

这时东南西三面一片昏黑的原野里都不断的有一长串一长串的火光出现。上来的香客二十个一队，三十个一组，过去一批，又来一批，渐渐越来越涌，老婆婆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了。

盘路上前前后后摇晃着一片火把，妇人的叫嚷声震彻四野，山鸣谷应。

我们三个混在一批香客的队里循路回去。这回去，可不像下来时那么容易。每走这么丈把路，就是一个关，一个妇人把守着，叫嚷不已。我不知道有这个情形，出来时竟没带一个铜子，过一道关，就被窘一次。不时有手来掏我腰包，扯我的衣裳，我只好暗暗叫苦。哈代先生却满不在乎，大摇大摆地跟着香客后面走。

忽然一个人扭住了我。按照刚才的经验，只要摆一下身肢就可以脱逃的。这次可不行。我被那人扭出了行列，弄得无可奈何。我停睛一看，那人披着一件破衣，白皮细肉，一把粗辫子，不是别人，就是我白天看见的那个体面干净，衣饰摩登的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此惶恐狼狈之中，我听得哈代先生呵呵大笑了起来。

“那不是香客呵！那不是香客呵！那是上面庙里的先生呵！”一个男人远远的站在门上嚷着。

我看那男人，也是见过的，正是白天在路上遇见，一块上来的那个苍白清瘦的青年小伙子。

说时迟，那时快。那姑娘给提醒了，羞得要不得，使劲把我一推，就像一只兔子似地窜到黑暗里去了。

脱了险以后，我反对再混在香客队里去，免得受这些无妄之灾。哈代先生一路把我取笑着，一直到了庙里。

庙门口那位守着灵官的二当家的道士，已经不是刚才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一手握着敲磬的木槌，衣袖捋到臂膊上，敲一回专制磬，嚷一回，唾沫四溅，脸红耳赤：

“开路第一盘，上山第一关，这是灵官爷爷啦！你们拜灵官爷爷啦！替老奶奶报信的啦！灵官爷爷不报信，老奶奶不知道呵！开路第一盘呵！你们都要拜呵！……”

那些香客踉跄的走过来，都驯顺地跪下，磕头，丢钱。有一些不拜的，拜了没丢铜子的，道士就用条凳拦住他，不许过去。如此这般，——又要嚷，又要敲磬，又要忙着拦阻不丢钱的香客，——工作竟是十分繁重。因此忙得他脸红耳赤，丢了他温立尔雅的身份。可是看看他那扁盘里，已经满满的半扁盘铜子，比起下面那些没有菩萨玩的，到底不同了。

回到朋友房里，已经快三点了。远处近处的叫嚷声，敲磬声，一直闹到

天明。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原载 1935 年 10 月《文学》第 5 卷第 4 号)

差船

去年十二月初，我从芜湖到了安庆，要坐上水船到九江去。这时候南京政府西迁，敌人过了太湖，东线正万分的吃紧；安庆的情形也已经非常纷乱。稍有资财的市民们已经快逃光了。伤兵，难民以及文武官员把几条窄狭的街道点缀的枪凉而恐慌。江口几家旅馆都没有了空余的房间，行李箱笼堆积的碰了天花板。大家都瞪着焦灼的眼睛，互相打听上水船；结果是谁也没办法。

我去找一个熟识的旅馆老板，请他设法替我弄一张到九江的船票。老板告诉我说，中国商船都停班了，英国商船都不靠安庆，要么，只好想法子坐差船，价钱可贵的吓死人。我有要紧事急于赶日子到九江，愿意多花些钱坐比较有把握的船。于是老板就把这事委托了他的接江的。那神通广大的接江的很快就找来一位小轮上的“老大”。这人四十岁上下，面孔尖尖的，戴一顶瓜皮帽，身上穿着细花黑绸的棉袄裤，一看样子就知道是个吃水码头饭的。他看我的行李简单，表示满意，把头向那接江的点一点，就捋下卷起的袖口，筒起手来，耸着瘦骨棱棱的肩膊，站到一边去，让那接江的和我谈价钱。当时谈妥是船上管我饭，管我铺位，从安庆到九江，二十二元。谈妥了，要我马上交钱，马上上船。我却不大放心，问“老大”说：

“你们的是什么差船呢？”

“军政部的伤兵船喽！”他头也不掉的回答。

“你们的船几天到九江呢？”

“最多两天。”

“我花钱搭你们的船，你有权柄作主么？”

“老大”就嫌我麻烦，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把瓜皮帽脱下来，皱着眼睛，用手使劲在头上搔着，搔的白色头屑乱飞，说：

“你先生真没的说！大家都是熟人，难不成我还骗你钱？我看你是单身人，行李也少，要不然那里去搭这样便宜的船？人家到九江四十块洋钱票追着塞在我手里，我招也不招他。不信你问问老板看！”

我知道我说他不过，老实交出钱来，立刻上船。接江的把我一点行李掂着，“老大”在前面引路。沿江走完马路，左转一个弯，右拐一个角，走到一条污秽的后街，从一家油货铺进去，打后门出来，一支小火轮拖着两只民船，正靠在江岸边。

轮船小的不像样。除了后舱的机器房，就只有前面一间卧舱。连煤也没处存放，撒撒拉拉的塞满了船舷的狭道上；人进人出，都得从煤上踹过。“老大”领我到那间唯一的卧舱里。里面连上带下一共六个铺位，中间摆一张小桌子，就再无回旋的余地。接江的向我要了所谓酒钱，又从“老大”那里分去了五元的一张钱票，就满足的上岸去了。

这里“老大”走到右边的铺位跟前，狠狠地把铺位一搯，上铺上从被窝里咕噜钻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惺松着两粒惊惶的眼睛，望了一望，看清了是“老大”，把手在口角上抹了一把口水，赶快跳下来。“老大”用各种下流话骂着，指派他把上面的被窝搬下来，把我的行李放上去，铺好。小伙子不作声，一一照办。老大问：

“副官呢，没上来？”

“没上来。”

“ 护士长呢？ ”

“ 上来了一下，又走了。 ”

“ 你妈妈的！你只会挺尸，什么事也不管！你晓得我个卵蛋！——泡茶来！妈妈的！ ”

老大骂着，已在下面铺位上歪躺下来，两脚高高地架到小桌子上。同时一副简单的烟具也从铺旁板箱里拿出来，点上灯，聚精会神地烧烟泡。他一口气吸了三四枪，把瘾过足了，而后慢慢很和气地找我谈起话来。问我那里人，做什么事，家眷在那里。告诉我，眼前长江交通毫无办法，夸说我的运气好，能搭着他的船。又告诉我他最近的背晦，他的小轮原是从镇江跑内河的，大场失守，前线吃紧，伤兵医院要搬往武汉，于是就被军政部扣了来。他原已谈妥一件生意，那是一家富户全家逃难，从镇江送到武汉，说定两千元。

定钱也付了，轮船忽然被扣，吃到嘴的一块肉还是吐了出来。现在船上七八个人手，自己在内，连抽支香烟，洗个澡的钱也弄不到。

他说一句，就骂一句“ 他妈妈的！ ”

忽然他从铺位上起来，靠近我，非常友谊地说，左边的铺位，上面一层是护士长的，下面是副官的。他们上岸有事去了，等一下就要回来。护士长和副官都是厚道人，不管他的事，但是假若问到我是什么人，最好回说是他的亲戚，不要说花了钱的话，免得他面子过不去。我一听这话，知道上了当。但我只好冷静下来：另外找船，谈何容易，所谓差船就是这么回子事；钱已经花了，由他去罢。但是我心里不由的十分厌恶，舱里再也待不住，就从小口上爬出来。

冬天的日子晚的早，这时不过四点多钟，就暮色四起了。江边停着无数的船，岸上人声嘈杂，并且间杂着一声两声的枪声，想是伤兵为抢船起了争执。靠江的这条后街，虽然偏僻，来来往往的人还是很杂沓。每个人神情都显得张惶，浮动。只有浩森的江水卷着大朵的浪花，猛扑着堤岸，白色的水沫四迸，好像在怒吼着；同时岸上不断有队伍走过，唱着雄壮的战歌；草棚旁的垃圾堆上还聚着许多衣服槛楼的小孩，手里拿着竹片木棍，在做练兵的游戏，一边提着稚嫩的声音高呼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中华民族万岁！ ”——这些声音汇合起来，好像一流滚沸的热水，熨温着我的苦痛的心。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这一声粗犷的叫喊就近在我的身边。我从船舷上踏过煤炭，走到船尾，才看见小轮拖的民船上，正有几位受伤的弟兄从矮矮的芦席篷里探出头来，在招手向岸上练兵操的小孩呼应，而且一面拍着掌，笑的那样天真有趣，那样诚拙可爱。我很想和他们打谈打谈，就走近去，蹲下身子，向他们望着。那里一共两只小民船，每只船上横躺着十多个弟兄，把两个又窄又矮的船舱里塞得满满的。他们有的在吹口琴，有的在哼战歌，有的在酣睡，有的板着脸出神，还有呻吟着的。另外有三四个全副武装的弟兄，坐在篷顶上，向岸上发呆地望着，手里盘弄着小手枪，面色显的沉闷而焦躁。我正要冒昧地找他们攀谈，忽然“ 老大 ” 来到我的身后。篷顶上一位矮个子的弟兄，打着一口湖南腔，厉声地喝道：

“ 船老大！你听说的船到底什么时候起锚？ ”

“ 老大 ” 满脸堆着笑，恭敬地喊他“ 班长 ”，说副官和护士长一回来，就可以开船。

“从镇江到安庆整整两星期。”另一个河南口音的骂着说，“走一天，停三天，到了安庆又是一停两天。闹啥呢？他妈的！弟兄们十多天不换药了！”

“今晚上还不回来，我们自己开船，王八肉的！”班长吼着骂。

“老大”暗暗拖了我一把，扭扭嘴巴，叫我回到舱里去。

“你先生在铺上躺一躺罢，一会要开饭了。”回到舱里，“老大”很耐心地和我做着笑脸说：“你先生穿的长袍，站在船面上，岸上都望着，回头副官碰见了，打麻烦。这些兵大爷也野蛮的很，脾气一把火，成天找岔子闹。你说你好好地蹲着，不关他们事，嘛，说不定几时就会惹上他们的火，给你个下不去。这世界还讲理吗！”

“老大”做着极其诚恳的样子，好像他对我十分同情和爱惜似的。我心里厌烦，质问他道：

“刚才那弟兄说的，从镇江到安庆走了两星期。可是你告诉我，从安庆到九江，最多两天。你说的话要算话！”

“你先生真是！从镇江到安庆，一路上都靠，那怎么能比呢？”

“你怎么知道这以后就不靠了呢？”

“靠码头，是办事；没事，靠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以后就没事呢？”

“我说没事就没事。煤也上齐了，米也上齐了，什么都办好了。你想想还有什么事？”

到晚上八点钟，副官和护士长回来了。每人手里抱着大包小包的吃食，大匣的吕宋烟，成听的“大前门”，另外还有大捆的留声机片，嘻嘻哈哈一路说笑进来，浓烈的酒气四喷。护士长穿的是庄青呢大氅，肥厚的脑袋，高大个子；副官则是黄呢军服，大衣敞开着，里面武装带和短剑齐备，领口上佩着少校章。他们把手里的东西望铺位上一扔，招呼“老大”叫小鬼头张罗开水，泡新鲜茶来吃。副官摘下军帽，抬头忽然看见我，向我狠狠地瞪了一眼：

“你是什么人？”

“是我家门口的，都是朋友，都是熟人。嚇嚇！”“老大”赶着代我回答，非常丑劣地谄笑着。

副官“唔”了一声。随即脱去大氅，一边打着下江口音的生硬官话，眼睛也不看“老大”，说：

“你要老实点，不要在我跟前掉枪花。一路我都和你说过的：我做副官的押这只船，名誉要紧。我可不大好玩的！”

这副官三十多岁，苍白的脸，音调柔弱无力，可是两只眼珠很有点威严。他把“老大”训了几句，也不深究。“老大”就出去了。这里副官和护士长慢慢回复了刚才的嘻皮笑脸。副官把小窗推开，打了个呵欠，痛痛快地伸了一个懒腰，而后关上窗子，笑着说：

“啊呀，这鬼舱里闷气的很！你着急要上来；再住一夜，明朝天亮再上来有多好！”

说着迷了眼睛哈哈大笑。另一个也会意地笑着，却不答话，窝着两片嘴唇吹口哨，从裤带上取出钥匙串里的五用刀，忙着开吕宋烟匣子；拿出两支来看一看，掐去头子，递了一支给对方，自己点着一支。副官衔着烟，从铺位下面拖出一只崭新的留声机匣子，护士长就去铺位上取了刚携来的那捆唱片，解着绳索。副官却不耐烦，抢过来，用刀子把绳索割开，一张一张地细

看着片名。护士长热心地和他分工合作，赶紧打开机匣，装上轮头和唱针，又忙着摇发条。

“刺虎！刺虎！先唱刺虎！”护士长歪仰着头，吃力地摇着唱机，一面迷蒙着一只被烟熏着的眼睛说。

留声机开了。从“刺虎”开到苏滩和各种小调，唱完一张，又换上一张。他们摇着头，顿着拍，跟着唱和；一边把大包小包的太妃糖，奶油卷，花生米拆开来大吃，大说大笑。骂安庆这地方不好，东西不讲究，街道太窄狭。高声谈一会，贴着耳朵唧啾一会，于是又放开嗓子大笑。

直闹到深夜十一点钟，他们酒气退了，疲倦上来；副官深深打了个呵欠，忽然想起了上面铺位上还有个我的存在，就用一种轻蔑的声音嚷着说：

“喂，你是到那里的呢？”

“到九江。”

“你是那里办事的呢？”

“老百姓。”

好像他们有极严重的军事机密，两个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我当做了大有嫌疑的人，细细盘问起来。直问明“老大”曾经答允我两天到九江，并且得了我二十二元的时候，副官就恼起来。大骂“老大”胆子大，有碍他的名誉，他万万不能允许。护士长却要息事宁人，一再劝副官不要计较：

“差不多算了罢，反正个把客人的事。”

一面又叮嘱我要明白这事：是“老大”得了我的钱，和他们毫不相干。可是我却要副官负责答覆我一句话，船到底几时到九江。我说我有要紧的事赶日子，要不然，我也不肯花许多钱来搭差船。护士长说：

“那你上当了！我们的船十天怕还到不了九江。这里开了头，到东流停一天，到华阳停一天，马当，彭泽，湖口也都要停……”

“说完了，张开肥下巴，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决定找“老大”退钱上岸，立刻披衣穿鞋。

正在这时，忽然那个湖南口音的矮个子班长，从小口子里跳进来，板着脸，对副官行了一个军礼，厉声地叫道：

“报告！我们的船还打算开不开！”

随即再行了一个军礼，也不等副官的回答，就转过身敏捷地爬出舱外。这对于副官是一个奇突的袭击。护士长也给愣住了。副官觉得这有损他的尊严，半天抹不开脸，气得两片薄嘴唇颤着，抖着手扣好敞开了的领扣，披上大氅。护士长赶快拉住了他，不许他出去，把他按到铺位上躺下，并且用毯子把他盖起来。

“我去，我去，太不像话了！”

护士长爬出了舱。我要出去找“老大”，“老大”却自己匆忙地进来了。我也懒得和他争吵关于慌骗的事，干脆的要他退回我的钱，送我上岸。他愣了一下，不理睬我，撇开身子一直到副官的跟前，谄笑着说：

“请你副官给我个面子，赏我两口鸦片烟吃吃。”

于是直截地央求副官，岸上有两个客人，到汉口下坡，行李不多，这里正还空着两个铺位，要求副官成全他。

副官半天不作声，忽然推开毯子跳起来，嚷道：

“你胆子不小！给你面子，你不要，索性来起来了！老实告诉你，我副官不是好玩的！……”

“副官，”“老大”说，依旧丑劣地笑着，“船上七八个人手，总得弄点外快子。两三个人的事，求求副官赏个面子罢。”

我没法耐烦听他们的，逼叫“老大”赶快退回我的钱，把我的东西送上岸去。“老大”立刻把丑劣的谄脸翻成了无赖的恶笑，不肯退我钱，说钱早就分掉了；一边继续粘着副官，要他答允两个客人搭船的事。在这个僵局中，护士长回了舱。护士长从中调解，一方面责备“老大”不该谎骗我，一方面讥笑我自己上当。叫“老大”把剩下的钱还我，剩多少，还多少，要我认些倒霉。“老大”却趁机拉上那两个搭客的事，说若是副官答允了他的要求，他就可以实行我的说法。这尴尬的争执，直闹了一两个钟头才算有了结果。两个新客人搭船的事，副官坚持不答允。

“老大”发着脾气，胡乱把我的行李卷了起来，满口夹七夹八的唠叨着，把我送到坡上的那家油货铺子里。原来他所招揽的客人，已经被他领到这铺里；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带着一个小孩，是三个，不是两个。这两夫妇比我老练，他们谈好从安庆到汉口，三个人，每位五十元，钱却不曾交付，要上了船，再肯付。因此船虽搭不成，却没有白送钱。

“老大”借口马上就开船，不肯送我回旅馆。但他并不马上回船去。悻悻然坐到一条木凳上，托着头，两只眼睛愣着，愣了很久，就对我们痛骂副官的丑行。说副官所以不肯让他搭客，是因为他要一路荒唐胡闹，欺骗讹诈，怕客人碍他眼。他在镇江扣了船，动身之前，已经在地方领了充足的米钱，煤钱，船上赏钱和弟兄们一切开支的。但是他一个钱也不拿出来花。拿着二十多个伤兵向沿江各个地方诈钱。每到一个码头，就去要“给养”。若不给，就声言他不负责，要把伤兵交给地方。地方上最怕这一手，只有照给：八十块，一百块，甚至三十，二十。钱拿到手就滥吃滥嫖，恣情胡花。船一靠了岸，再也不想开。这一路以来，在和州靠一天，在当涂靠一天，在运漕靠一天，在芜湖靠三天；鲁港，荻港，大通，和悦州，贵池，殷家汇，枞阳镇，无不停靠，讹诈，滥吃滥嫖。只差在南京没有这么干。伤兵们的苦痛毫不在心，没有菜，不管；没有油，不管；一路上不换一次药，不发一个钱。他们的放纵恣肆，到了使人惊诧的程度：他们在安庆原打算昨天开船的，只为了要买留声机片，街上买不着，听人说有个住户人家搬家，出卖唱片，但那主人不在家，要到今天才回来，竟因此又耽搁一天，一定把唱片买到了手。

“老大”的话本不能信的，但想到我这倒霉的十多个钟头里亲眼所见的，我只有承认他说的是全部真实。

我和那两个夫妇都惊骇地苦笑了。

“老大”骂着，吃完一碗馄饨。下面船上忽然砰的响了一下对天的枪声。江面上起着空阔的震应，船上立刻哄起一片喧哗。伤兵们粗暴的嗓子吼着，护士长和声温气地劝解着。喧哗声渐渐静下来，就听到护士长叫着“开船了！开船了！”接着高声呼唤着“老大”。

“老大”不动身，也不答应，只是愣着。

我压下对他的憎恶，善意地和他说：“看你说谎弄钱，真有一套鬼把戏；碰到真场子，你可胆小，没用，只会发发牢骚。你骗我们老百姓有办法，对那副官你就没了主意？我看你的事很好办：你只要上船去，把你刚才谈的这番情形照样子去给伤兵弟兄们和那班长谈谈。——他们都还装在鼓里，不知道真相……”

“呃，你为什么替副官瞒着，不对伤兵说穿呢？……”那一对客人也说。

“老大”低着头想了半晌，突然站起来，两眼睁得很大，满身是劲地说：
“看看我可玩的过他！大家就来玩一玩！我一定说，他不客气大家不客气！我怕什么！——我若叫弟兄们放他活的到了汉口，我来世就变个扁毛虫！”
咬着牙齿，狠狠地这样自语着，走向船上去。

我看看表，已经快四点钟，我和那三个客人都没处可去，只有等待天亮了，再回旅馆想办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

（原载 1938 年 3 月《七月》第 2 集第 11 期）

副官及其他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作

一位炮科毕业的朋友，在军队里曾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中等身材，黄瘦的面孔，头上盖着稀疏干枯的短头发。一年四季都看见他穿着褪了颜色的草绿布军服，胸前五个钮扣，只剩了两个；原来穿的一双黑帆布胶鞋，近来也不见了，换上的是川东特产苧麻编的草鞋。这朋友的样子，单独的看并不稀奇；可是和他的同伴在一起，那就简直是个怪物。他的同伴们是怎样的：军政部织呢厂出的马裤呢军服，裤子上的摺痕压得笔挺到底，浑身上下不许有一点皱纹；纹皮的黑色皮靴，后跟上镶着马刺，全都擦的闪亮；武装带子斜挂着，是时时刻刻准备人家来拍照片刊登外国画报的派头。因此他被同伴们尊为“文学家”。意思是像这种寒伧样子，实在不配做副官。

其实他身为军人，也确有爱读文学书籍的癖性。我自从认识他，他就是在当副官。没有事办的时候，成天见他躲在房里不出来，也没有声息，除了偶然听到他扫清嗓子的假咳声。一天我有事找他。他坐在桌边，两肩高耸着，把两肘横搁在桌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他看的是一本很厚的翻译小说，书眉上还批着许多蚂蚁脚迹似的小字。

“心里闷的很，看看小说。”他站起来，干枯地笑着。

夜里也是如此。虽然各个房间里的墙壁上都贴着条告“奉谕：晚八时半息灯，早四时半起床。”但往往夜深十一二点钟还看见他房间的窗户纸上晃动着暗红色豆油灯光，不时地听到他的嗓子扫咳着，发出于巴巴的寂寞的声音。

他大约整日整夜都伏在他那张垫着报纸的方桌上用功。

“老在后方呆着，不大好，是不是？老是在后方，不大好，是不是？”他常常寂寞地笑着，拿这类话问我；其实是他在自言自语。

“有机会用功看看书也是好的。”我只好这样回答他。

“是的，没有办法。是不是？”他说。

有时他奉命令到城里办事，总是提着抱着几大捆的书回来，瘦削的肩头歪耸着，脸色泛着红，像只鸭子似的，钻进房里，就再也少见他出来。有时我进去看看他，他正在翻弄着刚买来的书，大堆大堆的叠在桌子上。

“买了这些书。”他很有点兴奋不能自制的神气，望着面前的书，“我把一个月的饷全部花了。都是在收买旧书的摊子上买的。

书店里新出的小册子没有什么可看的，是不是？”

我就随手翻看那些书的名目，都是属于文学哲学一类的，而翻译的小说尤其多。

“我想买全鲁迅先生的杂感集子，今天跑了一上午，只买着一本《三闲集》。”

他拿起那本已经没了封面的破书给我看。上面他已经批了字：“此书珍藏，他人请勿随手乱拿。”旁加密圈，下署他自己名字，并盖有图章。

我就告诉他，我那里还有几本鲁迅先生的著作，若是喜欢，可以借来看。他就非常兴会，立刻到我房里拿了过来。

有一次我到他房里，看见他用十行纸，上面压着铜尺，下面衬着自画的方格，一笔一划地正在誊抄一本书。他抄的正是从我处借来的一本《准风月谈》。

“我把它抄起来，我已经抄好了一本《野草》。”他站起来笑着说。

“那太辛苦了。”我惊诧而很受感动：“其实你若要留着常看看，我可以全都送给你的。”

“那怎么能呢？现在都买不着了。抄一遍也是很得益的。是不是？”

停了一会，他又说：

“我们发个愿心，自己用油印来印。我来抄，我可以抄。印出来拿到街上去卖，只取纸张油墨费。我想一定有许多人抢着要。——就是不容易腾出一架油印机。”

“是呢，这也不是容易办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把我没有的集子抄一份，留着看。”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我全都有的。撤退的时候没来的及带，全都丢了。三大箱子书，丢的真可惜。是不是？”

我们并没有深谈过。平日他的嘴巴也像他的人，迟钝，干枯。我们见面闲谈，总是这样的枯涩而不活泼。这次还算谈的最多的了。

以后我到他房里，总看见他伏在桌上，宽开两肘，横搁在桌沿上，耸着竹椅靠背似的瘦肩头，显得那种使劲吃力的样子：不是在看书，就是在抄写鲁迅先生的集子。差不多没有例外。

一天他带着一副活泼的笑脸，到我房里来了。这是难有的事。他用臀部靠着我的书桌，一只脚撑去很远，嘻嘻的，沉默着，而后说了：

“您听见说么？我奉了命令，派我到前方部队里去了。”

“哦，这太好了！”我替他欢喜，不自禁地嚷着。

“现在我一两天内就要走。”

他搓着两手，在手掌心里细看着，好像那手心里有个什么把戏似的；其买那干枯的手掌里只有两块老硬的肉茧。

“这次还是不能多带东西，书也不能带。我是搭便车到洛阳。”停了半晌，他又接着说：“您有没有功夫，请您到我房里坐一坐，好不好？”

我随他到他房里。他从他的枕头下面抓出大叠的书；而后搔一搔头发，把蚊帐撩开，把铺上一层薄薄的被子一股脑儿卷起：原来他的床铺是三只旧的木板箱拼拢而成的。掀开盖板，那里面一排排全装着书。

“这全是我的书，”他搔着头，笑着，“叫我又丢了去，真舍不得。想送给您：您存着也可以，转送给朋友也可以。”

“你带不了的，我替你保存着，你将来回来，我再还给你。”

“我不会再回来的了。死也死在前方，像个样子。”他笑着，“我只带鲁迅先生的著作。鲁迅先生的著作我挑出来，其余的我全都搬到您房里去。——您嫌不嫌累赘？”

“那有什么累赘。”我回答。

于是他动手检点鲁迅先生的著作；捡了大半天，检出五六本。其中有他自己抄写的，也都装订的很是齐整。

他动身的头天晚上，正是好大月色的时候。我和他踏着石板路，走到河边上，恰好听到有空袭警报的钟声。于是我们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看着河水簸动着一棱棱的月光，听着小鱼在水草丛里发出吱吱之声。

“都说鲁迅先生是个文学家。”他手里慢慢地戏弄着几块碎石子，说：“他们并不完全懂的鲁迅先生。他们没有好好读过他的作品。”

说着，他看看我，扔了一个石子到水里。断了一会，又说：

“鲁迅是中国民族的智慧。中国社会过于腐败了，不只过去，现在也是的；不只老年人，青年人也是的。大家胡里胡涂地活，其实是往死路上走。许多人，嚷着许多好的主张，其实那些主张空洞抽象，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内容。在他另一面的生活里，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在整个的精神上，还是一样的往死路上走。比如我自己，我真感觉出来了。每天耳濡目染，习于恶劣卑鄙，而不自觉。像一步步地走进烂泥坑里，自己不能停止，自己也不知道。空暇的时候偶尔拿起鲁迅先生的集子——尤其是杂文，一读，忽然背脊上凉了半段。我恍惚听见他是在大声吆喝我。我的眼前亮了，我看见我自己站在烂泥坑旁边，脚上身上已经沾着烂泥；我看见我自己踏上死路，就要迈开步了。”

他一口气的说着，像一个酒醉的人的呓语。我很感到兴味。因为我们相识虽已很久，但他从没有这样的对我长谈过；我虽久已知道他崇敬鲁迅先生，但从没有听说过他关于鲁迅先生的议论。

“确实有这种情形。”我揶揄着。

“中国的社会积重难反，太坏太坏了。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太幼稚，太脆弱了。有时获得一点半点的智慧，从鲁迅先生的著作里。但一会子又会失却，照旧胡涂而且愚昧。鲁迅先生把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看得太深刻，太透彻了，无论是横的方面，或是纵的方面。我敢说，若是不读鲁迅先生的书，就不配做一个中国的青年。因为我觉得，除此而外，再没更好的方法可以了解中国，再没方法可以懂得怎样做一个向前的，往活路上走的中国人。青年人嚷着救中国，可以不了解中国么？青年人嚷着救中国，可以不明白怎样才能往活路上走么？不读鲁迅先生的书，那就耳不聪，目不明，只是个聋子，瞎子，会一辈子在黑暗中摸索，还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里。直到自己死亡，直到整个的民族灭亡。无论你是干什么的，无论你是学什么的，都没有例外。除非你声明你不打算活，除非你承认你自己打算死，除非你说你自己不打算做人。鲁迅先生只是个文学家？你算说错了！他是个生活家！他教人生活，不要往死路走；他教人如何争取生活，如何争取人的生活，不然唯有死灭，唯有作畜牲！”

“我说的读，不是马马虎虎的读，不是读一遍就搁下的读。是精读。是细琢细磨，细思细想，细咀细嚼的精读。读一遍是没用的，读两遍也是不大有用的。一定要常常翻出来读，不时地翻出来读。应当有一种袖珍本发行，至少杂文和散文小说要印成袖珍本，像‘牛津辞典’那样的又薄又牢的纸，印成小小的一册，每个青年人荷包里放一本。多少人崇拜鲁迅先生，各地方年年纪念鲁迅先生，为什么没人做点这样的切实的事呢？只是开开会，写些照例的文章，到底有啥益处呢？没有人注意到读的事，没有人注意到著作普遍流播的事。没有，还是没有。……”

他看着河对岸一棵树头，轻轻地吐了一口长气。

“现在的出版业还是抓在商人手里。”我插口说。

“就是商人也应当快印这种书，可以赚钱的，可以大大赚钱的。不说袖珍的，就是普通本的也没有；想借本来抄抄，也不容易借的到。我有位朋友的朋友，他有两册《且介亭文集》，我还没看过，想借来看一天，他竟然不答允。一天就还他，他不肯，稀奇不稀奇？我敢说他是拿鲁迅先生的书做他向社会表示前进的幌子的！他根本没有好好读过鲁迅先生的书！”

“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想法子向社会，向青年人表示出来，说我也

是赞成鲁迅，佩服鲁迅的。这样就比如挂了徽章，证明他是个前进分子，证明他并不腐化，并不卑鄙，从而博得青年人对于他的好感和信仰。青年人也是这样，以崇拜鲁迅为时髦，以崇拜鲁迅为荣耀的事。其实我敢说他们真正认识鲁迅先生的怕不多，因为他们多半根本没有花功夫好好读过鲁迅的书。——我这决不是诋毁这类人，他们在某一点上也是可喜的。但这毕竟很危险。人们只知瞎捧，只会盲目地崇拜。我看，慢慢地，鲁迅先生会变成一个偶像，鲁迅先生的智慧和精神慢慢地就会死去了。”

“那倒是不会的。”我插口说。

“只有精读鲁迅的著作，只有不时的沉下心细读细读，才能接受到鲁迅先生的智慧，才能把捉到他的战斗精神，才能看出他的对于工作的严谨态度。读的越精细，次数越多，才越能握的紧，越能感触的具体，越能认识的深到。

“那种老辣有力的笔调，那种洗炼赅蓄的语言，那种针针见血，直刺进你的心的深处的话句！那一句不是恰好搔着痒处，那一句不是恰好打着痛处！像拿着一条皮鞭，来鞭笞，使劲地鞭笞，鞭笞这些麻木的人们，一鞭一条血痕！一鞭一条很深的血痕！”他紧咬着牙齿，鼻梁皱着，直皱到眼角尖，两眼圆睁着，右臂用力地向下抽打，好像他手里真握着一根鞭子。

那一晚警报时间很长，有三批敌机打我们头上飞过。等到解除钟响了，我们才站起来，慢慢地离开河边，向归路上走。从他的谈话里，我获得了许多的欢喜。我想，今天晚上他这些话，大约庄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平常没机会告诉我；现在要和我告别，上前线去了，他就不自禁地因兴奋而向我倾吐出来。我在前面走着，一边不住地回头看那个干瘦单薄的身影；我分明触感到，他的那个身影其实很是健壮，很是结实。

第二天大早晨，这位奇怪的副官就背着他的小小的行囊，搭了一辆军用卡车，到河南前线去就任他的炮兵连长去了。

有幸结识了一位老先生，使我大开眼界；他真是一位博学多闻之士。

他曾在教会学校当过近二十年的学监，曾在儿所教会大学当过多年国文教师。孔孟经书读的滚瓜烂熟，自然不用提；耶稣的全套博爱救世的道理，他成天满口的宣扬着，因为他是一位三十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此外，他也熟读者庄之书，主张为人处世应当无营无求；也极力宣说墨家的学说，鼓吹苦行主义；佛教的道理他也拍手喝采的，因为一则某某法师是他的朋友，二则某某巨宦又与他有十年知遇之交，而此阔人在失意之后就虔诚奉佛，直到老死于天津的租界上。他也谈美，自信对美学有深刻研究，因为他买过一本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用朱笔圈点过三章多。对高尔基之死，他也深加叹惜，承认他是个“一代文魁”，可与中国的韩文公媲美，夸赞他“丈起俄罗斯文苑之衰”，因为有一天他到我房里来，我没有功夫答理他，他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册高尔基纪念号的杂志翻看了很久。

他老人家身体出众的康健，牙齿一个也没脱落；眼睛也好，看土纸印刷的报纸，毫不感觉费力；走起路来，腰干挺直，步步稳快；每餐可吃两碗干饭，一碗稀饭；无论何时，总听见他哼唱着，从大鼓昆腔以至五七言诗。因为他有的是多余的精力，所以最喜找个人谈话。因为他是个年老的基督徒，又曾做过多年的学监，所以一开口就是教训。

这所谓谈话，在他实是一种发泄。他不许对方开口。他要你恭恭敬敬地坐在他面前，庄肃而含微笑，不时地点头称是，以表示你的叹服和领悟。于是，他满意极了，可以随手抓住一个题目，以他一生广博的学问，援引发挥，

从《礼记》扯到破除迷信，崇尚科学；从早起早睡的道理扯到艺术起源和“移情作用”；从希特勒的霸业扯到幽明分界，因果报应的道理；从必须乐天知命，不可妄求的哲学扯到一位英国教徒肯以三百元代价买了齐白石画的三只墨蟹的奇事，因而又见出至理来；从佛家静坐的功夫扯到立志进取，必有成就，古今英杰无不由奋斗而来的精义。他的每句话都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教条。他说的如何空洞芜杂，他也不负责任；如何矛盾悖谬，他也不知道。直把你教训的不得不慢慢站起来，借口说是尿急了，逃走，他还是要对着你的后影大声地嚷下去。

“我是个老青年”，他常常说，“你们别以为我年纪大，我的脑筋可是挺新的。”

于是他马上拿事实证明，就孟子说“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这就一半是错的。帛诚然轻，暖，老人穿着合宜；吃肉可不然。他有一位同庚的朋友就是吃肉吃死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古圣人也并不是无可皆议。脑筋旧的人就不然，他们以为圣人的话都是对的，等等。

他房里靠书桌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纸条，有一条写着道：

“凡吾人读书阅世，所心得者必须告于人，吝教，小人也。”

同住在一起的都是些青年朋友，对于被老先生拉着“谈话”，引为至苦。因此老先生平居很感寂寞，而需要“谈话”的心愈益热切。

因此老先生每天盼望有空袭警报；因为警报一来，大家都聚集到防空洞里，此时相对无聊，他的“谈话”就不怕没有对方了。

“又闹飞艇了！”他管警报叫“打报告”，管空袭叫“闹飞艇”。于是他说了：“天天都闹飞艇，凭这点子恒心，你们不要小看了日本人！日本人有这个恒心！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是我们圣人的名训，我们自己不知道宝贵，日本人却识的这是句宝贝活，拿来奉行不渝，拿来欺侮咱们中国。这真可叹极了。所以说，”打这里扯下去，后来伊于胡底就毫无准儿了。

就是这位老先生，一天警报时候，拿着一函薄薄的线装书到防空洞里，从容不迫地坐了下来，探出着头，把在座的人都打量了一回。

“你们都在这里么？”他很威重地说。看他的神气显然又是要过他的“居，小子，吾语尔”的那个瘾。

他慢慢把手里那一函书拔下牙签，摊开在膝头上。防空洞口有太阳光映射进来，我们看见那是最近出版的许广平先生编的影印“鲁迅书简”。

“不是听见你们都作兴这个姓鲁的么？”他得意的说：“我弄来这部他的书简。是昨天孟委员请我吃饭，是他赠我的。这诚然是部好书。写的好，作的好，称得起‘写作俱佳’四个字。你们可以好好地研究他一番。这鲁迅诚然是个人杰，的确是个人杰。”

他也一样承认鲁迅是个人杰。原是：人家把他的书信这样考究的印刷装订出来，连孟委员也买来收藏，不是个人杰有此份儿么！

“怎么的确是个人杰呢？”一位朋友嘻嘻地问道。

“你这话问的有意思。”他很满意，因为平日朋友们是很少向他发问什么的，“我和你们说，这是一部性灵流露之书，非人杰不克有此。你们读过《郑板桥家书》么？郑板桥是个前清的名士，也是写作俱佳，另外还有一笔好画。这是前清的一个人杰。他的书信，字画，至今流传，胎炙人口。就是因为一派性灵，出于自然，丝毫不假造作。唐朝的李太白，是唐朝的一个人杰。他那种奔放之诗，还不是性灵流露之作吗！不过唐朝是古之盛世。所以

李太白的气度自然显得厚些，比郑板桥晚近之才，自然又有不同；但为人杰则一。我告诉你们，——这最为重要：凡人杰之得以传于后世，全靠一个不移之志。人杰，是天地灵气之所钟，无代无之，无地无之。天地间有所谓正气，像文文山的《正气歌》；有所谓刚气，还有浩然之气，——自然，浩然之气有时也就是正气；也有妖气。灵气是百气之一。灵气充沛于宇宙，钟于山，钟于水，亦钟于人。——钟于人，即为人杰。所以说，人杰地灵呢。何以说全靠一个不移之志呢？朱子不弃篇说：‘人皆趋波，我独守此；人皆迁之，我独不移。’这就是个不移之志。说得俚俗一点，就是，不管世俗如何，我站稳我的脚跟，不许它摇宕一点。我只管我干我的，不管别人干什么，怎么干。吾人立身处世，这种操守是应当有的。我是干什么的？干教育的。五十多年来吃的一碗教育饭，我即五十多年守此不移。无论到那里，我也是要教人。此为吾之职，吾之志，吾立定脚跟于此。所以我替我的书斋取个名，叫做‘我有我之我斋’，你们说名字怪不怪？哈哈，其实再恰当也没有了。所以少年人，立志，为一件最大的事。不立志，即未站住脚跟，一辈子摇宕浮沉。——就是这个‘宕’字，宝字头，一个石字的宕字。这一个字，毁了多少人！……”

“您刚才要谈的是鲁迅先生呢！”一位朋友提醒他说。

“是呀，回过头来我自然要谈他。”他说：“这鲁迅，即如唐之李太白，清之郑板桥，是民国的一代人杰。你看他这一笔字（他指着膝上的书筒），完全戛戛乎独造。既不宗王，也不宗颜；不是魏碑，不是章草。什么也不是。可是才气横溢，一点不俗气。文也是好的，全然出于自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独往独来，丝毫不受拘检。——《郑板桥家书》你们读过么？也是这样的。可是我告诉你们，你可不能学他，你学不到。凡人杰，都不是功力求来的。杜甫可学，李太白则不可学。你们若想学他，必定上个大当！还有一点，昨天我和孟委员曾经详论过的。孟委员也大大的佩服。你们常常鲁迅鲁迅，报上也鲁迅鲁迅，真是风靡一时。可是有一点你们未必知道。就是他的满腹郁结忧默之气，……”

“什么之气？”朋友很好奇地插问道。

“你们不是常常说忧默么？鲁迅的文里正就有忧默之气，也就是郁结之气。这可千万要当心！（朋友们半懂不懂，但都不禁嘻嘻笑了。）诚然，国事至于今日，忧世伤时，也是志士仁人所当有，不足为怪的。可是形之于文，传之于后，影响可太大了。怀才不遇，牢骚发乎中，也是人情之所不免。但因此而郁结为戾气，不能遣解，则不但自苦，亦且害世。少年人受害尤其不浅。我从前年少的时候，也不免趋尚时好，羡慕才情，把个郑板桥何绍基一类人五体投地的拿来崇拜。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杰，不可学的。然而幸好郑何一类人，毕竟还是平平正正，笔墨间并无半点戾气；极而言之，到头只沾着点野气。所以虽未获益，毕竟也没有受多少害。这鲁迅就不同了。孟委员说的，鲁迅的诗文，没一篇不是诋毁他人的。哈哈，吾知之矣！骂人是多么容易的事，那个骂人也可以骂的痛快淋漓！少年人缺少阅历，惑于他的辞令，大家都竞竞尚之。如此风靡时，造成风气，后去真是岂堪设想！我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牢记着：人生处世，贵乎快乐和平，这是属于阳性的。若整天忧默郁结，患得患失，那就入于阴性一流。你们想想，一天到晚和和平平，坦坦荡荡，快快乐乐，那有多么好！何苦牢骚满腹，以诋毁詈骂为快，以讽刺诽谤为能？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人，社会国家纵能容之，亦必不能自永其

寿！不会活的长久的！屈原就是个先例！屈原当初纵然不跳江，也必定郁结而死，决不能活个七十八十！何况屈原只为忧国，一片忠心，并不是成天乱发牢骚；也自有其一种浑厚磅礴之气，和戾气又截然不同。你们看，呐，这里，（他翻开折了角的一页）这里他自己说的：‘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哈哈，是不是？所以这是人杰，他自己知道的。毒气鬼气，全都是戾气。钟于灵气，发为戾气，这是末世之象，也怪不的他本人。可是你们青年人定要当心！我再告诉你，凡正气之所钟，如孔，孟，耶稣，那是我们可以效法，而且应当效法的。凡灵气所钟的人杰，先不管他的戾气不戾气，你就要学也没法学的到。你们一片热心，趁早收起来！我告诉你们，著书立言，是我们的职志，且吾人亦必有此志。但总须温柔敦厚。你们留心‘温柔敦厚’四个字！我今天说了半天，这四个字最重要！至于他信里说的，不肯受外国人的赏金，那是好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古人也是如此的。……”

说话之间，大家原都是以一种好奇逗趣的心静静地恭听着。但是听到后来，也许是觉得还不如某某之类的议论警辟而奇妙罢，于是有几位慢慢地溜出洞外看敌机的踪迹去了。老先生四座看看，轻咳了两声，不免有点意兴索然；用指头上长约二寸的指甲敲着书筒的函套，哼了几句诗，另外抓了个题目，扯到他的牧师比医生更重要，精神上的病比形体上的病更可怕的一番至理名言上去了。

老先生的鲁迅论戛然中止，在我是觉得很可惜的。但即此已可以见出一个梗概；我相信他这番议论，佩服的必定不止孟委员一个人。

我的一位远亲，排起来大概是老表之类罢。因为我们年岁相仿佛，他称呼我表哥，有时我也称呼他表哥，彼此之间是很亲密而又很客气的。

他在文化界多年，为人也并不多特别，不过真实，坦白，神经质，感情冲动，是朋友们素所深知的；对鲁迅先生一心敬仰，提起来，不曰“周先生”，就是“老头子”，无论谈到什么问题，总不忘记把鲁迅先生扯上去，这也是朋友们都知道的。

“这次神圣抗战，局面变化真是太大了！要是周先生这时候还在的话，你说他怎么样？”这是他最感觉兴味的问题。我已被他问过不止二十次。

小小的个子，贫血的脸，近视眼镜，满身油迹的旧西装。——那西装的裤子恐怕穿着很不舒服，不时的看见他用两肘管着，腰部往上挺一挺。

对于钱财账目之类，是必定弄错的；不管多么重要的信件，是往往忘记答复的；朋友托他办什么事，也总是忘记了……

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位先生。

一天下着大雨，这个好人伞也没打，弄的泥身半段，跑来找我，把我房里踹的到处泥水脚印。

“表哥，”他说，“今天你请我吃饭，我还要喝点酒。”

我说：“可以的。但是有条件：第一，没有菜，因为家里没预备来客人；第二，只有上回喝剩的小半壶大曲，天下雨，没人到街上去。

我的话他没有听，他就说他自己的去了。他躺到藤椅上说：

“我真兴奋极了。昨天晚上我梦见周先生。有趣极了！太逼真了！我现在想起来还……你听我好好地谈给你听：说是抗日战争胜利地结束了。我和我女人走到街上，说是在一家铺子里领东西，只凭一种证章，完全不花钱。那位管东西的职员看了看我的证章，一检检出一包东西交给我，上面写着九

一六的号码。我说：对了，对了，这就是我的号码。——真是我的号码。你说是什么号码？是我从前在学校里时候的注册号。严格地说，我已经忘记多年了，忽然做梦会想起来。表哥，你说好笑不好笑？”

“你这个人还会记牢了一个数字号码？”我笑着说。

“上课的时候，先生就是用学号点名。严格地说，这个号码我听了四年，我怎么记不牢？——你说那包里是些什么？两件汗背心，四双袜子，两管黑人头的牙膏；还有一件是一本作文簿。说是我自己写的一篇稿子，说是交周先生改过了的，从头到尾都改了。当时我也没有细看。我想一定又是字句不干净，标点符号没有留心，用了不妥当的字眼；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老毛病。我记得眉上还有许多小字的批。我心里乱的很，好像有许多事缠在我心里。我急急地走到街上，看见许多人往一个戏院里走，潮水似地涌过去，我也跟着往那边去。忽然迎头遇着你。你问我那里去。我说：‘听老头子讲演去，你也去，我们一路去！’我就拉了你同走。你把我的手摔了，你说：‘胡说八道！周先生战前就死在上海了，那里又有一个鲁迅先生？’我笑你见闻太陋。我说：‘这你都不知道吗？战事一结束，周先生的肺就带到苏联换来一个新的，周先生是早就好起来了！’严格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消息是那儿来的。心里只觉得快乐。和你一同走进戏院里。那里面人山人海。一会儿，有个人出来讲话了，说大家安静些呀，周先生身体刚好呀，不能用大嗓子说话呀。——可不真是周先生讲演吗！我高兴极了。使劲地挤，使劲地挤，一直挤到台口跟前，又找到后台。我埋怨他们办事的人为什么不在台上装一个扩音机。办事的人说，周先生不肯用扩音器说话。——我想，周先生真是！严格地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表哥，你说周先生若是还在，他肯不肯用扩音器说话？”

我笑了起来，我也只好说：“严格地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做梦真是莫名其妙。——一会儿，周先生走出台面来了。你听那个掌声呀，那些欢呼声呀。有些人快乐的在座位上乱跳，把帽子脱下来乱扔。我把手都拍肿了。周先生步子很稳健，三步走到台口上站定，和蔼地微笑着，背着手，也不动。穿着一身庄青羽纱的旧夹袍，头发蓬蓬的。严格地说，完全像他生前那次参观木刻展览会拍的照片里的样子。一会儿，人声突然静下来了，周先生的嘴唇在动了。我听见他报告讲演的题目。——表哥，你猜是什么题目？”

我猜不出来。饭可拿上来了。下酒的菜只有两个皮蛋，一盘铁胡豆。我把半壶大曲放到他面前，让他自斟自酌。

“表哥，”他站起来扶着裤腰，挺了挺身体；斟了一杯酒，喝了半口，流了一半在他的衬衫和领带上；而后撮了几粒胡豆在手里，坐下来，继续说：“严格地说，老头子完全不同了，说话改了风格了，不说讽刺的反话了，完全说的正面话了。这回的题目说是《论马虎文化》。论马虎文化，我记的牢牢的。一开头我就觉得是要斥骂我。我看见他手里拿出一大束报纸杂志来，翻着。我知道其中有我编的一种，也有许多我发表的稿子。我知道都有点糟糕。我怕他把我的名字当众提出来，指着我大骂一顿。我心里乱极了。也着急的不得了。但是心里却在极力准备着遁词。我想嚷起来，我想说：‘周先生，你不知道，严格地说，抗战中什么条件都万分艰苦，你不能不替我们想想事实的困难呀！’后来，我真的嚷出来了。我嚷出许多理由来，可是一嚷，就嚷醒了。——严格地说，是我女人把我推醒的。”

一边兴奋地说着，一边满嘴口水地嚼着胡豆壳。——因为，严格地说，他把胡豆肉大半零零碎碎地吐到酒杯和酱油碟子里。

“表哥，”他喊我，说：“你看这个梦有趣不有趣？——严格地说，恐怕都是我的神经作用？”

“你这个梦真是有趣的很。”我笑着回答。

“今天早上，我从四点半钟醒过来，直躺到九点我才起身。”他沉下脸，严肃地说：“我在枕头上好好的来了个自我批判。表哥，难怪你常常说我。我这个人的确太马虎了。想起了周先生，心里不能不难过，不能不惭愧。我今天从头到尾好好地想了一番，简直把自己批判的体无完肤。我高兴极了！我想，周先生的锐敏深刻的眼光，周先生的学问根柢，周先生的硬骨头，钢铁一般的战斗精神：这些，我们也许学的到，也许学不到，要看各人的本质是怎样。可是他的治事精神，他的对于工作的毫不苟且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只要自己留心，严格地说，是不应该不能的。我想想，我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站在文化的岗位上，这许多年了。可是，我对于我的工作太马虎。我欠缺了一种对工作敬重，对工作尽心竭力的精神。我这个人太松，是太松懈，太懒散。并不是我有意马虎，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弄的。”

“表哥，也并不一定完全因为这个梦引起来的。我近两年自己常常的不安，老是感觉一种莫大的内疚似的。我的毛病我自己完全知道。你平常说我的，不过是最显著的几点。严格地说，有许多你不知道，你观察不出来。第一，我精神上时时刻刻像负着重债，没有一刻感觉到那种安闲自在，愉愉快快的时候。我的形体上老是闲着的时候多；东跑跑，西谈谈，无聊的时候多，真的坐下来作事的时候少。可是心里老是非常忙迫，从来没有从容自在过。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弄得这样。到了逼紧了，非坐下来工作不可了，我的心还是没法子宁静下来。我心里老记挂着许多别的事，许多别的问题。你只知道我写的稿子没有尽心尽力，只知道我写好稿子从来不看一遍就交出去排印；你不知道我内里的根由，你不知道我内心的真实状态……”

“我今天想，周先生是怎么对付他的工作呢？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个心的放在他面前的工作上面，用了他的全副精力。一个字都不苟且。要不然，他的文章为什么那样严谨，那样凝炼，有力？”

稿子写好了，他一定回头细看几遍，一个字写的不清楚，都要涂去了，重写一个；一个标点打的不妥当，都要重新改过；一句话说得不放心，他都要花费许多时间，想尽法子，找许多麻烦去查书。他的文章拿出来，才是结实实的一篇文章。——我们只说用心，不是说才力。他自己校的稿子，一个错字也不许有，一个标点也不许错。有一个字模模糊糊了，他也要勾出来重新排。他不许标点排在每行的头一格，怎么麻烦他也要调整过来。经他的手编印出来的书，的的确确才像一本书。你看看《海上述林》，你拿到世界上那一国去比一比也毫不逊色！——我不是说纸张和装帧——还有替青年朋友看稿子，改稿子，严格地说，比那个负责任的国文教员也要过细些！”

听到这里，我把筷子放下，拍起掌来。前面那番话，在我是毫不觉得稀奇的，因为我常常听他这样诉苦，已经听惯了，虽然是大同小异，但最后这番话，今天却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我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表哥，”这回是我喊他，“你怎么也注意起这些小节来了呢？你以前不是骂这是迂气，这是钻牛角尖么？”

“你不要捅我！”我的老表对于我这调侃，表示了反感，“我近来常常

反省自己。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检讨我自己。我近来对自己有许多认识，还没有同你谈过。我怕你捅我。第一，我对于工作，完全凭冲动，或完全是被迫的，不是自动的。我想我这样像个文化工作者么？我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木工，像一个产业工人一样，天天的那样工作，经常的那样工作呢？我为什么高兴就干，不高兴就不干呢？逼紧了，才马虎干一干；没有逼，就老是不干呢？我想，一个严肃的工作者应该是自动地要干，他敬重他的工作，他对他的工作发生兴趣。他是每天干，经常地干！高兴，得干；不高兴也得干！周先生就是这样的，谁逼着他和封建和帝国主义这样斗争的呢？谁也没有逼他干。表哥，是不是应该这样？”

我说：“那也要看具体情况怎样。——自然，严格地说，当然应该这样。”

“我近来常常看外面投来的稿子，”他把最后一杯酒喝完了，停了停，说：“大半都是青年学生投来的稿子。每天总有个十件八件。严格地说，没有一篇能用的，没有一篇！内容不谈了，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这么伟大的抗战，为什么青年的灵魂里这样贫乏？”

“也有好的，不能一概而论。”我插口道。

“我是一般地说。”这回他不是严格地说了，“我以为第一是根本没有诚意，只是鬼混一下，图个侥幸；第二，我要先骂我自己，目前文化界里没有好的榜样给他们！”

“骂你自己可以的；把责任推到文化界身上，可一定有人会不答允你的。”

“所以先骂我自己。——表哥，你看看那些大堆大堆的稿子，真要叫人丧气！我们不管好不好；只说用心。比如标点罢，有的全是轻轻的一点，也不知道算个逗点，还算个句读，还是算个爪子点；有的从篇头到篇末一路逗点打下去，直打到最后一句还是个逗点！”

“这倒是目前报纸杂志上时兴的办法。”我说。

“所以我说目前的榜样太坏。——再说，那些字迹，真是交给那个有本事的文字学专家也研究不出来。错字讹字连篇都是，那更不用说。句法往往出奇的不通，真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至于滥用名词，句子的拖沓，意思的散漫零乱，说来说去简直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没有文法，没有章法，没有修辞，没有一点逻辑观念！”

“这个学校教育要负点责任。”

“文化出版界也决不能辞其咎！——总之，太堕落了！太堕落了！我说简直是堕落！最要紧的还是用心，根本不打算好好地干。你说难道标点符号也是难事么？花两个钟头的功夫就可以学会的。他们根本不肯用心。甚至看一首短诗罢，肯句句留心，字字过目的也没有！他们翻开书来，只是走马看花，看个朦胧模糊的故事！半个钟头可以看完一本《铁流》。总而言之，没有学习的诚意！”

我喝了一口汤，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

“表哥，我知道你笑的什么！”他也难为情的笑了，“你是说我没有资格责备别人，你是说我和他们一样的。我知道！表哥，是不是？”

“你不要管我，你还是说你的。我喜欢听的很。”我说。

“我告诉你一个笑话：我女人的大弟弟，我的一个小舅子，十九岁的一个大学生，学文学的。他老把个‘环境’的‘境’字，写成‘风景’的‘景’字。我说了他一次，他骂我没落了，也咬文嚼字起来了，骂我为什么也注意

起这种无聊的事上来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汉字根本应该废除的，这是落后的文字，将来应该一律拉丁化。——这大体上都是我曾经骂过别人的，你又要笑了？——我和内弟说：你现在是不是还用的汉字呢？你为什么要把它写讹了呢？分毫丝厘的，一点尺寸都不走不是应该的么？你也等真正能够把汉字废除的时候再说呀！——表哥，他们现在都讲究大处：他们不屑于注意这些小事。”

“当然，大处怎么可以不管呢？”

“自然，严格地说，大处小处是同样不能漠视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是一回事；文字语言的问题又是一回事。谁说要叫他们放下大处呢？——这还不好笑。最好笑的是过了两天，他翻出我自己的一篇印出的文章来，那上面我也笔误了好几个字。这一下，弄得我哑口无言！所以我说，目前文化出版界不能辞其咎！我受了多少刺激，受了多少内心的谴责，我不能不通头反省，不能不批判自己！”

“这样的情形下去，——事实上是已经造成了风气，岂只是‘马虎文化’？简直是‘堕落的文化’！简直是‘文化的堕落’！世界上从古以来没有一个向上的民族社会可以允许有这样的文化的！这就叫做新文化呀！凭这样的新文化就可以推动出新的中国呀！——表哥，我心里的苦痛真是说不出，尤其想起了周先生！”

“我今天早上翻看了一早上周先生的年谱。我高兴极了！周先生像我们年纪的时候，还在北京教育部衙门里当他的科长，当他的金事。严格地说，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文艺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文化斗争的生活。我想我们目前也还是在吃奶。只要我们不甘马虎，能够认识自己，努力克服弱点，也许将来干的比周先生还要有成绩。这样一想，我真的增加了许多勇气！”

“我今天上午，校对了一上午稿子。篇篇都是我自己校对的。我连排成了‘幹’字的‘幹’字都找了出来。——表哥，你看就是，下一期的阵容必定叫你耳目一新，文章篇篇结实，印刷字字都不含糊！从此以后我下了决心，我每天至少在桌上工作十个钟头！”

“表哥，”我说，“你不要冲动。真那样，怕你顾了小处，又忘了大处！”

“无论如何，我今天高兴极了！所以我要跑来告诉你。我要冒着雨找你喝酒！——表哥，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的许多话，有些地方虽然似乎言之过甚，但是大体上我是同意的。”我笑着说：“无论如何，你的鲁迅先生的梦是做的太好了，你的自我批判的功夫，也是太有价值了！”

“你也替我高兴罢？”

“那当然。——但也并不太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再过两天，看你的冲动同兴奋就要完全过去了。”

这末后一句，是我有意要捅他一下的。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

（原载1940年12月《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

谈癖

人之癖，当无聊闲谈的时候，是个有趣的题目。

何谓癖？严格的定义倒似乎不容易下。通常大约是指某些不正常、没道理的习性而言。其形成，想多起于积习，慢慢发展而成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世上绝对无癖的人，恐怕不见得多。不过普通人的癖，或因司空见惯，人遂不觉，比如喜抠鼻孔，好抠脚丫之类；或因相习成风，积非成是，比如旧时代的人喜爱妇女小足之类。有一些癖，来得显著而又奇特，使别人惊诧，不能理解；他本人亦莫知其然，并且无可如何：这就应当归入怪癖一类。

有一位本家老哥，整天做一副怪脸：眼睛瞪着，鼻梁皱着，牙关撕开着，自鼻侧至嘴角，扯出两条很深的折痕。略如佛殿前四大金刚的面目。我初见他时，以为他本是这副面目。那知其实不然。有一时他忽然松开脸孔，怪相立刻不见，五官原来都很秀气。然此秀气的脸孔，只可于偶然的一刹那中见之，经常显现出来的，还是那副“金刚怒目”的怪相。此人甚怕我的父亲。父亲常叱骂他做此怪脸，他即努力要抹去脸上怪相，但极不易如愿，而且不能持久。我们有时嘲笑他，仿效他，他即生气。又有一位同学，当与他对话谈笑，或并肩同行时，他常常突然一回头，自用其嘴咬一下肩膀，并发出一种怪声，如狗抢食时的叫声。此种怪动作，每日至少要做二三次，总把我吓了一跳。他即脸红耳赤，觉得极难为情。察其情，直有不能忍禁的苦处，像我们平常人打喷嚏或打嗝儿一样。有一年在津浦铁路上遇一旅客，此人与我同房。我看见他的脸上，眼睛，眉毛，鼻子，嘴唇，以至两边腮巴，每个部分，每块肌肉，无时无刻不在动着。各部分的动，有许多变化，或二至三个部分向同一方面动，或另以数部分作方向不同之动；或各部分轮流递换地动，或各部分同时一齐动。而且或，或扭，或扯，或牵，或跳，方式种种不同，总使整个脸孔经常地保持在动的状态中。动到一种辰光，大约他自己也觉得难过或难为情了，就用手使劲在脸上摸一把，意欲使之不动。但无效果，不等他的手拿开，脸上各部又已开始动起来了。此人脾气甚大，见人偶有笑容，以为笑他，即怒目相视。但尽管怒视，他的脸还在动；见茶房露笑容，他必怒骂：“王八旦，笑什么，没规矩！”但尽管怒骂，他的脸还是要动。车中无聊，有时我亦偷偷将脸面壁，而仿效其动。可是顾此失彼，不知所措。以视他脸上那动之匀称熟练与自然，怕练他十年也不会成功。

幼时家中有一常来的客人，此人有数怪癖。当他举碗喝茶时，他必先以左手食指入茶中，立时吓了一跳，连忙缩回手指，而后才若无其事的喝茶。当他睡觉时，解衣后于床沿坐定，忽然举起一足，把鞋子摔出很远，于是独脚跳着过去，套上那鞋子，重复回床坐定；再把另一脚上鞋子照样摔出，又照样跳着过去，把它穿上。如此表演毕，才若无其事的上床安寝。当他大解时，他搂起衣摆，走到厕上向坐处探头一看，而后吃一惊似的走回；再走去一看，重又走回。如此来往二三次，才若无其事的解开裤子，坐了上去。幼时顽皮好奇，因为素知他这些有趣的怪癖，到他睡觉或上厕所时，必从门缝中窥看。我看见当他这般表演时，他的脸色极是严肃认真，绝无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他喝茶时试之以手指，而又吓了一跳，表情亦是如此。而且每次必如此做一套。察其情似亦有不得已者。他的怪癖，不止这三种，据传说，他的太太就知道另有一种，可惜未闻其详。不过上述三种，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亲见的。

以上所说，苟非亲眼看见，谁能置信？若说是因心理或生理的病态，毕竟是何病态？若说由于积习，又是怎么样养成的？其间必有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原因，人莫能知。癖之怪而至于此，真是太没道理了。

一个人的生活过于窄单调与呆滞，最易使其习性作畸形之发展；一个人受压迫太甚或生活太悲苦，最易发生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旧时代妇女之有怪癖者特多，实非偶然。

曾见一婢女有偷食癖。做婢女的吃不着少爷小姐吃的好东西，因而偷了解馋，这本是有道理之至的事。但此婢女情形有不同者。她的老主人性格宽厚，少主人则力讲自由平等之道，他们待她实在很好（后来送她上学校读书，做了女学生）。每逢吃东西，必有她的一份。但是递给她时，她总不肯接受。她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但背后她必想方设法，甚至冒甚大危险，偷食此拒而不要的东西。后来发现的次数多了，人人以为奇怪。一次同伴于闲谈时间问她何必如此。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偷的好吃些。”说此活时，愁眉苦脸，若不胜重忧者。又见一婢女有放火癖。她荷包里老藏着一盒火柴。当她到柴房取柴时，她即将柴草点燃，看着火烧大了，她又吓得大声呼救。早晨她在房中扫地，往往暗将帐子点燃，但随即以手乱扑，并且急得呼号。在避人耳目之时，她总要放火，而且总把自己吓得面无人色，以至哭叫。起初，人家不知道此即她自己干出来的事，于是疑神疑鬼，当是狐仙作祟，轰传远近。但日子一久，马脚渐露，终于把她拿住了。问她何以如此，她说不出道理。此女时十六、七岁，聪明，伶俐，主人素来爱重。说她出于顽皮无知，说她心里藏着什么怨恨，似都说不过去。

有一妇人吃饭，必须捧着碗，靠在门方上站着，才吃的下去；否则不能下咽。若参加宴席，她只能陪着坐坐，连筷子也不举。必待席散，她才到厨房里盛一碗饭，箝点菜堆在上面，慢慢的吃着，显得香甜无比。若出外赴席，亦必回家再吃。她发觉人家有意的看她吃饭，必羞的狼狈而逃。因此她躲到偏僻处的门上去吃的时候多。人家拿她取笑，她即说：“各有各的脾气，少见多怪的！”此人婢女出身，后作主人的偏房，后又扶正。又一年老仆妇，经常以坐着打瞌睡，为正当的睡觉；除非重病不得已，从未上床躺着睡过。坐以打盹的地方，最好是门阶上，旧式床的脚踏上，否则短脚凳上亦可。坐高凳难得佳眠，平躺着则不能合眼。又此姬喜食瘟猪肉及腐臭霉烂之菜，简直嗜之如命。若闻何处何家弃有死猪及腐烂败味不堪入口之菜，必跑去设法弄来，虽有要事在手亦丢开不顾。

在太太们，洁癖怕是最普通的癖。我的一位寡婢，除一贴身婢女外，不许任何人进她的卧房。即此婢女，亦须确有必要之事，始许脱去鞋子进去，立刻就须出来；闲常轻易不许入房，不脱鞋不许入房。人至其家，除递来的茶碗外，任何物件，即如桌子，凳子，门扇，墙壁之类，也最好不要随使用手去摸或动。她很爱我。一次她生病，叫我去给她看看；但我不肯脱鞋，结果竟蒙特许。此是除那婢女外，第一个人进她的房，而且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有人穿着鞋进她的房。又一新式太太，出身贵家，爱洁成癖。每日洗脸洗手，没个遍数；这不必细说。今举一事为例：一日，与其丈夫家人等闲坐谈笑，她的丈夫说了一句话调侃她。她即起立，一边娇嗔地说：“我要打你！我要打你！”一边走入房中，以香皂洗手一次，走出来，在她丈夫身上轻轻拍了一下，再到房里以香皂洗手一次，而后始像做完一件大事，含笑归坐。

还有一位太太嫌恶许多东西，虽对并非不洁之物亦然。后来最使她嫌恶

的是落下的毛发之类。若见地上或桌上有一根落下的头发，她即蹙额瞪眼，以手紧握其嘴，失声惊呼：“啊哟不得了！一根头发！”其紧张之状，实已超过嫌恶，而类恐怖，这显然快成病狂了。

积习成癖，积癖而成病狂。习，癖，狂，原只是量的差别，其始似并无本质之不同。

按理说，小孩子年纪小，入世不深，不应该养成什么古怪的习性。可是据我的观察，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癖，他们缺乏理性，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喜好。喜好什么，而莫名其妙，亦是癖，至少类乎癖。

曾见许多小孩，当他们两三岁的时候，喜在地上抓鸡屎吃，喜在门窗器具上掠尘灰吃，亦有喜食泥土者。有一女孩喜吃干鸡屎，见则如得糖果，若有人拦阻她抓食，必号哭滚跌，与之拼命。又一小孩常瞒着大人，躲到人迹少至的搁楼上去吃灰尘。若被人发现，他即害羞而逃。我的一个侄女，幼时喜吃水烟袋烟杯中之所谓“烟屎”。每见大人吸水烟，必索其烟杯，到手，先以指头抠食，而后十分馋饕的置杯于口中舐吮之，吃的眉开眼笑。若要不到手，则撒赖拼命。平常欲止其啼哭，或欲其依从何事，亦唯有以给她脏烟杯子为条件，始能达到目的。这都是说的两三岁小孩子。还有一亲戚家之女孩，年已七、八岁，喜食纸灰。平常吃的，是吸水烟用的纸捻儿上的烟灰，这不算奇。一次邻家有了丧事，俗例于钵中烧“纸钱”，以奠亡魂。此是大量的烧纸，有大量的纸灰。她即成天守着那钵子，大把大把的抓了吃。吃到咳呛流血，吓得哭起来，哭了一会，想想，还是不能忍禁，抓吃如故。其何以有此？想是生理上缺乏什么质素？怕也未必。今大人之嗜好烟草，已成一全世界普遍的风习。吸烟与吃灰，严格的，客观的说，有什么不同？人本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

小孩子恶作剧，喜破坏好杀生，这是人听共知的。但平常不过喜弄坏玩艺或用物，喜弄死蚂蚁蜻蜓而已。我知道两个实例，却有远甚于此者。有一男孩与其所配之童养媳，都是十岁上下的年纪。这小俩口儿，每在大人外出时，将家中的鸡捉住，两人合作：一个提着翅膀，一个以一通旱烟袋用的铁钎，自鸡之粪门通入，自嘴中穿出。如此弄死的鸡，不知有多少；有时一次要弄死两三只。虽被大人严行打罚，亦不能禁。问他们鸡蛋好吃不好吃，答曰好吃。问既如此，家中的鸡死光了，有没有鸡蛋吃。他们亦知道没有鸡蛋吃。又一八、九岁小孩，其母有事外出，叫他在家好生摇小弟弟睡觉。他却跑到厨房中拿来菜刀，先将其弟之“小鸡鸡”割下，再将睾丸割下，又将其鼻子耳朵全都割下。一个不到周岁的小弟弟终被裔割而死。这简直骇人听闻了。他们何以喜干这残忍的事？不过解释说，因为小孩子好奇，顽皮无知，等等。其实亦不尽然。日本“皇军”占领我们首都后，以杀人多寡赌胜负，岂亦出于顽皮无知？人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本没什么理性可言。

我的一个小孩今年算是六岁。此君颇有些有趣的癖。他常坐着出神，一个人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每天早晨在上马桶时，他独自坐着，眼睛看定一个地方，做着手势，说：“这边来了一只老鹰，哦，没有了！这边来了一只狐狸，哦，没有了！我拿石头打你！你不怕石头？搬飞机来摔你炸弹，看你怕不怕？”云云。不知他是对谁说话。又常喜弄点吃的东西，一个人躲到门角落里，以门将自己遮掩起来，有时于其中扮演数个人对话，有时不作声，也不吃东西，呆头呆脑的蹲着，久久不动。也不明白他想的些什么。我知道许多小孩有类此的癖性。我依稀记得我自己幼小时，亦喜如此，情形大致与我

这个儿子相同。所以我对此孩的所为，颇了解与同情。但我已忘记自己当时毕竟是何心情。于是有人说，此孩此癖，是受的我遗传。有些癖性乃由遗传而来，恐怕不假。

总而言之，孩子们的癖似都无关乎“积习”；与大人们的癖究竟不相同。

癖，是畸形的发展；做文人，据说须有天才，天才亦是畸形的发展。故若将此题目拿到文人身上，亦有不少可谈的。

林和靖妻梅子癖鹤，王羲之癖鹅，陶渊明癖菊：此不过有所喜爱而已；纵然也算是癖，无足奇者。史载温庭筠每吟咏，必八叉其手；陈后山作诗，先闭门酣卧。这就有点意思。德国哲学家康德氏，于其搁笔凝思时，恒注目窗外远处的一棵树梢，一日此树被伐，遂致文思枯索。英国文豪约翰生，每于深夜，踽踽街头，遇电杆则以拳击之；若身已走过，发现遗一电杆未击，必回身补击之。这也有趣的很。但此皆见于记载，何必谈它？我们还不如近处取材，谈谈当代的中国文人。

当代的中国文人之中，不佞只于几位新文艺作家有些所见所闻。诗人朱湘蓄长发及肩，状如古板上所见披发行吟之屈大夫；后先生竟亦是投江而死，此亦大奇！又白采先生喜于案头置一极精巧之珠漆小棺，白莽先生喜以骷髅脑袋作书案小摆设。但此皆得之传闻，未知翔实。而今这几位也都亡故了。

俞平伯先生酷喜昆曲，执教清华时，居南院，家中聘一笛师，每课毕及星期假日，则携一篮，中置笛子曲谱与水瓶茶杯之属，偕夫人公子暨笛师，到校后圆明园废墟中大吹大唱，往往流连终日。夜间及风雨天，则于寓中行之；星期六之日虽至夜深，歌声笛声不止。又闻一多先生，自民二十前后亦任清华教授，喜穿“双梁鞋”“扎脚裤”；此时新士大夫阶层无论中装西装皆穿皮鞋西服裤，闻先生独保持民初服式，故显得古香古色，极为惹眼。我已快十年没看见俞、闻二先生，现在如何，不敢妄测。但若许我妄测的话，我敢说他们十分之九不会改变。

小说家张天翼住在南京他的令姊家里时，喜欢带点稿纸，跑到熟朋友住处去写文章。又有一奇习，就是喜欢有两个指头扯他的下嘴唇。在他写稿子凝思的时候，听人家谈话的时候，必将其下唇连连揉而扯之，愈想或听得入神，则愈扯得上劲。问他为何这样？他笑而不答。后来我查明白了。此习之起，是因为他的下唇的里面破了一块皮，破处结疤，他即揪着嘴唇，将此疤于牙齿上面揉破之，等到再结为疤，再揉破之。随破随结，随结随揉。积日既久，疤上加疤，遂致长成肉茧。若不揉扯它，就有些难过；若是揉扯它，则颇有趣味。——是这个道理。但是当初既已结疤，又将它揉破做什么？这却没道理可说。杂文作家魏猛克喜躺着看书，同时脱了袜子，自搔其脚丫，及倦而抛书，则将其臭袜子夹入书中，以作书签；及起而整装，则另取一双袜子穿之；及再躺下看书，随手另拿一册，看了一会，又以刚自脚上脱下之袜夹入之。故其床头抛乱的书多夹着此种奇妙的书签。

我结识老舍先生暨何容先生亦已多年。二位先生皆正正常常，合情合理，想发现他们什么特殊习性，简直无懈可击。近年过从较密，竟被我“把握”到一些些。原来何容先生睡觉喜以被蒙头，如小孩子听了鬼故事之后睡觉者然。又酒后话多，说来说去，反复无已，只是那一句。但此一句必是参透吐情，至警至辟之语。老舍先生除每晨必打一套太击拳外，于写稿停笔时必以骨牌“打通关”，以养精神，以助文思。其骨牌置于床上；写了一会，遇着

了问题，即离开桌子，坐到床沿上，打一会通关。问题有了办法，立刻丢开骨牌，继续伏案去写，不管通关有没有打通。又嗜食苦瓜。他到敝寓串门儿，自己买了苦瓜带来，托为炒菜佐餐。问是否须放水中漂一漂，漂去它一点苦味。先生乃大惊诧：“就是要吃那个苦味儿！”我试吃了一筷子，其苦赛过奎宁，不禁连刮舌头。

或说，这里所谈的，有些无非是小小的习嗜而已，多还算不得癖，至少不奇不怪。这是可以说的。但也要看发展下去不。比如何容先生，倘若将来在炎天暑热时候，也要弄床棉被蒙着头始能睡觉；比如老舍先生，将来若从苦瓜中提炼出精或粉，以瓶装随身带着，吃饭时必须于菜及汤中搁它一勺，如平常之放盐放油或放味精味素者然：这时请问以为何如呢？

（原载 1942 年 7 月 16—24 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敬悼佩弦先生

近年来心情常在焦躁沉郁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觉得格外简淡起来。因为无善可陈，话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许多的师和友，久已音书断绝。虽然心里总是怀念着他们。

还是抗战胜利的那年夏天，和朱先生在成都匆匆见了一面，这以后信也没写过一封。恐怕我现在在哪里他都未必知道。八月十二日报载朱先生胃病又发，正在医院里行手术。我就觉得不很好。因为我知道他“拖”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身已经多年了，若不是到了严重地步，是不会进医院去开刀的。果然，第二天报上就传来他的死讯了，说行过手术之后转成肾脏炎，因为体力太弱，终于不救。

朱先生的死，细想起来真是所谓“势所必至”：以他那样认真不苟的人，处在这样的时世和境况，拖上了这样的病，不能休息，不能医治，只是听天由命地拖着，那结果早就可以预料的。看到报上所传的噩耗，当时只感慨地说：“唉，他才只五十一岁啊！”但心里实在没有感到多大的震惊。

叫我大大震惊了的，倒是在成都的那次会面。那时朱太太带着小孩住在成都，朱先生趁着暑假从昆明回来。我路过成都，从叶圣陶先生那里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特意去看他们。那地方可不容易找，是在望江楼附近名叫报恩寺的一座小尼庵的院落里。他们住着几间没有地板的小瓦屋，简陋，但很整洁。我先看见一位小弟弟，紧凑的个儿，清秀的苹果脸，穿着黑洋布褂裤，在小巷寮檐下阴处一张小竹凳上坐着，聚精会神地看书。看这小弟弟的形貌神态，简直是个具体而微的当年的朱先生。我走了许多冤枉路，找得满身汗，这一下知道找对了。但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羸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十一年没见面，又逢着这艰苦的抗战时期，变，是谁也要变的，但朱先生怎样变成这样了啊！我没有料到；骤然吃了一惊，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握着笔，穿得衣履整饬，想必正在房里用功；看见我，很高兴，慌乱的拖着椅子，让我到房里坐。一会儿工夫，又来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们都喊他“朱大哥”，坐满了屋子，大声地说笑着。朱先生各方面应酬着，作古正经，一点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前面，是个生人，于是他还不时“张罗”我参加谈话，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笔。但我看到他多么疲乏，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球凸露了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客人散了之后，朱先生和朱太太留我吃午饭。朱先生吃得很少，说吃多了就发胃病，而且只能吃面食。

我知道他患了胃病，是余冠英兄的信上告诉的。我也患过严重的胃痉挛病，属于神经性的，痛起来面无人色，话也说不出，满床乱滚。但一不痛，就食欲亢进；吃了东西，又是痛。后来承阳翰笙先生介绍，服了一瓶鹿茸精，掉了两颗大牙，病却从此没发了。当时我曾主观地设想朱先生的胃病和我的相同，把病状和治法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我也要试试看。”又一次的信说：“我的胃病时好时坏，难在有恒的小心。但以后得努力，不然日子久了，拖坏了身体，到了不大能工作的地步，那就糟了。”但以后的信上就没再提过胃病。我还当他慢慢好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患的是十二指肠溃

病，不但没有好，而且已经把人拖成了这样。

吃过饭，他废了午睡，同我谈到两、三点钟，叫我多多“囤积”生活经验，将来写些出来；又谈他自己研究和写作的计划。而后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几个人，参加几处聚会。吃完晚饭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远的赶回家一定淋得浑身透湿。

“这个病，目前我没办法，只好不要去管它。”这是当时他轻描淡写地说的一句话，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留在我耳里。他好像对他的病满不在乎。但显然的，他原先信上说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后得努力”的话，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抛开不顾了。我明白他那句轻松的话里的沉重意味，当时什么话也没说。

还在小学时，我就在新杂志上读过朱先生的诗文。俞平伯、朱自清，那是当时齐名的两位新诗人。民国十八年我进清华，知道朱先生任此间中国文学系主任。当时我们青年学生持一种奇怪的信条，以为求学当拿一科作为太太，另外一科作为爱人。我是把文学当做爱人的，因为我从小喜欢它；进的却是经济系。入校后最初半年，虽同在一个园子里，我没有和朱先生识过面，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这年冬季，一天刚忙完大考，和同学到大礼堂门前晒太阳，慢慢的台阶上一层层挤了近百的人。有些喜欢胡闹的，每见面前路上有人走来，大家就齐声对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时那人的脚步即无法抵御，不自禁合上节拍，走成练兵操的步伐，对着这人多势众，唯有窘得狼狈而逃。正在这样笑闹着，大路上来了一位矮矮的个儿，脸色丰腴红润，挟了大叠的书在手，趑趄着短而快的步子，头也不抬的匆匆走了近来。同学们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来。最初他还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经的走着。但随即他就理会到了，一时急得不知所措，慌张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阶上连连点着头，满面通红的逃开了。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还当他是高班的同学。但是当他走过之后，有些同学耸耸肩头，顽皮地伸舌头了。其中一位告诉我，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余冠英同学的怂恿，决定和“爱人”结婚，正式转入中国文学系。我到图书馆下面系办公室去找朱先生办手续。他仔仔细细看我的成绩单，看了很久，说：“可以，我准许你。”于是拿起钢笔签了字。他座位的前后左右书架上都是一叠叠横摆着的书，多半是新书，很少线装的。他的案头也摊着好几本。面前有篇正写着稿子，娟秀的小字，涂改得乱七八糟。他的矮小的个儿埋在座位里，精神很饱满，态度极庄严，但面孔发红，透着点忙乱神气，一点不老成。我想，大约这就是他的友人们所说的“永远的旅人的颜色”罢。

直到我离开学校，我记得一共选了朱先生三门课。一门是“诗选”，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我们得一首首背诵，上了班不时要默写。此外还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还和同班合作“拟柏梁体”。朱先生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愆，他也不肯放过。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双圈。常常使我们拿到本子，觉得对他不起，因为我们老是不免有点鬼混。另外两门，一是“歌谣”，一是“新文学研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书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他讲课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

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我所录的大致没错。

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的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们并未记下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实在不关重要。举个例说罢，他所讲的作家，照例要介绍几句籍贯和生平。一回，讲到刚出的小说作家张天翼，他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后来我到了南京，恰好认识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我赶快写信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谢谢我。

在校数年，我很少单独去访朱先生。他总是那么庄敬不苟，又爱脸红，对我们学生也过于客气。比如说，他称呼我，总是“吴先生”，总是“您”，听着实在有点使人发窘和不安。（直到成都那次会面，他才叫我“组绅”）是后来余冠英兄接了家眷来，住在北院朱先生寓处隔壁的房子里，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谈天打桥牌，有时顶头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里坐过几次。那时朱先生新结婚。朱先生对太太说话，也是非常客气，满口“请您”“请您”的，真所谓“相敬如宾”。那所房子我们取名“四个斋”，因为朱太太名竹隐，余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个“个”字，而朱余两夫妇又是四个人，他们合住着那所房子。在这“四个斋”里和朱先生的谈话，我现在记得几则。一次是谈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时《子夜》刚出版，朱先生推崇备至，说取材，思想，和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它走。“写小说，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小说，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也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这样的话，我不止听他说过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历史》和《别》。他似乎很生气地说：“那是什么！”随即就脸红起来。另一次谈及刚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创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说：“他说我这里有块疤。”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块没长头发的大疤。但觉得这说得不好，于是脸又红了。还有一次是鲁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进城去请他到清华来讲演。他拿着清华中国文学会的请函去的，但结果碰了钉子回来。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处就是系办公室。除了吃饭，上课和休息，他总在那围

着满架图书的座位里“埋”着。我到这里找他，多是为选课的事。他劝我多选外文系的课，劝我读第二年英文；我读了两年法文，也是他鼓励的。但对别的同学，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决不牵着同学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气。是有一位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有几本要看的书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图书馆书库帮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说的话更不客气。“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厌恶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后来为编年刊，向他索稿。到约定的时间去取，他还没有写完。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见他埋头写着，很是着急，稿纸上涂了许多黑团团。终于脱稿了，把稿子交给我，指着说：“你看看这几句。”我记得那几句大意是：“诸位若因毕了业，就自以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

我毕业那年，家境坏了，本想找个工作。照规例，要就业的到系里登记，外间来信要人，即为斟酌介绍。我登记之后，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两三次事，但到时心里又不甘愿，回说还是不想就业。那时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学校里再赖了一年。可是拖着太太和女儿，靠研究院数十元津贴和一点不可指望的稿金，实在不易维持。于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职业。那是在寒假中，说河南有个大学要教员，后来打听，又说不是。记得一天早晨奇冷无比，我遇见朱先生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风到邮局里打电报通知那学校说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但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为系务缠住，自己没法用功。听说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准许他放掉系主任之职。他说：“你看我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实在非用用功不可了。”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摆脱系务。

抗战期间，他从昆明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

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烦麻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下面说到他的工作计划：

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Q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做“世情书”。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 Formlessay；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这信正是他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我所传闻的，为了避空袭，背着仅有的一卷被子，进城去上课，住了几夜，又背着被子回乡下寓处那样

的生活中写给我的。长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会作评论，关于朱先生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就，这里也不能道及。以上我只拉杂琐屑的把我所见的他“这个人”细略叙述了出来。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见《背影序》）是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们，他毫无什么了不得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他把牢了大处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作这个时代的人了。

（见《标准与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国十一年他二十六岁时所作的长诗《毁灭》中的末段：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罢，
走！走！走！

（原载 1948 年 9 月《文讯》第 9 卷第 3 期）

